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八十年代西方政坛丑闻录



八十年代西方政坛丑闻录  
杨江华

## 第一篇 政治丑闻

## 民主党乘机发难 共和党化险为夷——“辩论门事件”之争

1983年夏，当人们对11年前发生在美国“历史上最丑恶的宪法危机”——“水门事件”还记忆犹新之时，美国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又转移到了另一桩同样发生在共和党人在任总统身上的政治丑闻——“辩论门事件”。如果说“水门事件”把在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从总统蝉联宝座上摇落下来的话，那么“辩论门事件”却只给了在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政府一场虚惊。但即使如此，“辩论门事件”仍狠狠地刺激了里根总统的政治神经。

### 两党备战 幽灵再现

1983年是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的第三年。当时，美国经济已爬出低谷、开始回升，失业人数也渐渐减少。这对里根来说无疑是他可能蝉联第50届总统的好兆头。事实上，1983年1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一致推举里根和布什再度参加第50届总统的角逐。同年4月，尼克松也表示希望里根重新出马竞选。里根自己也曾多次暗示，他的任务难以在一个任期内完成，并声称布什是他最理想的搭档。弦外之音，一闻即知。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也吹响了争夺第50届总统宝座的进军号角。迄止1983年6月，该党已先后有6人宣布争取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尽管这些竞选者还“玩不出多少惊人的花样来对里根挑战”，但却正在想方设法寻找突破口以图改变他们在竞选前的不利局面。

显然，共和、民主两党都在积极备战，以图在争取第50届总统宝座的竞争中决一雌雄。恰在此时，“水门事件”的幽灵又一次萦绕在白宫的上空。

是年春夏之交，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劳伦斯·巴雷特在其新著《同历史赌博》中披露出一条爆炸性消息。他在书中叙述到，1980年大选中，里根的竞选班子弄到了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竞选班子为卡特“准备的一份高度机密的总统竞选辩论简章的副本”，并利用这些材料赢得了同卡特进行的面对面的电视竞选大辩论的胜利。此事一披露，立即引起了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关注。美国各大报纸争先恐后地披露此事件的各个细节，有人“机智地”称之为“辩论门事件”。

为了“能轻易、迅速地”制止事件所引起的争论，里根的白宫班子于1983年6月28日主动地交出了1,000页“辩论简章”的文件材料。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朝着白宫所希望的相反方向的发展，那被打开了的“潘朵拉盒子”已无法关上。民主党人立即利用此事对共和党人大加挞伐，他们指责共和党“就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并敦促国会和司法部迅速调查此事。6月2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受司法部的委托开始过问此事。同一天，美国国会也成立小组委员会调查此事，领导该委员会的正是民主党人、众议员唐·阿尔博斯塔。唐·阿尔博斯塔接受此任务后，他发誓说，他将“毫不犹豫地动用一切必要和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彻底搞清这个问题。”

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里根总统不得不作出反应，但奇怪的是，他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开始，里根认为所谓“辩论门事件”只不过是新闻界“无事自扰”，因而竭力加以否认。到白宫将有关材料公布之时，他又说在此之前“从不知道有此事”，并依然狡辩道，这些材料又“不是什么竞选策略的东西。”言外之意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当7月9日，调查人员从他自己的竞选档案中发现有《卡特拟议的辩论和竞选宣传的策略》的材料后，里根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公开向新闻界表示，他

已要求内阁成员，包括他本人同联邦调查局“充分合作，”随时接受查询，以便“把真相搞清”，如果发现内阁成员有越轨行为则予以包括解除职务等必要惩处。

由于该事件又一次涉及到在任总统共和党人在竞选中的舞弊行为，再加上里根对此事件前后态度的转变与当年尼克松在处理“水门事件”时前后态度的转变有惊人相似之处，（即都经历了否认、默认、公开表态等三步曲）。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辩论门事件”是11年前“水门事件”幽灵的再起。

“偷来的政治商品”

“辩论门事件”败露之后，白宫班子的许多人似乎预感到大祸临头，他们就“象吓破胆的罪犯”纷纷出台作证。然而，里根总统却似乎毫无惊恐之色，他还一再申辩道，他们所获得的“辩论简章”并非“不是什么竞选策略的东西。”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只要分析一下白宫自己所公布的以及调查人员在里根1980年竞选档案中发现的有关卡特“辩论简章”材料的内容，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事实上，这些材料对于里根赢得总统大选辩论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有关卡特“辩论简章”的材料主要涉及到前总统卡特的助手们为卡特准备的内政、外交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提出了“在竞选中”卡特“容易遇到里根攻击的主张”；概述了“对卡特的对外政策”可能提出的“批评”；指出了预计会在辩论中“提出的问题 and 应作出的答复”。甚至还包括卡特的谋士们告诉卡特怎样舌战里根的辩论技巧。例如，在“辩论简章的副本”中就有关于这些谋士们建议卡特把辩论拉到不利于里根的主题上的片断。这些谋士们认为卡特要多谈谁更善于解决内外政策的话，他们说，“你（卡特）是谨慎从事的，而他（里根）就未必如此；你已经干得有点门道了，他却缺乏经验；你懂得事物的复杂性，他却没有。”等等。

如果上述材料还“不是什么竞选策略的东西”，那么什么才够得上是“竞选策略的东西”呢？无怪乎卡特的原新闻秘书鲍威尔在获悉“辩论门事件”之后气愤地说：任何人弄到这些材料都将是他在竞选中能搞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

据调查，里根的竞选班子弄到“辩论简章的副本”后，如获至宝，他们立即对这份“偷来的政治商品”加以研究。为了达到战胜卡特的目的，他们甚至不顾美国的政治道德准则，竟然把“简章”副本送给一位所谓“持保守观点的独立政治评论家”、新闻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乔治·威尔过目，并请他手把手地“辅导”里根如何准备那场“唯一的、也是关键性”的电视辩论。后来担任里根政府的预算局局长的戴维·斯托克曼自己也承认说，他在竞选期间曾多次扮演卡特与里根进行模拟辩论。不过，他接着竟大言不惭地说，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一种政治手段。”

由于里根早已摸清了卡特的底牌，“知己知彼”，又事先有所准备，因而他在1980年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对答如流，占了上风”。至于卡特则因天机泄露，在辩论中吃了大亏。

“鼯鼠”之谜

人们在了解了卡特被盗的“辩论简章的副本”的内容及其真正价值后，很自然地又把目光投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上，即里根竞选班子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卡特的“辩论简章的副本”的？是卡特竞选班子里有人主动提供的，还是里根班子有意识地、积极地去弄到手的呢？

在调查的过程中，人们确实发现里根竞选班子中有一大堆人牵扯到此事，而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了里根政府班子的主要成员。例如有罗伯特·格雷、威廉·凯西（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温·米斯（曾先后任总统顾问和司法部长）、詹姆士·贝克（后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戴维·格根（后任白宫联络处处长）、戴维·斯托克曼、里根总统的一名助理韦恩·瓦利斯等。其中凯西、格根在1980年竞选时，主要为里根收集竞选资料，贝克、斯托克曼则负责具体指导里根同卡特进行的“那场辩论”。令人吃惊的是，当这些人在被查询时，尽管他们中有的人主动地交待了他们在1980年总统竞选时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提供了一些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证据，但却“都说不知道是怎样得到这些材料的。”格根说，是凯西将这些材料转交给他的。而凯西却矢口否认，并说“不记得收到过这些文件”。

事实上，关于“辩论简章的副本”的来源方式问题，调查人员唯一能找到的较为满意的证据是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是在格根的卷宗档案中发现的。该备忘录上记载，里根竞选班子所获得的某项材料是从“同为卡特筹划辩论的一名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一位人士”那里得到的。这一证据正好与劳伦斯·巴莱特在《同历史赌博》中所提出的一个大胆的“假设”相吻合。劳伦斯·巴莱特在书中推测说，“辩论简章的副本”很可能是卡特竞选班子中的一个“鼯鼠”无偿地提供的。然而，谁是真正的“鼯鼠”呢？这只“鼯鼠”是否果真加合众国际社记者所报道的那样，他是里根竞选班子“安插在白宫（卡特任总统时）的内线”人物吗？

由于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始终没有找到“证据说明卡特总统的白宫与此事有牵连”，因此，他们最后只得把寻找“鼯鼠”的希望集中到里根竞选班子的身上，其中被怀疑的关键性人物是凯西。恰在此时，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被披露。1983年7月17日，美国《时代》杂志说，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根总统1980年竞选活动的经理人威廉·凯西曾经募集前联邦特工人员建立了一个政治情报网。他利用这些人从他们仍在任职的同事那里收集政治情报，以帮助里根进行竞选活动。遗憾的是，凯西及其助理随即发表声明对上述报道加以否认，而对他们在1980年里根竞选期间是否干过“盗窃”文件的勾当一事一直守口如瓶。至此，司法部和国会关于寻找“鼯鼠”的调查已走入死胡同，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1984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发表一份报告说，关于1980年里根竞选班子获取前总统卡特为辩论准备的书面材料一事，联邦调查局用了8个月的时间，向200多人作了调查，并检查了1,000多箱文件和录音带，但没有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此事已构成犯罪。同年5月23日，美国国会负责调查此事的小组委员会也发表了一份长达2,413页的报告。报告说，尽管大多数的证据表明，卡特的辩论提纲是“通过负责人凯西之手转给了里根——布什的竞选班子”的，但“没能确定凯西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关于卡特竞选战略的这些情报的”。这就是说司法部和国会对“辩论门事件”的调查，因无法解开“鼯鼠”之谜，最后的结局是：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但是，美国政界仍围绕此事争论不休。站在前总统卡特一边的人坚持说，“里根集团是以水门事件那样的手段入主白宫的”。而里根的助手们在“一场虚惊”之后，则指责民主党人和新闻界在“造假门”。

## 是谁在幕后策划——“彩虹战士”号被炸案揭密

1985年7月10日深夜，停泊在新西兰北部奥克兰港的一艘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彩虹战士”号奇怪地爆炸了，船上一名摄影师当场死亡。此事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严重关切。经过大量调查表明，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而新西兰警方找到的几条重要线索竟条条通向法国，引起巴黎满城风雨。真正的凶手和幕后主谋者究竟是谁……

### 午夜巨响 震惊新府

1985年7月10日深夜，新西兰北部的奥克兰港已寂静下来，一艘和普通渔船没有太大区别的船只停泊在码头上，它就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

“彩虹战士”号对国际新闻界，对新西兰、法国、美国等国政府来说都不陌生。它是绿色和平组织租来的一艘平底渔船，船长48米，自重约449吨。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国际环境保护主义组织，1970年由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发起成立于加拿大。到1985年时已有成员50万。该组织以反对核试验、反对捕鲸、反对运输核废料、反对环境污染为宗旨，成立15年以来活动频繁。3月间，该组织成员曾驾驶“彩虹战士”号去过夏威夷，在太平洋地区开展反对美国核试验的大规模活动。5月初，“彩虹战士”号又抵夸贾林岛，反对美国从加洲发射洲际导弹。这一次，他们又准备去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核试验基地——穆鲁罗瓦岛，抗议法国在该岛进行核试验。

大约零点时分，30多人从“彩虹战士”号上走了下来。他们在码头上拥抱、告别，最后互道“晚安”。25个人上岸走了，剩下的人又回到船上。

那离去的25个人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刚刚在船上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研究和部署了该组织即将采取的重大行动。回船的人是这条船上的船员，其中有一位葡萄牙籍摄影师佩雷拉。他们送走了领导之后，他们便各自回舱安歇。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船体立即剧烈摇晃起来。刚刚上床的船员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一位船员发现船体右侧被炸开了个大洞，海水呼呼地直往船里涌，马上大喊：“船被炸了，快上岸！”人们在慌忙中匆匆离船上岸。总共12个人，一会儿便全部登岸。这时，佩雷拉忽然想起他那心爱的高级照相机还在船上，就不顾一切地又飞跑回船上。不料，就在他踏上船的一刹那，贴在船左侧的另一枚水雷爆炸了，其声音之响，爆炸力之大，都远远超过第一次爆炸。船体歪歪斜斜地迅速往海底沉去，可惜，年仅38岁的佩雷拉也随之葬身海底。

爆炸声打破了奥克兰港的宁静，惊动了整个新西兰。当警方确知被炸的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后，顿感事关重大，立即向惠灵顿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新西兰总理朗伊获悉“彩虹战士”号被炸后，马上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封锁现场，搜索海面，全力以赴捉拿凶手。

### 条条线索 皆指巴黎

新西兰警方接到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开始了调查活动。警方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爆炸案的指挥部，抽调66名精干警察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兵分三路：一路奔赴现场，一路搜索海面，另一路前往秘而不宣的地方。

负责海面搜索的小队很快就在离爆炸地点不远的海面发现一艘可疑的小气垫船，但船上空无一人，无疑，是被人遗弃的。警察在船上找到一只潜水用氧气瓶以及通讯器材数件，上面还有两个人的指纹。这些器材不但有“法

国制造”字样，而且据检验还属法国的军用物品。

凶手会不会是法国人？警方的脑子里马上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与此同时，另一组在港口调查的小组也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据目击者披露，在案发的当天，有一对年轻夫妇驾驶野营汽车多次出没于“彩虹战士”号周围。调查人员立即抓住这条重要线索，他们询问宾馆、饭店，检查码头、车站和机场的过往游人。两天后，即7月13日，终于在奥克兰港找到了那对夫妇。过对夫妇执瑞士护照，但警察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了护照是假的，于是，当即把这对“夫妇”扣下了。

经盘问，这一男一女根本不是夫妻，他们也不是瑞士人，而是法国人。他们的护照是偷来的。这时，警察联想到小气垫船上发现的两个人的指纹，会不会是这对“夫妇”的。检验结果，正是他俩的。

原来，这对“夫妇”是法国秘密情报组织——国外安全总局的两名军官。男的是阿兰·马法尔少校，系国外安全总局行动处阿斯普雷多航海基地蛙人培训中心的教官；女的是弗朗索瓦兹·普里厄上尉，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安全总局情报中心任职。他俩于6月17日途径伦敦飞抵奥克兰港，冒充瑞士旅游者。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对“夫妇”在7月5日，曾租了一辆丰田牌小轿车，到过新西兰北部璜加雷港附近的一个小港，并与“乌维阿”号帆船上的3名法国船员有过接触。与此同时，另一路人报告：在案发前不久，“彩虹战士”号附近的海面上出现过“乌维阿”号帆船。

两个来源不同的情报都涉及“乌维阿”号。警方决定追踪“乌维阿”号，并呼吁有关方面给予支援。7月13日，澳大利亚诺福克岛的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发现了“乌维阿”号。他们马上通报新西兰警方，同时采取行动截住了这条船。经检查，船上的3个人都持有巴黎签发的护照。证件无懈可击，加上澳大利亚警察当时也无权传讯他们，所以只好释放，但没收了他们的一卷底片和一张奥克兰港详图。

当新西兰警察闻讯赶到诺福克岛时，“乌维阿”号已无影无踪。他们立即乘快艇追赶，终于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港找到了“乌维阿”号。但3名法国船员已不知去向。船上只剩下法国汤姆森公司的电子导航设备和洲际联络发射电台。

实际上，这3名船员都是法国国外安全总局的特工人员——阿斯普多航海基地的蛙人。今年6月，他们来到努美阿，在当地的游艇租赁公司租下了“乌维阿”号帆船。他们花了整整4天时间，在帆船上安装了通讯设备、电子导航装置、洲际联络发射电台。同时又租了一台压气机，3个减压阀和一只潜水用氧气瓶。6月20日，他们驾船来到璜加雷港附近的一个小港，与前面说到的那对假“夫妻”取得了联系。

随着掌握的情报越来越多，这3名法国船员涉嫌也越来越大。7月26日，新西兰当局发出国际通缉令，追捕这3名可疑人士。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调查，新西兰警方发现了3条重要线索，而这3条线索条条通向巴黎。

8月初，新西兰总理朗伊听取了“彩虹战士”号爆炸案调查小组的初步调查结果和分析，毅然决定派警员追到法国去，继续深入调查，捉拿凶手。

冠冕堂皇 贼喊捉贼

70年代初期，绿色和平组织就频繁活动于南太平洋，进行反核宣传。到



了 80 年代又有强化之势，法国军方为此深感不安。1984 年 9 月 4 日，法比尤斯总理和国防部长埃尔尼同时收到国外安全总局送来的一份关于绿色和平组织的绝密调查报告。报告中说，该组织与苏联某些宣传机构有直接联系，在南太平洋大肆活动，在反核、反法宣传中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正在成为一个很有动员力、十分危险的“压力集团”。这份编号为 39·81/CE 的报告鼓动上级领导部门下决心对该组织采取果断的打击行动。

1985 年 3 月初，法国核试验中心管理局局长亨利·法热海军上将从海军情报部门获悉，国际性环境保护主义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将驾驶“彩虹战士”号等 4 余船，前往南太平洋的穆鲁罗瓦岛，抗议法国在那里搞核试验。法热立即给国防部长办公室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侦察“彩虹战士”号的活动；主张国外安全总局可以不局限于收集情报，还可采取“有力措施”，扼杀绿色和平运动的抗议活动。

国防部长接到报告后，对法热的建议非常欣赏。3 月 4 日，埃尔尼召见国外安全总局局长拉科斯特海军上将，密谋此事。3 月底，两人再次会晤，决定派国外安全总局行动处的蛙人悄悄炸沉“彩虹战士”号船，并要求绝对不能造成人员伤亡。炸船地点选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港，因为帕皮提和新加坡定期有飞机飞往那里，潜入容易。而据了解，“彩虹战士”号又必将在该港停靠。

拉科斯特马上通报密特朗总统，对行动的宗旨和部署一一作了概述，并保证不造成人员伤亡，不留下蛛丝马迹，因此也不会牵连到法国。3 月 22 日，总统特别参谋长通知拉科斯特，国防部这一计划得到了总统府的批准。于是，拉科斯特一面向总理府申请特别活动经费，一面下令行动处开始行动。

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炸船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彩虹战士”号被炸以后，当新西兰方面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追查凶手时，法国方面则在热烈而欢快地庆祝国庆节，法国的报界对这桩后来成为爆炸性新闻的事件的报道也仅仅是几行小字而已。7 月 16 日，法国总理府获悉，新西兰警方已把调查炸船案的注意力集中于法国方面，新的情况表明，法国国外安全总局卷入了此案，被新西兰警方捕获的那对“夫妇”实际上是法国的两名特工人员。法比尤斯总理当即宣布组成一个内阁“危机小组”，参加者除了国防部长埃尔尼以外，还有内政部长若克斯、司法部长巴丹诺、总统府秘书长比昂戈。然而，这个“危机小组”并不想调查“彩虹战士”号被炸案的真相。“危机小组”在召开第一次会时，有两个人——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知道法国是炸船案的制造者。内政部长开始怀疑到这一点。但是所有人都不愿把牌摊到桌上，而是摆出一副追查真相的架势。

8 月 6 日，新西兰警察来到法国调查“彩虹战士”号爆炸案，尤其是法国国外安全总局涉嫌此案，这宛如两块巨石投入一泓湖水，顿时激起片片涟漪。舆论界为之哗然，反对党激昂慷慨。巴黎满城风雨。

8 月 8 日凌晨 1 点，法国政府公布了密特朗总统给总理法比尤斯的一封信。密特朗责成政府调查法卷入这一事件的真相。他表示，责任查清后，“不管犯罪者是什么级别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法比尤斯总理接到总统指令后，马上复信表示，要“请一位没有争议的人士来收集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情况”，以便使他能“最明确他说明法国情报人员和机构，以及法国当局是否了解这一犯罪事件的策划，或是否参与了这一事件。”当天下午，法比尤斯任命原戴高乐总统府秘书长、行政法院法官、无党派人士特里科负责

调查“彩虹战士”号事件。

一场由政府首脑导演的骗人把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遮遮掩掩 漏洞百出

自8月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下令政府调查有关法国卷入绿色和平组织“彩虹战士”号被炸案的真相以来，法国掀起调查“彩虹战士”号案件的波澜。在前一段时间几乎对此案不闻不问的新闻界，派出精干人马，对此案进行追踪调查。他们不断披露材料，爆出惊人消息。有些报刊开始怀疑法国有关机关参与了炸船事件，并指出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是国外安全总局的第二把手副局长埃曼将军。有的报刊更明确地指出，这样重大的决定，没有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的，现在社会党政府企图洗刷自己，把责任推到下级。

在事发初期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的法国各政党，在8月19日的参议院辩论会上打破了这种沉默。保卫共和联盟议会党团主席夏尔·帕斯卡说，政府应对“彩虹战士”号事件承担责任，不要想推出一些替罪羊来逃避其责任。法国民主联盟主席勒卡尼埃说，法国情报机关的行动是荒唐可悲的，他们显然是接受命令而干的，现在要知道是谁下的命令。这两个主要反对党都激烈指责政府并要法比尤斯总理辞职。

在传播媒介及参议会上闹的沸沸扬扬之时，法国有关当局始终保持沉默，无论是总统府、总理府、国防部还是被公开指责卷入的国外安全总局，均未对这一事件作过任何评论，对报界的指责也不置可否，他们在耐心地等待公布特里科的调查报告。因为他们相信，调查报告会“洗刷”掉新闻界对他们的指责。

8月26日，特里科调查小组终于拿出了关于法国同“彩虹战士”号被炸案关系的调查报告。特里科说，他查阅了“以前同事件有关的文件”和法国“外交代表及武官发回的电报”。会见了包括国防部长埃尔尼在内的许多政府成员，以及三军参谋长索尔尼埃将军、国外安全总局局长拉科斯特上将和他的主要部属等。他还听取了国外安全总局的几个工作人员的证词，特别是被派往“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特工人员的证词”。并同新西兰驻巴黎大使进行了接触。

特里科的结论是：法国政府一级没有作出过要使“彩虹战士”号蒙受损害的任何决定。国外安全总局没有给它在新西兰的特工人员下过与正确执行政府指示不同的命令。国防部长埃尔尼和国外安全总局局长拉科斯特都是“无辜的”。

至于被派往奥克兰的6名特工人员（他们是那对瑞士假夫妇、“乌维阿”号帆船上的3名法国船员和一名打入绿色和平组织的“女地质学家”），他们的任务只是监视“彩虹战士”号，他们在奥克兰港“严格执行”了他们上司的指示，“没有任何越轨行动”。

关于谁是肇事者，特里科提出有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孤立的个人行为”；第二，可能是别的特工部门干的，而“让法国为行动承担责任”，从而“损害法国”。

调查报告发表后的第二天，法比尤斯总理又发表声明，重申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利益不容触动，并再次指出那6名法国特工人员不是作案人。总理要求新西兰政府提供证据，并表示“如果证实确是法国人干的，一定法办”。

新西兰对特里科报告和法比尤斯的声明极为不满，认为法国的结论为时尚早。朗伊总理8月27日对记者说，他的政府欢迎特里科去新西兰继续调查，

并保证为特里科的调查“提供方便”。他还要求法国总理就法间谍在新活动一事道歉，否则，他的政府将驱逐法国驻新大使。

特里科调查报告漏洞百出，缺少起码的可信性，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巴黎《解放报》头版大字标题是：“毛线越洗越干净”（在法文里，“特里科”这一姓氏与“毛线”拼写法一样）。然而，在这份急于为政府开脱责任的报告中，特里科埋下了两颗定时炸弹。首先，他突出了总统特别参谋长索尔尼埃在事件中的关键作用，从而把总统府推到第一线。其次，他在报告的最后指出，“一项必须很快进行的行政调查很难作出最后结论”。“在提出这项报告之后，在法国应该再进行一次更为详细的调查研究。”特里科在报告公布后甚至公开表示：“不能排除我在调查中也受到愚弄的可能。”

这实在是一份令人哭笑不得的报告。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嘲弄报告是“专业化造假的范例”。

法国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政府内对此事态度不一致导致出现了内阁危机。法比尤斯总理和内政部长若克斯决心压总统做出“牺牲”国防部长的决断，从而达到保全他们的目的。在新闻界的卷入下，一场以埃尔尼为目标的“狩猎”开始了。

舍弃车马 保全将帅

特里科调查报告不但未能平息事态，反而使人们对政府遮遮掩掩，推卸责任的做法愈加反感，新闻界更是不甘寂静，各报纷纷捅出内幕，掀起了“彩虹战士”号事件的第二次冲击波。

9月17日，法国一家大报《世界报》在头版刊发独家报道。这家报纸引用了多种消息来源。它说，在奥克兰炸沉“彩虹战士”号并炸死了一名绿色和平组织船员的炸弹，是与已经被点名的那些法国特工人员不同的第三批身份未明的特工人员安放的。法国国防部长埃尔尼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事先已经知道这一行动计划，而且很可能就是他们授权特工人员干的。这家报纸还说，法国国防部当局对特里科提供的情况是假的。

这一披露是致命的，它彻底击垮了国防部长的辩护词。《世界报》刊出上述报道之后，埃尔尼感到大势已去，立即打电话给总统提出了辞呈。但是，总统加以拒绝。埃尔尼以为，这是总统在鼓励他顶下去。于是，国防部当晚就发表了一份公报，指责有人正在为诋毁法国军界而造谣生事。同时，他自己也向报界发表讲话，声明他从未下达过要炸沉“彩虹战士”号的命令。

次日，到了内阁会议上，埃尔尼才看到事情无法挽回了。法比尤斯态度十分明确，事件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他告诉总统：“我非常理解您的难处。”开会的时候，埃尔尼完全意识到，总统已经把他抛弃了。会上，内政部长的发言几乎变成了对国外安全总局的起诉。

内阁会议后，埃尔尼与总统进行了一次长谈。离开总统府时，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和痛苦。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统已经感觉到水在不断涨高，只好决定把他一个人沉下水底。换句话说，总理和内政部长终于得手了。他被推落陷井，再挣扎也无济于事。

9月20日，埃尔尼正式向总统递交了辞职书。埃尔尼是密特朗30多年来的挚友，两人关系甚笃。密特朗当上总统后，他又成了密特朗的得力助手。对他的辞职密特朗不免感到惋惜，但现实又是如此“严酷”，迫使密特朗不得不择泪割爱，同意了埃尔尼的要求。同一天，总统府发表了密特朗写给埃尔尼的信，信中对他充满了赞誉之词。

在埃尔尼挂冠的同时，政府又解除了拉科斯特上将国外安全总局局长的职务，全面改组国外安全总局。

9月22日，法比尤斯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承认是“国外安全总局的人员炸沉了这艘船。他们是奉命行事。”次日，又通过法国驻新西兰大使向朗伊总理表示口头道歉。25日，法比尤斯在法国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说，是埃尔尼和拉科斯特两人采取的行动，“主意也是他们这一级拿的，责任应由他们这一级来负”。当记者问道他是否知道炸沉在奥克兰港的“彩虹战士”号的计划时，他说：“国防部长从未对我谈起准备炸船一事，直到9月21日。”这表明，法国政府想以两位官员的辞职和被革职来平息风波。果然，由于朝野主要政党在防务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反对派头面人物基本保持沉默，谁也不敢利用此事公开去捞政治便宜，除了新闻界一度还在关心究竟命令来自何人外，此事在法国逐渐平息下来。

#### 互有所求 了结悬案

法国在新西兰奥克兰港炸毁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被新西兰政府认为是对其主权的侮辱，也是对其领土上坚持和平的人民的挑战。所以尽管法国总理已向新西兰政府作了口头道歉，并请求新西兰政府对被逮捕的执行任务的法国特工人员免予惩罚，但新西兰政府并不理采，于当年11月22日，判处两名法国特工人员10年徒刑。

法国两名军官在新西兰被判刑，对法国来说是一件极其难堪的事。自9月以来，法国先后派出外长、条法司长、大使分别在纽约、日内瓦以及巴黎就两名军官被关押的问题，同新西兰相应级别的官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谈判，但由于新西兰公众舆论中80%主张法国“间谍”必须在新西兰服满刑期，谈判没有结果。

次年3月，法比尤斯下台，希拉克组成内阁。这尴尬问题悬在那里，如同“脚上扎了刺”，“很不舒服”。虽说系前届政府所为，但毕竟是法国的“家丑”，需要尽快拔掉。总理府办公厅主任说，政府为此进行了“困难的”、“小步的”、但“大量的”秘密外交。与此同时，法国对新西兰政府施展了“巧妙”的经济制裁手段，频频施加压力。海关对来自新西兰的货物严加“检验”，百般挑剔：食品罐头常常“不符包装标准”，冷藏羊脑“不宜食用”。

新西兰农产品丰富，20%销往西欧共同体国家。在1986年8月1日以前，共同体将重新审批1987—1988年度新西兰的黄油、羊腿出口配额。共同体规定，在成员国一致同意下，才允许第三国货物进口。4月底，希拉克总理曾暗示说，如果两名法国军官继续在新西兰服刑，法国人将无法理解欧洲还会进口新西兰货物。新西兰政府一听，就辩出了此话的“含意”和“份量”。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也放松了口气，表示愿意在一定条件下解决这桩影响法新关系的悬案。

6月19日，新西兰和法国政府宣布，请求联合国秘书长解决它们在“彩虹战士”号问题上的争端。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裁决”下，法、新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拉下了“彩虹战士”号悬案的帷幕。

根据协议，法国向新西兰正式道歉；法国赔偿新西兰700万美元；法国的两名特工人员离开新西兰，前往法国在南太平洋豪岛的一军事基地“服刑”3年，其间可同家人团聚，但不得与新闻界接触，在两国政府达成新的协议前，他们不得离开军事基地；新西兰可同过去一样，向欧洲共同体出口其产品。

历时一年的“彩虹战士”号被炸案终于得以了结。

## 跌宕起伏，似了未了——“伊朗门”事件曝光

石破天惊 风波乍起

1979年11月4日，激动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0名使馆人员扣作人质，酿成了轰动一时的人质事件。从此，美国和伊朗成了冤家仇敌。

7年后的这一天，黎巴嫩的一家不起眼的杂志《船桅》周刊，登载了这么一条新闻：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曾于当年5月秘访德黑兰，同伊朗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伊朗方面要求美国提供军火。随后，数架美国运输机给伊朗运送了战斗机零件和弹药。

同一天晚上，出席庆祝德黑兰青年学生占领美国使馆7周年集会的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突然宣布，麦克法兰曾秘访伊朗，时间是1986年5月28日。当时，麦克法兰带着4个人，装扮成机组人员，手持伪造的爱尔兰护照，乘一架装有武器零件的飞机抵达德黑兰国际机场。他带来了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亲笔信，信中要求改善美伊关系，要求伊朗帮助释放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此外，他还带来了几件礼物，其中有一本里根亲笔签名的圣经，一块象征美伊打开良好关系的钥匙形蛋糕和准备赠给伊朗官员的象征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几把科特式手枪。拉夫桑贾尼声称，他下令将麦克法兰及其随从软禁在旅馆达5天，此后，他们被驱逐出境。

犹如平地里刮起了一阵狂风，整个世界都被震惊了。

目瞪口呆，兴高采烈，惊慌失措……这就是各种人听到这两条消息后的最初表情。当然，反应最灵敏，行动最快的要数那些“唯恐天下不热闹”的西方记者了，他们立即施出浑身解数，连篇累牍地追踪采访报道。多次的新闻大曝光，使这股狂风越吹越大，终成暴风骤雨之势。

阿拉伯国家对此的反应有的强烈，有的温和，有的沉默。最感恼火的是伊拉克，“感到被出卖了”，但是，一贯强硬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又不准备“同美国断交”，认为这是以色列“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破坏美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阴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则表示震惊和失望，批评美国的作法“使华盛顿丧失了在这个地区的信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则默不作声，各怀心思。

美国的西欧盟国也在埋怨，一些官员认为：“我们有种受到愚弄的感觉。”他们批评美国违背了它曾经要求它国恪守的信条，表面上振振有词地宣称决不向恐怖主义分子妥协，并不遗余力地反对向伊朗出售武器，暗地里却另行其是，这损害了美国在其盟国中的信誉。

美国国内的反应，犹如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

美国虽然是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但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经济实力的削弱，水门事件和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使美国人感到国家实力的衰落，对国家的信心也随之动摇。前总统卡特的私人民意调查专家卡特尔写道：“美国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中，这场近乎无形的危机不同于南北战争或大萧条。它与其说是物质危机，毋宁说是心理危机，信任危机，它表现为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雄心勃勃的里根总统似乎给美国注入了活力，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所恢复，外交较为活跃，美国对手苏联则面临许多困难，不得不从世界各地收缩。这些“重振美国”的努力，重塑了公众对国家力量的自信，恢复了“美国第一”的优越感。美国人的心理“越来越平衡”了。里根的声望在执政6年来也达到了高峰。

然而，此时此刻，从黎巴嫩和伊朗传来的消息又使美国人的心理难以平衡了。新闻界和国会就象炸了窝似的，闹得满城风雨，批评和指责如同狂潮般席卷而来：政府同关押人质者谈判，违反了政府宣布的一贯政策，即决不同恐怖主义组织做交易，决不同伊朗，利比亚之类的“邪恶国家”谈判；向伊朗运送武器破坏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禁止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法律和在两伊战争中严守中立的法律；秘密外交活动背着国会进行，违反了行政当局应定期向国会通报秘密活动的法律。激动的批评者们最后集中于一个声音：“里根总统必须出来向美国人民澄清事情真相！”

#### 里根露面 应付尴尬

面对咄咄逼人的国内外舆论潮流，一向镇定自信、谈笑风生的里根，仿佛老了许多。1986年11月13日晚，他出现在全国电视广播网的屏幕上，神情呆滞，表情尴尬。他首次承认。一年半来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秘密外交接触，他的确于当年5月派麦克法兰秘密访问伊朗，并曾授权向伊朗提供武器。他接着辩解说，政府之所以要如此做，是因为它有4个目标：同伊朗恢复关系；结束两伊战争；消除中东的恐怖主义；使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他重申，政府的这些做法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保持沉默的风险已超出了把事情讲出来的风险。”

此后不久，里根无可奈何地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些天来，我喉咙里犹如卡着一个苦胆”。可见其窘迫之状。

11月9日，里根在白宫又举行了一周来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面对那些令人头痛的，曾被西奥多·罗斯福骂为“扒粪者”的“无冕之皇”们，里根显得局促不安，回答问题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他试图进一步解释他的政府在美伊交易中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这一交易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一次失败，相反，这场“风险很大的赌博”是有条件地进行的，并且达到了部分目的。

他说：“我就象一个赌徒，知道这个行动所冒的巨大风险。但这是我的一项活动，是我一个人的活动，我对胜负负全部责任。”“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尽管我没有象法律规定的那样及时向国会报告。为保护美国人质的生命安全，继续在某些方面保密的作法是正确的。”他接着责怪新闻界对这一交易的披露断送了另外两名美国人质获释的机会。

他还使用了林肯的名言作自己的挡箭牌：“假如事实证明是对的，这些指责将无关紧要，假如证明是错的，10个天使说我是对的也没用。”

当被质问到他是否破坏了向伊朗禁运武器的政策时，他摆了摆手，有些慌张地说：“为了我们的目的，放弃一下禁运是值得的。当然，武器禁运现在和将来仍继续有效。”

当被问及是否有其它国家参与此事时，他表示没有。但记者招待会结束后10分钟，白宫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说：“人们可能对我今晚的一个回答会产生某种误解。确有一个第三国参与了我们的秘密计划。”但声明称第三国向伊朗运送武器不是由华盛顿授意的。所谓的第三国，白宫虽没有点名，但人们自然想起了以色列。

显然，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乱了方寸的，他未能平息国内外舆论的不满，没有平息国会山里嘈杂的指责声，反而使公众的疑团越来越大。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则穷追不舍，声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国会两院不断举行听证会进行调查，案情越揭越深，大有要把共和党政府拉下马之势。

## 事出有因 祸起萧墙

里根政府为何竟同被他们称为“邪恶之国”的伊朗打起了交道？而伊朗又如何接受了“大撒旦”的橄榄枝？说来话长。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曾经繁华一时，如今却成了世界闻名的恐怖之都。各派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组织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较量，炮战，枪战，暗杀，绑架，劫持飞机等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矛盾的焦点是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的激烈冲突，而美国长期执行一条纵容偏袒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的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仇恨，自然，美国人成了某些阿拉伯激进组织搞恐怖主义活动的活靶子。

1984年3月，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站长巴克利遭绑架。此后一年多内，又先后有6名美国人遭到绑架，酿成了使里根政府伤透脑筋的人质危机。绑架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了释放人质的3个条件，即释放1983年因参与策划和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而被科威特政府投入监狱的17名囚犯；美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释放被以色列和南黎巴嫩军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提供贷款，开发南黎巴嫩。绑架者扬言，美政府若不答应其条件，人质将被逐个处决。

人质危机引起了美国国内各界的严重关注。里根政府一方面声称要作出强硬反应，拒绝与恐怖主义者妥协；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寻求人质获释的途径，但收效甚微，时间越拖越久。绑架者似乎不耐烦了，他们说到做到，1985年下半年，在被绑架一年多后，巴克利的尸体出现在照片上。

里根总统在处理人质危机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一些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纷纷抨击政府“遗弃”人质。此时美国正值中期选举的前夕，执政的共和党内部一些人也要求里根尽快想出办法，以缓解舆论压力，增强共和党人的选举资本。内外交困，里根寝食难安。

真是没有办法吗？不是。在美国政府为人质释放所作的种种努力中，他们发现，要找到一个既不答应绑架者提出的条件而又能使人质获释的办法，那就不能不与美国的冤家——伊朗打交道。因为伊朗对绑架者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这一发现使美国政府啼笑皆非。

正当里根政府苦恼之际，1985年8月，从贝鲁特和海牙国际法院传来了信息：伊朗政府内部至少有一个派别的人对恢复同美国接触感兴趣，急切地希望同美国坐在谈判桌前。这一消息使白宫格外兴奋，里根当即召集国务卿舒尔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国防部长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等进行紧急磋商。里根认为，应该接住德黑兰抛出的红线，同伊朗谈判不仅可以为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能着眼于今后，即寄希望于霍梅尼之后，使美国“重返”伊朗。同伊朗恢复关系，对于美国搞活它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一盘棋是有巨大好处的。

而伊朗这方面，由于它同伊拉克打了6年，国库空虚，武器不足，经济上处于困境，国际上处于孤立境地，因而伊朗也有与美国做交易的愿望。这一政策重多地反映了以议长拉夫桑贾尼为首的温和派的主张，并得到了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首肯。霍梅尼曾说：“如果我们走一步，大撒旦就会走100步！”

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兴致勃勃的里根最后拍板：立即进行美伊秘密接触。这一任务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具体承办。另有报道说，早在1985年初，里根就批准了一份由麦克法兰拟定的计划，通过以色列向伊朗供应武器和零部件，改善美伊关系，使伊朗帮助释放美国人质。该项计划由麦克法兰和其



助手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诺思中校具体负责。

在这场交易中，以色列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掮客的角色。“摩萨特”特务，军人商雅各布·尼姆罗迪曾作为美国的代表，同伊朗实业家马努赫尔·古尔巴尼萨尔商谈具体交易办法。1985年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迈克尔·莱丁在以色列的安排下，在欧洲某地会见了古尔巴尼萨尔。1985年9月3日，以色列官员向麦克法兰转达了伊朗方面的意向，即若美国能向伊朗运送一飞机军火，伊朗将在一天内帮助释放一名美国人质。麦克法兰当即拍板同意。在1985年辞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麦克法兰仍继续为美伊交易而奔走。1986年5月，他亲赴德黑兰，钉下以后爆发“伊朗门”事件的楔子。经过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易。

1985年9月，以色列先后两次租用DC—8型运输机满载“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同期，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美国人终于尝到了甜头。9月14日，里根打电话给佩雷斯，对以色列的合作表示感谢。就在此时，白宫幕僚们在是否继续进行美伊交易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以舒尔茨、温伯格为首的一方，主张停止美伊交易，而以凯西和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为首的另一方则认为，如果需要的话，同魔鬼打交道也是可以的。双方毫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里根为调和双方矛盾，表示暂时停止与伊朗的接触。美伊一度回到互不来往的状态。

但是，问题并未解决、人质危机又紧迫起来，并严重地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里根权衡再三，终于下令恢复美伊军火交易。1980年7月到同年10月，美国先后两次给伊朗运送了军火，美国人质詹森、雅各布森先后获释。参议员邦伯斯估计，美伊军火交易总额可达1亿美元以上。

#### 奇峰突起再掀波澜

1986年11月25日，华盛顿的晚秋使人觉得阵阵寒意，而此时的白宫东室内空气闷热、气氛紧张。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似乎预感到今天的气氛非同寻常。

不久，表情凝重的里根急步走上讲台。他看了一眼鸦雀无声的会场，然后慢条斯理地说，由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和他的副手诺思中校参与一起他一无所知和不能容忍的活动，他宣布接受波因德克斯特的辞职，并将诺思革职。他声称，这项活动未经他授权，直到11月24日他才获悉此事。他说，“出了这样的事，我很痛心。”

听众顿时屏住了气息。

司法部长米斯也走上了讲台，他宣布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周密调查后证实，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的款项，有1000至3000万美元被国家安全委员会转入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在瑞士银行的账户，知情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助理诺思中校，波因德克斯特也略知一二，但没有设法制止。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对此毫不知情。以色列参与了此事。

米斯的话一讲完，会场上顿时一阵轰动，兴奋的记者们一窝蜂地涌向电话，电传机，争先恐后地向世界报道这条爆炸性的新闻。

案情复杂化了，伊朗军售案忽然演变成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丑闻”，成为美国“自水门事件以来的最大轰动”。绕过国会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违反了武器控制法和国家安全法；以武器交换人质，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相矛盾；而擅自挪用款项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又直接违反了1934年的博伦修正案。几个问题相互交织，里根政府一错再错，使得案情更加扑

朔迷离。

这时美国舆论界格外热闹，传闻不断，里根和他的政府面临更严重的危机。美国 ABC 广播网和《纽约时报》12 月 2 日联合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是 50% 以上的人认为里根知道转移款项一事，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里根在掩盖事实，里根的支持率从 1 个月前的 67% 陡降至 46%，下跌了 21 个百分点。新闻界则不断提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并表示要穷追不舍，提出一系列的疑点和问题逼迫政府回答。

里根知道了什么？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伊朗官员于 11 月 28 日发表讲话，威胁要公开麦克法兰 1986 年秘访德黑兰期间与“白宫某人”通话的录相带，以示里根“欺骗美国民众。”《纽约时报》12 月 8 日进一步透露，麦克法兰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早在 1985 年 8 月里根就批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军火，这与官方宣布的里根只是事后才知道的说法不符。12 月 7 日和 10 日，众议院议长奥尼尔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索拉兹分别表示，他们坚信里根总统知道军售款项转移一事。

内阁成员中有多少知情者？11 月 27 日，白宫内部有人向新闻界透露，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早在 1985 年就得知美伊接触，他对军售款项转移一事也了如指掌。里甘系里根多年挚友，他陷进泥潭，里根岂能清白如故？11 月 28 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小组委员会给司法部写信，把副总统布什，白宫总管里甘，司法部长米斯，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等人，统统列入怀疑对象。

军售款项到底转向何方？按照司法部长米斯 11 月 25 日的说法，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钱是由以色列转交的。但第二天以色列表示，所谓转交行动与以色列“毫不相干”。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也断然表示他们分文未收。《纽约时报》于 12 月 2 日披露，这笔钱还部分地转给了安哥拉反政府军和阿富汗游击队，而不象官方所说的仅限于尼反政府军。12 月 14 日，麻省《洛维尔太阳报》又抛出一条爆炸性新闻，称军售款项中有多达 500 万美元用来资助 11 月国会中期选举中赞成援助尼反政府军的保守派候选人。

诺思的能量真有那么大吗？在整个“伊朗门”事件中，奥利佛·诺思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他 1943 年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1968 年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校毕业后，加入海军陆战队，赴越南作战。以其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忠心耿耿而深受上级赏识。海军陆战队司令曾称诺思为“热情先生”。里根也称赞说：“他有良好的行为纪录，他是国家英雄”。在越战中，诺思获得一枚银星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朋友们称他为“兰博”。的确，诺思那鲜为人知的经历同“兰博”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据说，有一次他被 10 名越军包围，当时他身上只带着一把塑料叉子，情况十分危机，但最后诺思还是脱离险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81 年，诺思由海军部长推荐，进入白宫工作。此后，他一直负有许多秘密使命，往往早晨在华盛顿，晚上则出现在欧洲某地追缉恐怖分子的现场！1985 年 10 月，他参与策划成功地拦截载有劫持意大利邮船“阿基莱·劳罗”号的恐怖分子的埃及飞机。

在伊朗门事件中，诺思一直是个关键性人物。他亲自参加了同伊朗的交易，寻找出售武器的中间商，安排把出售武器所得款项存入瑞士银行，并 9 次亲自指挥在尼加拉瓜境内空投补给。在美伊武器交易败露后，诺思销毁了大量有关文件。在被迫辞职后，他仍指使其女秘书霍尔到办公室取出匆忙中未来得及处理的文件，忠心耿耿的霍尔把文件藏在靴子里和衣服里，躲过白

宫警卫的检查，带出来予以销毁，

尽管诺思成绩“显赫”，但他只不过是个中校，那有这么大的胆量独自制定并实施如此一项复杂的计划？他销毁文件的举动是否有人指使？值得注意的是，诺思本人私下总对朋友发牢骚，说他所干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那么，是谁下的命令？

随着案情的深入，公众的疑团越来越大。

阵脚慌乱白宫“内讧”

“伊朗—尼加拉瓜”双料丑闻刚败露，里根班底便慌作一团，纷纷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自己“清白无辜”，并相互推诿指责，怕火烧到自己身上。

国防部长温伯格放出风声说，他早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有关备忘录上对美伊交易一事批注道：“此事荒唐”当他得知军售款项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时则似乎怒气十足，说：“这种事本来不应该发生，我感到十分惊骇，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是可以的，但不能用这种方式，应由国会拨款。”12月4日，他指责麦克法兰在美伊交易问题上给里根出了“馊主意”。

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则称他在该案中“没起什么作用”，直至1986年10月才“听说”转移款项一事。

号称“美国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国务卿舒尔茨自称一直反对“武器换人质”的作法，对具体情况也只是“略有所闻”。但麦克法兰斥责舒尔茨撒谎，他称舒尔茨经常听取他关于秘密使命的汇报。话说回来，即使情况真如舒尔茨自称的那样，作为堂堂美利坚合众国对外政策的执行人，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竟一无所知，那只能说明他是一位“只是部分时间处理对外政策的业务经理。”

有意在1988年问鼎总统宝座的副总统布什则竭力与里根保持距离。他先是默不作声，避免发表任何评论。但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终于在11月28日打破了沉默，他承认，美伊交易“损害了我们的信誉”，但“此举对于阻止苏联对伊朗的入侵是有特殊意义的。”他说他知道美伊交易这件事并曾表示过支持，但他进一步说，“在某些方面表示过某种程度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这一丑闻可能损害了他尚未宣布要参加的总统选举，他说：“我知道有许多猜测，我认为，如果有人在外面正在刮台风的时候就试图预测两年后的气候情况，那么，我想他肯定是疯了。”

阁僚们忙于自保而无暇救驾倒也罢了，可有的人反戈一击，将里根推到更加难堪的境地。麦克法兰在国会作证时反复声称里根事先批准了向伊朗出售武器，副国务卿怀特·黑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不客气地指责了里根。温伯格也说里根对军售款项转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是知情的。面对这番景象，里根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有消息说，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里根频繁与尼克松通电话，向他讨教办法，并倾诉了满腹苦水。

步步为营 里根“脱险”

里根毕竟是里根，面对四面楚歌，他逐步改变了硬顶的策略，试图化被动为主动。

1986年11月26日，他指名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前国务卿培德蒙·马斯基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组成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关举动。12月1日，里根召集托尔委员会和白宫其它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说：“我决定查清所有事实，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12月2

日，应国会的要求，里根宣布将由法庭任命一名特别检查官调查此案，并要求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他还表示，凡是有违法行为的人都要送交法院处理，政府有关部门对国会的调查将予以合作。

这样，里根政府、国会和司法部门多管齐下，摆出大查特查的架势。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外，从事此案调查的还有4个专门机构：托尔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联邦法院任命的独立检察官，由前司法部副部长沃尔什担任，将重点调查本案中的违法行为，并确定是否要对违法者起诉；另外两个是参众两院分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1986年12月6日，里根在戴维营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他首次承认：“显然，在执行（他制订的）对伊朗的政策中有缺陷，犯了错误。”他说：“我对这一行动引起如此激烈的争执深感失望，我对这一行动引起这么大的不安和震动感到遗憾。”“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会拨乱反正，我正在这样做。”里根的语调非常动情，几乎是在道歉。

里根的建设性举动稍稍缓解了他和他的政府面临的压力。但人们对此仍不满意，他们认为，里根没有说明究竟是谁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在什么时候犯了错误。民意测验表明，里根的支持率仍在下降。

其后的几个月里，国会多次举行公开或半公开的听证会，先后传唤了许多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前去作证，但进展不大。特别令议员们不满的是，伊朗门事件的关键人物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两人在听证会上对所有的重要情节守口如瓶，他们借口行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这样的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自证其罪。”谁也没想到，为堵塞美国宪法漏洞而制定的第五修正案今天竟被人当作掩盖其违法行为的一道“护身符”。

经过3个月的追踪调查，托尔委员会终于在1987年2月26日上午10时正式向里根总统递交了一份厚达282页的调查报告，从而把“伊朗门”事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份报告不仅在结论上与政府主要官员的证词大相径庭，而且对里根和他的许多亲密顾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报告透露，麦克法兰作证说里根曾亲自向他下达命令，支持向伊朗出售军火，而里根过去对这一行动表示是，“我恐怕自己受别人记忆的影响，”“我记不得过程了”。报告还指出，有关伊朗的主动行动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一系列的武器换人质的交易。”总统似乎的确采纳了其助手的“错误建议”。至于转移款项的问题，报告的结论是，“整个事件一直是，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很令人费解的，整个事件无法充分解释清楚”。报告指出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必须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公诸于众后白宫所出现的混乱局面负主要责任。”海军中将波因德克斯特“显然没有认清或是忽视了他的做法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冒了严重风险。”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知情的，“他没有迅速地把这件事向总统提出来。”而舒尔茨和温伯格“不过问事态发展情况”。

托尔报告使里根及其亲信大大松了一口气。报告没有发现证据证明里根知情。自从事件败露以来，里根并没有打算故意给美国公众制造假象或进行非法的掩盖行为。对于麦克法兰不利于里根的证词，托尔委员会先是认可，后又推翻了，因为这个判断是“模糊”的

难敌风潮 阁僚换班

托尔报告发表后，在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公众普

遍表示疑惑不解和诧异。新闻界讥讽说：“里根政府就仿佛是坐在汽车的后座里，汽车正冲下山去，却无人在前面把着方向盘。”“托尔委员会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太知道也不太想知道的总统形象。这份报告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情景：一个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受人摆布的总统形象，一个疯狂的政府，在那里人人都在竭力掩盖自己的罪责。”

暴风雨终于震憾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在事发之后，里根政府来了个大换班。先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和其助手诺思中校挂冠而去。本案的中心人物之一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在1986年12月15日突发急症，住进了医院。在做完脑癌切除手术后，于1987年元月提出辞呈。手术后的凯西说话困难，后来发展为半身不遂，再也不能出庭作证。1987年5月6日，凯西辞世。凯西是共和党的三朝元老，是里根多年的老朋友，他对白宫的决策有重大影响，在伊朗门事件中，凯西有重大的违法嫌疑，并掌握着许多重要秘密，如今他把这些秘密都带进坟墓去了。

麦克法兰，这位忧郁、严肃、勤奋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竟于2月9日服食了过量的镇静剂。他的妻子发现他昏迷不醒时向医院打紧急电话呼救，终于使他脱离了险境。警方根据情况，判定这是一宗“自杀未遂或企图自杀”案。麦克法兰还不到50岁，正值壮年，为何要自寻短见？在伊朗门事件败露后，他时常觉得有被人抛弃的感觉，长嘘短叹，神情抑郁。他曾向一位挚友沮丧地说：“想不到30年来的辛苦奔波，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充当人质，却因自己的忠诚和坦率沾上了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以至于毁于一旦。”

托尔报告敲响了里甘在白宫任职的丧钟。报告不客气地指出“里甘的所作所为几乎比人们记忆中近些年任何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都过份。他对白宫班子实行个人控制，并要求把这种控制扩大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个人积极参与国家安全决策，出席几乎所有有关处理美伊武器交易的会议。”其实早在托尔报告公布之前，里甘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素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著称，且脾气暴躁，不易与人相处，人缘不好。但他凭着与里根多年的老交情，仍我行我素，最后连第一夫人南希都给得罪了，两人多次吵架，互为攻击，夹在第一大人和白宫总管之间的里根却哭笑不得。随着这场闹剧的日益激化，里根不得不抹下脸来，抛出了替罪羊。一直恋栈不去的里甘从电视上获悉里根任命前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为白宫新总管，于是他写下寥寥一语的辞呈，黯然离去。

同时，白宫也出现了辞职浪潮，大小官员士气一落千丈，纷纷托词另谋生计。1986年11月至1987年2月，白宫滥用麻醉品顾问特纳，总统政治顾问丹尼尔斯，白宫联络处主任布坎南，副新闻秘书斯皮克斯等人相继挂冠而去。连两名负责帮助里根应付伊朗门危机的顾问沃利轰和阿尔希亦表示无意“奉陪到底”。

#### “忏悔”演说再渡难关

1987年3月4日是里根和其夫人南希结婚3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却被视为里根力图从“伊朗门”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再一次向全国公众发表了电视讲话。讲话中里根尽管对所犯错误“没有表示道歉”，但“这一演说的整个语气已构成一种道歉。”

里根说：“我已经为我的沉默付出了代价，使你们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但是，我同你们一样，不得等着弄清事情的全貌。”“我已经研究了托尔委员会的报告，其调查结果是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是激烈的，我全部

接受。”

里根的语气似乎是非常诚恳的，有后悔的表情，听起来挺动人的。他说：“首先，我要说，我应对我本人的行动和我领导下的政府的行动负有全部责任。”“我确实批准过（向伊朗出售武器），我只是不能说出在什么时候。”“尽管事出有因，但也不应对此原谅，这是一个错误。”关于把军售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里根说：“……一无所知，但是，作为总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谈到为解除这次危机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时，里根表示他正在着手进行3件事，即：调整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修订国家安全政策以及确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他还表示要“不仅从字面上而且从实质上同国会搞好合作。”

里根坦率的态度和追悔的表情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舆论的压力。民意测验显示，多数公众对里根的讲话表示满意。第二天《纽约时报》评论说“自从肯尼迪为1961年的灾难性入侵猪湾事件接受人们的责备以来，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如此公开地承认错误。”“只有一位总统深深地陷入了困境，并且充分认识到自己深深陷入困境的时候，才会象他今晚那样讲话。”里根“今晚显得好象已经得出结论：为了挽救他的总统地位，他必须把自己的骄傲自负一古脑儿都咽到肚子里去。”

有的报纸还评论说，这下子总统“渡过了转折点”。有的用打棒球的术语说，总统“这一棒击中了球，上了一垒，但并不是一次（稳稳得分）全垒打”。换句话说，前途还没有定局。一些普通人听了演说之后“倾向于原谅，但不是忘却。”甚至在向来挑剔的新闻界中也有人说，里根“在认错方面已经走得够远的了，你总不能让美国总统趴下来。”

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伊朗门”事件所造成的损失绝非发表一次讲话，整顿一下班子所能补救。托尔报告是整个事件的重要一章，而非最后一章。一旦在未来的调查中又发现新的严重问题或情节，风波就会再起。

为了摆脱困境，扳回失分，里根采取了场上“篮下易将”的措施。早在1986年12月2日他任命了“解决麻烦问题的老手”卡卢奇接替波因德克斯特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7年2月7日任命号称“协商大师”的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接替了不得人心的里甘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3月3日提名有“廉洁先生”美称的原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些人事安排都受到了舆论的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由这些“里根圈子”之外的人来担任上述职务，将有助于白宫搞好与国会的关系。

1987年3月18日，美国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将于5月5日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并批准给予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等人以有限豁免权。舆论称之为“一出政治剧的序幕”。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众参两院两个调查委员会共访问了200多名证人，询问了150多人，审阅了10万多字的文字材料。据报道，听证会使白宫的助手们忧心忡忡，他们早已为听证会可能出现意外而研究对策，为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作好准备。为了引起公众对听证会的注意，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不断在电视上发表谈话，从而给人们留下“伊朗门”事件远未结束的印象。

将军揭底府院斗法

1987年5月5日上午，华盛顿国会山的听证会大厅，记者们兴致勃勃地

等候着新的“猎物”，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则面无表情，正襟危坐，气氛不同寻常。听证会开始后，第一个出场作证的是曾任美国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退役空军少将西科德。

西科德 54 岁，为人坦率，办事雷厉风行，效率很高，功勋卓著，被其母校西点军校誉为“标准的美国将军。” 1975—1978 年曾任美驻伊朗空军司令。西科德是同“伊朗门”事件有牵连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随同麦克法兰秘密飞抵德黑兰。在此之前，西科德一直守口如瓶，对国会调查人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为此国会相当恼火。1987 年 3 月 19 日晚国会通过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对西科德提出起诉。

此时在听证会上，西科德与以往判若两人，快言快语，有问必答。他承认，美伊武器交易中获得的 1800 万美元利润中，约有 350 万美元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一行动得到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一些高级官员的支持。他说，他一向认为这些活动是得到里根总统批准的。因为诺恩曾告诉过他，他跟里根总统讨论过这个计划，并同总统开玩笑说，伊朗的阿亚图拉实际上是在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正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西科德的证词对里根是不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里根总统远比他及其助手所承认的陷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泥潭还要深。”

更使白宫惶恐不安的是麦克法兰的证词。他坚持认为，支付 200 万美元作为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的赎金是里根亲自批准的（里根对此的反应是“记不清了。”）他还说，1984 年 10 月众议员爱德华·博伦提出的有关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军援的修正案被通过后，里根仍指示有关人员继续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并亲自出面向一个中美洲国家首脑做工作，要求放行被扣押在该国的一批运送给尼反政府军的武器。“总统公开和私下里多次表示他不想失信于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指示要“保证反政府军持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直到国会再次同意支持他们为止。”

面对出现的新情况，白宫急忙调整对策。发言人菲茨沃特一改先前的表态，承认里根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决定有重大牵连，但坚持说里根没有做违法的事。他还发出妙语，称里根“了解合法的行动，不知道非法的行动。”里根本人也出来作了解释。实质性的问题是，里根到底有没有违反博伦修正案？

1984 年 10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博伦修正案中规定：用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或“从事情报活动的美国任何其它机构”的经费都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花在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上。这一规定在 1986 年 10 月前均有效。围绕着如何判断里根所了解的“行为”是否“合法”就产生了对博伦修正案的不同解释，各执一辞，见仁见智。

国会人士称，里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与博伦修正案背道而驰。白宫方面则坚持说，里根没有违反博伦修正案，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甚至表示博伦修正案只适应于美国的情报机构，而不适应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它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不是情报组织。因而，博伦修正案“对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安会没有约束力。”但民主党参议员莫伊尼汉则威胁说，如果一旦查明里根确实违反了博伦修正案，那么他就有可能受到弹劾。实际上，博伦修正案本身就象瑞士乳酪一样漏洞百出，这就难怪白宫与国会斗法了。不管结果如何，都使里根力图恢复白宫信誉的努力受到严重的挫折。宪法规定，总统应监督部下忠实地执行法律，对此，即使里根没有违法，他也难免有失职之嫌。

听证会还只刚刚开始，一些关键人物尚未出场。其中包括获得有限豁免权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

#### 风平浪静丑闻收场

华盛顿，1987年7月7日上午九时，一位身穿海军陆战队军官制服，胸前挂满勋章的军人大步跨进了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会场。在场的各大电视网的记者立即把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大约有5000万观众在等着看他的镜头。他就是诺思中校。这是他第一次在国会听证会上亮相。

当主持人宣布听证会正式开始时，诺思刷地站了起来，举起右手面对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宣誓。没想到，这个形象竟使美国公众如痴如醉，不久刮起一股“诺思热旋风。”

从电视中可以看到，面对连珠炮般的发问，诺思神情坦然，侃侃而述。这与他7个月前在国会作证时沮丧、紧张、支支吾吾的神情形成鲜明对照。美国观众第一次看到有人慷慨激昂而又头头是道地为美伊军火交易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辩解。诺思说，他从未直接同里根总统谈起过把军售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也从未看到过里根总统批准这一行动的文件。他表示，他并不是为里根总统打掩护。他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上级的批准，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他还公然批评国会：“我认为，这些听证对我们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使亲者痛，仇者快。”“尊敬的议员先生们，你们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结果总是宣判你们自己获胜。”诺思越说越激动，听众席上不时发出阵阵喝彩。

6天听证会后，“牛仔中校”诺思一举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被称为“典型的硬汉”。《今日美国》别出心裁设立了“诺思热线电话”，结果在7月7日至10日4天内收到6.7万个电话，其中5.9万个认为诺思诚实可信。一些年轻人甚至做了有诺思头像的像章，上面刻着：“诺思：民族英雄。”甚至还有人打出要诺思竞选下届总统的标语牌。有些人把诺思作为自己的择婿标准。好莱坞的编导则酝酿着如何利用诺思的故事拍成电影。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接踵而至，形成了特有的“诺思现象”。

当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从“诺思热”中冷静下来时，另一位关键人物波因德克斯特又登场了。诺思在作证时曾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上级授权的，因此作为诺思的上级，波因德克斯特的作证就显得格外重要。波因德克斯特为人稳重祥和，工作勤奋，头脑聪明，在里根政府处理一些重大外交事务过程中，他曾发挥过很关键的作用。

7月15日上午，波因德克斯特出场作证。他不象他的下级诺思那么镇定潇洒，相反他看起来似乎有些惊恐不安。他说，关于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款项用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他从来未向里根总统汇报过，是他亲自批准的。“如果我向他提出要求，他当时是会批准这一决定的。”“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坚信总统也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他所以要向总统隐瞒此事，是为了今后万一事情泄露，里根有“加以否认的可能性，”以便保护总统“在政治上不受损害。”

波因德克斯特的证词使白宫大大松了一口气，对里根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据称，里根得知结果后耸耸肩说：“这算什么新闻？7个月来我一直是这样说的。”继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之后，内阁要员舒尔茨、米斯、温伯格等人相继出席出庭，但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于是，长达11个星期的“伊朗门”事件听证会于1987年8月3日正式结束。尽管存在于众人头脑中的许多



谜一直未能找到答案，尽管议员们仍然对结果表示不满，但毕竟可以这么说，风暴已经过去了。

1987年11月18日，美国国会两院“伊朗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最后正式调查报告，这份长达690页的报告详细叙述了“伊朗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揭露了政府高级官员在决策过程中阳奉阴违，隐瞒事实，欺骗公众以及对法律和宪法程序的蔑视。报告认为里根没有完成宪法赋予他的责任，因而应对“伊朗门”事件负实质性的责任。尽管调查委员会没有得到直接证据证明里根总统有意欺骗国会和美国公众，但里根总统的行动和声明有欺骗之嫌。

这份调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伊朗门”事件调查的结束，随后这一案件交由美国司法机关继续审理。国会的这次调查历时11个月，花费了近800万美元，马拉松式地听取了500多人的证词和查阅了30多万份文件。如此兴师动众，大破钱财的国会调查在美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余波犹在似了未了

1988年3月16日，特别检查官沃尔什对诺思提出起诉。被起诉的罪状多达14项，最为关键的两项是诺思犯有阴谋罪和盗窃政府财产罪，主要证据是私自将卖给伊朗军火的1400多万美元利润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诺思否认了对他的这两项关键指控，并声称白宫文件和总统可以证明自己无罪。而白宫则以多种理由反对出示“秘密文件”，还坚决反对传唤总统，因为法律规定“现任总统不能当堂作证。”

既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审判不得不避重就轻。经过两个月的审判和长达12天的审议，在检查官提出起诉的12项罪名中，仅有3项成立，其余9项被判定证据不足。而诺思本人对裁决不服，他表示“要象一名海军陆战队战士那样战斗到底，不管要用多少年，直至最终证明无罪。”

1989年7月5日，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格塞尔正式宣判诺思三年缓期徒刑及15万美元罚金，并从事1200小时的无报酬公务活动，禁止担任公职。

在此之前，麦克法兰因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于1989年3月3日被判处两年缓期徒刑，2万美元罚款和200小时的无偿公共服务。

波因德克斯特被指控犯有欺骗国会和阻挠国会调查“伊朗门”事件等5项罪名。波因德克斯特的辩护律师说服法官格林传讯里根到庭作证，他企图使自己的委托人在里根的招牌下遮挡过去，轻松过关。

1990年2月16日和17日两天，卸任后的里根花了近8小时在洛杉矶法院秘密作证。79岁的里根风采依旧，笑容可掬。步入法庭后，他朝波因德克斯特坐的方向笑了笑，神秘地眨了眨眼睛。接着，里根在法官面前举起右手宣誓。法庭气氛肃穆，除有关人员外，没有观众和新闻记者。

随后，里根开始回答辩护律师贝克勒和检察官韦伯提出的问题。他的语调仍象在职时一样平稳。双方一问一答，时而切中要害，时而冗长乏味。近8个小时中，里根竟回答出100多个“不知道”，“不记得。”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他说他的行为一向合法，并一直建议行政助手们不要违法。他说，他没有指使助手波因德克斯特欺骗国会和阻挠国会调查。对里根的证词，华盛顿的评论家们说，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但再次显示了他执政期内政府中一贯懒散的作风。

4月7日上午，联邦陪审团在华盛顿地方法院宣布，波因德克斯特在“伊

朗门”案中的5项罪名全部成立。

6月11日，53岁的波因德克斯特由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处6个月的监禁。格林法官在宣布法庭裁决后表示，未给被告更严厉的刑罚，主要是考虑到他的军旅生涯及大笔诉讼费用。

“伊朗门”事件至此完全告终了。但是，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团，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它并没有结束……

为连任不择手段事败露自杀身亡——西德石荷州州长巴舍尔神秘死亡案

1987年10月11日，星期天，西德最年轻的州长、被人视为很有发展前途的政治家，大有可能成为今后联邦总理的乌韦·巴舍尔突然在日内瓦神秘地死了。消息迅速传开，传到了西德，震动了全国，更震惊了政界。是“自杀”，还是“他杀”？一时间，关心此案的人们统统坠入五里云雾中。

政坛新秀理想远大

在西德政坛上，乌韦·巴舍尔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1944年5月31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消失时，巴舍尔在柏林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出生了。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他和两个兄弟靠母亲辛勤劳动养活，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巴舍尔学业平平，但自小就有鸿鹄之志。据一位从少年时代就认识巴舍尔的人说，巴舍尔“从18岁起就立志要当联邦总理。为了这一目的，他不惜一切”。权力往往就象鸦片一样，对某些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目标导致了巴舍尔在政治上的早熟。他在中学时就担任学生代表，并开始从事政治色彩极浓的活动。16岁时加入基民盟的青年组织——青年联盟，18岁时加入基民盟，23岁时成为青年联盟的州主席，25岁时当选为基民盟的州副主席，27岁时成为州议员，29岁时当选州议会党团主席，从35岁时担任州财政部长和内政部长，是当时西德最年轻的部长。1982年，当他的顶头上司——石荷州州长施托尔滕贝格荣升联邦财政部长时，巴舍尔便成了这个州的州长。当时他年仅38岁。

政治抱负使巴舍尔在学习中主攻方向十分明确。他主攻法学和政治学，并获得双博士学位。他的政治学博士论文所选的题目是：“在特别考虑到三权鼎立学说的情况下，石荷州州长所处的地位。”事实证明，这种学历对他后来在充分利用权势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在石荷州的基民党内，他是一尊自我设计出来的，尤其受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每时每刻都在精心维护着自己的这一形象。为此，他宁可忍受体内不时出现的疼痛感，也要在群众集会上笔挺地站立几个钟头。对他来说，权力远远比自己的性命重要。

巴舍尔说，幼年时代的因苦生活使他成了一个“爱思考”和“谦虚”的人物。但有的报纸在评论他时说，他是个爱说大话的人，在大庭广众面前摆出一副领袖姿态时，决不会有半点的迟疑和脸红。在他管辖的州里，他只听得进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是精心栽培他的前州长、联邦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

巴舍尔在政治上有强烈的进取欲望。他的年龄优势，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一往直前的劲头，使他很少去考虑未来会遇到的困难。这种经历和性格决定，当他一旦发现有人会成为他的政治对手时，他将不择手段地搬掉他。

1987年，石荷州进入了选举年。随着州议会选举的到来，巴舍尔突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威胁来自比耶恩·恩霍尔姆。

为图连任不择手段

巴舍尔在石荷州已当了5年州长，但州长对他来说不过是个起点站。他绝不满足于做地方官，他要到波恩去，当议员，当部长、总理。为此目标，他苦心经营了半生。对这一次州选举，他看得很重。对于恩霍尔姆的威胁，他早就在考虑对策了。

恩霍尔姆是社会民主党人，时年50岁，瑞典移民的后代。1962年加入

社民党，持“中左”观点。他的工作精神受到当时的联邦总理施密特的赏识，1981年荣升联邦教育部长。社民党下野后，恩霍尔姆于1983年回到基尔，与巴舍尔争夺州长宝座。

石荷州本是基民盟的地盘，基民盟在此已统治37年。按常规来看，社民党人要在此获胜希望是很小的。但恩霍尔姆由于脸上经常挂着微笑，给人留下一个“温和”的政治家的印象，所以在一些民意测验中，比如在“令人感到好感”、“有吸引力”、“温和”等项形象测验中，恩霍尔姆的得分都高于巴舍尔。这对于要确保自己在石荷州统治地位的巴舍尔来说，是绝不能容忍的。

为了降低对手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和名声，巴舍尔感到身边急需一名有丰富经验的竞选助手和谋士。巴舍尔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曾在不来梅一家报社担任总编的普法伊费尔。

普法伊费尔是无党派人士，深受基民盟的器重，是一名出色的“竞选和策略专家”。他熟知政界的权势之争，对丑闻一类秘史极为敏感，他的文章常常在政界引起非同小可的反响。这样一个人对巴舍尔太有用了。有了这样一个得力助手，就能在权势之争中做得滴水不漏，也能挖出竞争对手的见不得人的材料。

普法伊费尔上任了。作为州长的新闻雇员，普法伊费尔的办公室离上司不到50米。他的任务是“观察媒介动向”，在竞选方面则另有一项特殊任务，即直接向州长提出心理和宣传等方面的竞选建议。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普法伊费尔深知州长对自己的器重，决心为之效犬马之劳，以报知遇之恩。

巴舍尔很信任普法伊费尔，凡是遇到非常棘手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一些不宜公开的事情，总是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密商。普法伊费尔曾这样说过：“对于秘闻一类事务，我是巴舍尔唯一可信赖的人。”面对这样一位有丰富办报经验的“私人顾问”，州长无半点后顾之忧。经过短时间的考察，州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普法伊费尔交底了。

1987年1月中旬的一天，巴舍尔把普法伊费尔叫到办公室，谈论起反对党领导人恩霍尔姆的收入和交税情况。普法伊费尔立即心领神会，派人审查了恩霍尔姆1983年4月至1987年1月的收入和交税的详细情况，并将具体数字列成表格。

一个星期以后，巴舍尔在办公室里口授了一份指控恩霍尔姆漏税的信件，普法伊费尔负责记录并打印3份，一份寄税务局，一份寄财政部长，一份寄给巴舍尔本人。巴舍尔说，他得到这封信，便有理由亲自过问此事。

有了匿名信，巴舍尔仍觉得不够。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他又向普法伊费尔透露了一个使之感到惊奇的消息：恩霍尔姆有同性恋行为，私生活放纵。他要普法伊费尔物色一名能提供情况的人，或是委托一私人侦缉公司，监视恩霍尔姆的行动，以获取确凿证据，最好是能拍到这方面的照片。

普法伊费尔遵照州长旨意，根据在刑事局工作的好友那里打听到的情况，最终选择了一家叫“哈里·皮尔”的事务所。1987年1月25日，普法伊费尔在不来梅市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同“皮尔”定下了这笔总数为5万马克的交易。

“哈里·皮尔”事务所接到任务后，立即派了两名暗探，对社民党领导人恩霍尔姆进行严密监视。他们每天租借不同的车辆，带着步话器和照相机，悄悄地跟踪恩霍尔姆，以期捕捉同性恋或玩弄女性的精采镜头。

为了嫁祸于人，巴舍尔甚至几次催促普法伊费尔设法为他弄到窃听器，装到他的办公室。然后他让女秘书约安全人员前来检查。一旦查出窃听器装置，巴舍尔就可以借题发挥，攻击对手，以取得更多的同情。

巴舍尔不仅算计主要对手社民党领导人，而且对有可能影响到他执政地位的小党也不放过。

在他的授意下，普法伊费尔曾伪造过绿党的“新闻通告”，攻击社民党，以激化两党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的矛盾。还冒充《图片报》的人，通过电话离间“石荷州独立选民协会”的领导人。总之不择一切手段，打击政治对手。

巴舍尔曾两次从空中坠地，6次遇车祸，均大难不死。他相信自己必有后福。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正在悄悄地向他袭来。

露出马脚 “朋友”背叛

1987年9月初，离石荷州选举仅剩一周时间了，西德最有影响的政治刊物《明镜》周刊，以醒目的《基尔“水门事件”》为题，报道了在野政界人士极跟踪事件，引起朝野各党极大关注。

在调查中，社民党从州政府内部获悉了一条重要线索：负责盯梢的“皮尔”侦缉事务所的重要主顾是西德一家大型化妆品公司汉斯·施瓦茨科普夫有限股份公司。这家公司的年营业额高达10亿马克，是西德化妆品行业中的巨头。该公司的总经理是卡尔·约瑟夫·巴尔豪斯。他极不欣赏积极从事反对工业污染活动的绿色和平组织。竞选活动一开始，他就公开表示反对社民党和绿党联合竞选。巴尔豪斯不但对石荷州有好感，而且更对这个州的州长巴舍尔有好感。两人相住不远，时常在一起垂钓，是多年的挚友。

早在1971年州选举时，企业主们就曾秘密募捐，资助基民盟，以阻止社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据统计，当时共赠款约360万马克。另外，在全国范围内，施瓦茨科普夫公司的大股东“赫希斯特”公司还曾于1972年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出资几百万马克，以帮助击败当时由社民党和自民党领导的联邦政府。据事后透露，单是施瓦茨科普夫公司就向联盟党捐赠了约500万马克的党派捐款。

鉴于往事，社民党人开始怀疑起这次竞选有企业巨头的介入，只是苦于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

《明镜》周刊的报道还提到另一条重要线索，即西德一些州的警察局对这次盯梢事件进行了调查。关于这次盯梢事件和调查结果，石荷州政府没有向当事人恩霍尔姆通报，使之长期蒙在鼓里。

此外，该刊在报道中还提及了基民盟党派报纸对社民党无中生有的恶意攻击等等。

《明镜》周刊在选举前夕揭露出的这起“盯梢事件”，使人对事件的政治背景产生了怀疑。在野党内有人联想到了美国的“水门事件”，并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执政党基民盟。

在这种情况下，巴舍尔不但不悬崖勒马，停止一切阴谋伎俩，反而继续策划，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继续走了下去。

《明镜》周刊披露盯梢事件第二天的一大早，巴舍尔就急忙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的家里，指示普法伊费尔为他找一个窃听器。当天下午，巴舍尔又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的办公室，询问窃听器一事。在这次电话交谈中，巴舍尔顾不上电话可能被偷听，向普法伊费尔透露了自己的目的：他要采取嫁祸于人的手法，栽赃恩霍尔姆，使他的形象受到损失。

然而，政治嗅觉颇为灵敏的普法伊费尔，此刻已预感到事情不妙。作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在主子得势时，他甘心于充当马前卒。但是当主子失利时，他则绝不会一味跟随下去，走向死胡同的尽头。他开始抽身退出了。

接到州长的指示后，普法伊费尔就四处打听，当他得知窃听器属非卖品，私下使用是非法的，会受到法律制裁，他立即作出抉择，与州长分手。当晚上巴舍尔再次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的家里询问窃听器一事时，他一反常态，只在电话中说了一句话：“可惜没弄到。”

次日清晨，普法伊费尔在州府留下了一句话：他白天不在，要赶紧去汉堡处理“州长的事”。在汉堡，他向公证人一五一十地告发了其上司巴舍尔的言行和意图。

#### 反击不成被迫辞职

当《明镜》周刊在州选举前一周首次揭露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时，人们并不清楚有巴舍尔的背景。自从巴舍尔的竞选帮手普法伊费尔倒戈后，《明镜》周刊立刻把矛头对准州长巴舍尔，几乎每一期都有文章透露事态的新进展和新线索。全国各大报刊、广播电视，也无一不在谈论这一事件。慕尼黑的《晚报》甚至说，在这一事件上，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也得好好向巴舍尔学习。这一事件写下了联邦德国战后选举史上最阴暗的一页。

这一丑闻犹如一场大地震一样，震中虽在基尔，但迅速波及首都波恩，波及全国，不仅动摇了州长巴舍尔的地位，而且也动摇了联邦政府内部的合作基础。

在首都，基民盟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在大的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总是不断产生磨擦。自民党是个小党，但基民盟这个大党却少不了它，缺少了它的支持，基民盟和它的姐妹党基社盟就得下台。因此，科尔总理很担心基尔的局势，他给巴舍尔打电话，要他坚持住，要拉住自民党，不要让它倒向社民党。他还明确地告诉巴舍尔，石荷州的事情关系到基民盟在首都波恩的地位。

在首都，受这一事件影响而日子最难过的莫过于当时的联邦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了。施托尔滕贝格到波恩之前是石荷州的州长。尽管他将州长职务交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巴舍尔，但仍然保留了这个州的党主席职务。基尔出事后，有人便把矛头指向施托尔滕贝格，认为他对巴舍尔事件同样负有责任。因此，他只好一个劲地给巴舍尔鼓气，让他顶住。

巴舍尔是个职业政治家，雄心勃勃。20多年的政坛生涯已将他磨炼成一名角斗士。处于这种局面，他没有乱了阵脚。他十分清楚目前的情况，不能手软，不能后退，后退就意味着基民盟的倒台，就意味着他那立志当联邦总理的远大目标将成为梦想。他要反击，他决心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人们对他的信任，与普法伊费尔作一番你死我活的拼斗。在得到波恩强有力的支持后，他更坚定了这一决心。

《明镜》周刊指名揭露巴舍尔的文章发表后，当人们感到不知道该相信谁是好人的情况下，巴舍尔抓住战机开始反击了。

巴舍尔本是法学博士，自认为能够利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同普法伊费尔打一场官司。他在不同的场合散布说，此事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选举后的第一天，巴舍尔就以污蔑罪向法院控告了普法伊费尔和《明镜》周刊的有关编辑。

巴舍尔调动了州府内外几乎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为反击作充分的准备。

他一连几天苦思冥想，推敲了每一个细节，并找了7个证人，立下了字据。一切就绪后，巴舍尔开始行动了。

9月18日这一天，对巴舍尔来说，是决定其命运的一天。这天上午，巴舍尔突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面对众多的摄像机和不停闪烁的闪光灯，逐一推翻了普法伊费尔揭露的事实。同时，他还亮出了有关人士提供的证明。

根据这些证明，人们看到了一幅与普法伊费尔所谈的绝然不同的情景。

在指控恩霍尔姆漏税的问题上，政府发言人阿伦德森说，他不记得州长下过这样的指示。巴舍尔的两名女秘书也证明当时没有收到一式三份的匿名信。

巴舍尔的妻子和司机也证明，当时巴舍尔事情多，根本没有机会与普法伊费尔谈及窃听器的事。

对于派人盯梢恩霍尔姆、秘密调查恩霍尔姆交税、伪造绿党通告和撰文攻击恩霍尔姆搞同性恋等问题，巴舍尔声明自己是一无所知，完全是普法伊费尔瞒着他干的，他不但是清白的，而且是普法伊费尔阴谋的受害者。

对于上述情况，巴舍尔郑重地宣布：“我以名誉担保。”为了洗刷自己，他使出了绝招。

局势很快就扭转过来，朝着有利于巴舍尔的方向发展了。

巴舍尔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当天下午，石荷州检察院就派人截住了普法伊费尔和与他同行的女秘书施罗德，搜查了他们在《明镜》周刊报社的客房，带走了普法伊费尔保存的36份材料。与此同时，法院也根据巴舍尔的要求，禁止普法伊费尔重复对巴舍尔的指控，否则罚款最高可达50万马克。

一时，普法伊费尔成了众矢之的。孤军作战的普法伊费尔顿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离开汉堡，带着女友即昔日的女秘书施罗德远走高飞，到葡萄牙的一个具有他的律师才知道的地方“度假”去了。

然而，巴舍尔也太小瞧普法伊费尔了，此君虽不是官，也没做过官，但漫长的记者生涯使他见多识广，也赋予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出走汉堡，并不是仓皇逃跑，而是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他带走了决定其命运的证据和材料，事后又一一抛出，给巴舍尔杀了一个回马枪。

普法伊费尔曾是巴舍尔的竞选伙伴，许多事是在两人之间商讨的，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一时各说各的理，真相难以分辩。但是，普法伊费尔手里有大量巴舍尔写的纸条，这些白纸黑字的纸条充分证明了普法伊费尔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巴舍尔的指示下干的。巴舍尔陷入了窘境，他无计可施了。

9月25日上午，巴舍尔向联邦总理科尔提出要对目前的事件负政治责任，并要求辞去州长一职。科尔没有同意，还是要他坚持下去。但巴舍尔已自身难保了，顾不得党的利益了。9月25日下午1点5分，巴舍尔正式宣布辞职，并委托州的联邦事务部长施瓦茨临时接管州长事务。

从《明镜》周刊指名道姓地指责巴舍尔起，仅仅2周时间，尽管巴舍尔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还是从州长的位置上掉了下来。巴舍尔不愧是个直线运动的政客，上时一帆风顺，下时直线落地。

自杀身亡臭名远扬

巴舍尔辞职了。他放弃了当联邦总理的远大目标，心里流着血和泪，独自一人走了。

巴舍尔离开了州府，但对事态的调查仍在发展。负责审理这一事件的吕

贝克检察院在调查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基尔市的一家邮局，人们从收件登记本中查到了匿名信的 3 个收件号。这 3 份挂号信的收件人分别是州长巴舍尔、吕贝克税收侦缉处和州财政部长罗格尔·阿斯木斯。顺藤摸瓜，人们又在州府的收件登记本中查到了这封给州长的挂号信的收件记录，签字的是巴舍尔的女秘书艾希勒。这一发现证实了普法伊费尔所揭出的事实，即匿名信一式 3 份，寄到 3 个不同的地方，同时也揭穿了巴舍尔及其女秘书的没有收到这封信的“誓言”。

私人侦缉事务所的老板皮尔也供认说：盯梢恩霍尔姆的任务是由普法伊费尔牵线达成的。

党内人士开始怀疑巴舍尔了，他的强大后盾也在迅速消失。吕贝克检察院根据已掌握的一些事实向州议会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巴舍尔的豁免权。从这之后，党内的矛头就指向巴舍尔。

这次该轮到巴舍尔“休假”了。基尔市这几周的风风雨雨，使巴舍尔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力。他奋力拼搏了半个月，终于精疲力尽，挺不下去了。他对这个人感到厌倦，他幻想着天堂里的田园生活。

巴舍尔想“走”了，为了洗刷自己，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制造了一起“被杀”的谋杀案。

巴舍尔辞职后，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到大西洋上的大加那列岛，住在一位老相识家里。几天之后，他开始行动了。

10 月 8 日，巴舍尔给基尔市州府办公厅主任汉斯—京特·黑贝尔恩发了一份电传，电文中说：“我于周日到达汉堡，班机 LH026，从法兰克福起飞，抵达时间：14 点 02 分。”

一分钟后，巴舍尔又发了一份电传，给基民盟州议会党国主席克劳斯·克里本。巴舍尔在这份电文中提到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根据我几天前获悉，并要于周末亲自去了解的情况，我或许在周一会为澄清事实起重要作用。在此我不能再作任何说明。”

在飞往日内瓦的途中，巴舍尔写了一篇“日记。”这篇日记的开头注明是为调查委员会准备的。日记中与道：“大约是 9 月 26 日，有一人打电话到家里，说他知道普法伊费尔的一些较详细的情况。10 月 9 日，一自称罗贝特·罗洛夫的人打电话到大加那列岛，显然想帮助对付普法伊费尔。开始提出在马德里见面，后来他答应在日内瓦接头。

“他不要钱，只是要报复普法伊费尔，因为他上过普法伊费尔的当。他不准备到警察局报案。他想要在日内瓦机场（碰头地点为国际航线问讯处）交来一些材料，这些材料足以说明问题。”

10 月 10 日下午，巴舍尔到了日内瓦。一下飞机，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到“美丽海滩”饭店。在饭店里，巴舍尔写了第二篇“日记”。臆造了与罗贝特·罗洛夫碰头的情况。

这天晚上，巴舍尔没有出门，连电话也不接。他躺在床上，静静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一本短篇小说选。这是巴舍尔看的最后一本书。当《明星》画刊的记者克瑙尔第二天找到巴舍尔时，他已进了天堂。

巴舍尔死后，有的报纸立即认为这起死亡事件属谋杀案。他的妻子和弟弟在他死后立即在日内瓦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巴舍尔的死是“他杀”。他们公布了巴舍尔留下的日记，公布了巴舍尔死前与他们通电话的情况。他们认定只有唯一的可能性：“他杀”。



警方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根据巴舍尔日记提供的线索。警方找到了神秘人物“罗洛夫”。但此君是否就是巴舍尔日记中的那个“罗洛夫”，警方难下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人那个周末不在日内瓦。巴舍尔在日记中提到的照片，警方一直没有找到。“他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相反，根据现场调查和尸体解剖，一致证明巴舍尔是自杀。法医断定，巴舍尔属于服安眠药过量致死。死者身上没有击伤的痕迹，也无临死前的反抗和痛苦挣扎的迹象。死者是躺在浴池里平静地死去的。他采取的是双重自杀法，即服药过量和试图淹死在浴池里，从而达到彻底自杀的目的。

巴舍尔自编自演的一出压轴戏被揭穿了。人们愤怒了，他的“证人”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推翻了“誓言”，从而使西德“水门事件”真相大白：

巴舍尔的司机舍勒哭了，他含着泪水承认自己的证词是巴舍尔写的，他为表示对主人的忠诚，不加思考地在证词上签了字。

巴舍尔的妻子弗雷亚觉醒了，她和巴舍尔的另一名女秘书伊罗娜·奥伯施泰因一样，承认了自己的假证词。她说，她的证词是巴舍尔写好让她在家签的字。

巴舍尔的亲信、州府发言人阿伦德森也承认，他是受巴舍尔的旨意作了假证。他把对上级的忠诚看得太重了，他总觉得他保护的是一位州长，而不是罪犯。

巴舍尔死了，这是一出悲剧，一场骗局。巴舍尔强烈的好胜心理，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忘记打击自己的对手。然而，他又一次失算了。他的这场压轴戏，不但未能击败对手，反而使他臭名远扬。

## 塞纳河畔的“伊朗门”事件——法国吕歇尔公司私售军火案 两翼“共处”频繁相争

1981年5月10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获得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执政伊始，他即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宣布解散法国最高立法机构——国民议会，提前进行立法选举。大选结果，社会党得到了国民议会510个席位中的273席，远远压倒其他各党，完全控制了国民议会。在23年大权旁落之后，密特朗总统满怀信心地表示他要放开手脚大胆地干了……

然而好景不长，在度过了5年短暂的“执政蜜月”之后，法国国民议会的5年任期也已经届满。1986年3月16日，立法选举的结果重新使得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变为少数派。保卫共和国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共获得41%的选票，再加上极右党派获得的4%的选票，使得右翼党派联盟以289席的优势在国民议会中占了绝对多数。密特朗不得不根据法国宪法任命保卫共和国联盟主席雅克·希拉克担任政府总理。

这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可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自从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一位社会党的总统和一位代表右翼反对势力的总理共同执掌政权，领导法兰西是法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法国宪法并没有排除这种情况的合法性，但此前近30年中却从未出现。密特朗总统在1981年到1986年之间所任命的都是社会党的总理，领导着左翼联合政府，顺利地执行他的政策。而如今，密特朗面临的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左翼总统，右翼总理，也即右翼政府。拥有无上权力的总统因失去了议会多数而丢掉了大部分权力，仅掌管着一个总统府。在法国人的政治词典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共处。

每个星期三的内阁例会主持人本该是密特朗总统。然而雅克·希拉克的右翼政府根本不听总统的管辖。每次内阁例会召开之前，密特朗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必定先在大会议室旁边的密室里单独会晤半小时，由总理把议程和将要决定的事项汇报给总统。会议开始后，各部长依次发言，希拉克最后作总结讲话，独定大政方针，堂堂共和国总统、身居主位的密特朗却毫无发表意见的余地，被冷落在一旁，只能在各项决定的文本上签署同意或不同意。

希拉克右翼政府利用大权在握的机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外交上完全推翻社会党的政策，加以全盘否定。此举除了欲报右翼各派在野5年之仇，更重要的，还有另一层打算在里面：彻底搞垮社会党，以期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重新击败社会党，夺回1981年失去的总统宝座。为此目的，右翼各党使尽了一切手段，除了将社会党的各项政策彻底否定外，还动用了揭露社会党丑闻的办法。对此，社会党也不甘示弱，频频还击，两翼争斗异常激烈。短短两年间，已先后有多起丑闻被揭露出来。如社会党政府国际合作部长通过援非机构“营私舞弊”案，涉嫌司法部长的珠宝商烧麦兄弟“敲诈勒索”案，全国通讯与自由委员会成员在分配电台波段工作中的“渎职”案，总统府反恐怖主义小组“贿赂”证人案等。明火执仗，互相指责。《法兰西晚报》评论说，一来一往，法国政坛上的左右两派“打成了平局”。有人说，法国政坛上的“共处”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共处”但不和平。随着1988年总统选举日期的临近，左右两翼又展开了一个新的回合的政治较量，离选举只有半年时间，“吕歇尔公司向伊朗私售军火案”又被揭了出来，轰动法兰西。

“吕案”经过，扑朔迷离

1987年11月2日，星期一，正当大多数法国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重又开始一周繁忙的工作时，一则新闻震动了他们，搅乱了法国人平静的生活。巴黎出版的《快报》和《问题》同时揭露了一项被列为“国防机密”的报告，即《巴尔巴报告》。它揭出了法国吕歇尔军火公司向伊朗非法出售军火一案的“内幕”。《报告》一经刊出，犹如一石击水，法国政坛和舆论界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各报刊大呼法国也出现了“伊朗门”事件！

其实，早在1986年2月，法国一家省报《海峡通讯》就载文详细介绍了“吕歇尔事件”。《海峡通讯》揭露说，自1983到1986年间，吕歇尔公司违反政府1981年作出的禁止向伊朗输出战争物资的有关规定，把名义上运往巴西、葡萄牙、泰国、南斯拉夫、巴基斯坦、以色列、秘鲁、厄瓜多尔等国的45万发大口径炮弹偷偷出售给了伊朗。当时执政的社会党法比尤斯政府责令司法部门进行处理，并吊销了吕歇尔公司的军火出口特许证。但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法国人的广泛注意，很快便被人们忘诸脑后了。不久，议会选举结束，反对党的希拉克右翼政府取代了法比尤斯政府。于是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3月16日，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安德烈·吉罗下令三军总监巴尔巴将军对“吕歇尔事件”进行调查。”3个月之后，巴尔巴完成了调查，提交了一份被列为“国防机密”的《报告》，并立即被呈送给希拉克总理和密特朗总统。当时，这一《报告》对外界是严加保密的。

然而，谁料事隔不过18个月，正当舆论界把目光转向即将于1988年4月开始的总统选举时，1987年11月4日，《费加罗报》和《世界报》又抢在国防部宣布对《巴尔巴报告》正式解除秘密之前数小时，将《报告》全文刊出。于是，象是一颗定时炸弹在法国政坛上轰然爆炸。

《巴尔巴报告》长达15页，其中以大量的事实和几位当事人的证词，不仅断定密特朗总统和前社会党国防部长萨尔纳·埃尔尼（因“彩虹战士”号爆炸案引咎辞职）是这一事件的最高知情人，而且“坚信吕歇尔公司的非法贸易得到了国防部办公室的成员、特别是特派专员迪博斯的庇护”。

那么，吕歇尔公司对伊朗的非法军火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巴尔巴的报告中看，1982年第一批共有4万发炮弹运往伊朗，当时这是真正的地下交易。那时国防部长萨尔纳·埃尔尼的办公室确实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这4万发炮弹原来说是销往伊拉克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运往伊拉克。吕歇尔公司那时正面临困境，濒于倒闭，它需要在几年的时间里裁减一半的工作人员，为了挽救颓势，吕歇尔公司正积极寻找办法，扩展产品销路。通过一位比利时中间人的联系，吕歇尔公司得以把生产的炮弹成功地秘密销往伊朗。接着，这一交易就转由吕歇尔公司在意大利的一家子公司——欧洲军火公司来进行，它的负责人是马里奥·阿皮业多。他原来是美国空军上校，曾任美国一家机床公司的代表。就是他直接与伊朗谈判，促成了这笔可观的军火生意。（伊朗军队每天需用5000发炮弹）。

吕歇尔公司的总经理丹尼尔·德瓦吾汗则亲自前往巴黎，到国防部长埃尔尼的办公室，向特派专员迪波斯解释他这一做法的理由。有人怀疑这次会面是由中间人联系的，巴尔巴的报告中提到了保罗·安德烈·法纳考茨，这是一位守口如瓶、颇有威望的企业家，他在政治上亲社会党，并和埃尔尼私交甚厚，他对促成这次会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迪波斯则对吕歇尔公司的非法军火交易开了绿灯，只是要求德瓦吾汗不要公开向伊朗出售武器，并要他去

把此事告诉国防部外事局长，他可以发出指令同意这一军火交易。

于是，这便为吕歇尔公司把军火销往伊朗打开了方便之门。1983年一年中，吕歇尔公司租了货船，把大量的炮弹从圣马诺港运往伊朗的邦达阿帕斯港。这些军火的目的地对外公开称是巴西、秘鲁、巴基斯坦、南斯拉夫、泰国、厄瓜多尔等。这一交易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滑稽的是，吕歇尔公司曾公开声称有一批203mm口径的炮弹是运往泰国的，而事实上泰国根本就没有发射这一口径炮弹的大炮。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更有意思的是，1983年12月31日，埃及海关人员在萨义德港检查了法国的一艘货船，船长说船上装的是平底锅，这使得埃及海关人员大为惊奇：法国为什么要运这么多的平底锅去伊朗？

据巴尔巴报告称，国防部长埃尔尼的办公室多次得到关于吕歇尔公司向伊朗非法出售军火的报告，但毫无反应。最后，一直到1986年1月26日《海峡通讯》刊文揭露了吕歇尔公司私售军火案后才不得不停止。报纸登载文章之后近2个月，一直到3月13日议会选举前几天，社会党国防部长保罗·吉莱斯才正式对此案提出起诉。第二天，马提尼宫（法国总理府）正式宣布中止吕歇尔公司的军火交易。

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吕歇尔公司共向伊朗出售了45万发以上的炮弹。当然，这些炮弹都是打着其它国家的牌子而秘密运往伊朗的。巴尔巴报告详细列举了这些军火的销售情况。

那么，1986年之后这一非法的军火交易是否还在继续呢？根据《海峡通讯》的报道，1986年12月~1987年7月间，有好几艘满载炸药的货船从圣马诺港起锚，驶向海湾，但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些货船的最终目的地是伊朗。

《海峡通讯》的记者透露至少有4艘货船中途停靠在圣马诺港。比如1987年2月26日，悬挂丹麦国旗的“丹尼斯”号货船装有40吨炸药在此停靠，但目的地是阿曼。另3艘也很难断定是前往伊朗的。

但舆论界认为可能有些军火通过比利时的泽布腊港运往伊朗。1987年2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晚报》称1986年有大量的法国军火经这个港口运往伊朗。吕歇尔公司之所以选择了泽布腊港，是为了在非法向伊朗出售军火的交易泄密后加强保密。这一交易由比利时联合炸药公司的一位前负责人担保。在布鲁塞尔和布鲁日都有人在谈论吕歇尔公司充当了比利时另一家武器公司：迈卡尔公司的转包商，这家公司也被怀疑向伊朗出售了武器。

但是，法国政府却坚决否认这一说法，说1986年以后没有再向伊朗出售任何军火。

1986年3月13日，对吕歇尔公司的起诉书送到了米歇尔·勒格朗法官的手中。他对此事做了调查，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销往伊朗的武器中，有C型炸药吗？

勒格朗法官是法国北方人，身材瘦削，面庞清秀，肩膀宽阔、结实。他有20年检察官工作的经验，先后在杜埃、布勒斯特和巴黎工作过，1976年6月到1981年6月，他参加了令人生畏的国家安全法院的工作，从事恐怖案件的审理。在国家安全法院所做的工作使他对恐怖案件和敏感的案子非常关注。他属于一个五人小组，与特别检察院紧密合作，进行反恐怖主义的斗争。

从1986年3月到1987年11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勒格朗法官认真、

细致地调查了吕歇尔事件，他调查、询问了许多与吕歇尔案有关的人，并委托司法警察进行调查。他在这一细致而又秘密的调查后认为，吕歇尔公司可能充当中间人向伊朗出售了 型炸药。在吕歇尔公司的帐目上他发现了关于 1200 公斤 型炸药的出售记载。这种型号的炸药曾被用于 1985 年和 1986 年发生在巴黎的恐怖爆炸活动。这种类型的炸药是法国国家炸药和爆破器材公司生产的，但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生产这种炸药，到底 型炸药是通过何种渠道销售给伊朗的，这是吕歇尔案件中的一个疑问。

矛头指向，险象环生

雅克·希拉克的右翼政府在距选举仅有半年时间时突然以吕歇尔军火案向左派发难，其目的和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在巴尔巴报告中，通过证明前国防部长埃尔尼，部长办公室特派专员迪博斯的涉嫌，把矛头直指密特朗和社会党。调查报告指出，前社会党国防部长埃尔尼和他的下属迪波斯为吕歇尔公司非法出售军火提供了庇护。《观点》杂志称德瓦吾汗在他的主要助手，公司二号人物，总经理助理莫戴斯的陪同下于 1983 年底前往巴黎拜访了迪波斯。他们俩先到办公室拜访了弗朗索瓦·埃斯布尔，当时他是埃尔尼的技术顾问，负责国际事务，现在任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他在答复巴尔巴的调查问讯时承认德瓦吾汗拜访了他，并对他说吕歇尔公司非常需要向伊朗出售军火。他对此话大吃一惊，并以“必要的明确态度”对德瓦吾汗说这是非常不合法的。这次会谈的时间很短，德瓦吾汗显得很不自在。接着，埃斯布尔把他引到了隔壁特派专员迪博斯的办公室，简要地对他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谈话内容，然后就悄悄地退了出去，留下他们 3 人在屋里。

但是，迪波斯却否认“曾经接到或发出指令，以方便吕歇尔公司进行的非法对伊朗出售武器的做法”。相反，他倒记得国家安全局曾含糊地告知他军火运往的真正目的地，迪波斯命令国防部外事局要求吕歇尔公司停止此类行动。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军火贸易根本不属办公室的职责范围。”

迪波斯的辩解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巴尔巴报告还指责社会党从吕歇尔公司的军火交易中获了利。巴尔巴在报告的第 8 页提到 1984 年春迪波斯对当时任国家安全局长的沃特汉的一次谈话。沃特汉那时得到了一些关于军火真正销往的目的地的情报，并对此表示担忧。迪波斯却让沃特汉将军“不要插手”，并说“你知道，吕歇尔公司给社会党提供了资金”。

巴尔巴报告在第 8 页下面的注解道：“这一供认与 1984 年 4 月拉考斯特将军获得的情报接近。据此情报，吕歇尔公司得到了 30 万发炮弹的定货，其中 3% 的佣金转给了社会党……德瓦吾汗也承认了这一点”。巴尔巴报告还提到，国防部长埃尔尼的两名亲信法尔考茨和弗朗索瓦·迪亚斯参加了 300 万法郎的转移。法尔考茨接纳了这笔钱，后又转给了掌管社会党财政的弗朗索瓦·迪亚斯。报告还称另有近千万的佣金由意大利设在瑞士的一家银行转走。但巴尔巴报告说一点也不清楚这些“贿赂”由谁所得。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只有在当时财政部长的许可下才能执行。

巴尔巴报告还指出前社会党外交部长罗朗·迪马也涉嫌此事，说他 1985 年 12 月干涉了一家讽刺小报，劝说它不要发表关于军火交易的调查报告。说这样可能会损害释放在贝鲁特人质的谈判。这家讽刺小报后来以幽默的笔调写道：它“从来不畏惧压力”，但却“对迪马外长的压力做出了让步。”可罗朗·迪马也不承认此事与关于释放人质的谈判有关，因为第一批军火出售

到伊朗时人质问题还没有出现。

巴尔巴报告被披露出来的当天和第二天，亲右翼反对党的《费加罗报》就连续发表评论和文章，指责密特朗起码对这一“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应负政治责任，并要求密特朗总统对此作出解释。雅克·希拉克总理也假惺惺地“对在选举前丑闻的增多表示遗憾”，但接着又含蓄地道出了他的真正心思，他说：“一旦事情真发生了，就难以避免被新闻界加以渲染”。言下之意，目前的状况完全是由社会党自己造成的。

政府发言人阿兰·朱佩也发表讲话，称这是“违反外交政策的一件国家大事”。他说：“不要把个人沮丧的心情或是无关紧要的计算获利的方法和与国家大事混淆在一起。很明显，原政府明知道他们的做法与外交政策相悖，却仍然把武器出售给一个和我们敌对的国家。这是一件国家大事。”

从政治意义上讲，吕歇尔事件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它的爆炸是不可避免的。阿兰·朱佩的讲话表示右翼已公开地利用巴尔巴报告以对付左翼社会党。政治矛盾的指向愈加清晰：国家元首密特朗。正如右翼自己指出的那样“要打开真正的‘密特朗门’”。阿兰·朱佩的谈话在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府）看来无疑是战争宣言，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密特朗参加1988年4月的总统选举。

尽管法国司法机构已决定受理吕歇尔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和审理工作，但法国各界都明白，真相和调查都是次要的，向密特朗和社会党施加政治压力才是右翼的真正目的。左、右两翼都准备展开一场战斗，右翼对此下的赌注是可观的。几乎所有关注1988年大选的分析家都认为，总统选举之战中的个人素质，如能力、威信以及在公众中的形象将比其施政计划和政治纲领更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由吕歇尔事件引起的两翼冲突有个人化的趋势，这种冲突非常可怕，有可能升级。

右翼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希拉克政府积极地寻找证据说明原社会党政府在吕歇尔军火案中有欺骗行为以便完全赢得这场冲突的胜利。右翼不断声称揭露吕歇尔公司秘密军火交易的巴尔巴报告早在1986年6月就被送到爱丽舍宫，但爱丽舍宫并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右翼各党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

紧锣密鼓，反击获胜

右翼政府的攻击和指责使得社会党和密特朗总统处于危机之中，《社会报》认为这一事件将给社会党带来比“彩虹勇士”号爆炸案更为难堪的后果。

早在吕歇尔公司私售军火案曝光之前，右翼政府就利用“发展路口”金融丑闻、“彩虹勇士”号爆炸案等对社会党发难。但是，这些丑闻都没能触动中心人物密特朗，而只是涉及了密特朗总统的一些亲信人物。因此，希拉克政府才再次提起吕歇尔案，把矛头直指爱丽舍宫，把密特朗做为这次攻击的明确靶子，对于保卫共和国联盟（希拉克所在的右翼党）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而法国民众联盟（右翼政党）也想借此一箭三雕：首先，这一新的丑闻可以破坏两翼的共处；第二，可以损害密特朗的形象，并间接地影响希拉克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可以使法国民众联盟超然于丑闻之外，而从中得利。法国民众联盟的主席让·纳卡利埃在阿兰·朱佩发表谈话后紧接着说：“只有共和国总统才能使事实得以澄清，他有责任保持国家的连续性，引导法国的外交。”总之，右派的枪口正高高举起，瞄着密特朗，希望通过巴尔巴计划动摇密特朗的地位，而巴尔巴报告的披露已打开了爱丽舍宫的大门。

左翼社会党和密特朗总统对吕歇尔案的沉默并没能掩盖笼罩在社会党领导层和爱丽舍宫上的紧张气氛。自 11 月 2 号巴尔巴报告披露之后，密特朗就连续召集了多次会议。密特朗总统的助手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应付方案。有人提出让前参谋总长索纳尼埃将军出面发表声明，称密特朗一直要求军方不要向伊朗出售武器；有人则提出让密特朗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出面干预，在选举期间宣布对涉嫌的军方人士提出诉讼；还有人建议密特朗总统致信希拉克总理，以求得妥协。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但密特朗却表现得异常镇静，他善于把握时机，等着右翼暴露出弱点，然后开始反攻。

1987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国防部长安德烈·吉罗在国民议会宣布巴尔巴报告不再是“国防机密”。而此时的社会党也结束了自己的争吵，达成了一致。当天晚上，在社会党执行机构的会议上，社会党进一步完善了反攻战略。在社会党领导层里，气氛非常紧张。经过艰苦的讨论，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准备发动反击。社会党具有一些传统的色彩，喜欢一致同意，不喜欢有不和谐的音符冒出来。社会党以其行政机构的公告确定了他们的方针，揭露了希拉克政府“对社会党的丑恶的诽谤和中伤”，否认右翼对其挪用资金的指控，并控诉右翼组织了这场旨在打倒社会党的战争。紧接着，社会党的 4 巨头，里奥南·乔斯潘、马尔赛·德马尔热、路易斯·麦尔马茨和皮埃尔·乔克斯也纷纷走上前台，毫不掩饰地对社会党的观点加以说明和解释，对右翼政府展开反攻。当欧洲的一台政治节目主持人菲利浦·贝黑尔向乔克斯采访有关吕歇尔案件时，这位国民议会的社会党团主席大发雷霆，怒气冲天地说：“你在从事一桩肮脏的职业，你在帮助朱佩发动战争。时间长着呢，咱们后会有期。”

为了尽快熄灭这场由右翼政府点起的倒密特朗的大火，社会党不断地提出反驳和抗议，并公布了他们认为的一些事实，以抑制吕歇尔丑闻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密特朗总统却一直表现出泰然自若，11 月 5 号星期四下午他还戴着帽子、披着衣中和他的朋友博拉特一起在街上散步，他相信希拉克的进攻仅仅是为了触动自己的地位，而绝不想使战争升级。果然不出密特朗的所料，当天晚上，阿兰·朱佩的讲话调子变得温和起来，说他的谈话不是针对密特朗总统的。希拉克总理的一位亲信还透露真情说：升级对谁都不好。于社会党无利，于密特朗无利，但最终对右翼和希拉克也同样不利。反而搞得大家都非常窘迫。

一直到 11 月 16 日，沉默了近两周的密特朗总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站出来公开表态了，他就吕歇尔事件一案接受了法国 RTL 电台的采访。他首先表示，在 1984 年 5 月确实接到有关这件事的报告，但当时只是“一些传闻和怀疑”，后来又看到，“巴尔巴报告”，才知道这些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但后来并没有人再向我报警。”对于他是否对此事负有责任，密特朗总统称：“宪法没有赋予我核查军事物资出口的职权，因此我对此毫无责任”。接着他又说：“我敢起誓，社会党并未从中捞到分文好处。”而且，他坚决否认吕歇尔事件与扣留在伊朗的法国人质有关，他严厉谴责有关方面“通过报界来公开这个报告以及有人利用这个报告大做文章的做法是诋毁社会党的一种道德大骗局。”他最后建议议会就党派活动资金，竞选经费公开化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便“一次性地解决这些年来毒化法国政治生活的问题”。

据报道，大约有 600 万法国人收听了有关这次采访的广播，事后的一项

民意调查表明，55%的人认为总统对这一事件的澄清是“清楚”的，“可信”的，但右翼报纸则称这是一出“没有说服力的戏”。

但不管怎么说，社会党和密特朗总统终于从急风暴雨般的攻击中解脱了出来，度过了一场严峻的政治危机。1988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表明，希拉克的右翼政府并未从吕歇尔公司非法向伊朗出售军火丑闻中得到多少好处，反而给法国公民留下了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印象，缺乏法国人所希望的稳重性格，从而失票不少。对于社会党和密特朗总统来说，虽然吕歇尔案件披露后一度非常狼狈，陷于信任危机之中，但从整个过程来讲，还是有惊无险的。在两年多的政治争斗中，密特朗总统和社会党最终还是得分多，失分少，占了上风的。

吕歇尔军火案终于平息了，关于吕歇尔真相的报道也逐渐减少。然而，吕歇尔事件依然是疑团重重，法国普通百姓难知其中真正的奥妙。吕歇尔案的提出完全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吕歇尔案重又悄无声息，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但对于法国公民而言，其失望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法国一位评论家所说：“法国人民象小孩子一样，永远无权知道‘国家大事’的真象！”



## 唐宁街 10 号： 1988 年秋天和冬天的童话——英国 “ 劳森门 ” 事件与 “ 鸡蛋风波 ”

几年来，富于个性的撒切尔夫人以 “ 坚韧不拔，积极进取和充分自信 ” 的精神率领她的保守党政府闯过了不少难关，从而使英国摘掉了 “ 欧洲病夫 ” 的帽子，英国人从 “ 灰心失望走向自信有望。 ” 撒切尔的内阁也因精诚团结，富有效率而著称于世。

但是，向来平稳得以至 “ 平淡无味 ” 的英国政坛，在 1988 年秋冬之际接连闹出两个风波，惹得满城风雨，给撒切尔夫人带来不少麻烦。这两件麻烦事分别是 “ 劳森门 ” 事件和 “ 鸡蛋风波 ”。有趣的是，两个风波都是阁僚们出言不慎，信口开河造成的。

### 借报探风 引火上身

“ 事件十门二丑闻 ”，似乎已成了近年来举世所公认的一种表达形式，这是美国 “ 水门 ” 事件和 “ 伊朗门 ” 事件的功劳。1988 年深秋，英国也出了个 “ 门 ”，这个 “ 门 ” 里的中心人物是英国财政大臣劳森。不过这个 “ 门 ” 还没闹到山姆大叔的那么大，但也使 “ 铁娘子 ” 撒切尔夫人伤了不少脑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1988 年 11 月初的一个星期五，财政大臣劳森找来几家星期日大报的记者，举行半年一次的吹风会，会议的中心是年度财务报告。其间记者沃登问到有关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情况，劳森透露，财政部正在酝酿制定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打算给 100 多万最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增发补助。他说，他想从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中，看能不能制定更好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帮助少数入不敷出的老人。劳森的意图是：借大报探探风，摸摸公众对改革养老金制度会有哪些反映。因此，他在吹风会上谈得随便自如，东拉西扯的，记者们似乎也 “ 吊儿郎当 ”，并未把它当回事，许多人连笔记都未做。

不料，两天后，这个平平常常的吹风会竟上了各星期日大报的头版，引起了许多人注意，从而平地刮起了一股旋风，以至闹得沸反盈天。

原因是，劳森在讲话中用了 “ 制定发放标准 ” 的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嗅觉敏锐的记者们立即抓住了这个字眼。他们觉得劳森是在暗示养老金制度要改革，这令人想起了英国在 30 年代实施济贫法时进行 “ 经济状况调查 ” 方式，它意味着削减老人的部分养老金，而这是令英国公众胆战心惊的。

消息发表后，朝野顿时轰动。国会下议院立即改变原来的话题，转而把劳森的吹风会作为辩论的主要内容。工党议员攻击说，这是对孤苦伶仃老人的 “ 残忍 ” 措施，要求保守党内阁澄清事实真相。执政的保守党内部也怨声迭起，认为劳森的讲话是极不负责任的，不能代表执政党的主张，也不能代表撒切尔夫人的意见。老百姓的反应则更为强烈，他们认为政府的作法是 “ 不人道 ” 的，同时要求政府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面对意料之外的风潮，劳森也吃不住劲了。他努力向议员们解释，政府既没有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打算，也不准备作任何经济状况调查，而且正准备对一些经济特别困难的老人增加救济。对于新闻界的报道，他大为光火，称这是 “ 我作大臣近 10 年生涯中所见的最不负责，最不准确，胡说八道的报道。 ”

这一下又把新闻界给惹火了，记者们立刻予以反击。他们说，好吧，如果你不承认你说过的话，那就请把吹风会录音带拿出来对证，看看是不是有 “ 制定发放标准 ” 的活，这一着又将住了劳森。因为在吹风会后，劳森的

秘书曾说：“讲话已经录音，可供公开引用”。这句话给记者抓住了。工党议员们也要求财政部出示录音带。面对咄咄逼人的态势，财政部乱了方寸，部发言人急忙出来声明说，讲话录是录了，但因操作时粗心大意而未能录上，所以磁带是空白的。显然，这种搪塞是漏洞百出的。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劳森不敢拿出磁带。

一时间，舆论沸腾，对劳森的指责如潮水般涌来，在野党也频频发起攻击，声称要对劳森进行不信任辩论，新闻界更是推波助澜，今天发表抨击经济状况调查弊端的文章，明天又刊登关于老人的专访。有意思的是，为仿效美国“伊朗门”丑闻，评论报道都冠以“劳森门”的标题。人声鼎沸，热热闹闹，把个一贯自信的劳森弄得六神无主，坐立不安。

劳森自任财政大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撒切尔夫人的得力助手，他的许多大胆的改革措施使英国经济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为此他得到了朝野各界的赏识。但好景不长，他的进一步改革财政的措施碰了钉子，遭公众抵制，在货币政策上与撒切尔夫人又产生了一些分歧，特别是同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经济顾问沃尔特斯发生争吵。有人认为劳森可能要辞职，但由于他过去管理经济的政绩，撒切尔夫人还是留用了他。

为何“制定发放标准”一语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呢？就因为它使人联想起30年代的“经济状况调查”。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洛雷的老太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一些执行济贫法的经济状况调查人员闯进她家，核查了所有的家产，强行地把一架收割机，一把小提琴和自制的独弦琴都列入家庭奢侈品，因而不能领取救济金。当时，一些申请救济的家庭不得不事先卖掉钢琴，以便领取一份救济金养家糊口。

英国目前约有1000万老人领取养老金。随着人们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英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将趋于严重，养老金也就成了政府的沉重负担，劳森企图逐步实施由企业承担退休职工部分养老金措施，并对发放体制作部分调整，把钱用来解决真正的困难户。为此，他借吹风会投石问路，没料到“燃起了一场大火。”

但是单凭一个“制定发放标准”就断定是“劳森门”风波的起因是不够的，它表明了撒切尔夫人政府在1988年进行的社会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其根由是40年来福利制度所养成的英国人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使许多英国人依靠政府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来生存，正如外界人士所说，“英国人变懒了”。

“劳森门”风波并未持续多久，它发生于英国1988年度议会行将结束的时候。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于11月22日宣读了政府新的一年的施政讲话，接着又是一周的议会辩论，人们的视线暂时转移了。不久，社会福利大臣莫尔又在月底宣布增加75岁以上和残废老人的养老金。于是，风波逐渐平息下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撒切尔夫人进行的设法削减福利开支，减轻政府负担的努力不仅成了泡影，反而被迫增加了一笔开支。对于劳森的讲话，撒切尔夫人如同哑巴吃了黄连，哭笑不得。经过这场风波后，劳森在政界还坚持了一阵子，最终不得不在1989年底与撒切尔夫人分道扬镳了。

快人快语 鸡蛋作乱

刚刚经过“劳森门”风波的英国政坛，随着冬天的来临，渐渐平淡起来，人们开始象以往一样按部就班地过日子，注意保养身体，以应付寒冷的天气。

但是，没过多久，这样无味的生活又被打破，英国人又闹了个不亦乐乎，保守党阁僚们又为此操了不少心，费了不少神。这一次风波竟是由小小鸡蛋引起的。

1988年12月3日，卫生部国务大臣爱德维娜·柯里夫人在接受独立电视网记者采访时说：“本国养鸡场生产的蛋，大多带有沙门氏菌。”这一讲话当天向全国播放后，英国鸡蛋市场立刻发生一场“地震”。

鸡蛋是英国人每天早餐餐桌上的必备食谱，英国每年要消费90亿个鸡蛋。现在，一位堂堂的卫生部国务大臣出来发布官方消息，说你们餐桌上的鸡蛋大多带菌，食后轻者腹泻，重者一命呜呼，这岂不是大祸临头！全国上下立即染上了鸡蛋恐惧证，人们纷纷对鸡蛋敬而远之。市场上的鸡蛋无人问津、行情一落千丈，几天内，鸡蛋销售量骤然下降了百分之五十，造成4亿只鸡蛋滞销。卖不出去的鸡蛋在发臭，餐馆饭店甚至取消了蛋品菜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成千上万只母鸡遭到宰杀，为圣诞节准备了大批火鸡的市场一片萧条。显然，如此下去，许多养鸡场将被迫关门，鸡场股票将不得不被廉价出售。

鸡场主们跳脚了，他们群起而攻之，大骂柯里夫人胡说八道，全国农民联盟干脆要她辞职，以谢天下。前内阁大臣约翰·比劳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公开信中批评柯里夫人和她的上司撒切尔夫人，并要求政府对由于柯里夫人的讲话而产生的影响表示道歉。以维护本选区农场主利益为己任，人称“郡区骑士”的保守党议员们一扫斯文常态，大骂柯里夫人“满嘴舌头乱跑”。政府内部也闹起了内证，农业部国务大臣麦格雷戈回国后刚下飞机，便一口咬定柯里夫人的讲话纯属“无稽之谈”。于是，执政党议员攻击执政党政府大臣，政府中的两个部又互相骂街，成了伦敦政界的一大景观。

一时间，议会言必称鸡蛋，报刊文必写鸡蛋。这还不够，作为英国最大的蛋鸡饲养公司之一的泰晤士河谷鸡蛋公司已开始对柯里夫人采取法律行动。该公司12月15日晚宣布，它已决定采取行动“恢复鸡蛋的好名声，整个行业决心进行反击。”纷纷扬扬，事情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形势不妙，白厅又忙乱起来。先是卫生大臣贝克出来解释，说柯里夫人讲话的原意是让大家别吃生鸡蛋。随后首相大人撒切尔夫人煞有介事地跑到议会宣布说：“我在仔细阅读了医疗官员的声明之后，决定在午餐时吃面包和炸鸡蛋，我觉得味道很好。”农业部与卫生部也公开表示要澄清事实真相，制定广告宣传计划，携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旨在恢复英国鸡蛋的声誉，号召人民放心吃蛋。为此政府拨出了50万英镑的紧急专款。然而这仍旧没有扭转势如雪崩的鸡蛋市场，未能平息鸡场主及其议会代理人的怒气。

无可奈何，埃德温娜·柯里夫人，这位号称“撒切尔第二”的女强人，于12月16日下午2时黯然挂冠而去。

政府也不得不采取紧急应付措施，以补偿鸡场主们的损失。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对记者说：“鉴于目前鸡蛋市场的形势，政府已决定采取短期购进鸡蛋的特别措施”。12月19日下午，农业大臣麦格雷戈在议会下院说，政府将向不久前遭受鸡蛋风波损害的鸡场主和鸡蛋加工商赔偿1700万英镑，他希望这一措施能有助于恢复人们对英国鸡蛋的信任，对于积存的鸡蛋的处理办法是，100万个送给苏联亚美尼亚地震灾民，其余的付之火海。

但事态的了结并不那么简单，鸡场主们虽赢了第一回合，但还觉得不解气，要乘胜追击。他们在议会的代言人——下院农业委员会声明要柯里夫人

到议会作证，向全国公众认错道歉。下台后的柯里夫人仍不甘心，她多次声辩说，她的“鸡蛋评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言之有据”言谈中很党委屈。一些科学家也证实她的话并非言过其实，“据保守的估计，每周约有一个人因鸡蛋中的沙门氏菌而中毒死亡”。议会上院的120名贵族议员于当年5月就有过一次集体中毒。这时候，一直在旁看笑话的工党突然杀出来：保守党政府为何让带菌鸡蛋投放市场？保守党政府觉得招架不住，只得避其锋芒，王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唇枪舌剑，你把蛋鸡抛过来，我把鸡蛋扔回去，好不热闹。

好究根问底的新闻界则疑团重重，他们决心要把鸡蛋案弄个水落石出。1989年2月初，《泰晤士报》驻议会上院记者葛思女士偶然从议员们闪烁其辞的辩论中获悉，在议会图书馆中，有一份机密的农业部与卫生部提供的调查报告。她托一位“关系户”帮她偷印了一份。次日，《泰晤士报》头版大字标题赫然醒目：“秘密报告估计，沙门氏菌感染达200万例”。接着，工党向新闻界公布了两份泄露出来的卫生部与农业部在1988年6月联合会议的记录，记录揭示了两个部如何“合谋”由卫生部掩盖当时带菌鸡蛋致人中毒的真相，在向新闻界封锁消息的同时，安排农业部规劝鸡场主改进鸡蛋加工消毒，不让别人抓住把柄的过程。

这下又不得了，风云陡变，英国公众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原来是被政府捉弄了。舆论界又炸了窝，鸡蛋事件演变成了政府是取信于民还是失信于民的问题，保守党政府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鸡蛋风波有变成英国的“伊朗门”事件的风险。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再也坐不住了，她决心出来控制局面，她不能容许这种场面存在下去，给她形象抹黑，不久前她刚为“劳森门”事件烦恼了一阵。如今这场鸡蛋风波使她的自信心严重动摇，特别是她刚下决心在新的一年里进行改革，削减预算，减轻政府负担，没想到还未来得及实施便出了这么些乱子。不过，铁娘子总归是铁娘子，在风波面前她似乎处变不惊，镇定自若。

1989年2月7日，撒切尔夫人在白厅召开内阁会议，商讨解决鸡蛋风波的办法。撒切尔意识到：她在过去10年对食品生产，分配和烹饪方面的改革措施，虽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那就是造成了病菌污染食品的问题。她过去对这一问题不予理会，和内阁僚商量后，撒切尔决定成立个专门的食物委员会，指导饮食卫生，加强食品卫生调研，并责令鸡场主立即宰杀可能带菌的蛋鸡，做好鸡蛋出场前的消毒工作。一切就绪后，风波逐渐平息下去，起初盛气凌人的鸡场主也不再吭声，其代言人下院农业委员会也不敢再传讯柯里夫人了。

有趣的鸡蛋风波就此收场。

## 从“托尔风波”看美国驴象之争——布什提名托尔被否决事件

1989年3月9日，经过连续6天的激烈辩论，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终于作出最后抉择：以53票对47票否决了布什总统对约翰·托尔的国防部长提名。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同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的首次交锋就此鸣锣收兵。美国舆论工具一个时期以来大肆渲染的托尔风波也就此平息下来。然而，美国舆论认为，这场风波的后果并未就此消除，它对布什政府造成的巨大冲击也未就此结束。

### 布什上台 以官报情

乔治·布什在总统大选获胜后不久即表示，准备任命他的好友，得克萨斯州同乡，前参院军委会主席约翰·托尔出任国防部长。布什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提名托尔为国防部长呢？

布什和托尔的交情可上溯到1960年。那时，初入政坛的托尔在家乡首次竞选参议员，由于资历浅，声望低，加之竞选经费捉襟见肘和得州一向是民主党人的天下，托尔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后来由于布什鼎力相助和竞选对手约翰逊因竞选总统而又不愿放弃参议员职位而惹恼了民主党选民，托尔竟意外获胜，成了得州90年以来的第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托尔对于布什的这一恩德始终铭记在心，并随时准备予以报答。1988年，布什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后，托尔在党内资深议员中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他，并以实际行动投入布什的竞选行列，为布什在家乡赢得选民支持，出了大力。另据报道，1987年，正当布什为竞选总统作准备时，身为调查“伊朗门”事件的总统委员会主席托尔负责起草了一份使布什免于受指责的调查报告。鉴于这种关系，尽管布什对托尔贪杯好色的劣迹也有所耳闻，但他经过思考之后，于1988年12月16日正式宣布：提名托尔为国防部长。

布什正式提名的话音刚落，托尔已搬进五角大楼的临时部长办公室。照理说，托尔所具备的经历是完全有资格担任国防部长的。他自1961年35岁时进入参议院军委会后，一直从事与军事有关的工作，1981年当上了军委会主席，1985年1月退休后，又奉里根之命担任美苏日年瓦军备控制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对于美国的各种军事问题，他了如指掌，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是有名的防务专家。国防部长这一令人陶醉的职务，是托尔踏上仕途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坐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办公室，心里怎能不高兴呢？托尔认为，自己得到军委会和参院全体会议的批准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于是乎，他开始集中考虑如何当和怎样当好国防部长了。他忙着制定一个个计划，方案和措施，准备一俟提名获得通过，就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给五角大楼打上自己的印记，也给不顾纷扰提携自己的挚友争光争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托尔沉浸在胜利前的喜悦之中时，参院军委会的气候却突然急转直下，由晴变阴，由热变冷，发生了对托尔极为不利的变化。

### 贪杯好色 风云突变

1989年1月31日，右翼保守组织首席发言人保罗·韦里奇向参院军委会提供证词，声称他曾亲眼看见托尔在公开场合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和别的女人打趣逗乐。与此同时，托尔前妻也大爆托尔好色，“玩弄女人”的丑闻。

托尔的首任太太叫罗伊，他们结婚24年，于1976年离婚，两人分手后仍维持朋友关系。2月初托尔在参院作证时，罗伊带着3个女儿出席，表示

支持托尔。托尔的第二任妻子叫莉拉，与托尔在 1983 年结婚。1987 年，莉拉以托尔有婚外情为由，提出离婚。据法庭记录，莉拉曾指责托尔与 3 个女人有暧昧关系，包括一名电视台女艺员，达拉斯市一名交际花及一名女仆。莉拉说，托尔从 1984 年至 1987 年，先后结交了 10 多个“女朋友”，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与多个女人通奸。她还说：“我一直担心国会会爆出托尔为主角的性爱丑闻”。另外，还有一名神秘女人致电国会，揭露托尔过去几年为玩女人花去百万美元。

托尔好色之说，还牵涉到一位苏联美艳的芭蕾舞演员。托尔在得州与这位苏联艳星邂逅，两人一见钟情，交往维持了数月。联邦调查局非常注意这名苏联艳星的行踪，中央情报局更怀疑她是苏联间谍。

托尔曾任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知道许多国防秘密。参院民主党人士说，一个知道国防秘密的人，与神秘的苏联女人交往，自然令人想到国防机密会否外泄的问题。过去，有关方面曾对此作过调查。并未发现有不妥之处。然而现在有些议员要求深入调查，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那个苏联美女是间谍，托尔是好色之徒，难免陷入脂粉阵中。

托尔对他好色的指责，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承认自己在婚前有时逢场作戏，与女人欢好，但婚后忠于妻子，没有拈花惹草。在参议院军委会听证会上，托尔断然否认自己是个“坏男人”。

除了好色之外，酗酒也是托尔的一大罪状。除了保罗·韦里奇的证词外，《休斯顿邮报》也报道，有 4 个小伙子去年 7 月在达拉斯的一家夜总会亲眼看见喝得醉醺醺的托尔和一个年轻的舞女跳舞。主张戒酒的参院军委会主席，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萨姆·纳恩当着电视记者的面直截了当地质问托尔“有无酗酒问题？”托尔干脆地回答说：“没有，从来没有。我是一个比较有节制的人”。

此外，参议院还担心托尔同国防工业的密切关系。托尔曾为一家国防工业的大承包商当过顾问，年薪十分丰厚。人们担心，托尔一旦当上国防部长后“难以同前承包商划清界线”，降低国防预算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军委会中的某些老参议员还列举了托尔任军委会主席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托尔的前参院军委会办公室主任，现在的空军部副部长詹姆斯·麦戈文在 1984 年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防务预算前几小时，突然在陆军的一项采购计划上增添了最后期限的规定。后来，陆军为完成任务只得违反自己的规定，准备将采购合同交给麦戈文指定的一家以色列工厂。麦戈文在 1985 年接受参院调查时供认，此事是在托尔的授意下干的。托尔在 1 月 25 日的提名听证会上断然否认他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尽管托尔本人概不承认对他的指责，尽管参院军委会共和党议员严词指责韦里奇的证词“纯系捏造”，批评《休斯顿邮报》的报道“毫无根据”。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扭转托尔所面临的不利局面，反而引起报界指责托尔贪杯好色，同军火商关系密切和有违反法律之嫌的高潮。

面对陡然紧张起来的气氛，白宫要求参院军委会推迟表决，等待联邦调查局的进一步核实和调查。在此期间，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指派以弗雷德里克·麦克卢尔为首的一批托尔的前助手返回军委会，游说纳恩和其他民主党参议员，劝说他们投托尔的票。麦克卢尔对议员进行游说，称总统提名阁员时，对其资格和经历都作出审慎调查，那些对托尔的指控纯属造谣。共和党参议员森普逊说，托尔做国防部长胜任有余，是个真正的“内行人”，他

虽然喜欢饮酒，但并非酗酒之徒。然而这一行动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进一步激起了他们对托尔的反感，尤其是那些在托尔任军委会主席期间受到压制，对他的霸道作风不满的参议员。军委会与白宫的对抗情绪日趋激烈。

尽管形势突然恶化，但此时白宫若能抓住纳恩这位对民主党参议员有巨大影响的关键人物，若能在分析、判断和行动方面不进一步失误，要争取使托尔提名获得参院军委会的通过还是极有可能的。

#### 白宫出马 初战失利

萨姆·纳恩是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1985年1月接替托尔出任参院军委会主席，是民主党内著名的军事问题专家。此人在参院，尤其是在民主党参议员中享有盛誉。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当选总统或在职总统提名的内阁成员或其他高级成员，需经参议院有关委员会听证，表决，然后再由参议院全体会议半数议员的表决通过，方能正式任职，否则无效。目前民主党是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党，在众议院435个席位中拥有260席，在参院100个席位中占有55席。而参院军委会则是参议院中最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凡政府提出的有关国家防务和军事方面的各种重大问题，包括国防预算，军事外援，人事任命等等，都须先提交它讨论、审议、认可，然后再由参院或参众两院全体会议或两院联席会议讨论批准。纳恩是参院军委会中的铁腕人物，一般说来，凡是他希望批准的议案，军委会都能通过。

对于这样一位享有较高威望，很少遇到公开挑战的人物，白宫官员，尤其是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不是设法去争取和安抚，而是采取公开抨击他的极端做法。他们批评他是“权力狂”，“妄图利用军委会主席的地位来控制五角大楼。”还指责他在议会中搞党派活动，说他“早在两周前就已秘密作出了否决托尔提名的决定，并私下逼迫民主党议员表态”，如此等等。结果，纳恩异常愤慨，矛盾立即激化了。

2月7日，白宫负责检查官员行为和道德准则机构的负责人搏伊登·格雷和参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邀请参院军委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去白宫听取联邦调查局提出的有关托尔的最后一批报告。之后，白宫的一些官员声称，“报告中没有任何表明托尔不适宜担任国防部长的材料”。次日，布什也发表讲话说，联邦调查局的最新报告“推倒了对托尔的一切指责”。

纳恩对格雷和多尔的做法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党派活动。对白宫官员和布什所下的结论，他也极其不满。他气冲冲地说：“这只是总统的看法，并不是我的意见。”还说：“如果白宫要求现在进行表决，我无疑将投反对票。”军委会中其他民主党议员也十分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在为托尔涂脂抹粉。

至此，参院军委会对托尔提名的态度已经明朗。2月23日，军委会对托尔的提名进行表决，纳恩在投出自己关键的一票之前说，托尔的酗酒和好色问题不容忽视，投票结果是，11票对9票，民主党议员全体反对，共和党议员全体赞成，党派界线，泾渭分明。

#### 驴象之争 逐成白热

初战失利，布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他此时有两种选择：一是中途换马，重新提名国防部长人选。这无疑等于认输，其结果可能导致他的威信下降，并会使新闻界和公众对他有无能力和信心同国会打交道的疑虑增加，给

新政府今后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另一个是，硬着头皮背水一战，争取使托尔的提名在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布什及其助手们心里都很清楚，即使共和党全体参议员都保证投赞成票，仍需拉 5 名民主党议员才能凑够 50 票。（依美国国会表决规则，在出现 50 比 50 的情况下，可由副总统兼参院议长拥有的关键一票决定胜负。）从参院军委会 2 月 23 日的表决结果看，这 5 票并不好拉。尽管如此，这毕竟是通过努力仍有希望获胜的一个选择。布什选择了后者。

2 月 23 日，布什在出访日本、中国和南朝鲜之前，向新闻界宣布，他仍坚持对托尔的提名，仍坚信托尔是最合适的国防部长人选。

而在那边，以纳恩为首的民主党参议员也不甘示弱。他们一面固守阵地，一面又主动出击，除了在原先几个问题上继续作文章，批评托尔之外，纳恩还派人到外地调查和核实托尔的其他问题，并声称托尔与一起受贿丑闻有牵连。

不过，民主党最有力的武器，还是抓住托尔的“酗酒问题”。民主党参议员贝纳特·约翰斯顿语气坚定地说：“在核时代，绝不能在一个掌握未来命运的人身上去冒险。”纳恩坚持认为，托尔的酗酒史“说明对他不能委以指挥导弹部队、空军部队或海军导弹潜艇的重任”。新闻界也对此大作文章，推波助澜。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指责，托尔再象以前那样反唇相讥，或矢口否认，显然与事无补了，于是，托尔于 2 月 26 日通过两家电视台当众发誓：“如果参议院确认总统对我国防部长提名，我保证在任职期间滴酒不沾，不管是葡萄酒、啤酒，还是任何其他种类的酒”。

然而，托尔情切意真的保证似乎并没有缓解或者减少民主党人对他贪杯的指责，反而等于承认自己以前确有酗酒问题。以至连共和党参议员拉里·普雷斯勒和南希·卡斯鲍姆也开始对此感到怀疑和不安起来，他们向新闻界表示，到时候他们有可能对托尔投反对票。这对白宫来说，是个不祥之兆，对方的票还没有拉到，自己营垒内反而出现了“变节者”。

#### 最后结局 托尔归故

2 月 27 日晚，布什结束亚洲之行返回华盛顿。翌日一大早，他便立即同参院民主党领袖乔治·米切尔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接着他又会晤了一批民主党参议员和共和党参议员。这一天，布什共会晤了 12 位参议员，呼吁他们投托尔的票。与此同时，前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福特及现任副总统奎尔也四处活动，谋求对托尔的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民主党阵营中终于有人回心转意了。他们是亚拉巴马州的豪厄尔·赫夫林和康涅狄克州的克里斯托弗·多德。这对布什和共和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舞。但距表决人所需要的票数仍相差不少。然而，此时民主党也并没有放松警惕。纳恩又向托尔射出了一支冷箭，说他在开咨询公司期间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政府购买武器计划的内部情报提供给了军火承包商。

紧接着，《华盛顿邮报》也向托尔开了一枪，报道了退役空军中士鲍勃·杰克逊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词。杰克逊说，托尔在 1976—1978 年视察得克萨斯州的伯格斯特龙空军基地时，对基地的一位女秘书和 F—14 飞机上的一位女机长动手动脚。

这一箭一枪不仅打击了托尔的形象，还进一步给共和党阵营制造了新的麻烦。最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提出让托尔试当半年国防部长的



建议，但遭到民主党议员的坚决反对。乔治·米切尔说：“据我所知，给予一个内阁成员半年试用期，无此先例。”萨姆·纳恩则说：“如果设立一个试用国防部长，那会对武装部队和在国际社会产生消极影响。”

3月9日，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结果揭晓，53票对47票。52名民主党参议员和女共和党参议员南希·卡斯鲍姆投了反对票。44名共和党参议员和3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白宫与国会山的第一次较量就此降下了帷幕。

托尔在五角大楼观看了电视台转播的表决实况后，神情暗淡地说他将回得克萨斯州老家去过平民生活。24小时后，布什提名理查德·切尼为国防部长，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欢迎。

托尔风波过后，布什发表讲话说，托尔是“被连议员们也认为缺乏根据的指责无端中伤了”。然而，这场风波的背景十分复杂微妙，真正的利害关系是政治性质的，它反映了美国两党的勾心斗角。正如布什的一名支持者所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的危机。上台伊始就输去这场斗争（对布什来说）是灾难性的。国会山将充满‘血腥味’”。

## 发主在阿尔卑斯山麓的政治丑闻——瑞士女部长科普夫人下台记

位于阿尔卑斯山麓的瑞士一向以政治清廉和治国有方而闻名于世，然而1988年12月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家却发生了一桩罕见的政治丑闻：瑞士历史上第一个女部长——司法部长和警察总监伊丽莎白·科普夫人执法犯法，严重违反国家官员保密条例，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引咎辞职。并于1990年2月被法庭传讯，接受审判。

伊丽莎白·科普夫人时年53岁，出身名门望族。1984年当选为瑞士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联邦委员会”7人成员之一，成为瑞士历史上第一位女部长。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科普夫人前程似锦，今后大有希望成为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第一位女主席。然而，这桩瑞士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却使这位夫人断送了自己辉煌的政治前程。

这桩丑闻最早是瑞士提西诺省一位年轻的检查官迪克·马蒂揭发出来的。马蒂在调查瑞士银行接受来自国际贩毒集团一笔数额高达10多亿美元的“黑钱”过程中，竟意外地发现身为司法部长和警察总监的科普夫人执法犯法，违反国家官员保密条例，通过电话向她当律师和沙卡尔奇公司董事的丈夫通风报信，司法部门已怀疑沙卡尔奇公司与非法转移毒品美元有关，不久将对这家公司进行调查。于是，她的丈夫汉斯·科普连忙辞去了在这家公司的任职。几天以后，司法部门掌握了沙卡尔奇公司近年一直从事非法转移毒品美元的确凿证据，而这家公司老板——吉恩和巴尔基兄弟曾经在1987年因涉嫌拥有100公斤海洛英而被警察拘捕过。

伊丽莎白·科普夫人泄露机密的丑闻曝光之后，她立即矢口否认迪克·马蒂对她的指控，她辩解道，在她给丈夫打电话以前根本没有收到有关沙卡尔奇公司的材料。但是瑞士政府任命的特别检查官已经确认科普夫人曾经打过迪克·马蒂揭发的那个电话。

科普夫人的丑行被公之于众以后，瑞士朝野上下大为震惊，舆论哗然，公众对政府出现了信任危机。人们不满地指出，尽管瑞士政府一贯称科普夫人是一个能干和勤奋的部长，但是早在她当选联邦议员时，新闻界已经指出她那个劣迹昭著的丈夫将会对她产生危险的影响。因为科普先生曾有偷税漏税的行为，瑞士律师协会还曾怀疑他滥用律师的职权。然而，瑞士政府对于新闻界的评论置若罔闻，仍一意孤行地重用科普夫人。这次随着丑闻调查的深入，人们还发现包括联邦检查官办公室在内的司法部的一些部门在处理来自其他国家的关于国际毒品贩运活动的报告的做法颇为可疑。他们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公然庇护受到其他国家调查和跟踪的嫌疑分子。例如，联邦检查官甚至运用法律手段来禁止新闻界披露沙卡尔奇公司和科普先生的违法活动。当局对一些在这一事件调查中走得太远的记者进行了惩罚，监视，窃听一些记者的电话，试图缩小影响。然而，公众的反映极为强烈，他们一致要求严惩这种犯罪活动。面对公众的责难，瑞士政府非常狼狈。为了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瑞士政府宣布成立两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一案件及司法部和瑞士立法程序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为使这一事件调查得以顺利进行，议会撤销了科普夫人豁免受审的权利。科普夫人也在公众的强烈谴责声中被迫引咎辞职。

经过一年多调查，1990年2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在洛桑对科普夫人及其两名同案被告：科普夫人的私人秘书凯瑟琳娜·斯库普和司法部前法官雷纳特·施沃布进行公开开庭审判。科普夫人被指控严重违反国家官员

保密条例。检查官皮勒指出，这种消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泄露的秘密。如果这一罪行成立，科普夫人将被罚款 4 万瑞士法郎，或被处以 3 年监禁。但是，科普夫人对这项指控始终矢口否认，在法庭上一再辩解说，她是无罪的，因为她是从私人秘书斯库普那里得到有关调查的消息，在通知丈夫汉斯之前，她并没有收到司法部内部有关沙卡尔奇公司非法转移毒品美元的材料。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又对斯库普和施沃布进行了审讯，而她们两人对科普夫人在给其丈夫通风报信之前，是否已收到司法部关于沙卡尔奇公司的正式材料，也不太清楚，不能明确回答。因此，法院认为，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控告科普夫人违反国家官员保密条例的指控不能成立，法院只好宣布科普夫人无罪，两名同案被告也被认为无罪。

法院宣判科普夫人无罪，公众对此反映极其强烈，他们认为政府制裁不严，纵容官商勾结。因为近年来，国际毒品贩子利用瑞士银行条例中的缺陷，将大量毒品美元堂而皇之地携入瑞士境内存入瑞士的银行，而瑞士司法部门对此决不会干涉。所以瑞士成了军火商、恐怖分子、毒品走私贩子及绑架分子处理非法收入的“天堂”，在今天瑞士银行账户中充满了无数的“黑钱”。由于这种现象极其普遍，法语中就很形象地借用了“BLANCHIR”（即“洗净、洗白”）这个词，似乎通过把非法所得的黑钱转入合法的金融渠道，就可以把脏钱洗净了。科普夫人执法犯法，却被宣判无罪，瑞士舆论嘲笑地说，脏钱被科普夫人“洗净”了，而科普夫人自己又被国家“洗净”了。真可谓：“清廉”国度不清廉，部长犯法免受罚。

## 第二篇 经济丑闻

涉嫌贿赂受查询 无罪被贬失前程——理查德·艾伦“涉嫌”贿赂案始末

1981年1月20日，里根正式入主白宫，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理查德·艾伦由于曾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里根竞选班子内的外交事务顾问，替里根出谋划策，深得里根青睐。因此，他在里根上台后立即被委任以重任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希望以此机会影响里根政府对外政策，成为继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之后的白宫“隐形人”。无奈却因“涉嫌贿赂”，在任职不及一年之时，被迫“退出政府舞台”。

好心搭桥 健忘误事

据报道，理查德·艾伦自1972年以来，通过他所开办的波托马克国际公司曾担任过好几家日本公司的顾问。他和许多日本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网。于今，他身为白宫幕僚——里根的重要谋士，他的那些日本朋友很自然地希望通过他来“捞点好处”。

果然不出所料。还在里根就职前夕，艾伦就接到日本《主妇之友》杂志的一名记者的电话，要求帮助安排一次与南希·里根会面的计划。为了不止朋友失望，艾伦“出于好意”便“把这个请求”转交给有关人员去“研究、处理和决定”。在艾伦的帮助下，1981年1月21日，即在里根就职的第二天，《主妇之友》杂志的副主编木本佳子和另外二名日本妇女（一名记者、一名翻译）终于如愿以偿，采访了南希夫人。尽管这次采访是非正式的，是“站着谈的谈话”，但在日本记者们看来这次会谈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会谈之后，她们便决定按照日本人的习惯，通过艾伦向南希夫人付了1,000美元的“酬金”，以表谢意。当晚，她们便将关于赠款之事告诉了艾伦。

为了不使日本记者或南希夫人感到“难办”，艾伦决定暂时“收下”这笔表示“敬意的赠款”，以待查明“以何种适当的程序交给政府”。据说，这笔“酬金”是木本佳子亲自用白色信封装着转交给艾伦的，信封内“一共是10张100美元的钞票”。艾伦收到“酬金”后，马上叫秘书把钱存放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艾伦这样处理了这件事，原本“无可非议”。但令人费解的是不知为什么艾伦没有立即把这笔“酬金”交给政府，而是让它在保险柜里躺了“8个月”。殊不知，正是这笔被“遗忘了”的钱给艾伦的官宦生涯带来了莫大的麻烦。

1981年9月，人们在艾伦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个内装有1,000美元的信封。艾伦的顶头上司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知道此事后，立即向联邦调查局作了汇报，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此事给政府带来“太大”的损害。经联邦调查局证实，艾伦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事件并未就此了结，白宫一方面将该事件提交司法部进行进一步调查，另一方面又要求日本当局对日本《主妇之友》付给艾伦“酬金”一事进行核实。

报界推波助澜 华府手忙脚乱

1981年11月13日，日本《每日新闻》首次报道了白宫调查艾伦“涉嫌”贿赂之事。报道说，美国总统里根信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因“接受了”日本一妇女杂志的1,000美元“酬金”而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该报道还含蓄地称之为“可能是桩受贿事件。”消息传出，美国舆论大哗。一时间，艾伦事件成了“摇撼白宫”的政治大丑闻。

艾伦获悉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后，惊恐不安，对报道中所使用“接受了”钱的措词极为愤慨。在该报道发表的当天，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几乎是咆哮着说：“我没有接受钱，我是收到了钱。”并解释道，那笔钱之

所以交给他，是因为它是一个“外国团体”，送来的，而他的办公室按常规是处理对外事务的，“这件事前前后后没有可以非议之处”。

与此同时，白宫也对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惊愕不已，“感到极度不安”，几乎是不知所措、穷于应付。针对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美国总统法律顾问菲尔丁在11月13日被迫发表声明证实说，联邦调查局是从9月中旬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的，但没有发现艾伦有违法或违章行为。并说，所发现的“酬金”已送交财政部，调查已经结束。此外，白宫发言人戴维·格根也宣布，艾伦没有问题“无可怀疑”。然而，司法部发言人汤姆·德凯尔却对此另侍一说，他在声明中说，调查“还在进行中”尚不能作出结论。于是，格根又只得连忙出来道歉，并认错说，白宫的声明事先没有同司法部联系。

不仅如此，事态的发展还波及到里根夫妇。据说，与艾伦事件有关的美国家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对把艾伦的交易公布于众以及政府随后进行的调查”也感到“非常恼火”。至于一贯信任艾伦的里根总统则在“焦急地等待”司法部对艾伦调查的结果。

1981年11月19日，日本《每日新闻》通过援引一些人士的话又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日本警方调查的最重要的事是付给艾伦的钱的数量，因为在那个装有现金的信封上的数字可能写的是1万美元，而不是1,000美元”。这就使问题更为严重，美国舆论再次哗然。人们纷纷推测艾伦必将离职。

面对美国公众的敌意，华府要员通过各种途径尽力试图“平息不断掀起的风暴”。里根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开始出来为艾枪说情。1981年11月6日，米斯同联邦调查局有关人员的谈话时明确指出，没有必要对艾伦“采取行政行动”。11月24日，他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全国见面》电视节目中证实，是他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此事的；并再三强调，“我认为，目前没有让艾伦离开白宫的计划”。海军部长约翰·莱曼也站出来帮艾伦说话。他证实说，他亲眼看到艾伦接到的钱是1,000美元，当时他还风趣地对艾伦“作了个鬼脸”。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主妇之友》的主编以及受到南希夫人会见的三名日本妇女也先后证实了她们付给“酬金”的对象，详细经过和具体数目。

#### 调查步步升级 艾伦“请假离职”

正当艾伦在政府中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之时，日本几家重量级的媒体又爆出冷门。1981年11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同时报道，艾伦还“接受了参加这次采访的”日本记者们“送的两块石英手表”。

据受到南希夫人会见的三名《主妇之友》杂志的日本记者回忆，这两块表是她们“离开日本时在机场一个免税商店里以每块表130美元的价格购买的”。按正常的零售价格，每块表约值150美元。日本记者说，她们是分别在1981年1月16日（即在里根就职前后）将这两块表作为送给艾伦夫人的“个人礼物”交给艾伦的。然而，根据美国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官员是不允许接受价值100美元以上的礼物的。显然，作为政府官员的艾伦已违犯了此规定。

为了澄清事实，艾伦于11月21日以“书面答复”的形式回答了白宫新闻室的提问。在“书面答复”中，他一再证实这些手表是一位相识多年的日本记者在里根宣誓就职和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所赠送的。此

外，他还激动地申辩说：“如果这些个人礼物是在1月20日之后送的（但情况不是这样），白宫的规定对于那位记者朋友是出于个人关系赠送的礼品也是不适用的。”然而，不管艾伦如何解释，由于他所说的情况和日本记者所说的情况发生矛盾，这就进一步使人们对他的“信誉产生新的疑问”。

在司法部调查的同时，联邦调查局也正在调查艾伦的商业活动。对此，日美许多新闻部门也添油加醋地大肆加以报道。日本共同社说，“艾伦先生作为日本几家大公司的企业顾问是陷得很深的”。1981年11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白宫的某些高级助手“正在追究艾伦在政府研究汽车进口问题期间同日本商人进行会谈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事实上，艾伦与日本某些商人之间的暧昧关系早在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期间就被提起过。当时，有人指责文伦利用他在理查德·尼克松任总统时在白宫任职期间建立的关系，为他和他的朋友与日本人签订了有利可图的咨询合同。只是因为他立即“从里根的竞选运动中引退”而未过分揭发。而今，他作为里根“核心班子”的重要成员，由于“涉嫌贿赂”他的商业活动尤其是与日本商界人士之间的商业活动必然会受到调查。

在调查中，人们发现艾伦在1981年2月向政府递交的经济情况申报表中遗漏了他在1972年开设的咨询公司——波托马克国际公司，更没有将该公司的“顾客”每年付给他的5,000美元酬金申报个人所得税。理由是他在1978年1月已将该公司出售，并于1980年底与这家公司断绝了“财政上的关系”。但事实上，他是在1981年1月出售的。当1981年11月，报界向他“询问”有关细节时，他才承认说是“搞错了”。接着，他修改了申报表，并老实地开列了1980年底在该公司所拥有的10万美元到20万美元的资金。这次对艾伦商业活动的调查结果又使人们联想到：艾伦在出售一家咨询公司时是否有“非法”行为。因为美国1978年所通过的《从政道德法》明文规定：在向政府提出道德状况报告中，故意弄虚作假是重罪，应该受到5年的监禁和1万美元罚款的惩处。

自从1981年9月联邦调查局对艾伦事件开始调查以来，该事件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对该事件的“兴趣越来越大”。1981年11月24日，18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要求政府任命特别检察官进行审理。据美国法律规定：如发现政府人员有违法行为，司法部可以进行初步调查，期限为90天。除非证明这些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否则司法部必须任命独立的特别检察官。

为了不让“里根总统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为了减少白宫的外来“压力”，艾伦于1981年11月29日要求里根总统准许其“请假离职”，直到司法部结束对该事件的调查为止。当天，他在美国三大电视网上理直气壮地说，他将用法律手段对付编造关于他的谎言的人，因为这是他“可以大胆讲话”的时候了。他说，他将把“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以“不让种种含沙射影、闪烁其词的说法四处流传”。并确信他“将会恢复……工作。”

白宫有意 艾伦无奈

由于新闻媒介的“煽风点火”，艾伦事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不时地冲击着未满周年的里根政权。为了应付事态的发展，摆脱困境，里根“核心班子”的高级助手们以及里根夫人围绕着艾伦的去留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论。南希·里根、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和副主任迈克尔·迪弗认为艾伦收下酬金犯了严重错误，而他继续同他的那些已出售的咨询公司的前顾客和联系人保持关系则是“作了严重的错误估计”。为了“减少政治上的损失”，

他们“建议解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他的职务”。但是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仍竭尽全力袒护艾伦，他指出：谁也没有提出证据说明艾伦接受日本记者1.000美元“酬金”，并把钱放在保险柜里遗忘了8个月一事“触犯了法律或规定”。因此，他强烈反对解除艾伦之职。但终因势单力薄，难撑大局。辩论结果，艾伦成了白宫政治的又一牺牲品。

1981年12月1日和23日，美国司法部先后宣布艾伦在酬金问题上“没有犯罪意图”；在接受手表和没有准确地填写财政情况表格的问题上也没有违犯某一条具体的法律，因而，“没有必要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进一步调查”。这等于说，以前对艾伦的一切指控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艾伦复职应该只是迟早的时间问题了。然而，这时已被艾伦事件弄得尴尬不堪的白宫领导层并不希望艾伦再因到原来的职位上。于是，他们就在艾伦复职问题上有意拖延、甚至设置障碍。白宫先是在1981年12月1日宣布顾问室将按正常程序对艾伦是否“违犯了政府官员守则”的行为“进行单独复查”；接着又于12月23日（即在司法部已给艾伦正式“开了无罪证明书”的当天）宣布“有一些涉及白宫条例和程序的问题”必须先加以解决，然后才能考虑认为艾他的问题了结，并恢复他的职位。

由于艾伦已在事实上无法复职，于是，他在失望中“很不情愿地提出了辞呈。”1982年1月1日，白宫正式宣布艾伦辞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务的决定。3天后，任命副国务卿小威廉·克拉克继替艾伦之职。为了让艾伦多少得到些安慰，美国行政当局对涉及艾伦收下“酬金”以外的问题发表了一个报告，声称艾伦“曾和他的公司的前客户在白宫会过面、进过餐，但并没有过什么不轨和违法行为”。与此同时，白宫又在政府部门中找了一个并不怎么显眼的职位——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顾问——来打发这位曾显赫一时、雄心勃勃的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 莱茵河畔的水门事件——历时7年的西德弗利克贿赂案

政坛要员一旦卷入经济丑闻而被报刊公诸于世，其命运几乎是肯定的一下野甚至入狱。可是，本文的主人公西德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却不是这样。1981年末东窗事发之后，他不仅岿然不动、照旧活跃于西德政坛，而且还在1982年带领本党（西德自由民主党）人士一起把执政已达8年之久的施密特总理拉下了马。随后，拉姆斯多夫在新总理科尔的内阁中出任经济部长，继续主持西德全国的经济工作，直到1984年6月才被迫辞职。

这起弗利克贿赂案前前后后持续了7年之久，简直成了80年代前半期联邦德国的政坛风云录。弗利克案牵涉到包括三位联邦部长在内的众多政坛显要和经济巨头，并在1984年10月把联邦议院议长巴泽尔拖下了台。

### 小党大官 翻云覆雨

1982年2月正当施密特对议会刚刚举行完的信任表决结果“非常满意”，准备“加强社会党和自民党间的相互合作，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时，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内却又爆出一大丑闻。

其实，这段丑闻大曝光既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也算不上突如其来，只不过是旧话重提，略有发展而已。原来，1981年冬，西德一家很大的公司弗利克康采恩涉嫌漏税；1975年该公司出售它在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中的股份时得到了19亿马克（合7.03亿美元）的收入，但却没有交税。1981年11月25日，西德国家检察院搜查了弗利克公司董事会的办公楼。经调查，检察院发现该康采恩漏税与波恩的一些政治家有关，于是这桩经济犯罪案件又变成了一桩政治丑闻。1981年11月29日，西德发行量最大（99万份）的新闻性杂志《明镜》周刊披露说，联合政府的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财政部长汉斯·马特赫费尔和总理府国务秘书拉恩斯泰因有收受弗利克公司的贿赂，为该公司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的嫌疑。但是，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政府的信任危机上，没有顾及这桩丑事。

然而，在议会信任表决后的第21天，即2月26日，检察官下令对这两位部长的财政活动进行调查。调查主要涉及弗利克公司的偷漏税情况和两位部长的“变相贪污”。检察官们认为此案错综复杂，将涉及包括其他内阁成员在内的1000多人，因此，他们打定了开展持久战的决心，准备花几年时间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检察官们的这一决定深得民心，西德举国上下抓“大鱼”的劲头一下子上来了。本国新闻机构开动机器大肆报道自不待言，外国新闻界，如法新社、路透社也来凑热闹，一哄而上，竞相报道。

一时间风波再起，拉姆斯多夫和马特赫费尔“极其坚决地反驳了这种指责。”施密特总理也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应付这一尴尬的局面。首先，他信誓旦旦地庄重声明，他对两位部长的信任“绝对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然后，他在尽量不对司法部门的决定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又小心翼翼地暗示检察官“有时候可能是错的”。为了使自己的论点更具说服力，施密特总理还举自己为例作了一番论证。他说，回溯到1963年时，他本人曾涉嫌一起严重的叛国案，警方用了4年的时间才排除了对他的怀疑。

一言既出，不明内情的人也许会以为总理大人是爱将心切，护短意浓。知根知底的人却知道，施密特自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者城门失火，必定殃及池鱼，拉姆斯多夫下野，很有可能把整个政府拖垮；再者，对于这桩丑闻的主角，他的那位自民党经济部长，他更是奈何不得。

先撇开拉姆斯多夫本人的情况不谈，单看他的来头——西德的自由民主

党。1982年时，西德主要有8个党，数施密特担任副主席的社会民主党人多势众，当时拥有党员98.2万人；接下来便是赫尔穆特·科尔担任主席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有党员68.2万人；然后是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员17万人；论人数，自由民主党排行老四，有党员8.3万人，另外4个政党——绿党、德国的共产党、西德共产主义联盟和国家民主党，少则区区几千人，多则万把人，政治影响实在不足挂齿。然而，千万不可小看自民党，它虽然人数不多，能量却不小，在西德政坛上从来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社民党和基民盟一基社盟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所以在争夺执政权时这两大政治集团向来有我无你，两不相容。可是，无论哪一方要想赢得议会中的大多数，都不能不借重自民党，自民党对它们的向背会使西德这两股政治势力的任何一方产生重大的政治得失。在1949年9月21日西德建国后的历届政府中，社民党和基民盟一基社盟这两大势力有上有下，而自民党却渔翁得利，稳坐联合政府中少数党的交椅，几乎没有尝过下野的滋味。

拉姆斯多夫本人也决非等闲之辈。拉氏1926年12月20日生于西德的亚琛。1944年18岁时从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6年，他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1947—1950年，拉姆斯多夫先后就读波恩大学和科隆大学，主修法律和政治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担任过估税员，后又投身商界，长期担任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经理。1951年，拉姆斯多夫加入自由民主党。从1968年起，他担任自民党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司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也逐步上升。从1973年起，他担任西德联邦议院议员，从1977年起，他又担任西德经济部长。仅从他的履历看，他走过的道路与多数西方政客大同小异。但是，凭心而论，他的成功要比旁人艰辛得多。战争带给他的是终身残疾，但他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在生活中奋力拼搏，曾经获得过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和残疾人体育运动金质勋章，说他身残志坚、毅力惊人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从政之后，他还忙里偷闲，在1978年和1980年先后出版过两本书，在政府中可算得上一位文武全才。在自民党内，拉姆斯多夫与本党主席、长期担任西德外长的根舍过从甚密，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在政府中，他主持经济工作，一贯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提供过多的社会福利。虽然他免不了与总理发生分歧，但确实是施密特的一员得力干将。因此，在调查尚无定论时，施密特无论是从两个执政党的关系着想，还是从个人的才干方面考虑，都不打算舍弃他。1982年4月初，正当弗利克公司贿赂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波恩盛传施密特将改组内阁，罢免涉及该案的财政部长马特赫费尔和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然而，4月27日施密特正式公布内阁的重大改组时人们发现，施密特只免去了内阁中本党的几位部长的职务。而拉姆斯多夫则继续留任经济部长之职。

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施密特力保拉姆斯多夫，弗利克案也还未了结，拉姆斯多夫却并不领总理的情，他似乎也不以弗案风波为累，依然我行我素，兴风作浪。本来，社民党和自民党在1981年夏天就曾为1982年的预算吵得差点不欢而散。1982年的这个夏天，双方又为1983年的预算争得面红耳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6月30日达成了妥协，避免了一场政府危机。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经济未能象政府在6月份乐观估计的那样很快回升，收入达不到预期指标，1983年的财政预算中又出现了100亿马克（约合40亿美元）的亏空。对于如何填补这一亏空，两党意见不一。社会民主党一向标榜为广大职工谋福利，是靠大搞福利主义起家的，因而它主 张大量举债和增

加税收；而自由民主党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它认为增税会损害它所代表的这部分人的利益，因而主张大刀阔斧地削减福利开支。此外，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威信江河日下，反对党基民盟队伍日益壮大，自由民主党十分担心自己再同社民党结盟会与之同归于尽，因此，素有“波恩政界最为足智多谋的策略家”之称的自民党主席汉斯—边特里希·根舍暗下决心，要改弦更张，与社民党决裂。

作为自民党内阁部长中最右的人物，拉姆斯多夫充当了实施这一意图的急先锋，他最先放风说要“更迭”。1932年8月31日，西德发行量最大(493万份)的《图片报》报道说，拉姆斯多夫宣称，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黑森州地方选举中，选民们可能表明他们是否希望他的自由民主党退出联合政府。31日这一天，拉姆斯多夫又在威斯巴登的一次讲话中说，社会民主党要想推行它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的经济政策，它就不得不另谋联合政府伙伴。9月1日，施密特总理在内阁会议上对拉姆斯多夫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抨击，当面谴责拉氏的言论危害了西德政府内政外交的行动能力。施密特对拉姆斯多夫的言论表示“震惊、意外和恼火”，而且很不客气地说，要是什么人想背弃自由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协议，他们就应当“公开地、坦率地、直截了当地讲出来，而不必通过接见各种人物去表达这种态度。”

自民党与社民党分道扬镳的决心已定，它决不会因施密特的勃然大怒而放慢步伐。9月11日，拉姆斯多夫抛出了一份长达34页的经济就业和福利政策综合方案，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第二天，拉姆斯多夫又违反内阁惯例，公开了他向施密特总理递交的这份报告。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自民党向社民党发出的最后通牒，施密特总理则风趣地说，“公众舆论认为这是一份‘离婚书’”。

果不其然，9月17日，自民党主席、联合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率领拉姆斯多夫和内政部长格哈特·鲍姆(自民党副主席)、粮食和农林部长约瑟夫·埃特尔集体辞职。自民党与社民党长达13年的执政联盟正式破裂，施密特联合政府就此垮台。但是，施密特总理“没有眼泪，没有挽诗”，他决定维持少数派政府，独撑危局。施密特的意图是凭借他本人的威望和社民党的执政地位等优势，在反对党措手不及，以及自民党退出联合政府后内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提前大选，摆脱困境。

然而，反对党岂能给施密特喘息的机会而坐失夺权的良机？9月28日，自民党和基民盟向西德联邦议院议长里夏德·施蒂伦克提出了一项“建设性的不信任案”，正式要求于10月1日进行表决，以便把施密特赶下台，由科尔取而代之。

#### 科尔收款 绿党发难

1982年10月1日，保守派领导人、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当选西德第六届总理。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这位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3米)的著名“黑巨人”已经卧薪尝胆，苦苦等待了7年。在如愿以偿的当天，52岁的科尔身穿礼服向联邦议院宣誓就职：“我宣誓，我要致力于德国人民的福利，增进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捍卫联邦的宪法和法律，认真地完成我的职责和对一切人主持正义。上帝保佑我。”10月4日，科尔完成组阁，拉姆斯多夫留任经济部长，新政府正式开始履行职责。

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弗利克贿赂案的调查者们又有了新发现。弗案的这项新进展差点破坏了新政府的廉洁形象和它所宣布的官民风雨同舟、共度

难关的宏伟构想。

1983年1月25日，西德《明镜》周刊又登载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科尔总理接受了正在税收方面受到调查的弗利克公司的现款。西德新建的激进小党绿党闻风而动，要求科尔立即辞职。绿党执委会委员贝克曼愤愤不平地说，科尔接受弗利克公司的现金是一件“丑闻”，绿党不要“接受工业界的贿赂而同时又要求公民准备为振兴经济‘作出必要的牺牲’的人当总理”。绿党此举对于新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正如读者所知道的，科尔并未辞职。但是，绿党的名字却因此响亮了许多，也为它在1983年3月6日举行的西德大选中赢得了不少选票。

绿党要求大规模调查弗利克公司贿赂案，因为据说这些大党都得到了该公司的“资助”。说句公道话，在这件事上，的确也只有绿党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

据1983年12月8日发表的“波恩检察院对弗利克案件的起诉书”透露，赫尔穆特·科尔确实接受了弗利克公司的现金。起诉书中共有两处提到了科尔拿钱的情况。

一处指称，1976年9月17日，弗利克公司经理布劳希奇让会计迪尔支出9万马克，其中6万马克给当时的经济部长弗里德里希斯，3万马克给科尔。用波恩检察院的话说，这位弗利克集团经理是“想支持作为反对党领袖的科尔的政治工作”。

整整1年后，正赶上拉姆斯多夫担任西德联邦经济部长，布劳希奇又从迪尔那里取了6万马克，给“科尔博士和拉姆斯多夫博士一人一半”。

在公布起诉书之前的调查过程中，波恩检察院核实过有关材料。1982年7月5日，波恩检察院传讯了当时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科尔。科尔承认，他收过弗利克集团的钱。然而，科尔又说，从1974年到1980年迪尔帐上记的56万5千马克是他所“完全不知道的”，他只记得“两次到三次捐款，数目是2万马克，或3万到3万5千马克”。

在这次传讯两个半月之后，亦即在当选西德联邦总理之前九天，科尔对此事作了准确说明。他给检察院写了一封信，介绍了1977年、1979年和1980年三次交付现金的情况。他说这几次的总额是15万5千马克——不过迪尔帐上所记的两个三万马克却不包括在内。

毫无疑问，一个官员如果接受了钱并因此渎职，那么他就是收受贿赂，理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然而，对于波恩的检察官来说，科尔是否同弗里德里希斯和拉姆斯多夫一起收了钱并不重要，因为当时的科尔虽是反对党的领袖，但却也算“一介平民”。既然科尔当时不是“官员”，他也无权决定对弗利克康采恩免税，因而检察院的起诉书只是确认了事实，并未对科尔起诉。

然而，绿党哪肯就此放过科尔。事隔两年之后，绿党老帐新算，再次对科尔发难。

1986年2月17日，绿党议员奥托·席利指控科尔犯有伪证罪。席利提出的指控有两项，一项说科尔向莱茵兰—法尔茨州（科尔的故乡，1969—1976年科尔任该州基民盟主席和州政府总理）议会设立的一个正在调查非法党派基金的委员会提供了伪证，从而将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引入了歧途。1985年7月，科尔曾向该委员会作证说，他一点都不知道设在莱茵兰—法尔茨州科布伦茨的慈善组织“1954年公民联合会”曾给过基民盟钱，当然也就更不知

道该组织起了使基民盟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资金合法化的作用。但是，3个月之后，科尔又写信给该委员会说，他回想起是那个慈善组织交来的钱。席利的另一项指控说，1984年11月科尔未能向一个议会委员会讲出真情。科尔当时说，他不记得从弗利克公司那儿得到过5万5千马克（2.4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一直在大力揭露和抨击弗利克贿赂案的西德《明镜》周刊与绿党遥相呼应。1986年2月23日，该刊报道说，科尔总理所在执政党的主要成员已经作了计划，一旦科尔由于说谎而被起诉，他们就抛弃他——那时候科尔必须下台。1986年2月24日，科布伦茨和波恩两地的检察官开始对科尔进行弗利克贿赂案败露后的第二次调查，这也是联邦德国1949年建国以来第一次对一位现任总理进行调查。

1986年2月25日，科尔接受汉诺威《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沉着地”面对司法程序，并且扬言“这项指控实际上没有什么，因为我是尽自己所知和良心作证的”。其实，当时科尔对这项调查是忧心忡忡的。他在这次采访中就说过，这项调查不论结果如何，都“将产生附带后果。政治气氛将因此遭到毒害，我们的公民将因此感到不安全”。除此之外，科尔当然也进行了反击。他谴责提出这项指控的席利谋求“破坏我个人的形象和名誉”，并且自信地说：“我认为，多数公民将看透并坚决抵制为反对一个成功的联合政府而采取的这种恶劣手段。”

对于这段“伪证”公案，科尔的参谋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说是“政治诽谤”。科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书记海纳·盖斯勒则宣称，科尔当初说“不”，也许是因为他“暂时失去了记忆”。从绿党方面来看，它也绝不可能大公无私，“别有用心”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科尔到底是“失去记忆”，还是装糊涂作伪证，人们不得而知。确定无疑的只有一点：1987年1月西德将举行新的大选，各党都在积极准备，而大多数选民们仍将选举已经成功地领导联合政府复兴了经济的科尔为他们的总理。

#### 正式起诉 “群星荟萃”

从1932年2月26日下令对弗利克贿赂案展开全面调查之后，波恩检察院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紧张侦查。1983年11月29日，波恩检察院发言人约翰尼斯·威廉宣布，检察院已经掌握了可以起诉拉姆斯多夫等人的足够证据。但是，由于拉姆斯多夫是联邦议员、现任经济部长，享有豁免权，要对他正式起诉必须首先取消他的这一特权。为此，约翰尼斯·威廉请求西德联邦议院取消拉姆斯多夫的议员豁免权。

1983年12月2日，联邦德国议会一致通过协议，取消他的议员豁免权，从而为检察院正式向法院提出起诉扫清了道路。1983年12月8日，波恩检察院首席检察官弗朗茨布鲁诺·奥伊伦卡姆普正式对弗利克贿赂案提出了起诉。弗利克康采恩的两名前经理和自民党的三名重要政治家分别被控行贿和受贿。波恩检察院的这份起诉书长达100多页，读起来就象是联邦德国的《名人录》：

- 被告拉姆斯多夫，男，56岁，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在担任部长期间曾四次接受弗利克康采恩的钱——总共13.5万马克。

- 被告弗里德里希斯，男，52岁，德累斯顿银行行长，前经济部长，从1975年12月到1977年5月他总共收了弗利克康采恩的37.5万马克贿赂。

- 被告里默尔，男，57岁，前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经济部长，弗

利克康采恩曾九次暗中对他行贿——他总共收了大约 14.5 万马克。

· 被告布劳希奇，男，57 岁，前弗利克公司经理，过去几年内他曾经给过部长弗里德里希斯、拉姆斯多夫和里默尔五位数到六位数的现金。

· 被告内米茨，男，57 岁，企业家，原属于弗利克康采恩的拉廷根市“化学工艺流程设计公司”负责人，他曾经给过自民党部长里默尔许多钱，从而从北莱茵—威斯特伐亚州的能源发展计划里得到了数百万马克的补贴。

起诉书接着列出了一张 140 人的证人名单，这张单子读起来《名人录》的味道就更浓了。“金榜题名”的既有第 25 号证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联邦总理科尔，自民党主席、联邦外交部长根舍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斯特劳斯，又有前联邦总统谢尔，还有联邦议员德雷格尔（基民盟）、埃姆克（社民党）和米施尼克（自民党）等人。按照西德法律，若有必要，这些人必须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面对涉及面这么广的政坛特大丑闻，西德公众反应的强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1983 年 12 月 12 日出版的第 50 期《明镜》周刊颇为尖刻地评论说：“平时只有在戈德斯堡的雷杜特举行国宴时才会有这么多政治名流，如果按波恩的检察官们的想法办，明年政治名流将在波恩地方中级法院的刑事陪审法庭大厅里欢聚一堂。”

不过，起诉书的核心部分却是长达 29 页的“对证明材料的评价”。在这一部分中，起诉书驳斥了被告在接受调查时对主要证人证明材料可靠性的否认，并透露了两位部长接受贿赂，策划通过对弗利克康采恩的免税决定的一些细节。

在检察院调查此案的过程中，弗里德里希斯和拉姆夫多夫始终不承认收过钱。他们的辩护律师想通过否认联邦司库卡里留下的材料的可靠性来为他们减轻罪责，因为卡里素有“自由的艺来家”的美名，而且这位证人已在 1981 年 5 月被谋杀，死无对证，岂不可以推得一干二净！然而，认真细致的检察官提出了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卡里多年的生活伴侣里塔·贝尔在一张清单上记下了卡里“亲自以现款方式或以其他方式接受的所有给党的款项”。单子上没有弗利克康采恩的钱，这就意味着那些钱可能没有作为党派活动基金上缴司库，而是有人中饱私囊了。

关于两位部长受贿和渎职的情况，起诉书说弗利克康采恩的经理布劳希奇频频地与弗里德里希斯和拉姆斯多夫接触，后两人“至少是缄默地表示愿意”在作决定时考虑到弗利克康采恩的付款。起诉书提到，拉姆斯多夫曾多次去过布劳希奇经理的私邸并暗示他如何同社民党的财政部长马特赫费尔打交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姆斯多夫在弗利克康采恩原来在杜塞尔多夫开的“米勒斯和费斯特”餐厅提出了如何拟写免税申请的主意。最后，弗利克康采恩的这份免税申请是经拉姆斯多夫亲自签字而批准的。拉姆斯多夫之所以有必要采取这样异乎寻常的举动，是因为签字前他的国务秘书奥托·施勒希特曾提醒他，对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格尔林—考夫公司实行免税遇到了新的法律问题。为了论证弗利克的贿赂与两位部长渎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起诉书引用了弗利克康采恩的老板卡尔·弗利克的话。起诉书指出，在还没有接到税收通知单时，弗利克曾从慕尼黑提醒他在杜塞尔多夫的总管布劳希奇说：“对波恩的友好迄今为止对我没有帮助。”

左推右挡招架不住

拉姆斯多夫不是一个轻易屈服于任何压力的人。从弗利克贿赂案败露到 1983 年 11 月底，他始终没承认过自己接受贿赂。即使在检察院对他正式起

诉前后那段局面最为严峻的时期，他依然矢口否认受贿。执政的联盟党、自民党及其领袖科尔、根舍态度也都极其强硬，大有支持拉姆斯多夫奋战到底之势。

1983年11月29日，就在检察院的发言人约翰尼斯·威廉宣布准备对拉姆斯多夫正式起诉的当天，联邦德国经济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拉姆斯多夫否认自己干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情，并将在随后一两天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明立场。第二天，拉姆斯多夫对记者说，他在任经济部长期间“从未接受、要求或得到过”弗利克康采恩的“一个马克”。

11月29日当天，西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立即表示，他确信拉姆斯多夫是无辜的。科尔总理没有在这一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政府发言人伯尼施宣称检察官约翰尼斯·威廉宣布的指控是“令人震惊”的。伯尼施明确表示，尽管这种指控引起了轩然大波，科尔的政府仍然支持拉姆斯多夫。不仅如此，伯尼施还拐弯抹角地对检察院进行了旁敲侧击的批评。他说，“有些人认为检察官没有勇气取消这些指控。”人们不难听出他的话外之音：实际上这是一桩证据不足的案件，检察官只是迫于公众舆论施加的压力才硬着头皮要把案子追究下去。”最后，科尔的这位发言人重申：“我只能重复我说过的话——在拉姆斯多夫被判决有罪之前，他仍将是清白无辜的。”

12月2日，西德联邦议院就是否取消拉姆斯多夫的豁免权一事进行表决。在这次表决中，拉姆斯多夫显得相当大度。他本人投了赞成票，给人们留下了“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的好印象。

对于拉姆斯多夫这个在一年前倒戈搞垮了社民党政府的“叛徒”，社会民主党自然恨之入骨，他们决不会轻易放他过关。12月7日，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提出了要求拉姆斯多夫辞职的议案。社民党议员提出这一议案的理由是，不管拉姆斯多夫在“弗利克事件”的贿赂丑闻中是否有罪，拉姆斯多夫在受贿罪的阴影笼罩下无法履行他的职务。这一天，科尔在西德联邦议院发表了经电视转播的讲话。科尔指责检察院在对拉姆斯多夫正式提出受贿指控之前就将此事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是“奇怪的作法”，是“不能容忍的”。科尔还在议院中为拉姆斯多夫进行了辩护，他对要求拉姆斯多夫辞职的反对派议员挥动着手指，提高了嗓门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983年12月8日，正当拉姆斯多夫在议院为新的预算进行一般性辩论时，波恩检察院对他提出了正式起诉。法官表示，他们将仔细审读起诉书，以断定是否有充分的证据审讯拉姆斯多夫，然后才允许拉姆斯多夫在进入诉讼以前看起诉书。12月9日，西德联邦议院就要求拉姆斯多夫辞职的议案进行表决。结果，联邦议院以274票对196票否决了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这一提案。这次表决中78票的多数比科尔联合政府通常拥有的60票优势要多，因而给了处境困难的拉姆斯多夫莫大的安慰。

虽然议会否决了要求拉姆斯多夫辞职的议案，他的去留问题仍然使得科尔政府左右为难。当时，科尔上台才一年多，严重失业和收入普遍下降仍是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人民普遍存在不满情绪的情况下，科尔政府力求稳住脚根，政策十分小心。留下拉姆斯多夫可能会使政府的威信进一步受损；不留拉姆斯多夫也有难处。一来科尔政府是联盟党和自民党的联合体，离开了自民党，联盟党难于单独执政，二来拉姆斯多夫确实是处理经济问题的内行。许多人都把当时西德经济形势的好转归功于他，如果他下台，自民党内后继

无人就会发生阁职分配困难导致政府危机，而经济界又会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引起怀疑，从而影响经济的复兴。

犹豫再三的科尔决定先派高级法学家研究起诉书的 23 份卷柔和 36 份证明材料，然后再作定夺。总理办公厅主任、曾经担任过莱茵兰—法尔茨州司法部长的瓦尔德马尔·施雷肯贝格尔承担了这一研究任务。1983 年 12 月 20 日，联邦德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施宣布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将留在西德内阁。伯恩施说，科尔和拉姆斯多夫一致认为，案件记录不能成为“在作出开审的决定之前改变目前政治估计”的根据。但是，伯恩施也声明：“总理强调说，让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留任的决定只具有政治意义，因此并不涉及这个案件，这一案件现在是由一个独立的法官审理。”

随后，弗利克贿赂案又进入了一个长达半年时间的潜伏期——等待法院决定是否审理此案。但是，拉姆斯多夫在此期间继续表现出“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倔劲。1984 年 2 月 9 日，拉姆斯多夫当着由各党派组成的议会质询委员会的面，对检察官指控他在弗利克公司行贿丑闻中接受现金一事发起猛烈的反击。德新社在当天的报道中说，“这一反击之猛烈使委员会的成员们大吃一惊。”拉姆斯多夫在反击中一方面说，所谓弗利克公司掌握着的、以及检察官对他的起诉中详细提到的那份受贿者名单是“漏洞百出”的；另一方面又指责检察院没有公平地对待他，因为同案其他被告、其中包括对前财政部长汉斯·马特赫弗尔的指控均已取消。与此同时，拉姆斯多夫的律师给检察院寄去了一件详细的公文。文中声称，检察院对拉姆斯多夫本人的指控从法律上来说站不住脚的，因此，无法辩护。

为了挽救拉姆斯多夫的政治生命，科尔也想尽了办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在 1984 年 5 月中旬提出了赦免逃税者法案，该法案建议对近 2000 名参与非法筹措竞选经费的政界和工商界要人免于刑事诉讼。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在没有先同本党其他领导人磋商的情况下就立即表示支持科尔的建议。但是，根舍立即在党内遭到了马丁·班格曼等人的严厉批评，根舍在党内的地位随之岌岌可危。最后，根舍不得不告诉科尔，他的党是法治国家的守护者，他不能再支持这项赦免法案。毋庸赘言，这样一个触犯众怒的法案遭到的只能是胎死腹中的厄运。

拉姆斯多夫无计可施了，科尔也就只好“挥泪斩马谕”。

1984 年 6 月 26 日，波恩地方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弗利克行贿案，律师将这一决定通知了拉姆斯多夫。26 日午夜，拉姆斯多夫晋见了总理科尔，向他提出了辞呈。27 日清晨，拉姆斯多夫宣布辞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之职，当天上午科尔接受了他的辞职。但是，拉姆斯多夫在 27 日发表的声明中再次强调，他在任期间从未接受过弗利克康采恩的任何钱财。他声明，辞去部长职务“并不意味着退出政治，也不意味着听天由命”。拉姆斯多夫表示，他仍将履行他议员的职责，并在党内发挥作用。

1984 年 6 月 28 日，49 岁的自由民主党律师马丁·班格曼就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在班格曼宣誓就职时，科尔总理在议会热情赞扬拉姆斯多夫是个坚强的、富有战斗性的人，并且赞扬他办事勇敢、富有同情心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高潮迭起议长辞职

本来，人们都以为拉姆夫多夫的辞职会使弗利案告一段落，然后逐渐平息下去。岂料按下葫芦又起瓢，好戏竟在后头：新闻界居然把火烧到了联邦



德国的第二号人物联邦议院议长巴泽尔的头。

1984年10月中旬，西德舆论集中火力报道了巴泽尔与弗利克集团的经济关系。议长巴泽尔受到的指责主要有二点。一是他在1973年辞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和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之后，曾在法兰克福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弗利克集团曾以支付“顾问费”为名，先后向巴泽尔提供了170万马克的巨款。有的报道甚至说，这笔钱是当初巴泽尔辞去基民盟主席之职，让位于当时党内后起之秀、现任总理科尔的代价。舆论指责巴泽尔的第二点是，巴泽尔有参与弗利克集团偷税漏税的嫌疑，因为在巴泽尔为那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期间，该所正在为弗利克集团处理申请该集团出售奔驰厂股票所得款项免税的问题。

1984年10月23日，巴泽尔发表声明，矢口否认他曾从弗利克集团得到巨款。但是，议会中和巴泽尔同一个党的“弗利克调查委员会”成员赫斯特·艾尔曼却承认，他在看了有关材料之后，认为对巴泽尔的指责至少有部分根据。这时的西德舆论已经认为，巴泽尔的去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确实已在酝酿新议长的人选。

第二天，即1984年10月24日，巴泽尔亲自到“弗利克委员会”作证，企图为自己的政治声誉辩护。巴泽尔完全否认舆论对他的指责，但是他也承认，他在1973年至1982年充当律师事务所顾问期间，的确知道这家事务所同弗利克集团有合同关系。在巴泽尔之后到场作证的是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阿尔伯特·保席，他承认在1973年到1979年期间曾从弗利克集团得到180万马克，作为工作的酬金。但是，他完全否认弗利克集团通过他向巴泽尔付款的说法。他说，他从弗利克集团取钱和他给巴泽尔160万马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尽管如此，人们认为巴泽尔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澄清，西德舆论对他在这种嫌疑下是否能继续担任仅次于总统的高级职务表示更加怀疑。

10月25日中午，巴泽尔决定辞去议长职务。他写信给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说，由于无法承受对于他的政治和心理压力，而议会又必须继续工作，所以他决定辞职。当天下午，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德雷格尔在开会前宣布了巴泽尔的这一决定，并表示尊重他的决定。

这时的巴泽尔确已陷入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境地。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内，他还可以发发牢骚，要求恢复名誉，指责他的党内同事虚伪，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可是，对于公众，巴泽尔还能再作什么解释呢？正如巴泽尔的后任、新当选的议长菲利普·耶宁格尔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公民仍在不安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政治机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是否还存在？”

耶宁格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要经受住的是一场对议会民主的挑战，但不是议会民主的危机。”但是，他又号召全体议员协助他立即克服“信任危机”。他宣称，“新闻机构不仅对自由的民主政体发挥作用，而且也对自由的民主政体的维护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位新议长“呼吁新闻机构如实地进行报道和给予公正的评论”，耶宁格尔的观点是，巴泽尔的这一步（辞职）表明我们制度的可信性和民主体系有自己改正的能力。”然而，在普遍存在怀疑的情况下，苏联塔斯社在10月29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波恩的弃子术》的时事评论似乎能更好地反映当时西德公众疑虑不安的心态。在这篇文章中，塔斯社评论员写道：“与弗利克康采恩的舞弊有关的波恩政治丑

闻，正按照象棋的快战比赛规则神速发展。相沿着斜线迅速地奔来跑去，车聚成了堆，马也失去了控制，而王由于翼侧的危险局势急忙进行王车换位。小卒处在慌乱中：必然被将死了！不知是谁急忙地提了个办法：弃子！”

#### 虎头蛇尾匆匆结案

巴泽尔下野之后，舆论自然把注意的焦点又转向了总理科尔。

1984年11月7日，科尔在议会“弗利克调查委员会”受到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严厉盘问。科尔证实，1977年和1979年，他得到过三次捐款，共10.5万马克。（在弗利克前会计迪尔的记帐名单上科尔的名下记载着从1974年到1980年总共支付56.5万马克以上。）但是，科尔说全部捐款都交给党的司库支配了。

1984年11月8日，“弗利克调查委员会”对副总理兼外长、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进行了盘问。从弗利克公司前经理布劳希奇手中没收的记录说，根舍曾答应“帮助”为该公司减免巨额税款。对此根舍回答说，这“完全令人莫名其妙”。至于在被没收的弗利克公司的账单上有根舍的名字，而且账单表明他接受的捐款总额超过100万马克（33.8万美元），根舍回答说这些钱均已交给党的司库，他个人分文未取。但是，根舍作证说，1980年8月，布劳希奇曾要他向当时的财政部长汉斯·马特赫费尔施压力，以确保最后的一系列减免税收的要求得到满足。不过，根舍又说“我对他说……我不会也不能向马特赫费尔施加压力”。在这次听证会上，弗利克调查委员会还向根舍问到了1983年12月向自民党捐款600万马克（200万美元）的匿名捐款人的身份问题，因为这次捐款发生在一项规定捐款超过1000马克（338美元）的捐赠者必须公布身份的新法律生效前几天。在根舍受质询后一天，即84年11月9日，自民党名誉主席、曾在1974年至1979年任西德总统的谢尔证实，这笔钱是零售商、百万富翁赫尔穆特·霍尔滕在获悉自民党财政拮据之后提供的。

1984年11月29日，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再次受到弗利克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在此之前，勃兰特已在10月26日受到过一次质询。当时，调查委员会发现有些证人和材料涉及勃兰特同弗利克财团的关系。根据弗利克财团前主任会计师迪尔的记录，勃兰特曾在1975年2月、1979年6月和1980年1月3次总共接受过19万马克的付款。调查委员会主席、基民盟议员朗纳在质询时还引用了弗利克财团写给勃兰特律师的一封信，信中保证弗利克方面不会把向勃兰特支付款项的事泄露出去。此外，弗利克财团前经理布劳希奇在作证时提到，他同当时的财政部长、社民党人马特赫费尔讨论免税问题时，马特赫费尔曾寻求勃兰特的支持，当时社民党的司库璠曾把弗利克财团对社民党的捐款同政府处理该财团的免税申请联系起来。勃兰特在回答时坚决否认他曾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弗利克财团的钱财，并宣称，他对社民党政府时期弗利克财团曾得到免税一事毫无所知，更没有施加过影响。同时，勃兰特在这次质询中还反守为攻，他说为了反对社民党左翼的代表人物埃普勒，弗利克财团倒是曾给了某些新闻记者不少钱。尽管后来查明，勃兰特本人并未拿那些钱，会计帐上的记录是经理布劳希奇让会计迪尔记的，因为布劳希奇认为那些钱用于勃兰特所管的范围。但是，1986年3月，勃兰特还由于1984年11月29日的这次作证被人以“伪证罪”告到了波恩检察院，因为在1984年的这次作证中，勃兰特曾断言无论是他还是别的社民党负责人都没有接受过弗利克公司的钱，而1986年3月西德的《星期一世界商

报》说，社民党前财务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瑙 1975 年从当时的弗利克公司经理康拉德·卡莱奇手中接受了 10 万马克（合 4.5 万美元）的现金，收据上有瑙的亲笔签名。瑙通过他的律师证实，他确实接受过这笔钱，并将它移交给他的下任威廉·德勒舍尔。

就这样，西德政坛名流走马灯似地一个个被引上了弗利克案调查委员会的证人席。而正当弗利克案把西德政坛搅得天昏地暗之时，远在他国的西班牙居然也闹起了弗利克贿赂案：1984 年 11 月 2 日，西班牙巴塞罗纳省保守的日报《先锋报》宣称，弗利克财团向西班牙社会党支付了 400 万马克（130 万美元）的经费，其中大部分钱交给了冈萨雷斯首相本人，用于资助首相在 1982 年时的竞选。对于这种报道，首相自然怒不可遏，一气之下将《先锋报》告到了法院。

这桩弗利克案给西德政要平添了无数的烦恼，1984 年底时，简直谁都无法弄清此案何处是尽头，何时能了结。

1985 年 8 月 29 日，波恩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弗利克行贿案，被告是西德前联邦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和弗里德里希斯，以及弗利克康采恩的经理布劳希奇。虽然联邦部长出庭受审在西德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法院等候旁听的人却只有 100 多一点，而且由于场地有限，只容许 41 人入内旁听，记者也只有 41 人获准入内。看来，这时候弗利克案引起的轰动已经开始退潮了。当天新华社发自波恩的电讯说：“在审讯过程中，检察院将提供 200 名证人，估计整个审讯将要拖延数年之久。”

然而，结案的速度要比人们预料的快得多。1987 年 2 月 16 日，西德波恩地方法院正式宣判前联邦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受贿罪不成立，但法院认定拉姆斯多夫在使弗利克康采恩逃税中负有责任，因而判以罚款 18 万马克。当天，波恩地方法院同时宣判前经济部长弗里德里希斯的受贿罪也不成立，但同样以帮助弗利克康采恩逃税为由判处他 6.15 万马克的罚款。历时 7 年之久的弗利克贿赂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 震动法兰西的金融丑闻——法国“发展路口”风波

1986年4月28日，刚刚上台不足一个半月的雅克·希拉克右翼政府就揭露了前社会党政府要员，原国际合作部长克里斯蒂昂·努西贪污“发展路口”公款案，并想借此整垮左翼社会党。两派相争，险象环生，丑闻百出。“路口风波”逐步演化为了一场激烈的党派之争，震惊法兰西。

### 丑闻披露，右翼发难

4月28日凌晨6时，法国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条独家新闻，把还在酣睡中的法国公民从梦乡中唤醒。这则新闻不同于一般的独家采访或报道，它揭露了一桩大丑闻：有人发现刚卸职的前社会党政府国际合作部长克里斯蒂昂·努西拥有一座豪华的古堡，而努西本人绝无购买这座古堡的巨额资金来源，于是要求司法部门前往侦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际合作部所属的对外援助机构，刚被希拉克总理宣布取消没几天的“发展路口”帐目混乱，至少有2000万法郎的亏空。1984年12月在布隆边首都布琼布拉举行的第12届法非首脑会议由“发展路口”筹办，耗资6100万法郎，且有许多假单据。1982年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的法非首脑会议也由“发展路口”筹办，但仅花费1000万法郎，为何1984年的会议费用竟高出如此之多？这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官员贪污公款案，克里斯蒂昂·努西一举成为此案的中心人物，他断然难逃法律的制裁！

“发展路口”成立于1983年，是执行密特朗总统“第三世界主义”的专门机构，专职经营法国对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国家的财政援助，也经管一些特需款项的处理。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较晚上市的报纸立即改版，在头版或醒目位置刊出这条新闻，并作出种种猜测。记者纷纷涌向总理府、外交部和国际合作部，打听消息，要求公布全部案情，要政府要员回答问题并做出解释，质问政府将作何处理。

接着，新闻媒介逐渐披露了努西挪用公款的事实：努西不仅用“发展路口”的资金购买了古堡和田产，还为其情妇购置了田宅；在他担任市长的博尔市举行集会，接待外宾，向社会党支付党费，进行竞选活动等，用的也都是“发展路口”的钱。

记者们都以为这条爆炸性的新闻是他们的电台同仁凭借职业的敏感和勇气挖掘出来的，暗自向欧洲第一电台竖大拇指，他们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右翼政府根据手中掌握的材料暗中鼓励电台予以披露的。当天中午，刚接任克里斯蒂昂·努西的观任国际合作部长米歇尔·奥里业克便发表谈话，要求审计院审理此案，并称：“案子非要有个水落石出不可！努西背后肯定有人，不论牵涉到谁，都要拉他出来在法律面前示众！”明眼人已逐渐从强硬的讲话中看出，奥里业克的讲话实际上代表了希拉克总理的意见，因为奥里业克是希拉克的心腹。奥里业克所指的努西背后二人，必定是指努西的政治靠山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政府上台不久即怂恿电台揭露这一丑闻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过想借此整垮社会党，以报在野五年之仇罢了。

右翼政府的突然袭击，加上新闻舆论的大肆渲染，使得希拉克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为了平民愤，也为了平息右翼对社会党的怒气，巴黎大法院决定受理此案。

但努西不只是刚卸任的前部长，还是现任国民议会议员，法院对议员不得轻易传讯，更不能拘捕，只有经议会同意而成立的最高司法法庭才能加以

审讯。法院一时对努西无能为力，只好决定先从努西任部长时的办公室主任伊夫·查利埃入手，他不仅是“发展路口”金柜的钥匙掌管人，大部分款项都经由他手向外支付，而且也是他向报界和希拉克政府提供了关于努西的一些犯罪事实。巴黎大法院决定先收审这位“路口”案的直接当事人，不享受法律豁免权的伊夫·查利埃，并委任让一皮埃尔·密索大法官主办。

节外生枝，案中有案

然而，就在巴黎大法院刚做出决定，拘捕令尚未发出的时候，法国内政部的一名高官——法国全国警察总监雅克·德勒布瓦紧急会晤了查利埃，交给他一本新签发的护照和一张机票，向他透露了巴黎大法院决定收审他的决定，要他立即离开法国远走高飞，前往拉美国家紧急避难。一切都已办妥，查利埃只管放心前去，对外名义是受法国政府之托办理一件棘手案子。处于危难之际的查利埃连忙打点行装，准备前往遥远的异国。

1986年5月14日，精心化妆的查利埃戴着宽边墨镜，在法国内政部三名秘密警察的护卫下，顺利通过巴黎戴高乐二号国际机场的海关，登上了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法国航空公司班机。次日凌晨，飞机在里约热内卢着陆，查利埃一出机场，就被两位巴西黑手党党徒迎上一辆黑色宽体福特小轿车，悄然驶向里约热内卢远郊的大森林，在那里，查利埃下榻于一座占地数公顷的高级别墅。查利埃并非受法国政府之命前来办什么案子，而是由一位美丽的巴西女郎陪伴，或是到海滨浴场沐浴阳光，或是到赌场里一掷千金。好不自在！

在政府的精心安排下，查利埃在被收审前夕无声无息地在法国消失了。右翼政府费尽心机，要搞垮社会党，但为什么又要安排要犯查利埃出国避难呢？后来才知道，主要是因为此人向执政的右翼党提供了许多社会党的内幕情报、特别是社会党政府在5年执政期间的情报，希拉克政府为表示感激而采取了保护措施。正在审理此案的巴黎大法院当然不知其中奥秘，一面为案犯出逃而自责保密不够，一面全力侦破查利埃是怎么出逃的，离境后又逃往何处。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希拉克政府的行为很快便暴露了。社会党立即倾尽全力攻击希拉克政府及其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库瓦，要他交出罪犯，同时交待自己的“罪行”。努西义正辞严地在议会发言：“我是清白的，政府才是有罪的！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吧？右派议员先生们，到底是谁应该接受审判，你们自思吧！”

虽然内政部长帕斯库瓦一再申明政府与此事毫不相干，同时要求议会尽快通过成立最高司法法庭的法案，把社会党前部长、犯有重罪的努西送上审判台。但是，面对社会党和舆论的强大压力，政府看出包庇查利埃的阴谋实在不能长久，便作出姿态：法国政府已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出通缉令，以便尽快使查利埃归案伏罪。“到时，谁在包庇罪犯将大白于天下，社会党将不得不交出努西以谢国人！”

1986年11月6日，在巴西避难长达半年之久的查利埃终于被引渡回国，投入巴黎卫生监狱。

让一皮埃尔·密索大法官这下有事干了，清闲半年之后，他也确实踌躇满志，准备大展一番手脚。然而，审讯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当大法官查验犯人的证件时发现，查利埃逍遥海外半年之久所凭借的护照是由政府鉴发的，没有任何涂改和伪造的痕迹，照片也是查利埃本人。不过，持照人的姓

名却是伊夫·纳瓦罗。也就是说，政府在向查利埃颁发护照之时，就把他的姓氏改成了纳瓦罗。而且，驾驶执照上的姓名也是伊夫·纳瓦罗，颁发日期与护照相同。

消息传出，如同“发展路口”金融丑闻刚被披露出来时一样，举国震动。法国人的语汇里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假真护照”，即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真护照作假，为自己的私利服务。

这桩“案中案”的提起，使得“路口”案情更趋复杂。亲社会党的《世界报》等也频频发表文章，向右翼政府发起攻击，舆论开始向不利于政府的方向转化。希拉克政府为挽回局势，同时表明此事与政府无关，遂于1986年12月2日向新闻界宣布解除当初帮助查利埃出逃国外的全国警察总监雅克·德勒布瓦的职务，并称为防止意外，将对德勒布瓦实行“司法监护”。此举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外界特别是新闻记者与他接触，透露出对政府不利的事情。

处于“司法监护”之下的雅克·德勒布瓦，虽与外界断绝了来往，但法官是可以与之接触的。查利埃向密索大法官供认“假真护照”来自德勒布瓦之手，德勒布瓦则向大法官声称是“来自大老板的命令”。再查，密索大法官发现查利埃手持的“假真护照”属于法国反间谍机关领土监测局的“库存物”，这些空白护照是专为特工人员出国执行特殊任务时鉴发的。

1986年12月9日，密索大法官传讯了法国领土监测局局长贝尔纳·热拉尔，问他法国反间谍机构为何要做危害本国安全的事，协助一名本国司法机关将要依法拘捕的要犯外逃？这是有意犯罪还是受人指使？“司法独立、不论谁犯罪都应追究。法律面前必须以实相告，这是国家公职人员最基本的品德。”然而，热拉尔局长的回答大出密索大法官所料：“事关国防机密，恕不相告。”说完，热拉尔拂袖而去。根据法国内政部的规定，领土监测局的行为即使与法律发生抵触，它也既可拒绝出庭，又可拒绝做出任何解释，因为事关“国防机密”。

法院认为“国防机密”一说不能成立，要求巴黎上诉法院检察院就此做出决断。社会党也就此向政府提出质问：领土监测局的活动只能限于本上，而把一个既不属于其工作人员，且司法部门正在辑捕的要犯派往国外，属于何种行为？

1987年5月27日，巴黎上诉法院检察院就所谓：“国防机密”一事做出最后裁定：领土监测局鉴发给伊夫·查利埃的“假真护照”是正当行为，送他出国确系“国防机密”，任何司法机关均不得继续追究此事。

次日，自1986年底一直处于“司法监护”之下的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监雅克·德勒布瓦官复原职。

同时，由于社会党的积极干预，司法机关也不能提审努西而无法继续审理“路口”一案，但让一个部长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无法向舆论交代，司法独立又从何谈起？面对如此局面，让一皮埃尔·密索大法官感到左右为难，无能为力，只好提出了辞职。

此时，涉嫌“路口”案的15个人当中只有查利埃一人被捕，身陷囹圄。查利埃数次要求法院释放他这位“替人受过者”，遭拒绝后三次绝食。巴黎法院当局8月底发表的查利埃健康公报称：犯人虽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十分虚弱，但为了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不能按照通常情况下的处理方式让他监外就医。

1987年9月15日，查利埃的两个律师格雷古瓦·特利埃和克萨维埃·德鲁联名致信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请他“关注查利埃的状况。绝食以来，查利埃的体重已下降了13公斤。心理分析报告证明犯人正在进行慢性自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之。”“伊夫·查利埃并非‘路口’金融案的主要受益者，却是该案的唯一在押者，岂非咄咄怪事！”

阿尔班·查朗登收信后，从“人道主义”考虑，要求密索大法官于9月23日假释查利埃。“新闻人物”查利埃挂着盐水瓶，躺在巴黎科汕医院的担架上，在数名全副武装警察的“保护”下，与记者见面。这位当初志满意得的部长办公室主任，先为左翼效力，后反戈投靠右翼政府，如今却落得两边不是人，谁也不管的悲惨境地！

议会争斗，政争激化

巴黎大法院经过1年的司法调查，于1987年4月30日公布了“发展路口”金融丑闻案的案情，认定社会党前国际合作部长克里斯蒂昂·努西犯有罪行，特别是组织筹备1984年12月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举行的第12届法非首脑会议过程中，非法挪用公款至少7000万法郎，应受法律的追究和制裁。

报告公布后，右翼各党派便紧锣密鼓展开了活动，积极酝酿方案，研究部署，以便早日向议会提交法案，要求成立特别法庭，审判克里斯蒂昂·努西，社会党也专门成立了“危机委员会”，全力以赴对付这场由政府发起和导演的“倒社会党运动”。努西若有罪自然应依法惩处，但政府的目的是要借此整垮社会党，岂有此理！法国新闻媒介也分成左右两大翼，相互激烈地进行指责。记者们多次问密特朗总统对此事的看法，总统不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便是缄口不语，“无可奉告”。

1987年6月3日，吵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充斥着法国最高立法机构——国民议会。半圆形台阶式议员席，最前面一排为专辟的政府席，供内阁成员前来回答质询、解释政策、提出法案。以希拉克总理为首的40余名政府成员无一缺席，个个面色凝重。

当议员们的力气业已用尽，吵嚷声终于渐趋平缓，最后到无人再要求发言时，希拉克总理才站起身来，慢步走到话筒前，从衣袋里掏出事先打印好的讲稿，开始发言。希拉克总理代表政府历数社会党执政期间的弊端，特别指出社会党政府纵容努西犯罪便是自身犯罪。努西贪污如此巨额公款，社会党政府竟毫无知觉，还要等到由反对党执政后才加以纠正。希拉克总理要求议会尽快通过议案成立最高司法法庭，加快办案，使罪犯得到应有的制裁，以体现法律的尊严。中午议会休会，议员们吃饭期间，希拉克总理与右翼两大议会党团主席举行工作会议，在饭桌上研究将提交议会讨论通过的法案文本和其他程序，随后便征集签名。数小时之内，256个议员的大名业已赫然在目。右翼掌握着议会多数，看来努西是非上审判台不可了。

在右翼征集签名，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致信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议长，正式要求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审判努西。

司法部长致函两院议长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党议员团主席皮埃尔·若克斯旋即主持召开了社会党“危机委员会”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路口”案已演变为一场政治事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倒社会党运动，决不能等闲视之，社会党必须运用一切合法手段予以反击。若要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库瓦亦应接受审判。社会党议员团不承认什么“国防机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路口”案决非“水门”案，有人想以此达到政治目的，断不可能！努西发表谈话称：“我对所谓账目混乱一事毫不知情。查利埃伪造我的签字领取款项，伙同不法商人制造假发票。我永远是无辜的！”

1987年7月10日，春季议会闭幕式举行之后，议员们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外出度假，“路口”案声嘶力竭的争吵暂告平息。但是，两派领导人都在加紧筹划，以便在秋季议会上再决雌雄！

议会重开，左翼反攻

9月，休假的议员们陆续返回了巴黎，精神抖擞地投入将于10月上旬开幕的秋季议会的准备工作，政府各部门也加紧工作，准备各种议案交议会讨论。就在这时，社会党针对政府的反措施也出笼了。

9月21日，克里斯蒂昂·努西的律师向巴黎预审法庭递交了一份诉讼状，告发一些人包庇罪犯，并以大量数据证明“发展路口”金融案的真正犯人是查利埃而非努西，帮助犯人潜逃的人自然也是罪犯，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政府对社会党的指控嗤之以鼻，根本不屑作出反应。

10月7日，秋季议会开幕，右翼各党联合提案递交国民议会获得通过。当国民议会议长雅克·沙邦-戴尔马宣布“340票赞成，211票反对，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审判前部长克里斯蒂昂·努西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右翼议员们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平静，政府也无人出席，右翼不希望给人以势压人之感。

良久，努西要求发言，他说：“这完全是一场政治阴谋。表面上是反对一个人，其实是通过一个人反对整个社会党”。此后便无人再要求发言，议长宣布休会。

此时的社会党对“假真护照”一事的指控并未撤除，同时使尽浑身解数向政府施加压力。此外，社会党还在多方寻找执政党的破绽，因为只有“以毒攻毒”才能迫使政府有所收敛，也才能挽回社会党的面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社会党果然找到了政府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同“烧麦”案的瓜葛，于是“发展路口”案又横生枝节，丑闻之外，又出丑闻。

在巴黎市中心，有一家法国最有名的已有200年历史的珠宝首饰公司。公司世代相传，现由Chaumet兄弟两人共同经营，法文音译为“烧麦”公司。“烧麦”公司曾经生意兴隆，财大气粗，在日内瓦、布鲁塞尔、伦敦、纽约等地都有分公司。然而，由于1982年石油价格暴跌的影响，一直经营惨淡，到1985年年中期已欠债20亿法郎。“烧麦”兄弟为渡难关，千方百计弄钱，其中办法之一便是借债，许以12%至22%的高息。1987年6月13日，巴黎上诉法院起诉厅以诈骗和转移资本罪逮捕“烧麦”兄弟入狱，公司收款付息成为地下银行亦为罪状之一。法庭和财政司法警察当局本无意追究借钱给“烧麦”公司的30余位大富翁的法律责任，但现任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借给公司630万法郎一事披露后，反对派岂能轻易放过？

查朗登因公子娶了“烧麦”兄弟中之长者雅克·烧麦的千金为妻而与这家公司结为儿女亲家。他把630万法郎存入公司收取高额利息，他妻子还在公司设有一个100万法郎的帐户。公司不是银行，作为一个前著名法官和现任司法部长怎能不明白这一点？社会党连连对此发起攻击，并在议会要求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辞职。

消息传出，舆论为之哗然，焦点也迅速地转向司法部长查朗登。亲社会党的《世界报》和右翼报纸《费加罗报》不断发表文章、谈话，相互指责，



毫不相让。

1987年10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就此举行大辩论。社会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政治家在担任公职前后各公布一次财产状况，以证实他是否利用职权为自己敛财。而右翼政党议员则称：“政治家也有权利使自己富有。我们目前的制度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立贞节牌坊。”

表决结果，社会党议员团的提案遭到了否决，右翼议会多数派一致得出结论：“使自己富有是每个人的权利！”

代人受过，路案翻身

1988年2月6日，亲社会党的《世界报》头版大幅标题非常引人注目：《司法警察调查报告减轻了努西先生的责任》。该报指出：“路口”案共挪用公款30619584法郎，主要系查利埃所为，罪在查利埃。他模仿努西的签名领取款项。努西则主要是用公款垫付了竞选市长和国民议会议员的费用，总额在10万法郎左右。司法报告得出最后结论：努西作为部长举止欠妥，但最主要的是中了办公室主任的圈套。此外，长篇报告中对查利埃挪用的数千万法郎的每项用途都罗列分明。

社会党第一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随即发表声明：“这一浩大、准确、冷静的报告，与我们最初所讲完全吻合。克里斯蒂昂·努西的所作所为或许有失轻率，但他是个诚实的人。查利埃受人操纵，问题是要弄清楚从何时开始。希拉克总理先生身边总有那么一群企图挑起事端的人，最后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与此同时，右翼报刊登出了内容相反的评论文章，并诘问社会党：“众所周知，‘路口’丑闻远未结束，案子的审理还未真正开始，设在凡尔赛宫的特别委员会正在积极工作。一切显得缓慢，然而却是在稳步而正常地进行。秘密文件是怎样流向社会的？社会党的解释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皮埃尔·若克斯何以知道警方报告并发出预言的？谁犯了‘侵犯司法机密罪’？”

由于总统选举定于4月24日和5月8日分两轮举行，在这决定各自政治命运的重大时刻，左右两翼都全力以赴投入竞选，在“路口”一案问题上的激烈争吵便暂告搁置。

1988年5月8日，第一轮（4月24日）总统选举10名候选人中的2名得票最高者在第二轮选举中一决雌雄。当晚8时，选举结果揭晓，密特朗再次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成为第五共和国以来第一位通过直接选举蝉联总统的人。

1989年12月13日，法国电视二台《披露真情》节目同时邀请社会党内政部长皮埃尔·若克斯（密特朗1981年当选后他即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希拉克任总理后下野，密特朗再次当选后他又官复原职）与其前任夏尔·帕斯库瓦就“假真护照”一事做出各自的解释和回答。皮埃尔·若克斯捷足先登：“假护照就是假护照，根本无所谓假真护照。大家都知道，应帕斯库瓦先生的要求，才有人为查利埃制作了一本假护照。它与‘国防机密’毫不相干。这本是出于政客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酝酿的一场阴谋……法国人民将会发现这是一场多么可鄙的政治阴谋。”夏尔·帕斯库瓦并不反驳，只是淡淡地说：“我国有一位以上帝自命的总统，如果我们又有一位对这位上帝唯命是从的内政部长，那我们真应该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帕斯库瓦没有说。

1989年9月，内政部长皮埃尔·若克斯宣布当年查利埃借以出逃巴西的

“假真护照”之“国防机密”解密，允许司法机关过问此事。预审大法官菲利浦·雅南受命审理此案。11月20日，雅南从领土监测局局长贝尔纳·热拉尔那里获得了关于“夏尔·帕斯库瓦以内政部长名义命令他为查利埃签发护照和驾驶执照的供认。幸亏帕斯库瓦是现任参议院议员，否则，他将因犯有利用职权作弊罪而遭逮捕。

1989年12月7日凌晨1时30分，法国国民议会以283票赞成，168票反对，通过了社会党议员让·皮埃尔·米歇尔提出的一顶修正案。该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凡在1989年6月15日前的历次竞选活动中，以非法手段筹集经费或使用经费而犯罪的，只要没有中饱私囊，没有制造假钞，没有直接搜刮，没有贪污或变相贪污，一律赦免无罪。

这项法律修正案，将使许多人得到解脱。然而，社会党通过此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解脱克里斯蒂昂·努西在“发展路口”案中的罪责，下一步便是把右翼前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库瓦送上审判台。投票结果一出来，法国民主联盟议员热拉尔·隆盖即发表评论：“十足的虚伪！”次日，各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也多以“虚伪”为题名。

“虚伪”归虚伪，社会党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让·皮埃尔·米歇尔的修正案经国民议会于1989年12月15日颁布为正式法律后，“发展路口”金融丑闻案就算落下了帷幕。

克里斯蒂昂·努西被赦免无罪，查利埃做了替罪羊，这场历时长达3年多的“路口”案之争也最终以社会党的大翻身而结束。然而，法国左右两翼政党之间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也暴露无遗。人们相信，左右翼之间的相互指责和争斗还会不断发生，还会有新的“路口”丑闻被揭露出来。

## 里根时代的美国国防部丑闻——五角大楼舞弊案透视

五角大楼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几座规模宏大的办公大楼之一，它是美国国防部所在。曾几何时，就在这座庞然大物内，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挖”出了一桩美国“国防部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军人采购丑闻”。该案情节之严重，涉及面之广，令人“无法想象”。

### “歪风”行动密而不漏

1988年6月14日，也许是美国国防部历史上最丑陋的日子；也是令全部上下最紧张的时刻之一。就在这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针对五角大楼贪污受贿案联手进行的代号为“歪风”行动的调查正式进入公开收网阶段。当时，这一行动波及美国12州，共有38名军火承包商、军火工业咨询顾问和五角大楼官员的办公室和住宅被搜查（其中包括空军部部长助理帮办、海军部部长助理帮办等人的办公室和住宅），有的甚至被贴上封条。

令人惊 的是，这次“歪风”行动的调查计划是如此的秘密，以至于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都“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该计划实行公开收网调查的“最后时刻”才被告之。

事实上，“歪风”行动在2年前就因一名前海军部职员 的告发而开始实施。当时，这位前海军部职员已退役在一家军火承包商的公司内干活，他曾“因看不惯有些事情的做法”早已牢骚满腹。1986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位原在海军部工作过的军火工业咨询顾问的电话，该顾问说他有一些国防机密要出售。为了发泄私愤，这位前海军部职员立即把所接到的电话内容报告了海军部。海军部获悉此事后，会同联邦调查局拟定了“歪风”秘密行动计划。他们一方面指示那名告密者继续与那名打电话的军火工业咨询顾问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在征得法院的准许下，对五角大楼内12部电话机安装了录音设备，甚至还在国防部的顾问办公室等处悄悄地装上了窃听器，以截听国防部的电话通讯装置。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司法部的消息来源报道，法院授权的电话录音进行了291天。录下了4.800次谈话，其中有571次涉及违法行为。经过长达2年之久的秘密调查，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根据录音谈话，顺藤摸瓜，掌握了国防部官员接受军火承包商贿赂以交换军火投标价格资料的证据后，便决定于1988年6月14日进行公开搜查。直到这时，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才把“歪风”行动的调查经过通报了里根总统、国防部长卡卢奇和司法部长米斯。据负责此案的官员说，他们事先没有通知上层的秘密做法是“明智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到头来，谁会落入网里”。

### 莫大丑闻举国震惊

由于“歪风”行动出人意料地在美国总统眼皮底下抖出又一起受贿丑闻，这使里根总统十分尴尬。1988年6月16日、17日，里根先后召见国防部长卡卢奇、司法部长米斯、联邦调查局长塞申斯共商对策，并指示执法官要“尽快”查清。里根之所以对此事表现得“非常关切”，是因为这桩发生在五角大楼的受贿丑闻在美国国防部历史上是空前的。里根害怕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形象。

据调查，参与行贿五角大楼官员以探听情报、承揽国家防御合同的美国军火生产公司多达20余家，其中有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诺思罗普飞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联合科技公司、尤尼安电脑公司等；涉及国家防御合同近100个，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受牵连的在职和已退职的五角大楼官员有100余人。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业界人士，甚至众议院中也有5

名议员卷入此案（其中有 4 名民主党议员，1 名共和党议员）。

在这桩案件中，最引人注目，证据最为充足的是对前海军部助理佩斯利的指控。佩斯利是在 1981 年被海军部长约翰·莱曼任命为部长助理（主管武器研制）的。在此之前，他曾在波音飞机公司供职，1987 年 1 月离开海军部后，转任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和弗吉尼亚州军火承包商 BDM 国防公司的顾问。他的这种“旋转门”生涯，使他获利不小。单是在他任海军部长助理后不久，波音公司就以“退職金”的名义，送给他 18.3 万美元，而波音公司随后顺利地同海军部做成了一大笔生意。

卷入此案人士中，军衔最高的有海军四星上将、前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昂斯。此外，前海军部长莱曼的手下也至少有 5 名部长助理帮办干过“泄漏机密文件”换取外快的勾当。这些文件包括国防预算和采购备忘录，甚至莱曼同前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内部通信也被捅了出去。

这桩发生在“美国国防部历史最严重的军火采购丑闻”被“挖”出来以后，美国舆论为之哗然，他们纷纷要求政府迅速查清，并严惩犯法者。布什作为当时美国副总统，为了不让这一丑闻“搅”了他竞选美国第 51 届总统的前程，他在“震惊”之余，公开表示他“决不会容忍五角大楼、街上或国会中的不法行径”。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也于 1988 年 6 月底，先后宣布将对此事件的调查举行听证会。到 1989 年 1 月底，在卷入这桩丑闻的众多人员中“已有 8 人承认有罪”。此外，五角大楼在已定案的 299 个贪污受贿案中，“共追回了将近 3 亿美元的赃款和罚金”。

#### 五角大楼舞弊温床

五角大楼的超级丑闻曝光之后，它立即成了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的“抢手货”。人们不仅对“挖”出腐蚀五角大楼的“蛀虫”发生兴趣，而且更加乐于对这些“蛀虫”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刨根问底。

1980 年里根竞选总统时，曾信誓旦旦地说，在他任总统时，他将连根拔除国防部内的浪费现象。然而，在里根总统将近 8 年的任职期间，人们在五角大楼依然看到“总是有许多钱到处流淌”。以至于在这里面“挖”出了这桩令人“无法想象”的超级丑闻。这是为什么？美国舆论对此议论纷纷。

有的议员认为，这是“多年来”五角大楼一直存在的“严重的管理问题”造成的。因为美国政府过去挑选人员时“只考虑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而不考虑他们是否擅长管理”。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上面所提到佩斯利，他早在波音飞机公司任职时，就有过贿赂国防部官员，对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窃听活动等不光彩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干龌龊事”的家伙，居然被前海军部长莱曼委以重任。另据报道，早在 1985 年当时的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就得到密告，说有的海军官员泄漏机密给承包商，然而，他却置之不理，听之任之。由此可见，温伯格“对五角大楼的管理松散”到何等程度。

诚然，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对五角大楼的管理松散……可能是非法的交易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是，导致这桩超级丑闻产生的根本原因恐怕是因为“在里根执政年代”庞大的军费开支引起了人们“极度浪费和贪心”。

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国民生产总值为全世界之冠。在里根执政期间，每年国家开支达万亿美元，而“荦荦大者”首推国防开支，大约每年花费 3,000 亿美元。五角大楼每年几乎将国防预算开支的一半（约 1,500 亿美元）用于订购军事物资和装备。美国全国的 1/3

企业，航天工业的 80%，造船工业的 60%，电子工业的 40%，都要靠五角大楼的订货。这样，五角大楼也就自然成了各军工企业争夺的“肥肉”。为了在五角大楼关于军事的订货谈判中达到中标的目的，各军火承包商必须先掌握充足的军事经济情报，包括摸清军方所需武器标准、五角大楼的真实意图以及了解其它军火承包商的明确打算等。而要掌握这些信息就必须有中介人的穿针引线。于是乎，在美国就出现了所谓“军火工业咨询顾问”之类的人物。

这些“顾问”有的是以前的军界红人，有的自己或亲属占据国防部要职。他们既有丰富的经验，又同军界、政界要人来往甚密，消息灵通，常常掌握着五角大楼的机密。因此，这些人一挂牌“营业”便立即成了各军火承包商竞相以重金聘请的对象。例如，1986年当佩斯利仍在海军部任职之时，他的妻子维姬收到了弗吉尼亚州维蒙顾问公司所给予的 5 万美元的酬金。而恰在此时，维蒙公司正代表若干家军事用品承包商与海军部打交道。其中的奥妙，不言自明。又例如，国防部民用采购官员杰克·舍曼承认，他在 1986 年 10 月至 1987 年 6 月间因向外界透露了“涉及数百万美元合同的秘密招标信息”，而得到了 4.35 万美元的酬劳。

正是在所谓“顾问”们的咨询下，许多私人承包商利用所得来的情报，在承包国防部的招标中既能保持商价，又能保证中标。他们往往只需花几千或几万美元就可做成一大笔生意，旋即获得约上百万、乃至几百万美元的利润。然而，国家却不仅由此可能要损失几十亿美元，而且由于这些靠舞弊而中标的公司所生产的武器装备质次价高，它的安全也严重受到影响。无怪乎，美国国会议员一再声称，五角大楼已成了“一个袋口大张的大钱袋”，并养肥了一批军火承包商和军火工业咨询顾问。

总之，在五角大楼发生的“用美元换取信息的爆炸性丑闻”决不是偶然的，正如美国一位立法者所说，它“是国防部最高层的管理松散和大量‘戕害人性’的金钱造成的。”

## 黄金·监狱与政府要员——意大利“金子监狱”丑闻案

意国监狱，黄金铸起

位于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是个迷人的国度，提起他人们往往会想到历史悠久的罗马城，风光旖旎的水城威尼斯，充满传奇色彩的西西里，还有漂亮的金发女郎。然而，谁能想到在这个令人憧憬的国度里，却能藏污纳垢，罪犯横行。一条条狭窄的街道成了毒品贩子和吸毒者的“王国”。在西西里，撒丁岛，在米兰，那不勒斯，在意大利全境，这样的“王国”难以计数。毒品交易异常猖獗，由此而引起的谋杀、抢劫、偷盗、卖淫层出不穷。在这个面积 30.12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546 万的国家里，竟有大小不同的监狱 191 座，关押着近 4 万名犯人（其中四分之一的犯人为毒品贩子和吸毒犯）。即使如此，意大利的现有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政府年年增加拨款，用来修造监狱的经费约有几十亿美元，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预算的 0.3%。可是，年复一年，天文数字般的金钱花得干干净净，却没有几座监狱能够竣工。

1978 年 2 月，都灵瓦莱特监狱发生犯人暴动和爆炸事件，监狱的许多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加修理已难以使用。意大利司法部不得不同意追加拨款，委托建筑公司日夜加紧修复。原计划拨款 50 亿里拉，后来猛增至 230 亿里拉。

佛罗伦萨的犯人用品仓库的最后造价比原计划多了 7 倍。

维罗拉监狱计划 1972 年动工修建，预计造价 20 亿里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动工日期推迟 10 年，竣工时共花去 430 亿里拉。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意大利通货膨胀严重吗？最近 20 年里，这个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确实曾一度高达 21.5%。但近年来却逐年下降，进入 80 年代后，一直徘徊于 4%~6% 之间。通货膨胀无法解释监狱造价猛涨几倍的现象。

难道在意大利建造一座监狱真的是如此之难，确实需要如此之高的费用吗？如果不是，这么多的钱又落到哪里去了呢？

意大利民众和舆论对此非常关注。一位记者针对这一疑问创造了“金子监狱”的说法。如果把政府拨款分摊到仅造成的几座监狱上的话，无疑，这些监狱可以看做是由金子铸成的。

“金子监狱”的说法在意大利家喻户晓，国外对此的传闻也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对“金子监狱”的疑问在与日俱增。

丑闻败露，端倪初现

1988 年 3 月 3 日，在意大利罗马闹市的众议院蒙特奇托里奥宫，众议员们纷纷步入投票大厅，他们将就国家参与伊利集团的“资金丑闻”案件加以表决。

就在投票表决之前，意大利爆发了一条更为轰动的丑闻——“金子监狱”事件。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多年来一直令意大利人疑惑不解的“金子监狱”问题此时才初露端倪。

原来，使得意大利监狱造价贵似黄金的原因是一些政府要员贪污受贿，薰心利欲所致。这些人中有的政府部长，有的是议员，有的是部长秘书，他们和公司的老板、经理们互为勾结，狼狈为奸，利用修造监狱的机会象毒品贩子一样牟取暴利，大发横财。谁能想到，那些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衣冠楚楚，风度非凡，谈吐得体的政界要人们竟会与这样的丑闻联系在一

起。

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据意大利《快报》周刊披露，卷入丑闻的主要人物是前公共工程部长尼科拉齐、前司法部长达里达、前邮电部长的秘书马扎尼等人，涉嫌地位之高，范围之广在意大利近年来披露的丑闻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意大利一家名叫“科德米”建筑公司的老板“德米科”。他的名字与公司的名字在意大利文里都是 6 个字母，只是排列次序变了一下。据意大利报刊报道，这位德米科大老板通过公共工程部局长加布里埃莱·迪帕尔马，先后送给公共工程部长尼科拉齐的赃款达 20 亿里拉之巨（约合 150 万美元）。由于政府高级官员和建筑商暗中勾结到一起，巧取豪夺，攫取暴利。于是，意大利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金子监狱”。据报道，这都是科德米公司、伊科梅克公司、索马克公司、那伏内兄弟公司等巧立名目，加以修筑的。

例如，佛罗伦萨的索利恰诺监狱，以“专家提出权威意见”为名，5 次追加预算，最后光是追加的款项就高达 410 亿里拉。科莫监狱原来是由伊科梅克公司承包修建的工程，后来被科德米公司抢了过去，造价非但没有竞争性，反而增加了一倍。建筑商与政府主管部门要员内外勾结，发了横财。

建筑商德米科以承包监狱修建工程为名，大行贪污贿赂之实，时间长达 15 年之久。被他贿赂的人很多，赃款难以计算。社会党议员米拉尼接受赃款 8 亿里拉，部长秘书马扎尼将 2.7 亿里拉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还有一位曾任社会党副书记和运输部长的“大人物”也卷入了丑闻，手脚很不干净，只是捞取赃款的数目未见报刊披露而已。

在意大利，许多建筑公司贪污贿赂成风。《快报》周刊文章说：意大利的建筑公司比理发店还要多，注册登记的多达 7.5 万个。不少建筑公司拥有飞机、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但竟然没有挖土机、工程师和泥瓦匠。它们的拿手好戏就是通过承包转包几次交易，将巨额赃款捞进自己的腰包。

据意大利司法部监狱司司长尼科洛·阿马托透露，意大利尚有 33 座监狱正在兴建之中。有的因为发生贪污丑闻，修修停停，旷日持久，平均新建成或修复一座监狱需要 10 年时间。那不勒斯以南的萨莱尔诺监狱始建于 1963 年，承建公司前后更迭 3 次，一直拖到 1982 年才算竣工。有关部门验收这座监狱竟又用了 3 年半时间，1986 年才正式启用。层出不穷的矛盾，频频爆发的丑闻，难以计数的赃款，竟使这座监狱的问世历尽 23 年的风风雨雨。

恐怖活动，有机可乘

德米科能够在买通政府要员后为所欲为，巧取豪夺，还得力于意大利国内的恐怖活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意大利的恐怖主义活动席卷全国，象“红色旅”、“卡莫拉”、“黑手党”、“亨特朗盖特”等恐怖组织猖獗一时。它们在国内不断制造恐怖事件。意大利前总理莫罗、巴勒莫省总督达拉基埃萨先后遇刺身亡，波伦亚车站大爆炸一次死伤 100 多人，那不勒斯—米兰特别快车大爆炸数十人丧生都是恐怖分子所为。他们为非作歹，心狠手辣，十恶不赦。或者制造爆炸事件，或者刺杀记者、法官、警察和政界头目，或者冒充邮差上门绑架，或者抢劫银行、企业。意大利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竭力打击恐怖活动，却招来了残酷的报复。有的新闻记者用笔名报道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几天后就遭暗杀。有的法官在壁垒森严的司法大楼里暗中审查

恐怖案件，连他的同事亲友都一无所知，可几个星期之后就在家门口被恐怖分子绑架走，甚至惨遭杀害。反恐怖主义斗争形势异常复杂，这种反常的现象要求司法部门、包括监狱主管部门保持高度警惕。监狱规模多大，何时动工何时竣工，建筑材料来自哪里，哪个公司承包，都要严加保密。“秘密”两字就给德米科这类人提供了良机。建筑项目越是秘而不宣，这类人便越容易作弊。

德米科在这期间承包了许多监狱。一个又一个工地，来自四面八方的建筑材料，运输公司的运输费，承包工程的子公司，他都有一笔细帐。他把公司职员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材料费用等也都一一记了下来。可是，他却利用当时特殊的国内政治形势，用一些别人难以识别的密码一样的记号加以登记。例如，他购买的钢材与木材，使用的是“Z15NI”、“DA2DA”、“NI3MA”等等符号，他自己一目了然，别人却一窍不通。有了这些神秘的符号，就为贪污贿赂、营私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德米科通过公共工程部局长加布里埃·迪帕尔马买通尼科拉齐部长之后，得意洋洋，大有旋转乾坤，舍我其谁之势。

因此可以说，德米科等人如此规模的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与当时意大利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造成的特殊形势有着重要联系。

不了了之，风波平息

“金子监狱”丑闻爆发时，尼科拉齐还是大名鼎鼎的社会民主党书记，党的头号人物。消息传开，在党内外激起强烈反响。党内立刻分成两派，一派要求他立即辞职，另一派则拼命为他辩解。意大利大街小巷，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尼科拉齐则一脸委屈地在社会党会议上一再强调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决定辞去党的书记一职，让司法部门“揭开事实真相”，“尽快弄个水落石出”。罗马一家报纸则认为，尼科拉齐此举无非为了退一步进两步，准备东山再起。

热那亚税务警察指挥中心 1988 年 2 月 16 日与 17 日深夜展开行动，从科德米公司及其他地方搜出几十万页的涉嫌资料。这些资料，光是仔细阅读一遍，就起码得花上几个星期。“金子监狱”丑闻传遍全国，广播电视和报刊杂志开足马力，大量刊登有关内容的文章。社会各界也是众说纷坛，有人要求司法部门一查到底，依法严惩贪污犯；有人则冷冷一笑：看够了，向来如此！虎头蛇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那么，涉嫌“金子监狱”丑闻的政府要员们最终命运如何呢？

早在“金子监狱”丑闻曝光之前，曾从德米科那里得到 20 亿里拉赃款，身任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公共工程部局长的加布里埃莱·迪帕尔马就听到了一点风声，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畏罪潜逃，想去瑞士躲藏起来，避开即将来到的一场风暴。但他还是在意大利和瑞士边境被抓获。迪帕尔马只好无可奈何地后悔自己“太倒霉了”。同他秘密勾结的德米科也只好在法庭上承认自己贿赂了政府官僚，其中就有迪帕尔马和尼科拉齐。他哭丧着脸说：“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几乎负责修建监狱的所有承包商都大同小异……我同他们没什么两样。”“如果不这样，我有什么办法？”

涉嫌此案的部长结局又如何呢？意大利《晚邮报》1989 年 12 月载文对此作了报道。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部门若要审判涉嫌部长，必须经议会通过。一般来说，议会须先设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涉嫌犯罪的部长进行充



分的调查，最终交议会审核，投票决定。但是，意大利党派林立，互相争斗非常激烈，同时，各党派内部的派系倾轧也非常严重，因此，在专门调查委员会的设立上，更是意见百出，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由谁负责等等，都是争执之所在，因此，不但专门调查委员会难以建立，即使成立了，最终也调查不出什么结果来。不得已，议会最后只好将“金子监狱”丑闻案交“部长法院”审查，授权该法院3位声望高、权威性强的法官，保罗·祖基尼、维托里奥·布卡雷利、塞巴斯蒂亚诺·拉格雷戈共同负责调查此案。

可是，“部长法院”设立后不久，就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有人问，以“部长法院”取代议会专门调查委员会，那么，“部长法院”与最高法院的关系如何处理？又有人提出，按1988年6月5日批准的一项法律规定，议会一旦同意审讯涉嫌部长，审查材料应当全部提交共和国检察院。那么，“部长法院”和共和国检察院的关系又将如何？本来，负责审查全国所有法律，有权提出异议和修改的宪法法院完全可以解决这些矛盾，然而，它却出人意料地对此保持缄默，一言不发。于是乎，“金子监狱”丑闻案的调查与审理工作也就一直停滞不前，难有进展。

如今，虽然尼科拉齐、达里达这样的大人物的名声在意大利已是非常之臭，但意大利人却仍不禁要问：法律到底能否触动他们？

其实，正如罗马的《快报》周刊评论的那样：肮脏的手，肮脏的票，肮脏的交易，永远使人迷离恍惚。“金子监狱”丑闻的暴露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激起了意大利民众的愤怒，并使政府处于危机之中，党派、议会、政府也争论不休，吵得不可开交，但到头来，终不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归平静。

## 一桩跨越大西洋两岸的金融丑闻——法国贝希纳股票案

1988年5—6月，社会党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双双获胜，弗朗索瓦·密特朗再次登上总统的宝座，米歇尔·罗卡尔受命坐上总理的交椅。从而，社会党以其雄厚的实力结束了左右两翼共处的历史，信心十足地迈开了执政的步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社会党人沉醉在执政伊始取得的一连串成绩之中时，平地起惊雷，一起股票案件突然曝光。此案涉及“政界要人”，牵连许多西方国家，法国朝野顿时为之轰动。舆论猜测：执政的社会党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国人的信任，威信扫地？法国人也惊讶异常：是不是我们一时头脑发昏，选错了人？

### 选举大战 社会党全胜

法国人他们相信“公共意志”，喜欢全民投票。1988年是法国的选举年，法国人情绪高涨，各政党也磨拳擦掌，准备在选举中大显身手。总统的宝座金碧辉煌，谁不想偿一偿“第一人”的滋味儿？长期以来，鼎立于法国政坛的是左右两翼的四大党派，它们是左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右翼的保卫共和国联盟和法国民主同盟。左右两翼均有问鼎总统宝座的实力。然而，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右翼联盟协调不力，以戴高乐派的继承人、前总理希拉克为首的保卫共和国联盟和以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法国民主同盟发生分裂，严重影响了右翼的竞选实力。结果，雄心勃勃的希拉克在与社会党的密特朗竞选中一败涂地。5月8日巴黎时间20点，法国索福莱斯民意测验所根据初步统计预测，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的赞成票可能在54%左右，从而向全国宣告了这位现任总统卫冕成功，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六任总统。

当晚，密特朗总统在他的投票站希农市发表讲话表示，他将按照法国人民的意愿，团结全国人民，继续完成人民赋予他的重大使命。

电视台播放密特朗的讲话后，巴黎欢呼的群众涌向香榭丽舍大街、巴士底广场、共和国广场，口号声、汽车喇叭声响彻夜空。社会党要人也欣喜若狂，举杯同庆，大有如愿以偿，舍我其谁之势。

5月10日，密特朗总统任命社会党人米歇尔·罗卡尔为法国新总理。5月14日，总统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于6月5日和6月12日举行两轮投票，选出新的国民议会。

6月12日晚，国民议会选举揭晓，社会党在法共的支持下，只获得微弱的多数，传统右翼也同样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失去了组阁的机会。这样，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民议会中没有多数派的现象。罗卡尔总理因此辞职。

6月14日，密特朗总统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社会党虽然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但社会党有单独执政的信心和决心，并再次任命罗卡尔为新政府总理。6月29日，罗卡尔组成新内阁。从此，社会党结束了与右翼“共处”的历史，改变了“跛行总统”的政治格局，在政权角逐中大获全胜。

社会党执政后，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党因此在人民的心目中的威信也日益提高。然而，有谁能料到，与政治成功相伴的却是一桩桩见不得人的政治丑闻。

### 丑闻曝光举国哗然

1988年11月中旬，法国国营贝希纳铝业集团公司决定购买美国三角公

司的子公司—美国国民制罐公司（ANC），双方经过几轮谈判，初步决定以12.58亿美元成交。在谈判接近尾声时，贝希纳公司董事长拜见了法国工业部长和经济部长，要求政府开放绿灯，玉成此事。由于这笔买卖涉及到国营公司购买外国公司，报告立即上呈总统和总理过目。两国公司间的谈判和上呈报告都处于绝密状态中，除了总统、总理和参加谈判的要人外，其他人均不知晓此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法美两家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前4天，美国三角公司ANC子公司的股票突然“走俏”，有人以每股10美元的低价买走22.7万股，这笔交易大部分是在法国和瑞士进行的。购买协议公布后，这些股票又以每股56美元的高价抛出，持股人从中牟取了暴利。

稍具股票常识的人都知道，股票交易，风险颇大，股市行情变化莫测，它可以使人刹时间腰缠万贯，也可使人即刻倾家荡产。那么，究竟是谁生就一双慧眼，看好了ANC公司的股票？素有股市“警察”美称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机敏地嗅到“气味不对”，他们派出素质高超，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进行秘密调查，认定有人泄露了谈判机密，搞股票“情报走私”，于是向法国方面发出警报，并要求调查。刹那间，“贝希纳股票案”成了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野哄动，舆论哗然。

西方新闻界，素以机警、敏锐而闻名，它们似乎有寻根问底的癖好。法国的新闻界也是这样。丑闻曝光后，法国的各类报刊，无论是全国的，还是地方的，都蚊蝇逐臭般地行动起来，其中以《问题》周刊、《快报》周刊、《费加罗报》、《法兰西晚报》尤为积极。

法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接到美国同行的报告后，也开始进行调查。财政部下令“务必查清”此事。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确认，有人在股票交易中搞“情报走私”，6人从中受益。但是没有披露走私者的姓名。新闻界则顺藤摸瓜，究追猛打，终于使案件又有所进展。新闻界披露了4个与此案有牵连的人，他们是：

沙米尔·特拉布尔西：黎巴嫩人，45岁，是美国三角公司卖方的顾问。他否认有过任何购买和任何透露消息的事情，一口咬定自己只领过代理费。

马克斯·泰雷：76岁，亲社会党政府，是全国商业代理人联合会的前董事长兼总经理。他领导的巴黎投资公司在收购三角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布前3天买进了3.23万股，渔利880万法郎。他承认购买了股票，但他坚称是由于自己很熟谙股市行情才下决心购买的。

阿兰·布伯利尔：41岁，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皮埃尔·贝雷格瓦的前办公室主任，是所有传谣的焦点。他与沙米尔·特拉布尔西、马克斯·泰雷以及罗歇—帕特里斯·佩拉过从甚密。他因此涉嫌此案，被迫辞职。

罗歇—帕特里斯·佩拉：密特朗总统40年来的密友和心腹，他通过奥坦盖银行直接在法国购买了1万张股票，获利220万法郎。他承认是根据他朋友泰雷的建议才购买股票的。

新闻界的这一披露，使此案的严重性进一步升级，许多“政界要人”涉嫌此案，这不能不说是执政的社会党政府的一个严重打击。右翼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惨败，正找不列把柄攻击对手，这次可天赐良机，他们想在这场比赛中赢得一分，于是集中炮火向社会党及其政府发起了猛攻。为了保护社会党和政府的威信，头面人物立即作出反应，进行自卫还击。经济部长表示，此案一定要提交司法部门继续审理，一直追查到底。内政部长若克斯指责有人搞“政治利用”，声称政府部长和社会党议员无一人与此案有关。

对手争吵，孰是孰非，一时虽难以明了，但丑闻的的确确发生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此时此刻，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总统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总统讲话不疼不痒

丑闻一曝光，最感难堪的要数总统密特朗了，因为他的老朋友和心腹罗歇·帕特里斯·佩拉与此案大有牵连。1989年2月12日，密特朗在“7天中的7天”电视讲话中表示，他为他的这位朋友受到牵连而感到难过。他是在德国集中营认识佩拉的，他说：“在贫困和孤独的情况下，能够表现的那样坚强，那样有个性和那样重情义的战犯是不多的。佩拉过去很穷，后来变得富裕了，不过不是作为富商，而是作为富有的工业家。难道我应该因为他由穷变富而同他闹不和吗？不。”密特朗又说：“如果事实证明帕特里斯·佩拉只是象成百万法国人那样从事交易投机买卖，我是不会责怪他或为他的行为感到遗憾的。但是，如果他是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犯错误，我认为，我是不会继续保持我长期以来对他所持的友好态度的。”从密特朗总统的电视讲话中可以看出，密特朗是很敬佩佩拉的，他希望能与佩拉保持这种友谊，但是作为政治家，在必要的时候，他似乎也有勇气抛弃他这个多年的朋友。

密特朗在电视讲话中还谈到了丑闻的另一个涉嫌者马克斯·泰雷，他说，泰雷不是我的朋友，甚至同我也没有什么交往。但是我不想让我的话对他产生压力。凡认识他的人都是尊重和信任他的。

在谈到对该案的处理时，密特朗要求司法部门“严肃处理，不管犯罪人是谁”。他说：“我的职责是维护谨慎持重的法国人的利益，反对各种投机者。”

密特朗的讲话听起来很是冠冕堂皇，然而，事件的发展表明，他的这番讲话，只是不疼不痒地向世人说说罢了。他是否真下决心追查此案，只有他本人知道。

《问题》评论鞭辟入里

与密特朗总统的讲话相反，新闻媒介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全国的大小报刊，如数家珍一样摆出历史上各种丑闻，并围绕着该案，对法国的政治生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其中最有份量的当数《问题》周刊的评论。

《问题》周刊评论道：事实是，法国贝希纳公司购买美国ANC子公司时，几个身居要职的法国人轻而易举地把数千万法郎装进腰包。是他们深谙股市行情，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挣来的吗？绝不是，他们只能通过总统府、总理府、主管部（财政部和工业部）、巴黎国民银行、贝希纳公司领导层或中间人得到这个情报。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周刊评论说，这桩金融丑闻有损总统的威信，因为他的私人朋友帕特里斯·佩拉受到了牵连。正如总统的一名亲信所说：“对总统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正当密特朗总统提出外国移民权利问题并建立重新确定人权概念，以使自己的政治使命具有道德灵感之时，丑闻在他身边爆炸，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场灾难。

无论此案司法调查的结果如何，从政治角度讲，它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前总理莫鲁瓦办公室成员蒂埃里·普菲斯特在抨击文章中写道：“右翼不道德，左翼违反道德。”这句话虽然令人不快，但现在可能无情地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该报还详述道，贝希纳案件之所以严重，并不仅仅因为案情本身，而是本案突然证明了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其他事件使人们对政界人士以权谋私所产

生的怀疑。例如银行总公司案，尽管有人以确凿的证据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想调查马索尔投资公司董事长乔治·佩贝鲁“捞取”股票的年情。相反，佩贝鲁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了这家银行资本的10%。还有卧辅车公司案也让人记忆犹新，当时信托局以低价把一部分股票转让给乔治·佩贝鲁，而信托局监察委员会对此不闻不问。在帕泰公司案中，人们也不禁要打个问号：马克斯·泰雷的10多亿法郎来自何处？

《问题》周刊接着评论说，尽管政治丑闻在法国历史上接连不断，但是都没有贝案丑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贝希纳案件造成的影响绝不容忽视，首先，它影响国家最高当局的声誉。身居高位的官员受到怀疑，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对政府的信任是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的基础，而如今，政府正在失去这种信任。人们惊奇地发现，贝雷格瓦等正人君子式的部长与黎巴嫩人沙米尔·特拉布尔西这样的军火贩子勾搭在一起；社会党头面人物基莱斯同可疑的意大利金融家贾恩卡洛·帕雷蒂有牵连；财政部长的办公室主任同军火贩子一起共度周末，这难道不很可怕吗？这些政客的所做所为，不要说为礼仪所不许，更为道德所不容。

其次，贝希纳案件影响左翼形象。长期以来，许多法国人的头脑中对左右两翼已形成了固定的概念，他们认为，右翼讲求效率，左翼讲求道德。左翼领袖密特朗从青年时代起就发起运动，反对“杀人、腐蚀人的灵魂的金钱。”左翼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有能力向世人表明：它能象右翼一样管理国家，而且会管理得更好。然而，今天的左翼是否在证明，在它最能吸引善良百姓的道德伦理方面，与右翼如出一辙，不分仲伯？左翼政府一个接一个以权谋私的丑闻，迫使法国人自问：左翼与金钱究竟是什么关系，还视金钱如恶魔吗？1986年以前，左翼十分厌恶金钱，而如今，左翼突然逆转，受到金钱的利诱。这种利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左翼以前并不精于此道。正如一名见多识广的金融家嘲讽说：“那些从未看到过一沓三张500法郎钞票的可怜虫，一有机会便扑上来。”社会党左翼是否在重蹈100年前激进左翼的覆辙？激进左翼并始也是大讲思想，大谈原则，而后来却成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说：“金钱和激进有什么区别？”“毫无区别，都是里红外白，吃白食。”那么，陷入金融丑闻的社会党人是否也逃脱不了这种可怜的命运？

最后，《问题》周刊论述道，太阳落下山了，每个人都点起了照亮自己的灯，法国人是否可能在“大家都是耗子”的歌声中重新陷入彻底的犬儒主义？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法国人似乎在同金钱和解，总统可能接受这种普遍思想，赚钱在法国终于获得新的合法地位。但是，所有法国人包括政府高官们千万要牢记：与金钱和解并不是可以赚不义之财，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做生意是从不拿道德冒险的！法国再也不能长期被自己的伙伴视为高官们以权谋私的共和国了！

《问题》周刊的出色评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沉寂了几个月的法国人，又对贝案关注起来了。

#### 《宫廷骚乱》开脱责任

就在舆论要求尽快查清真象之时，司法部门也在慢慢腾腾、悠悠闲闲地搞着调查。法国的司法部门一遇到类似政治丑闻，历来都是如此，甭指望它会迅速起来。许多人对司法部门的调查已感到厌倦。然而，就在此时，贝案的重要涉嫌者阿兰·布伯利尔竟出版了一本名为《宫廷骚乱》的新书，极力

为自己辩护，痛陈自己是背负莫须有罪名的替罪羊，字里行间充满着委曲和失意，看后实在令人“同情”。让我们看看他的自我表白吧。

1988年5月10日，我被任命为皮埃尔·贝雷格瓦办公室主任，此事引起了不怀好意的反响。总之，我之所以被任命担任此职，是因为当时找不到另外合适的人选。我没有读过国立行政学院，因此这次任命无论对我还是对财政部长贝雷格瓦来说，都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

自1988年6月中旬起，贝希纳公司董事长让·冈杜瓦就提出要会晤贝雷格瓦部长。部长的财政经理让·路易·温奇奎拉负责这一会晤的准备工作。

贝希纳公司购买美国ANC子公司是一次十分漂亮的行动。在开始阶段，报界也纷纷赞扬这一行动。但后来，报界开始对这一行动表示不满。到此为止，我的名字还未被提及，但人们私下里已开始议论到我了。购买公司的行动刚一结束，贝希纳事件就发生了。

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引起了不怀好意的人的忌妒，他们千方百计地“搜集”证据，对我进行攻击。《巴黎日报》的一位叫斯特凡娜·德尼的记者写了一本书，书中说我在1983年曾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买过乔治·佩贝鲁的一所乡间别墅，企图在经济问题上大做文章。伊特凡娜·德尼并不是一个初入新闻界的新手，他之所以那样写，是因为某位“消息可靠人士”（当然不是国家的低级公务员）授意他那么做的。起初，他们捏造这个事件是想加害乔治·佩贝鲁的，但结果成了直接针对我的闹剧。

《快报》周刊透露说，在购买美国三角公司时，可能有人犯了泄露机密罪。当天，伊夫·吉阿内克（《问题》周刊记者）颇为激动地向我指出，他掌握着一个证据。我问他是什么证据，他回答说：“把情况告诉给沙米尔·特拉布尔西的那个人就是你。”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说法。不久，他也承认，有关谈判的事，是沙米尔·特拉布尔西告诉我的，而不是相反。

当时，贝希纳公司事件已成了一个大案。1月9日，各家报刊以大字标题报道和评论了这一大案。我竭力顶住。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让·法奇向我指出，财政检查司司长将找我谈话。1月31日，我和司长在礼貌而客气的气氛中开始谈话。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有一个问题至今仍使我感到惊讶不已。当我告诉那位司长我在巴黎国民银行立有一个帐户时，他问我是否在帐目上记录了什么可疑的变动（例如关于三角公司股票的可疑变动）。他说：“一个不诚实的经纪人动用已经冻结的存款进行购买活动，这是常有的事。”

我当时断然回答他说，一方面，我的帐户并没有被冻结；其次，这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想，在我陈述了情况以后，压力会减轻些，因为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对我不利的因素了。然而，我想错了，我完全成了一个应被打倒的人。

在购买三角公司期间，我只接见过纳尔逊·佩尔兹（7月12日），并同这一活动的主要人物在同一只船上呆过（8月11日）。然而，谁能想到我同财政检查司司长的谈话以及我在那只船上呆过这两件事竟影响了事情的发展？这两件事同购买三角公司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没有任何联系。

可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大肆渲染，使我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肉体上，都不能继续原来的工作了。我无法忍受无事生非的诽谤，更不忍看到我尽力效忠的国家受到损害，于是我决定向财政部长提出辞职。我是流言的牺牲品。

在这次事件中，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影响。我的孩子们的心灵受到了深深

的震动。我时刻在想，这次事件会在孩子们的心灵里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等他们长大成人后，我一定要向他们解释什么是义务，什么是对思想和朋友的忠诚。然而，当他们亲眼看到一切都可能受到非议，一切都可能在恶意、嫉妒或生活的严酷法则打击下崩溃时，我又该怎样使他们振作精神，怎样为他们确定努力和严格要求自己的目标？

看完阿兰·布伯利尔的自白，真觉得他是一个高尚之人，他是那么有正义感和道德良知，是绝对不会做出有悖于自己信仰和良知的事的。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这些涉嫌者，都象阿兰·布伯利尔那样，写一本“《宫廷骚乱》”，那么，他们就都清白无辜了吗？然而丑闻确实发生了，一些知情者将大把大把的法郎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无论这些涉嫌者怎样辩白，都难以抹掉法国人心中忧虑的阴影了：官场腐败，国何以治？！

#### 扑朔迷离真相难明

此案一发，一些报刊就预料，即使司法部门介入丑闻，恐怕也难以查个水落石出。司法部门真的那样无所作为吗？经过漫长的调查，案件的关键人物，总统的密友罗歇—帕特里斯·佩拉终于受到起诉。人们早已厌倦的心里又升起了一线希望。可是，无独有偶，佩拉在受到起诉后，突然死亡。警方一开始对佩拉之死惊慌失措，但最后宣布，佩拉之死与案件无关。这样，仅有的一点线索又中断了。案件变得越发扑朔迷离，司法部门也束手无措。看来，轰动法国政坛的贝希纳案件真的难以大白于天下，只得以虎头蛇尾告终了。

人们似乎对这一没有结果的结果并不十分惊奇。在法国，政治家和政党同企业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牵扯金钱的事和丑闻屡见不鲜。但是，丑闻受到彻底追查的却寥寥无几，而总统和总理因丑闻被迫辞职的事，几乎没有发生过。人们对社会党执政不久发生的出卖经济情报的丑闻记忆犹新。在该案中，政界人物信誉旦旦，决意严惩罪犯，但最终只查得泥牛入海，音信杳无。类似这样有头无尾的丑闻案在法国数不胜数。对于这桩股票丑闻，人们对处理结果没有信心实在情理之中。

诚然，事至如今，究竟谁是罪犯已不是重要的问题了，关键是：在法国，为什么象贝希纳股票案那样大大小小的丑闻屡见不鲜？这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 震惊希腊政坛的贪污案——希腊战后最大的经济丑闻

1981年，成立仅仅7年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帕潘德里欧的领导下在一片欢呼声中以压倒多数登上了权力顶峰的宝座。然而，曾几何时，公众的这股热情随着执政党内爆发出来的席卷希腊的40年来最大的政治、经济丑闻而消失殆尽，希腊各党各派都群起而指责执政党的腐败，纷纷追查克里特银行2.1亿美元巨款究竟到哪里去了？谴责政府少数高级官员大肆贪污，收受回扣以及受贿索贿等等。这些丑闻使执政的全希社运顿陷困境，公众舆论的锋芒还直指该党领袖安德列亚斯·帕潘德里欧。在随后而来的全国大选中，全希社运被一举赶下台，真可谓来得快去的也快。

### 结政客飞黄腾达成大亨

这起罕见的丑闻的主角名叫科斯科塔斯。科斯科塔斯1954年出生于希腊，1970年随父母来到美国，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因伪造信件曾被拘留，后被处以200美元罚款，并被勒令退学，以后他又想通过冒险发大财，为一些非法移民弄伪造的社会保险号码，利用它们来骗取失业保险金。1979年，就在美国司法部准备对他进行起诉的前夕，他带着妻子及4个孩子回到了希腊。1年后，1980年，美国方面正式指控他犯了“偷窃”罪，对他提出起诉。

回到希腊后，他在雅典的克里特银行谋到了职员工作。1984年底，克里特银行宣布以900万美元盘出该行，科斯科塔斯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笔钱，居然买下了克里特银行。当时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正全力以赴参加大选，并且有望取胜。科斯科塔斯看准了机会，聘请全希社运的老党员瓦克立斯担任银行总经理，他知道瓦克立斯是帕潘德里欧的老朋友。这一纽带终于把他和帕潘德里欧牢牢地联系起来，一场大骗局就此正式开场。

科斯科塔斯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克里特银行的董事长，他在希腊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就和地位。按常规，私人银行起码要等一年后才能获准开设一处分行，但是克里特银行在4年里就开设了大约50处分行，还获得了另外20份营业执照。他除了拥有克里特银行外，还拥有一家出版公司，该公司发行5种杂志和3家日报，并拥有一家电台。他在雅典郊外建造了一座大规模、超豪华的“报业大厦”，1988年初，他慷慨出资买下了希腊最著名的足球队，还创办了一家设备先进的印刷厂。成了希腊众所周知的大富翁。

科斯科塔斯突然间成为希腊的巨富，引起金融界、新闻界的怀疑，他们一再要求政府调查，但当局不但没有理会，相反称他为当代希腊具有非凡开拓精神的企业家。科斯科塔斯说，他根本不怕触犯任何法律，能随意提取大量现金，只要他有所担心时，帕潘德里欧就给他打气：“只要我在台上，你根本不用担心。”

科斯科塔斯由于靠上了全希社运政府首脑这把巨大的保护伞，在希腊可谓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他从一个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缉拿的在逃犯，一晃成了希腊财界的大亨，这不可不谓是一罕见的奇迹。

### 事败露科氏招供惊希腊

1988年10月，科斯科塔斯侵吞银行巨款的事败露，他和帕潘德里欧之间的金钱来往关系也开始沸沸扬扬起来。希腊司法部门开始调查这起巨大的贪污案，并对科斯科塔斯进行昼夜监视，然而就在警方准备逮捕他的当天，希腊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秘密通知了他，说当局将在晚上6点半拘捕他。科斯科塔斯决定逃了。他趁人不备悄悄溜出他的印刷厂，藏身在运送报纸的卡



车后厢里，逃出了希腊。他先后逃到意大利和巴西，11月24日清晨，当他逃到美国波士顿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拘留。

科斯科塔斯在美国被捕后，被关押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赛拉姆监狱里。在监狱里，他接待了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的采访，说他如果被引渡回希腊后，很可能永远消失在铁窗后面，甚至很可能被悄悄地干掉，而后宣布他畏罪自杀，无法出庭就所发生的一切事提供证词。因此，他决定招供。

科斯科塔斯一案的内幕是骇人听闻的。据科氏招供，他银行里成千上百万“失踪”的巨款实际上都落入了政府首脑帕潘德里欧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腰包。他的经济犯罪活动不仅自始至终得到副总理兼司法部长库措那尔格斯等全希社运政府高级官员的庇护，而且其大量挪用公共存款等犯罪活动还是由帕潘德里欧等人亲自指使和批准的。

这一盘根错节的贪污案开始于1985年的大选之后。当时，帕潘德里欧为了加强自己对全国的控制，物色到了科斯科塔斯这个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出版商和银行家，而科斯科塔斯也正想借助政治势力来营建自己的“王国”，因此俩人一拍即合。

科斯科塔斯说，执政的全希社运政府让国营单位，例如邮政局、城市交通公司、国营医药公司等大量的实际上属于画家所有的资金从国家银行中转存入当时还只是希腊很不起眼的私人银行——克里特银行。他对所有这些政府存款只支付2%或3%的最低利息，而在希腊银行界中一般利息均在15%左右。于是，政府存款的大部分利息落入了这些政治家的腰包。

科斯科塔斯说，在过去一年里，大约有40车的现金——每车上塞满装着5000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名）票面的蓝色公文包——运出克里特银行。首先送到他家里，他在家亲自将这些钱交给帕潘德里欧的亲信路瓦里斯，再由后者转交给首相本人。这种传递每星期进行一次，一年累计达30亿德拉克马（合2000万美元）左右。此外，科斯科塔斯还声称他曾亲自将5亿德拉克马送到库措那尔格斯的家里。另外还有6名执政党领导人按月从克里特银行领取一笔钱，这些钱总数达15亿德拉克马。

他们这样做丝毫不用顾忌被人揭发，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克里特银行里知情的50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雇员已遭到执政党的清洗，有两次镇压命令甚至来自帕潘德里欧本人。1988年夏天，政府强行通过了有利于掩盖这一贪污事件的特殊的“保密法”。科斯科塔斯说，作为回报，他亲自向副总理支付了200万美元的“奖金”。

1986年初，帕潘德里欧提出，应该办份日报来从事正面报道首相家庭的生活情况。科斯科塔斯果然“遵旨”筹措了一笔钱，创办了一份名为《24小时》的报纸。帕潘德里欧还让科斯科塔斯掌握的报刊统统“效忠于”他一个人，里面的编辑是清一色的帕潘德里欧所信得过的人。对反对派办的报纸，帕潘德里欧则让科斯科塔斯通过收买的方式使其日趋“中立化”。1987年初，帕潘德里欧指示他买下全国最有信誉，但对帕潘德里欧常有“不敬之处”的报纸《每日新闻》。

帕潘德里欧还指示科斯科塔斯买下希腊最著名的足球队——奥林匹克队。他让这位银行家买下这支球队后，说在1989年大选前夕政府将同意为奥林匹克足球队建造一个体育场，以此来赢得公众的欢迎。科斯科塔斯为这一计划投资了340亿德拉克马。

1987年10月，发生了一件使他们关系起转折性变化的事。科斯科塔斯

当时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副总统布什主持的一个午餐会。美国特工人员在核实被邀请者请帖时，惊奇地发现这位来自希腊的贵宾居然是联邦调查局起诉了整整 6 年而一直未能缉拿归案的逃犯，于是他们在华盛顿饭店彬彬有礼地“请”去了这位风度翩翩的银行大亨。在交了 100 万美元的保释金后科斯科塔斯才获准出狱。

此事过后仅 3 个星期，帕潘德里欧就召见了她。科斯科塔斯以为一定是“东窗事发”，可能要进监狱。出人意料的是帕潘德里欧居然叫他不用担心，不过有几个条件：一是要他筹措全希社运急需的 50 亿德拉克马（约 3300 万美元）的竞选经费；二是他应同副总理制订出退回存款利息的详细计划。科斯科塔斯说：“我知道这是赤裸裸的敲诈。”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为全希社运偷盗利息就是保证他能在希腊做生意的政治代价。

两个星期后，帕潘德里欧又打来了一个直截了当要钱的电话，需要 2 亿德拉克马（约 130 万美元）用来开支全希社运主持的青年节。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又以“全希社运党活动”的名义两次打电话给科斯科塔斯，每次取走了 1.5 亿德拉克马（约 100 万美元）。

1988 年 8 月，帕潘德里欧要去伦敦做心脏手术，临走前，路瓦里斯来到科斯科塔斯处拿走了 9000 万德拉克马（约 60 万美元）。手术后，总理第一次公开了早已众所周知的艳事——他同 34 岁的航空小姐莉娅妮的关系，这使他的政治威望进一步下跌。与此同时，科斯科塔斯同帕潘德里欧之间的金钱来往关系也开始沸沸扬扬起来。反对党抓住时机要求进行调查。

科斯科塔斯贪污案数额高达 2 亿多美元，涉及包括帕潘德里欧在内的全希社运政府的相当高级官员。丑闻传出，震撼整个希腊社会，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同凡响。这一丑闻被称之为“希腊战后最大的经济丑闻”。

#### 细追查帕氏政府丑闻多

科斯科塔斯一案曝光以后，人们对全希社运政府怨声载道，反对党抓住时机，穷追猛打，相继又抖出了全希社运政府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丑闻。

第一件是“非法窃听电话事件”。帕潘德里欧执政期间，授意属下搞“非法窃听电话的活动”，触犯国家禁止窃听的有关法律。在希腊国家情报局大楼内，有两个房间安装着整套窃听录音设备和 300 条电话线路，窃听上自政府内阁成员下至黎民百姓乃至政治对手的私人电话，甚至连总理本人的情妇莉娅妮也不能幸免。这桩政治丑闻激起反对党和公众的强烈谴责。

第二件是购买军事装备佣金案。此案几乎与科案同时败露。据报道，希腊政府 1985 年以来先后从美、法两国订购了 40 架 F—16 战斗机、40 架“幻影”战斗机及一批先进的导弹。这批军事装备的实际订购价大大低于希政府对内正式公布的价格，其数百万美元的差额均以佣金等名义偷偷装进了希腊政府官员及与他们过往甚密的外国中间商的腰包。

第三件是“买机”案件。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购进多架飞机，“经手人违法受贿”，使国家损失 1650 亿德拉克马（约合 10 亿美元）。

第四件是南斯拉夫玉米倒卖案。此案发生在 1986 年 5 月。据报道，当时希腊国营的国际贸易公司从南斯拉夫低价购买了 9000 余吨玉米，然后冒充是希腊的农产品，在欧共体市场上高价倒卖。由于希腊农产品不需缴纳欧共体农产品补偿费，售价规定高，希腊贸易公司从中赚了一大把。不料此事很快败露，遭到欧共体委员会的调查并被课以 250 万美元罚款。调查表明，希腊国际贸易公司倒卖南斯拉夫玉米案的关键是希腊商务部、农业部、海关、

港口等部门均出具了假证明。

从报界揭露的情况看，以上 4 大经济丑闻至少牵涉到全希社运政府的 4 名主要部长，有的甚至与帕潘德里欧有关。这么多的政府要员被牵涉进经济大案，这在希腊近代史上是少有的。这一系列牵涉到全希社运高级官员的丑闻，再加上帕潘德里欧的轰动国内外的桃色事件使执政党威望陡降，同时内部分歧增多，力量遭到削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全希社运政府也就不可避免地倒台下野了。

#### 遇大选全希社运摔下台

全希社运政府高级官员的政治、经济、生活丑闻导致其在国内外威望大降，内部出现分化，使得政府内一些高级官员声名狼籍，不得不引咎辞职或被解职。尽管全希社运政府竭力否认和辩解，但全国议会丑闻专案小组的初步调查表明，全希社运政府的领导人和一大批政府官员与这些丑闻确有牵连，他们成百万美元地接受贿赂，大肆侵吞和挪用公款，庇护经济诈骗犯等坏人，甚至还有人参与倒卖军火从中牟利。希腊所有反对党和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全希社运政府的腐败，要求查清这些丑闻，对有关人员绳之以法。

丑闻败露后，面对反对党和公众谴责，全希社运内部涣散，分歧深重，情绪低沉。全希社运党内和政府内的一批有影响的人物相继辞职、退党，以表明他们的清白和对领导层及同僚腐败的不满。有的甚至公开发表声明，批评全希社运中的腐败。就连帕潘德里欧的长子也几次表示不愿再任教育部长。

为了避免政府垮台，帕潘德里欧竭力否认其政府与经济丑闻有牵连，同时利用执掌政权的有利条件设法阻挠对这些丑闻的全面清查。然而，丑闻还是给全希社运造成了沉重打击，以致它在大选中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1989 年 6 月 18 日，希腊大选揭晓。希腊最大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击败了连续执政 8 年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获得 44.43% 的选票，在议会中拥有 145 席。全希社运仅获 39.07% 的选票，只得 125 个议席，被一举赶下了台。

大选失败后，由于新民主党单独组阁未成，帕潘德里欧又千方百计拉拢左派联盟，试图同其组成联合政府继续执政。在 1981 年和 1985 年大选的关键时刻，全希社运都曾得到左翼选民的支持。然而，由于它始终没有履行在前两次大选中所公开许下的撤走美军基地，让希腊退出北约等反西方的诺言，反而政府内腐败不堪，广大左翼选民已对全希社运感到失望。希共和希左翼党不顾全希社运的一再呼吁和提醒，坚持单独结成竞选联盟，发誓不与全希社运合作。大选结束后，全希社运为达到继续执政的目的，对左翼联盟“几乎作出了一切让步”，包括让左翼联盟任意挑选了大部长职务，帕潘德里欧不当联合政府总理等。但左翼联盟中央在反复商议后，拒绝了同全希社运合作。相反，该联盟同保守的新民主党联合组成了临时政府，从而使全希社运再度组阁的希望完全破灭。7 月 2 日，保守的新民主党同以希共为首的左翼联盟组成临时政府，连续执政 8 年的全希社运被迫下野，一举从权力的顶峰跌了下来。

#### 展未来帕氏难逃法庭审

新民主党和左翼联盟上台后明确表示，建立临时政府的根本目的在于“净化国家的政治生活，尤其是要全面清查与全希社运政府有牵连的一系列经济丑闻。”凡在清查中发现有违法犯罪者，不管其过去和现在的职位有多高，都将对其依法严惩。

1989年7月5日，希腊新联合政府宣布，它将对帕潘德里欧领导的前政权有牵连的4大丑闻进行调查。

7月19日，希腊议会通过决议，组成调查委员会对帕潘德里欧及4名前部长涉嫌受贿2.1亿美元的科斯科塔斯案进行调查。该调查委员会由新民主党、左翼联盟和全希社运的12人组成。9月14日，该委员会从美国调查在押的巨额金钱骗子科斯科塔斯后回国宣布，帕潘德里欧和4名前部长在这起丑闻中犯有渎职、受贿和违反部长责任法罪。他们要求议会批准组成特别法庭审讯前总理和4名前部长。

10月2日，希腊议长通过抽签方式从全国最高法院法官和上诉法庭庭长中途选出12名法官，组成一个特别高级法庭，专门审理帕潘德里欧执政时卷入的希腊最大经济丑闻。与此同时，议会还决定成立一个类似的特别法庭，专门审理“非法窃听电话事件”。随着特别法庭法官的惊堂木一响，帕潘德里欧的政治生涯也将到此终结。

## 腐败之风袭东瀛平成元年不太平——震撼日本的利库路特贿赂案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驾崩，皇太子明仁即位。新天皇采用“平成”为年号，寓意乃是“国内外、天地间达成和平”。出人意料的是，平成元年日出之国就风暴不停，一起利库路特贿赂案把日本全国搅了个天昏地暗。

从1988年6月刊案曝光，到1989年5月调查结束，日本检察当局传讯了3800人次，搜查了80余处，查明有7000余人卷入利案，其中包括40多名国会议员。随着官场黑幕一天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日本人民的反应先是惊愕不已，难以置信；继而便是怒不可遏，群起攻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法务相长谷川峻、经企厅长官原田宪、首相竹下登、民社党委员长本三郎和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等50余位社会名流被迫辞职，更有利库路特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劳动省次官加藤孝、文部省次官高石邦男等14人相继被捕，众议院议员、中曾根内阁的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和公明党国会议员池田克等17人被起诉。

事隔一年之后，1990年10月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公审了原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正式认定真藤恒接受利库路特公司转让的未公开股票是受贿行为，并判处他2年徒刑。虽然真藤恒是利库路特案的被告中被判有罪的第一人，但利案始末却还得从始作俑者说起：

### 罪魁祸首江副浩正

演出了一场利库路特丑剧之后，主角江副浩正已经“名扬全球”了。其实，此人身高1.65米，体型柔弱，表面上看实在是貌不惊人，人不出众。但是，江副浩正有一条是别人比不上的：他凡事善于钻营，肯下功夫，而且胆大过人。

1957年，年方十九，正在东京大学二年级读书的江副浩正初次展示了他的商业头脑。这一年，东大学生报由于连年亏损而愿花月薪1万日元（当时大学毕业的小学教员月薪仅8000日元）聘请得力的业务员，以推销报纸、承揽广告。江副毅然应聘，他上任后不断登门拜访老校友，向他们大力推销东大学生报，同时又通过这些校友积极向公司靠拢。1958年6月，江副以学生打扮，两度造访丸红饭田综合商社人事部，终于从该公司争取到了一则企业招聘广告。此后，一个季度内江副又为学报争取到了12家公司的广告。毫无疑问，丸红饭田商社的人事广告是江副浩正勤工俭学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60年3月，江副浩正在留级一年之后终于从东京大学毕业。这时的江副虽然学业平平，但却为自己在学其间经商有道而自鸣得意。学生时代的小小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江副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同年4月，江副浩正和一位也曾在东京大学报工作的好友一起创办了“大学新闻广告社”。创业之初，“大学新闻广告社”只有江副及其好友和一位新聘的女职员。由于人手紧张，江副一天常常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此外，广告社的办公条件也相当差。当时，办公室是江副在东京港区芝大楼租的一间加盖房屋，里面只有两张旧桌子。由于办公室里没安电话，他们还不得不借用大楼的公用电话。但是，这不过是万事开头难罢了。创业半年之后，江副浩正集得资金60万日元成立了“大学广告公司”，江副的企业也就从“个体户”升格为“股份有限公司”了。

企业性质发生变化后，江副又开始想方设法开拓新的业务。他从介绍企

业概况、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参考的美国杂志中得到了启发。1962年秋天，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刊物——《介绍各企业》，这份杂志后来成了大学广告公司的门面和顶梁柱。1963年，江副又增资500万日元，将公司名称改为“利库路特中心”——利库路特乃是英语 recruit 的译音，意思是“招聘”。6年之后，江副浩正又将《介绍各企业》改头换面，更名为《利库路特手册》而大量发行。

70年代初，江副制订了“100亿日元企业”的宏伟目标。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利库路特公司在短期内就突破了100亿大关，而到1980年时营业额竟已达到了500亿日元。在此期间，江副浩正于1974年开始经营地产业，创办了利库路特宇宙公司。1975年，他又开始进行企业兼并活动，并且着手实施了“第一次住宅情报连线网路”及其他一连串计划。

对于江副浩正来说，1981年又是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利库路特公司总部大楼在东京著名的闹市区银座落成，江副一心期望着公司又有一个新的飞跃。于是，江副开始积极渗入政界。经牛尾电机会长牛尾治郎的引见，江副结识了日本电信公司总裁真藤恒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江副浩正一方面竭力拉拢贿赂以真藤恒为首的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人员，另一方面又在中曾根的鼎力相助下取得了政府税制调查特别委员、土地临调特别参与等职，一跃而成了日本财政界的名人。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利库路特公司进行了大量的贿赂活动。

江副浩正行贿的手段与众不同，他不是直接奉送钱物，而是“让售”利库路特宇宙公司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表面上，股票买卖双方银货两讫，没有行贿受贿的嫌疑。实际上，如果行贿者公司的股票肯定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受贿者必定能从差价中大捞一票。这种行为在股市交易中称为“内部交易”，在美国、英国、法国和丹麦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在其它的欧洲国家一般仅仅视作有违道德。在日本，这种行为竟被认为是加强人际关系的一种“悠久传统”。然而，凡事总有个限度。虽然股票内部交易这个行为本身在日本并不违法，但如果股票发行人有计划地暗中以低价把股票大量兜售给各界要员，从而使后者贪赃枉法为自己提供各种便利，那么双方显然就犯有行贿受贿罪。正因为如此，1989年2月13日，东京地方检察当局以行贿嫌疑逮捕了江副浩正和利库路特系列的第一金融公司副社长小林宏，以受贿嫌疑逮捕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前董事长长谷川寿彦和前董事式场英，并同时搜查了这四人的住宅。

#### 初露端倪小松落马

1988年3月，一幢崭新的20层大楼在日本川崎市火车站前拔地而起——这幢大楼正是利库路特公司的川崎情报大楼。江副浩正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又一次大功告成了，岂料这幢大楼的落成却是他行贿劣迹败露的发端。

原来，1984年12月川崎市制定了一个城市发展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川崎市将在火车站附近70公顷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技术开发区，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是当时的计划调整局局长小松秀熙。为了获得在上述黄金地段修建大楼的地皮，江副浩正指示手下人与小松秀熙进行了接洽。双方一来二去，很快达成了交易。利库路特公司向小松“让售”其子公司宇宙公司未上市的股票3万股，每股仅作价1200日元。小松拿不出现钱购买这些股票，利库路特的第一金融公司又向他贷款。1984年12月，股票到了小松手中。1986年10月，宇宙公司的股票正式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小松将手中的股票以每股

5000 日元的高价倒手出去，净赚了 1.2 亿日元。当然，利库路特公司也不会吃亏，情报大楼的地皮能够到手自然是小松秀熙的功劳。

利库路特公司和小松秀熙之间的交易是在暗中秘密进行的，可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1988 年 4 月，神奈川县地方警察根据举报，开始对小松秀熙的情况进行秘密调查，只是小松当时已升任副市长，警方不大想揭他的老底，很快又以“没有确凿的证据”为由停止了调查。

然而，闻风而动的新闻记者们岂肯善罢干休。《朝日新闻》横滨分社的记者们继续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从利库路特公司搞到了该公司向小松转让股票的材料，但是小松秀熙本人却不予证实，记者就此陷入了止步不前的困境。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神秘人物出现了。此人在东京新宿区一家小咖啡店约见了记者，让后者匆匆地浏览了一张利库路特公司股票受让人名单。这张名单上列了 76 名社会名流，记者自然不可能全部记住，可是，记者记住了前文部大臣森喜朗等人的名字。根据这一重要线索，《朝日新闻》顺藤摸瓜，查明了不少情况，证实了小松秀熙与利库路特公司之间确实暗中有过交易。

1988 年 6 月 18 日，《朝日新闻》社会版头条发表了记者山本等人的报道，利案一下子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6 月 20 日，小松秀熙被宣布撤职，同时川崎市议会还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他的问题。

然而，更加惊人的消息却在后头。6 月 30 日，《朝日新闻》又挖出了四位受贿者：前防卫厅长官加藤 一买进股票 5000 股，获利 2000 多万日元；原农林水产相加藤以次女和秘书名义买进 10000 股，获利 6000 万日元；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以长子名义收进 5000 股，获利 2600 万日元，民社党委员长 本三郎买进 5000 股，获利 2600 万日元。7 月 6 日，《朝日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和大藏相宫泽喜一卷入丑闻的消息，并登出了他们的照片。面对这些惊人的消息，日本人民一时竟难以相信平常道貌岸然的各界名流居然干这种勾当。《朝日新闻》刊出这一报道的同一天，利库路特董事长江副浩正宣布辞职，人们感到利案问题相当严重，决不是新闻界在搞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报道。

#### 利案突破辞职成风

1989 年七八月间，日本新闻界始终以利库路特案作为报道的重点。在这些报道中，新闻界大体搞清了利库路特公司“让售”股票的情况：从 1984 年到 1986 年，江副浩正等公司高级职员共向各界名流出售了利库路特宇宙公司未上市的股票 720 万股，价格为每股 2000 到 3000 日元。但是，新闻界并未能够证明那些头面人物因为接受了股票而渎职。固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利库路特公司“投李”之后，名流们还未来得及“报桃”，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东京地方检察厅仅仅作些表面文章，没有深入调查这起丑闻。

为了搞清达官显贵们受贿赂的真相，日本许多在野党组织了专门的班子，社民联议员 崎弥之助与众不同，他只要儿子和秘书作助手。可是，最后成果最大的还是 崎弥之助，江副浩正就是栽在他的手下。崎在调查中发现，为了增加资本总额，利库路特公司曾在 1985 年春向第三者发行过一批股票。后来，利库路特公司又从这批股票中收回了 76 万股，专门用于笼络政要，并在 1986 年九十月间把股票转让给了包括 13 名国会议员在内的大人物。

崎弥之助毫不客气地将这一调查结果在日本众议院税制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上和盘托出，大大地得了利库路特公司一军。

急病乱投医的利库路特公司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解决办法。1988年8月30日，利库路特公司的子公司宇宙公司派社长办公室主任松原弘第6次登门拜访 崎弥之助。这一次，松原弘特别干脆，直截了当地摊牌说，只要 崎弥之助放过利库路特这一关，公司将奉养 崎一生。说罢这番话，松原弘还拿出了一包点心和一个装有500万日元的红包。然而，清正廉洁的 崎不仅没吃松原的这一套，当场予以严词拒绝，而且 崎事先还联系了电视台的人，在自己的客厅里装了录象机，把整个行贿过程和两人的对话录得一清二楚。1988年9月5日， 崎在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揭发了此事，当晚，日本读卖电视台播放了松原行贿的实况。9月8日， 崎正式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控告了松原弘的反社会罪行。这一下人赃俱在，利库路特公司自然在劫难逃，而警方也不能再敷衍了事了。

与此同时，那些中饱私囊的政客们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随着内幕不断揭开，舆论的压力也就愈来愈大，一时间日本政坛刮起了一股辞职旋风，与利案有染的政客纷纷被迫引退。政要辞职之风始于大藏相宫泽喜一，而又以法务相长谷川峻的下马最为滑稽，我们就以这两人为例。

宫泽喜一身为日本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又是党内宫泽派的领袖，可谓“德高望重”。更有意思的是，宫泽喜一长得象一位老实巴交的老农民，平常素有“廉洁”的好名声。然而，宫泽喜一也未能逃过利案这一关。1986年9月30日，宫泽的秘书服部恒雄以宫泽本人的名义买进了1万股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手倒卖，牟利5200万日元。其实，竹下登等人也都买了股票，只是他们用的都是秘书和亲属的名义，事发之后都可以用秘书盾牌稍稍抵挡一阵。宫泽喜一却是“老实人”吃亏上当，当初没留后手，一下子就被抓住了把柄。更为严重的是，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宫泽嘴上宣称买股票的钱是“自筹”的，手里却拿不出证据来，事后又被人揭穿，他是用利库路特第一金融公司的贷款作本钱买股票挣钱。这一下，宫泽再也无法狡辩，也无颜继续留在内阁之中了。1988年12月9日，宫泽喜一被迫辞职。

宫泽风波之后，竹下登立志要成立一个廉洁的内阁，实行“政治改革”。1988年12月27日下午，竹下新内阁正式成立。按照惯例，新内阁成员均与记者见面。由于此时利案风潮正凶，主管司法工作的法务相长谷川峻自然成了记者注目的焦点。在记者招待会上，长谷川峻应付自如，博得了记者们的好感。当回答到他与利案是否有瓜葛的问题时，长谷川峻还俏皮地说：“正因为没有瓜葛，所以才出现在你们面前”，俨然一副何必多问的气势，可是，第二天日本报纸又登出了一条特大新闻：长谷川峻及其政治后援团体“迫迪会”从1971年起每月都接受利库路特公司4万日元的政治捐款。这一下长谷川峻顿时哑口无言，只得在12月30日上午宣布辞职，同时表示“惭愧不已，深表歉意”。上台下台，总共三天，你说长谷川峻这出戏演得滑稽不滑稽？

####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进入1990年3月份时，日本内阁的辞职风潮已经告一段落，这时利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警方开始逮捕有确凿证据的行贿受贿者，原来以为钻了法律的空子可以不受惩罚的人先后落入了法网。警方的逮捕行动主要在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劳动省和文部省这三条与江副浩正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线上展开。

1990年3月6日晚，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首先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村田幸藏。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特殊



企业，它的前身日本电信公社是国营企业，1985年4月1日起改用现名变为私营企业后，日本政府依然控制着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垄断着日本全国的电话电报和国内外通讯业务，控制着所有国家级的超大型电子计算机系统。为了在信息时代图谋发展，江副浩正早已盯上了这家可以作为靠山的大公司，真藤恒是江副浩正最早结识的一个权贵。1985年8月和9月，江副和真藤两次会谈。当时，江副要求真藤对利库路特公司开始从事的信息业给予全面支持，真藤随即直接指示其亲信式场英和长谷川寿彦在转售线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等方面向利库路特公司提供便利。作为报答，利库路特公司在1986年9月30日前后向真藤转让了1万股股票。虽然这些股票在名义上是给真藤的秘书村田幸藏的，但转手后的收益2200万日元中900万日元存入了真藤的银行户头，另外1300万则存入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秘书室长的政界经费保密户头，村田本人并未将钱纳入私囊。

在受审时，真藤狡辩说“全部是秘书干的。关于得到股票之事，在看到出售收益的领收单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亮出了表明真藤在磋商转让股票阶段即已知情的具体证据。真藤恒最后不得不低头认罪。1990年10月9日，真藤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他的这一下场我们在开头就作了介绍。

利库路特公司是靠提供就业信息起家的。因此，劳动省官员也是该公司的重点行贿对象。1989年3月8日，东京检察当局分别以行贿、受贿嫌疑逮捕了利库路特公司原社长室室长辰巳雅朗和日本劳动省原事务次官加藤孝。

加藤孝在职期间，日本劳动省曾打算加强对利库路特公司出版物的管理和整顿，因为该公司的刊物登出的就业信息常常与事实有出入，引起了种种纠纷。江副浩正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立即对劳动省官员进行了拉拢和疏通，并且收买议员，竭力阻止通过旨在严格规定有关就业情报刊物发行的《职业安定法》。在此期间，利库路特公司经常招待当时担任职业安定局局长的加藤孝及其下属的主管课长鹿野茂打高尔夫球、钓鱼、旅游，到高级饭店就餐。利库路特公司的这一招果然灵验，1984年10月劳动省放弃了制定对职业介绍杂志加强限制的法规，而且与此同时加藤还在劳动省内积极活动，说服其他官员批准几家情报企业由利库路特公司牵头在东京都文京区设置“雇佣情报中心”。对于加藤的“功绩”，利库路特公司自然感恩不尽。1986年9月底，江副等人以每股3000日元的低价向加藤出售了3000股未上市的股票，加藤在第二天股票一上市即行抛售，一下子净赚了690万日元。

日本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也从利库路特公司捞了不少好处，早在1976年高石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时，利库路特公司就聘他为讲师，并在他的指导下发行《专科学校指南》。利库路特公司曾在高中进行“志愿”调查，并以调查为基础免费把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校等各领域的升学信息杂志送到高中生家中。但是，从1985年前后开始，专修学校的广告越来越夸大其词，而且学校与民间企业合作一起从中渔利。对于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种种批评和改进意见，但是，当时身为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的高石邦男不仅一味袒护利库路特公司，而且还在1985年9月积极帮助江副浩正获得了教育课程审议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等职位。为了报答高石邦男，江副指示彩釉陶器公司总经理小林宏到文部省次官室提出了股票转让事宜。只想占便宜的高石邦男居然还怕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不值钱，在请教了证券公司之后，高石认定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是“优良股票”。于是，高石邦男一

分钱没掏，完全用彩釉公司的贷款换取了1万股股票。1986年11月中旬，正当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涨到每股5000多日元的时候，高石把股票抛了出去。然而，高石意想不到的，好处捞足之后居然还会“甘尽苦来”——1989年3月28日，高石邦男和小林宏分别被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贿和行贿罪依法逮捕。

#### 失信于民政府垮台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劳动省、文部省三条线清理完毕之后，人们自然又把注意力移向了更高层，而这时万众瞩目的正是首相竹下登。

1989年3月31日，《朝日新闻》杂志再次一马当先，刊出了一篇题为《利库路特公司购买2000万元竹下“鼓励会”的宴会券》的报道，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竹下登。这则报道说，1987年5月21日下午6点，竹下及田中派内的竹下支持者在东京芝公园的东京王子饭店举办了一个名为“鼓励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晚会”的宴会。这次宴会门票高达3万日元一张，总销售额达21亿日元。关于宴会券，日本自治省的解释是：“只要宴会券的价格在社会常识的范围内，购买张数也是以出席为前提的恰当数目，就不成为政治资金法中的捐款。”相反，购买多得无法出席的大量宴会券，就应该看作是“捐款”。在王子饭店举办的这次宴会，售出的门票有6万多张，可是出席人数仅是1.3万人，由此看来，宴会的集资性质是相当明显的，而且也正是在这次宴会上竹下登宣称“贡献出五尺之躯是我最后的使命”，事实上表明他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决心。

既然购买这次宴会券应被视为政治捐款，那么购买者就应遵守政治资金法的有关规定。1987年5月利库路特公司的资本为16.2亿日元，按政治资金法的规定，它一年对政党、政治资金团体和政治家的捐款最多为1500万日元，对其他政治团体的捐款最多为750万日元。可是，利库路特公司一下就购买了700张竹下“鼓励会”宴会券，耗资达2000万日元，超过了以上所说的所有限额。此外，日本的政治资金法还规定，一位捐款人对“公职候选人”及“其他政治团体”的捐款总额，一年最多为150万日元，利库路特公司对“鼓励会”的捐款也大大超过了这一规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9年4月5日，日本《每日新闻》又发表了一则有关竹下登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捐款的消息，题为《利库路特曾购买竹下后援组织举办宴会的3000万日元的宴会券》。报道说，1987年5月，竹下登的后援组织“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在岩手县盛冈市举行宴会，利库路特公司又出资3000万日元购买宴会券。此外，报道还说，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竹下在利库路特公司经营的球场与“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的成员进行了高尔夫球比赛，随后竹下又乘利库路特公司的直升飞机飞回东京，此行一切费用均由利库路特公司负担。4月5日的《每日新闻》同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党委员长主张建立“国民联合政权”》的文章，报道了社会党委员长土井要求竹下内阁总辞职的消息。

正当竹下登为了宴会券问题而愁眉不展的时候，日本时事通讯社又在1989年4月7日抛出了《又发现新的事实》一文，揭露利库路特公司还曾向竹下登提供过2500万日元的揭款。当天下午，日本四大在野党举行二年多来的首次首脑会谈。在野党首脑们一致认为“现在时局是战后政治史上未曾有过的重要时刻”，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倒阁”。次日，自民党内部也发生了不利于竹下的信息。日本的资深政治家、前国务大臣河本敏夫在茨城县下妻

市发表讲演，“要求在参议院选举前谋求人心一新”，实际上就是向竹下登提出了下台建议。

竹下内阁到了山穷水尽，走头无路的境地，可是，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有识之士会议”却献出了一条转危为安的锦囊妙计。以前内阁法制局局长官林修正为首的“有识之士”们建议竹下登“率先垂范”，坦率地讲明自己同利库路特的关系，以求得国民的原谅。到了这种时候，竹下登也只有接受建议，把死马当活马医了。

1989年4月11日上午9点半，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开始举行会谈，竹下登在会上——交代了他与利库路特公司的金钱关系。竹下登除对众所周知的情况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之外，还主动交代了一些新情况，比如，在1985和1986年还得到了2000万日元的捐款，1987年5月21日的“鼓励会”除利库路特总公司买了2000万日元的宴会券外，利库路特宇宙公司还买了3000万日元的宴会券。据竹下登本人说，他和亲信们共从利库路特公司方面得到了1.51亿日元。虽然这一数字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预计，但是，由于竹下登表示他对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捐款负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首相的“决然行为”果然博得了公众的谅解。这样一来，竹下派的干部们都说“首相本人的问题清楚了”。内阁官房长官小渊也说，“这样一来，对首相本人的追究将告一段落”。

然而，竹下本人暂时得到解脱只能算是结束了竹下内阁与国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小插曲，整个竹下内阁与国会要打的交道则刚刚进入正题。因为政府迫切希望议会能够通过平成元年（1989年度）的财政预算，而在野党表示：除非能够传讯中曾根康弘或者竹下登内阁总辞职，否则对预算案不予审议。

利库路特案发生在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政府腐败他当然负有领导责任，而中曾根本人也不清白。他曾用两位秘书的名义购买了利库路特公司2.9万股未上市的股票，抛售了其中2.3万股，获利6385万日元。此外，利库路特公司还给中曾根提供了3500万日元的政治捐款，购买他的宴会券花去1071万日元，这几项总计达1.1亿日元，中曾根承认他确实拿了这些钱。可是，还有一件事中曾根始终不肯承认。1988年夏，利库路特公司拿出3500万日元的现金对自民党内15名有影响的议员展开拉拢工作，在其名单中就有中曾根康弘及其长子、参议员中曾根弘文。具体情况是：1988年8月20日前后，利库路特公司向中曾根父子分别支付了500万日元和100万日元的支票。但其支票又退回了利库路特公司，是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回的则不清楚。许多人怀疑，中曾根父子是在利库路特公司向社会党议员崎弥之助行贿事件被揭露后，怕事情败露才急忙退回了支票。中曾根本人口气十分坚定地说：“根本不知道有此事。”真相究竟如何？人们自然要求中曾根接受传讯到议会作证，把一切都交待清楚。

但是，中曾根康弘向来是一位硬派人物。他认为，接受传讯无异于承认自己不清白，这有损于他作为自民党最高顾问和前首相的尊严。此外，中曾根还担心，一旦传讯开了头，政界显要们将被一个个带上证人席，因此他表示“坚决拒绝”传讯。另一方面，在野党也不示弱。他们表示，中曾根一天不到国会作证，他们就一天不参加1989年度的政府预算。这一下竹下登没了辙。若是依了中曾根，预算案肯定通不过，可是新的财政年度已经从4月1日开始，政府不可能长期靠为期50天的临时预算运转。若是依了在野党，强

迫中曾根接受传讯，那么竹下又势必会失去中曾根派的支持而垮台。左右为难的竹下内阁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利案居然又有新发展。1989年4月14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利库路特公司向安倍夫人支付过900万日元的顾问费》的报道。报道说，在利案曝光前的两年又七个月里，即从1986年2月到1988年8月，利库路特公司每月给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的夫人安倍洋子30万日元的顾问费，总计已达900万日元。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不得不承认了这一事实，但他强调自己和妻子在接受记者采访前对此事一无所知。安倍宣称：“我身居繁忙的职位，资金方面的事情都委托秘书办理。顾问费一事是清水二三夫秘书经办的。顾问费已成了我的家庭收入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但是，安倍又说，“不管怎么样，作为干事长我深感负有责任。”把直接责任推给秘书，然后再假惺惺地表示愿意代部下受过——到了这种时候，安倍的这种劣拙表演还能骗得了谁呢？

一个星期后，即4月21日，自民党和在野党关于预算案问题的谈判正式破裂，负责在朝野之间穿针引线的安倍晋太郎连忙称病住院，竹下内阁终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4月22日，日本新闻界给了竹下最后一击。这一天，日本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说，1987年在竹下登竞选首相时，他的秘书青木伊平从利库路特公司借了5000万日元的巨款。本来，借债还钱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由于这事暴露在竹下登“全部公开”了他与利库路特公司的关系，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再也不会会有新情况被揭露之后，那么这位首相大人还有什么脸见人呢？

日本国民对“政治家近似儿戏的谎言”愤慨已极，要求竹下登下台的呼声更加高涨了。1989年4月25日，竹下登被迫宣布辞职。

竹下登辞职之后，往常争夺激烈的首相宝座居然无人敢于问鼎。当时人们曾希望比较清廉的伊东正义出任，但伊东却不愿意收拾烂摊子，他托词有病，千呼万唤就是不出山。万般无奈的自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与利案没有牵连的宇野宗佑继任竹下的首相之职。1989年6月2日，宇野宗佑走马上任。可是，不出一月，宇野宗佑这位“文武两道”、“多才多艺”、与财界缘分浅、和文化界关系深”的首相又爆发了与艺妓有染的“桃色丑闻”。1989年7月23日，日本举行三年一次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一败涂地。第二天，宇野宣布他对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的惨败“负有全部责任”，并且就势借着这个台阶辞职完事。

一桩利案拖垮了两届政府，搅得日本国无宁日，完全与日本政府趁改朝换代之际表达的希冀国内外和平安定的愿望背道而驰。究其原因，实在是金钱政治作祟，为政不廉的缘故。这真是：腐败之风袭东流，平成元年不太平！

## “爬金库”震惊朝野“大论战”世人瞩目——日本朝野各党接受弹子游戏行业贿赂疑案

1989年，是日本政坛多事之年，继利库路特案、首相桃色新闻等风波沸沸扬扬之后，又一桩政治丑闻“爬金库”贿赂案频频曝出惊人内幕，闹得满成风雨。正在召开的日本国会临时会议上，“爬金库”案成为“爆炸性”议题，“隐蔽的焦点”。执政的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咬住此案互相攻击，难分仲伯。与此同时，日本新闻界追踪报道，“爬金库”的幕后真相渐渐露出了庐山真貌。

风波乍起社会党“四面楚歌”

“爬金库”事件是日本《文春周刊》1989年8月17、18日合刊号首先报道出来的。该杂志揭露，1986年众参两院举行同日选举时，“爬金库”业团体全国游技业组合联合会（简称“全游联”）向8名社会党议员赠送了350万日元现金。土井就任社会党委员长时，“全游联”以买酒会券的方式捐款450万日元。此炮一打响，立即在政界引起轰动。对金钱政治分外敏感的日本新闻界立即抓住线索，穷追不舍，一时又弄得满城风雨。

“爬金库”一词是“弹子球”的日语译音。打弹子机游戏在日本非常盛行。无论到日本任何一处繁华街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爬金库”店。一到晚上那里更是灯火辉煌，顾客盈门。虽说是一种游戏，但因它具有赌博性质，玩起来非常上瘾。据说有1/4日本人迷恋这种游戏，该行业每年流动的资金高达20亿元。

“爬金库”业使许多人得以赌博，且该行业偷税漏税严重，在日本声誉不佳。政界接受此类捐款当然是不光彩的，而“爬金库”业不惜出巨资贿赂政界，无非是想找靠山，维持营生。社会党被抖了出来，自民党自然会抓住不放，因自家在“利库路特案”中吃了大亏，此番可报一箭之仇。树倒众人推，在野党阵营中的公明党、民社党、共产党等也纷纷登场，新闻界更是呼风唤雨，不时抖落出惊人发现。

在日本，法律允许政治家接受捐款，作为国会议员的各党政治家如不接受政治捐款，根本无法从事耗资巨大的政治活动。只是任何政治捐款都必须合法。日本《政治资金限制法》规定，捐款者和收款者都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款项，且每次不得超过法定限额。但法律并未限制捐款次数，这就使捐款和收款双方有机可乘，或化整为零，或暗渡陈仓，彼此心照不宣。“爬金库”业向政界捐款并不一定违法，关键在于，收款人是否行使了政治权力为捐款人服务。如果有金钱与权力交换的行为，则属行贿受贿。这次“爬金库”业捐款的疑点就在于此。

据报道，1984年，日本国会曾审议过“风俗营业法修正案”，其主要内容是加强有关部门对风俗业的监视，允许警察进入“爬金库”店检查账目等，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据说社会党议员在“全游联”授议下，在审议“风俗营业法修正案”时反对允许警察进入“爬金库”店检查的条款。在最终通过的法案中，删掉了该条款。另外，为防止“爬金库”业严重偷税漏税，1988年下半年在警察厅指导下曾推行过“爬金库”业卡片化，即玩“爬金库”的顾客必须事先买卡片公司出售的卡片。这样“爬金库”店无法隐瞒收支的真实情况，“爬金库”店当然极力反对。当时社会党曾多次给警察厅及有关部门施加压力，阻止推进卡片化。据说这也是因为“全游联”背后向社会党做了工作。

无独有偶，在追踪调查中，兵库县三木市“爬金库”业曾得到社会党参议员关照的事又暴露出来。

1985年12月，兵库县三木市几家弹子房未领到新的营业执照，被警方勒令停业，消息传到社会党参议员佐藤三吾那里，他便开始游说警方。1986年7月至10月，佐藤先后9次为挽救三木市弹子房业说情通融，均遭拒绝。此后不久，三木市警察厅向佐藤提交了一项关于高速公路系安全带的议案，佐藤表示：“只有先解决弹子房事件，才能解决安全带问题。”借机向警方施加压力。最后，佐藤与警察厅、三木市弹子房业主举行三方谈判。1987年2月，兵库县弹子房经营条例得到部分修改，同年8月，三木市弹子房业主们领到新的执照，重新开业。此项调查无懈可击，社会党陷入困境。

以上情况的披露，使在参院选举刚获大胜而踌躇满志的社会党挨了当头一棒，它竭力否认该党的上述活动与“全游联”的捐款有关。抓住别人短处而喜出望外的自民党立即表示要彻底追查此案。自民党认为，接受政治捐款的社会党议员在国会提出有利于弹子游戏业界的质询的行为纯属为钱使权，以权谋私，准备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予以追究，并希望以此转移国民视线，化解在野党咄咄逼人的攻势，摆脱眼下困境。

10月20日，在国会参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自民党抓住兵库县弹子房案发起凌厉攻势。自民党参议员山冈贤次首先提出“佐藤为救济弹子房而游说”这一“爆炸性质询”，佐藤则矢口否认。自民党穷追不舍，社会党处处被动，威胁说：“将不得被迫中断会议”。该委员会中的公明、民社两党此前曾合作提出废除消费税的议案，在本届国会上唱的是重头戏，此时，不得不忧心忡忡地表示：“电视传播中断。”

#### 对质公堂自民党引火烧身

自民、社会两党“龙虎相争”未见分晓，新闻界却捷足先登，搞到了“全游联”有关弹子房业界1984至1988年向政界提供资金的一览表，并刊登在《每日新闻》上。由此表可得知，4年间政界曾接受高达1.5亿日元的弹子房业界捐款。接受政治捐款最多的是自民党，共计有84人接受了总额高达1.1665亿日元的政治捐款。个人接受最多的是自民党员老、众议员A，他接受了3000万日元捐款。此外，虽说金额不大，但曾担任过两届首相的人也接受了政治捐款；社会党除了1987年2月举行的土井就任委员长庆祝招待会的宴会券450万日元以外，11名众参两院议员接受的政治捐款等共计1257万日元；公民党和民社党各有5人，新自由俱乐部（当时）和社民联各1人接受了捐款。除共产党以外的各党共109人接受了政治捐款。弹子游戏行业捐款的80%流入了自民党的腰包，连那些接受捐款的政治团体也都是自民党的后援力量。

形势急转直下，处境尴尬的社会党总算松了口气。自民党本打算采取主动，攻击别人，结果是引火烧身。于是两党达成自主调查协议，这无疑在两党的缓兵之计。

10月20日，官房长官森山真弓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自民党自主调查的结果。他说，从“爬金库”业界接受捐款或因“爬金库”业界购买宴会券而获得捐款的是海部首相和7位阁僚，总额为497万日元。为了避免使自民党重新成为众矢之的，森山官房长官表示，只要捐款不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就没什么问题，也没有考虑退还，并声明进行了反复的彻底调查。与此同时，公民党和民社党也公布了本党议员接受政治捐款的名单。

10月23日，参院预算委员会继续开会，一直处于守势的社会党大举反攻。社会党干部野坂浩贤质问海部首相，自民党前首相铃木善幸曾接受过在日南朝鲜人“爬金库”业主的政治捐款，显然违反了外国人与外国团体不得干涉日本政治的“政治资金法规”，要求唤铃木前首相作证。此外还要求前首相中曾根到庭作证，因他也接受了非法政治捐款。自民党毫不示弱，指责社会党也曾接受过“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捐款，同样违反了“政治资金法规”。

面对舆论界的强大压力，海部首相表示“本人接受弹子房业界45万日元捐款一事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弹子房业界的偷税漏税和声誉问题与捐款本身无关。然而，首相的辩解并不高明。公众已明白自民党在自己并不干净的情况下准备抽身后退了，以图使此事不了了之。官房长官森山对记者说，“将根据政治资金法规对捐款进行适当处理，没有必要考虑退还这些捐款”。她还表示自、社两党自主调查的标准有些模糊不清，今后有可能披露出新的事实。显然，自民党放弃了紧追不放的姿态。强弩之末，似有哀音。

都不干净结果是不了了之

“爬金库”业捐款事件风波的出现，同日本政局密切相关，随着众院大选的临近，各党无不进入临战状态，一方面谨慎地加固本党防区，一方面彼此攻击，互揭疮疤。

社会党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本欲乘胜前进，以图在众院大选中再上一层楼，不料背后射出一枝冷箭，自民党利用此案大肆反击社会党，并在茨城县补选参议员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谁知自民党也不争气，在新闻界穷追猛打下，“爬金库”贿赂案不断抖出内幕，自民党在此案中不但不干净，反而是得款最多的一家。形成自民、社会两党“大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隔岸观火”的在野小党趁机出面，推出解决方案。

公明党首先推出妥协方案。10月30日在熊本召开的公明党恳谈会上，委员长石田发表了“石田见解”。主旨是在野党阵营应督促修改政治捐款法，“在3年内废除企业、团体的政治捐款，政党接受捐款仅限于本党的政治资金团体”。民社党因社会党对“石田见解”持否定态度，故遮遮掩掩，态度暧昧，提出所谓补充措施。公明党无奈，将单独向国会提交这一修改案。舆论界评论，民社党历来看社会党脸色行事，而公明党和社会党并未树立相互信赖关系。“石田见解”表明公明党将在即将来临的参众两院总选举中“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实力。

“爬金库”贿赂疑案曝光以后，新闻界对此连篇累牍地报道。由于日本政坛金钱政治接连曝光，广大国民对腐败政治深恶痛绝。事发以后，日本朝野各党都成立了专门班子调查此案，检查当局也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日本政府表示，如发现违法行为，定当严惩不贷。然而，正象前面所述，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在这次事件中都不那么干净，此案最后竟不了了之。官方的解释是尚未发现构成受贿罪的行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同洛克希德案及利库路特案一样，它只能使日本国民对政治和政治家更加忧虑、失望和不满。

## 头号大国爆出的头号丑闻——美国众议院议长赖特以权谋私案

洋洋美利坚合众国，大国风范，久负法治之邦的盛名；堂堂众议院议长，官高位重，身居领导立法之要津。然而，詹姆斯·赖特，这位从政40年之久的政坛老客，却在任上演出了一场丑剧——阳面带头立法，阴面带头违法。此公挖空心思钻法律的空子，绞尽脑汁谋一己之私利，到头来声败名裂被逐出了国会山。

### 其人其事扑朔迷离

考察一个人大抵不外乎两种方法，一曰闻其言，二谓观其行。我们不妨先听听詹姆斯·赖特先生的自述：

出生日期：1922年12月22日

出生地点：德克萨斯州沃思堡市

学 历：1939—1941年就读于韦瑟福德学院；1941年就读于德克萨斯大学。

家庭情况：1942年娶妻玛丽·埃塞琳·莱莫斯，生有一子三女；1972年再婚贝蒂·海

宗教信仰：长老会

最敬仰的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

最喜欢的诗篇：拉迪亚德·基普林的《假如》

最喜欢的书籍：《圣经》

最喜欢的演员：格雷戈里·派克

若非从政可能从事的职业：牧师

休息自娱的方式：种植玫瑰花

身为当今美国民主党的象征和最著名的代言人，又是全美国仅次于正副总统的第三号人物，赖特议长给人的印象煞是不赖，至少有两点颇为引人注目：一是他爱诵诗养花，可见得情趣高雅；二是虔信宗教，注重精神生活——这又使人们不得不有理由认为他清心寡欲，淡泊明志。

的确，赖特在生活中给人的印象也还不错。他脸部肤色微红，布满了皱纹，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棕色的眼睛常常能使人感到他在微笑。这是一副憨厚善良的面孔。有时候，这位议长大人也确实平易近人，体恤下情。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侍者、司机、秘书、清洁工，他从来都以礼相待，决不恶语伤人。他会记得司机的生日，还会去秘书家帮助修剪玫瑰。“有的政治家从来不愿意为你花费时间”，赖特的司机莱昂内尔·劳森说，“他们更多的时间惦着的是自己的小狗。可是他不是这号人。”

赖特还是一个重情谊的人，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在众多的受惠者中，最著名的是赖特的一位“转折亲”。此人曾因重罪而蹲过大狱，可赖特竟然能使他“改恶从善”，并让他当了自己的高级助手（不过，这件事后来可给赖特添了不少麻烦）。平常，赖特还常常自责，不会表达对孩子们的感情，不会控制脾气，对人也不够宽容。

然而，这一切只是赖特的一面。公众对赖特并没有多少亲近感，不少人觉得他是微笑和矫揉做作的礼貌来掩饰乖戾的脾气和争权夺利的禀性。这一点在后来对他以权谋私的行为进行调查时得到了印证。每当有人向他提起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他的指控时，他都会勃然变色，大声喝止别人道：“少跟我谈这种琐事，别浪费我的时间！”

在美国，有关赖特的传闻很多，有些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他在众议院里



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曾经威胁说要把一位众议员打翻在众议院的地板上（赖特曾是业余拳击手）；他当初仅以一票之多当选议长，而且主要是因为其他两位候选人同他一样令人讨厌，所以大家只好三害相权择其轻……赖特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 溺爱娇妻执迷不悟

不少美国人认为，赖特的第二次婚姻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接近赖特的人甚至说，是赖特的第二个妻子贝蒂促使赖特作出了不顾法纪一味赚钱的决定。虽然这些说法有可能是为赖特开脱责任，可是也不是毫无根据，因为早年的赖特和晚期的赖特确乎判若两人。

赖特的童年是在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度过的。其父老赖特是一位漂泊四方的巡回推销员，在那样的艰难时代养家糊口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老赖特望子成龙，常常对孩子们说人生最大的目标莫过于担任公职，为大众服务。据说，小赖特最初从政时也颇有一番雄心壮志，声称要尽全力服务于人民。

珍珠港事件后几个月，19岁的赖特中断了在德克萨斯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赖特参加的是陆军航空队，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战斗中，赖特表现勇敢，荣获“英勇飞行十字勋章”。在军事方面，赖特还由于在空中预备役中的工作而在1970年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功勋勋章”。

1947年，赖特25岁的时候进入了德克萨斯州议会，一直干到1949年。从1950年到1954年，赖特任德克萨斯州韦瑟福德市市长。1955年，赖特作为德克萨斯州第12区的代表而被选入美国国会。初到国会山的赖特刚刚32岁，他被人们称为理想主义者。那时候，他把向他捐献的竞选基金最高额定为100美元，他还公布自己的所得税回执。不知道是他自己本身的缘故，还是美国国会那个大染缸的作用，这两种做法后来他都没有坚持下去。

到1961年时，赖特竞选参议员未获成功，反倒背了一屁股的债。随后经商的损失和抚养四个孩子和一位“花得总比我挣得多的”（赖特语）妻子的重担又加剧了赖特的财政困难。1969年，当第一个妻子玛丽提出离婚时，赖特求之不得地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了她，另外还每月给她950美元的离婚赡养费。

“我的财务情况是一团乱糟……”197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欠了那么多的钱，我需要运气帮我还债。”不过，据接近赖特的人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还债以外，赖特对钱还是没有多大兴趣。

1972年11月12日，赖特与他的前秘书贝蒂·海结为夫妻。贝蒂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性，即使在1989年64岁时，她也依然浓妆艳抹，衣装入时。在穿装打扮方面，贝蒂颇有几分模特儿式的眼光和风度。赖特对贝蒂的感情深得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充满激情地称她为“宝贝”和“亲爱的”，他搜集了她的50张照片，放在一本像册中，并且题了词：“贝蒂的种种神态”。

毫无疑问，赖特夫人贝蒂还是一位聪慧而有头脑的女性。婚后不久，她就开始了“改良”丈夫的过程。她干的头一桩事就是敦促赖特戒掉一天两包烟的习惯，这项工程起先虽然不见成效，但后来加上医生从旁协助，终究还是大功告成了。贝蒂还很为赖特与其他众议员的关系担心，因此她曾建议丈夫：“你干嘛不跟年轻的议员们再亲近些？”赖特从善如流，从此常常请他们一起吃饭。在办公室里，贝蒂也常常帮丈夫拿主意：聘用这位，解雇那位。

不过，在经济方面，贝蒂可确实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对丈夫的“改良”并不限于上述事项，婚后她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要丈夫脱下普通的大翻领格

子呢西装，换上镶边的黑色西服。至于贝蒂本人的花销自然更大，而且对此她也宣言不讳。有一次，她在承认自己特别喜欢山猫皮大衣和凯迪拉克轿车（这两样东西她都有）时说，“事情该怪我，我比他更喜欢精美、昂贵的东西。”

美国国会议员的年薪是 89500 美元，议长也只有 115000 美元，工资不算高，与影星、歌星、电视播音员的收入更是没法比。既然收入有限、支出无度，赖特家里入不敷出也就不足为怪了。1977 年，赖特动用 98000 美元的竞选基金偿还了他的私人债务，这是他采取的后来被认定为非法的第一个举动。

在贝蒂的怂恿下，赖特作出了许多招致非议、被人们认为违反了众议院道德规则的财务决定。这儿只说一件与贝蒂直接相关的事情，即她在马赖特公司的工作问题。这件事正是赖特被迫辞职的两大问题之一。

所谓马赖特公司是由赖特夫妇和赖特的老朋友马利克夫妇在 1980 年创办的投资合伙企业。据后来负责调查赖特事件的费伦说，赖特夫妇仅在该合伙企业中投资 57281 美元，可是这笔小小的投资会给他们带来了高达 434449 美元的收益。总的收益包括四年间付给贝蒂的工资 72000 美元，免费使用一套位于沃思堡的公寓（价值 53488 美元）和一辆凯迪拉克轿车（车价、维修费和保险费共计 19241 美元）。这笔收益还包括 59000 美元的红利、18001 美元的利息津贴，以及在 1988 年该合伙企业散伙时购买赖特的股份所付的 15 万美元现金和 12 万美元的一张期票。

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指控赖特违犯的规则是没有报告他妻子在马赖特公司的工资收入，也没有报告她收到的礼物，即对公寓和凯迪拉克轿车的免费使用。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赖特到底违反了哪条规则并不重要。人们只想弄清楚贝蒂该不该每年从马赖特公司领取 18000 美元的工资，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从未去上过班。（领取红利另当别论，因为只要有投资，不管是否在公司任职，均有权分红。）

马赖特公司说贝蒂领工资是因为她是公司的“财务顾问”。关于人们对赖特夫妇的所有议论，贝蒂说她都心自问过，而且“想不出我们做过什么值得别人说长道短的事情。”至于赖特，只要有人责怪他妻子，他就会火冒三丈。他说贝蒂是一位理财能手，“一个绝棒的顾问”。赖特的辩护律师萨斯曼在 1989 年 5 月 29 日的听证会上说贝蒂是一位“勤勉的财务顾问”，可是那天贝蒂刚进听证会的会议室就引起了一阵骚动。她穿着一件鲜艳的水蓝宝石色西装，进门先吻了萨斯曼一下，为了拍照，接着又吻了萨斯曼一下。结果，许多人都说，看样子贝蒂不会是什么“勤勉的财务顾问”。

尽管如此，赖特却依然一味地护着自己的妻子（当然，也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自己的爱妻时，赖特竟然激动得不能自己。“不管什么事降临到我的头上，我都要告诉你们，我的妻子是一位品行端正，作风正派，关心他人，完全值得尊敬的人”，赖特说，“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奋力捍卫她的荣誉和正直免遭任何人的攻击。”说到这儿，赖特心里一酸，硬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却不争气地夺眶而出。幸好众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眼疾手快，带头怜悯地鼓了鼓掌，众议员们顿时心领神会，随即发出一片哗啦啦的掌声，友好地帮助议长度过了这一尴尬的场面。

大祸临头寝食不安

回到家中，赖特依然不得安宁。

有些夜晚，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有些夜晚他又一跃而起，冲着晚间新闻大发雷霆。美国的电视节目时间太长，美国的新闻记者绝对的得理不让人。每当入夜，荧屏上总少不了有几个人在那儿叽叽喳喳地搞什么“电视漫谈”，而谈的又必然是热门话题——议长会不会辞职，会不会成为美国近代史上本党仍在联合执政而领袖却不得不被迫下野的第一人。贝蒂拉他坐下来，劝他息怒，要他冥想。赖特夫妇平常都练“先验冥想术”，据说，这是一种通过使用咒文（或宗教仪式或颂歌）能使精神解脱，并促使心理平静，激发创造性和静神康乐的沉思技术。可是，练倒是练了，真到用时它又不管用。

“老天爷，我可怎么办呢？”赖特问妻子贝蒂。“我觉得没救了。一切都被歪曲了。”

赖特从政40年，从来没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单是在国会山上，他也已经混了35年。他向来仕途通畅，从普通议员、到小组委员会主席、到多数党领袖（1976年起），直到1987年达到事业的顶峰，成为议长，几乎没经过什么坎坷。虽然不少人抱怨他过分专断，但是他毕竟资历老，他要出风头唱“独角戏”，别人也只有看的份。如今可倒好，走前门见到拿照相机的新闻记者就心惊肉跳；在报纸上被人家说成是“江湖骗子”、“水上油漂”；在议会里，又成了道德委员会的审查对象。

“那不是我”，赖特固执地说。“乐于助人——那才是我应该被人们记住的形象。”然而，今非昔比。1989年赖特风波席卷美国之时，美国新闻界又大肆报道了赖特的高级助手约翰·麦克过去的一桩罪行。麦克即前文提到的赖特的“转折亲”，是赖特女婿的兄弟。1973年麦克经营一家商店时，曾把一位名叫帕梅拉·斯莫尔的妇女骗进一间无人的小屋，在诱奸未遂的情况下，麦克用锤子敲了她的脑袋好几下，还用刀捅了她，划破了她的喉咙，并把她扔进她的汽车了事，根本不顾她的死活。为此，麦克被判刑15年。但是，麦克服刑仅27个月，即被保释出狱，并被赖特雇用。从此，麦克一直追随赖特而成为他的左臂右膀。本来，《华盛顿邮报》已在1987年报道过受害人的陈述，事情也差不多早已平息了。但是，1989年5月上旬，有人从华盛顿打电话给电台的“空中漫谈”节目说，在麦克诱奸帕梅拉前两周，麦克曾绑架他的妻子，卡她的脖子，然后强奸了她。麦克否认了这桩丑事，但是，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他在国会山也呆不下去了。5月11日，约翰·麦克被迫辞职。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麦克的这桩罪行本非秘案，这次旧案重提，矛盾显然是指向赖特的。经济问题尚未澄清，却又冒出一个重用犯罪分子的问题，对于赖特来说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

然而，赖特夫妇不是首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把眼前的困境归咎于报界的“敌人”和共和党。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由于新闻记者不喜欢他们，是赖特在议会中的同事嫉恨他的“独角戏”，因而想兴风作浪羞辱他、赶他下台。赖特和贝蒂觉得他们在华盛顿是全力以赴“干好事”的，只是“样样都跟我作对”罢了。

“人家说，只要认识新闻界的人，它们对你就会好得多”，贝蒂在议长办公室接受一次采访时说。于是，赖特夫妇开始讨好新闻界。他们先是邀请一些记者和众议员一起进餐，这个办法没有奏效。随后，他们又换了一位新的新闻秘书。这位新秘书给许多报刊杂志发去了一大堆的信件，抱怨它们专

门进行反面报道。这件事情产生的结果是，赖特被迫为此亲自道歉。然而，最气人的还是另一件事情。为了向记者说明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不会有什么不利的结果，赖特邀请记者们参加了一个他在国会山上临时组织的午餐会。第二天，赖特发现，所有报道集中报道的都不是他自己反复强调的主题，而是他说的一句话“如有必要，可以离开议长之职”。

看来，这一招是不灵了。赖特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无助的受害人，自己的命运只好听任“敌人”的摆布，而贝蒂更是直言快语地说，他们是在“等候死刑判决”。

#### 费伦报告一锤定音

赖特夫妇在度日如年地等候着。他们等来的不是“死刑判决书”，而是“费伦报告”。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费伦报告也确实是一份死刑判决书，它一锤定音，实际上宣告了赖特政治生涯的终结。

赖特事件初露端倪是在1988年春天。当时，佐治亚州选出的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纽特·金格里奇和一个叫做“共同事业”的自由派院外活动组织发表联合呼吁，要求全面调查议长詹姆斯·赖特的从政道德，从而引起全美国的关注。1988年5月26日，金格里奇正式向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指控赖特有违反政府官员行为规范和其它法规的嫌疑，于是，该委员会决定展开调查。为了确保调查的全面和公正，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特地从院外聘来了特别检查官——芝加哥的理查德·费伦律师，同时，众议院还拨款160万美元，用作调查经费。

费伦在8名助手的协助下历时6个半月，花费150万美元，从72名证人处取得证词，终于在1989年2月完成了长达279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对赖特的指控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首先是“马赖特公司”的问题，这一公司被费伦称为“交付现金的管道”，前面已经作了叙述，在此不再赘言。另外的5个问题是：

稿费问题赖特共出过5本书，分别是1965年的《你们和你们的国会议员》、1966年的《即将来临的水饥荒》、1968年的《剑与犁》、1970年的《国会与良心》（与人合著）和1984年的《一位公务员的反思》。

不反思倒也罢了，一反思，《反思》竟出了问题。仅117页厚的平装书《一位公务员的反思》是赖特的讲演和谈话集，该书的出版商是赖特的老朋友、沃思堡的印刷商卡洛斯·穆尔。从1974年起，赖特的竞选基金向穆尔支付了60多万美元，赖特从《反思》一书得到的稿费是62000美元，这笔稿费占全部版税的55%，而一般作者的稿费仅是10—15%，因而这桩交易有侵吞竞选基金之嫌。此外，穆尔曾因逃税而在联邦监狱坐过6个月的牢，还曾涉嫌贪污工会政治基金，穆尔的这些劣迹又加重了人们的疑心。

《反思》一书的销售情况也极不正常。人们发现，这本书主要卖给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或个人。例如，卡车司机工会买了2000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德克萨斯州同乡约翰·怀特买了1000本，德克萨斯州的一家输油公司“科罗纳多输送公司”的一位代理人买了1000本，德克萨斯州保险业企业家伯纳德·拉波波特买了1000本，沃思堡的地产开发商吉恩·佩特买了1000本。其中，吉恩·佩特曾公然对《纽约时报》说：“我只想给赖特增加点收入，但是规则禁止这样做，所以我就买了他的书。”费伦在调查中还发现，有时候赖特应邀作演讲不收演讲费，却要主办单位购买他的《一位公务员的反思》一书。根据规定，众议员应邀演讲的酬金不能超过年薪的30%，

但稿费收入并无上限。赖特在收取的演讲费达到了最高限额后就以卖书为手段逃避法律。

此外，这本书的整理出版也引起了公众的批评。《一位公务员的反思》是赖特的助手马修·科索洛特花纳税人的钱汇编成集的。科索洛特为此事花了 200 个工作时，其中包括在沃思堡呆了 3 周，公家为这次出差支付了 2078 美元。赖特坚持说这份工作是科索洛特自愿做的，而科索洛特却说，“我以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油井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大致情况是：正当赖特和马利克的老朋友莫里斯·贾菲及其儿子道格·贾菲所有的“贾菲航空公司”在向美国空军推销一架涡轮螺旋桨教练机时，马利克的儿子迈克尔·马利克从道格·贾菲的“圣安东尼奥公司”手中买下了该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林奇县色宾湖的一口油井的 4% 的股票。就在马赖特公司正式取得该油井股票的当天，马赖特公司又以 44 万美元的价格将这口井的股票卖给了西德“联合莱茵尼施石油公司”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子公司。扣除有关费用，马赖特公司在这桩交易中获利 35 万美元。

娱乐区问题：历史上，沃思堡市有一个很大的牲畜围栏，过去用以放置即将送往市场或屠宰场的家畜。该市的地产开发商比利·鲍勃·巴尼特想把这一历史遗迹开发建设为一个综合娱乐区，但缺少资金。赖特运用议长的权力通过经济发展署等机构向沃思堡市拨款 2250 万美元。费伦的报告指出，马利克在同比利·鲍勃·巴尼特谈判他在该项目中的利益时，坚持说议长的支持是他要求利益的根据。赖特风波发生后的 1989 年，马利克说他参与这一项目的时间很短，而且根本没有牟利。但是，1987 年秋天，马利克却对《新闻周刊》的记者，他为解决兴建娱乐区所需的经费忙乎了近一年的时间，并且坚持认为由于他筹得了 10 万美金，他应该得到佣金。

储蓄银行危机问题费伦的报告指控赖特以议长的身分对正在处理德克萨斯州不断出现的储蓄银行倒闭案的联邦官员施加了“不适度”的压力。马利克也卷入了这些事件，他既是银行的借款人，又是倒闭的银行经营人写给赖特的求援信的执笔人。

在蒙克利夫公司的投资问题沃思堡市的蒙克利夫家族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有几口油井。1979 年，赖特为该家族去向埃及政府和当时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求情。后来，埃及政府支给了蒙克利夫家族 500 万美元。几个月之后，蒙蒂·蒙克利夫以极低的价格将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口天然气井的一些股票卖给了赖特。费伦报告说，这份交易实际上等于给了赖特 82000 美元的礼物，但是，该报告未能说明赖特的外交行动和这件“礼物”之间有直接关系。

费伦报告列举的赖特的问题极其复杂，美国报刊认为，有不少问题复杂到了只有专职律师、会计师和当事人本人才能明白个中奥妙的地步。1989 年 4 月 13 日美国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公布的正式报告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结论也极其谨慎。评议报告认定对赖特的指控中有关娱乐区、储蓄银行危机和蒙克利夫公司的问题不成立，而油井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调查”，“然后才能恰当地得出结论”。但是，该委员会认定赖特在妻子任职问题和稿费问题上违反了下述规定：

“作为一名国会议员、官员或职员，不得在一年内接受与自己的公务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亲友除外）、任何外国人（或其代理人）的价值 100 美元以上的礼物。”

“任何国会议员在自 1978 年 12 月 31 日起的年度里所获额外收入均不得超过本人本年度薪金的 30%。此种额外收入是指工资、专业费和除版税以外的其它各项收入。”

法有疏漏道德不容

事实虽然基本搞清楚了，但是，对于如何处理赖特这一问题美国国会仍然感到十分棘手。

首先，对赖特的处理牵一发而动全局，将涉及全部议员的个人利益，因此也就势必会官官相护。据美国报刊披露，大约三分之一的众议员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公布的总资产是 30 万美元，甚至更多，而真正的财产净值又肯定远远高出这个数字。许多议员都是在任上发的财，他们的财产报表也表明，绝大多数议员积极参与了股票和不动产的投资。这就是说，在经济上有小辫子可抓的决非赖特一人。因此，赖特事件弄得议员们人人自危。1989 年 4 月 24 日的《新闻周刊》就说，许多议员担心，“如果赖特倒下去，他们都会因同样的罪行而摔跟头。”德克萨斯州选出来的民主党议员查利·威尔森就公开跳出来，如果严惩赖特，那么，“我们就是在冒险制定连教皇都没法遵守的准则”。

赖特事件也使许多议员夫人惶惶不安，因为兼职的也不只是赖特夫人贝蒂一人。据国会议员配偶俱乐部主席玛丽·雷古拉估计，一半以上的国会议员配偶（妻子或丈夫）都有拿报酬的工作。的确有许多人结婚前就已在国会工作，但有的人就纯粹是领薪水、不干活。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议员查尔斯·罗斯的妻子琼·罗斯在她丈夫领导的众议院烟草和花生委员会工作，但实际上每周只有锻炼身体时才去露一次面。议员配偶在议会外干活的也不少。例如，纽约州选出的众议员诺曼·伦特是主管通讯的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委员，而他妻子巴巴拉·莫里斯却是纽约电话公司的公开注册的院外说客。但是，这些人的问题并没受到追究，所以赖特喊冤叫屈地说：“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妻子都工作，为什么我的妻子不能工作？”

美国国会在处理赖特时面临的第二个考验是如何对待法律上的漏洞。谁都不否认美国国会制订的法律浩如烟海，但是这些法律也不是特别难以规避，赖特就把收取演讲费转化成了卖书得稿费。众议院的有关规则规定议员要“慎重对待”非家庭成员或朋友给予的 100 美元以上的好处，那么马利克算不算赖特的“朋友”？马利克让赖特夫妇免费使用沃思堡的公寓，算是对他们的“个人招待”呢，还是算礼物？对于前者，法律没有规定任何限制，对于后者，法律则明确规定不得轻易收受。此外，什么才算是与所立法律有“直接利害关系”也是一个规定得很含糊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美国报刊早就指出，赖特能否侥幸过关，完全取决于他能否使其他议员相信他是党派之争的受害者，从页让道德委员会的议员们作出“纯法律性质的判决”。实际上，赖特及其三位辩护律师也都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然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赖特的法律问题是跟政治分不开的。虽然老百姓对于一般犯罪分子钻法律的空子会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但人们决不会轻易原谅议长钻法律的空子。为政必须讲究从政道德，自己制定了法律不仅不遵守，反而振振有词，这叫老百姓怎么服气？正如蒙大拿州选出的民主党议员帕特·威廉斯所说的：“选民是非常注意道德问题的”。赖特风波初期的民意测验表明，75%的选民认为，“如果情况属实”，赖特必须辞职。到了后期，情况则成了“不管众议院怎样处理，赖特在公众的头脑中已经被

定了罪。”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赖特于 1989 年 5 月 31 日被迫宣布辞职。这样，由于不再是议员，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他的调查也就终止了。对于赖特来说，这确实是上策，因为等待国会的弹劾或继续受审查只会更加丢人现眼。但是，辞职之后，赖特仍将受到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赖特成了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议长，也开了美国历史上议长因违法行为而丢官的先例，其反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正如美国共和党的一位工作人员温迪·迪莫克所说，“国会的面罩被揭开了，美国人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那儿发生的事情”。

## 穷人无房住官商发横财——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黑幕揭秘

1976年6月，尚未上台执政的罗纳德·里根批评当时的政府说，“20多年来联邦政府一直说要为穷人建造低价的住房。新计划在不断地通过，可是没有一个计划兑现。”只说不做”，这是里根给他的前任下的结论。

目前，里根两届任期已满，早已荣归故里。可是，穷人的住房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现在美国有25—75万人无家可归；在里根任期内，对低收入住房计划的补贴从342亿美元锐减到了149亿美元，相应地，得不到住房补贴的贫困家庭则从1979年的400万个增加到了1987年的540万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联邦政府只能满足一半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要求。在巴尔的摩，35000人在争夺18000套房子，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要房的人与房子的比例是四比一。

一面是穷人住房条件的恶化，另一面传来的却是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消息。1989年6月，美国报刊揭露前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利用他跟住房部官员的关系为承包商介绍业务，获好处费42万美元。1989年8月，美国报刊又披露说，有几十位声名显赫的共和党人干过同样的勾当。美国国会发现，里根政府的住房部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达40—80亿美元，而准确的数字谁都无法得知。布什上台后任命杰克·肯普为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肯普在走马上任后不久就说，“我对我发现的情况不胜愤怒。”这位新部长为什么大动肝火？他的前任到底干了些什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里根执政时期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政绩”。

### 部长读职助手擅权

里根当政时的住房部长塞缪尔·皮尔斯是一位黑人。皮尔斯有两大兴趣，一是反对住房问题上的种族歧视，在这一方面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对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啧啧称赞；皮尔斯的第二大兴趣是出国旅行——单是苏联他就去过五次。

青年时代的皮尔斯是一位出色的律师，后来他又当过刑事法庭的法官。此外，皮尔斯也曾在财政部任过职，在国会担任过议员的幕僚。但是，皮尔斯从未单独领导过一个较大的部门，缺乏担任联邦部长之职的经验。皮尔斯步入政坛的原因也非常耐人寻味：196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竭力举荐皮尔斯出任政府高级职务，目的是想让他与当时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相抗衡，领导黑人“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从1964年起，皮尔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最后终于登上了部长的宝座。

皮尔斯虽然当上了住房部长，但却对本部门的工作毫无兴趣。通常他很少过问工作。因而得了个雅号——“沉默的塞姆”。他若要过问起工作来，却又令人啼笑皆非。他一共当了八年部长，在卸任前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同事们正在热烈讨论有争议的“适度修缮计划”，皮尔斯冷不丁地插话问道：“什么是‘适度修缮计划’？”，他这一句话就把所有人都问得默不作声了。其实，皮尔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心想的是到最高法院去任职。可是，偏偏白宫又不愿意提名他当法官，因为白宫认为他的观点过于自由派，而且他还不够德高望重，难当重任。于是，皮尔斯就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上午10点上班，下午4点回家。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没有全部用来处理公务，不少下午他就在办公室看电视连续剧消愁解闷。

皮尔斯在住房部采取的是所谓“公司的”管理方式。他当“董事长”，一切事务都交给“经营人员”操办。最要命的是，皮尔斯听不进任何批评意



见。1985年的时候，他明令公共关系办公室取掉每天送给他的剪报中的任何反面报道。谁要是向他反映意见，他就会说“你把起诉书拿来，我就采取行动”。结果倒好，1989年果真有6名皮尔斯任部长时的住房部官员被起诉，其中还包括经管部长基金的杜波依斯·吉列姆。

既然部长自动放权，必然得有人填补权力真空。在住房部掌握实权的是皮尔斯的行政助理德博拉·戈尔·迪安。迪安在住房部还有一个重要职务——皮尔斯派在“监督浪费、欺诈和管理不善部长委员会”的代表。1984年迪安开始在住房部担任要职时才29岁，但她却神通广大。迪安出生豪门世家，政治关系极广，参议员阿尔伯特·戈尔还是他的表亲。迪安本人曾办过杂志，经营过酒吧。用皮尔斯后来的话说，她还有个特点是“权欲太强”。迪安名为皮尔斯的助手，实为“业务总管”，对工程交给谁去完成有最后的决定权。住房部的大部分项目不是被迪安给了有权有势的共和党人，就是给了她那些曾在住房部工作，后来又跳槽出去当“顾问”挣大钱的朋友们。后来，人们从迪安的卷宗中找到了不少想捞取好处的共和党人写给“亲爱的德比”的信，而这位“德比”自己也写了不少信去讨好她想要讨好的人。例如，后来被布什提名为美国驻卢森堡大使的弗雷德里克·布什（与布什总统无亲戚关系）就承认，与迪安有了交情后，他从住房部争取到了60万美元的补贴。虽然他不承认其中有什么肮脏的交易，但对他的任命还是在美国国会遇到了麻烦。

此外，住房部工作人员最痛恨迪安的一点是，她在部内拉帮结派，安插亲信。她把她的六个朋友都安排到了关键职位上，这些人都极不成熟，被人们称为“乳臭未干的一帮毛孩子”。但是，这帮人对待同事却粗暴无礼，专横跋扈，同时由于他们有靠山，别人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皮尔斯为了推卸责任，后来在国会说他对迪安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可是迪安的一位亲戚却为迪安抱不平地说：“他要不知道这些事情就肯定是一具木乃伊”。虽然皮尔斯被人们称为“沉默的塞姆”，但他帮朋友争取项目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打破沉默。前联邦住房局代理局长雪莉·怀斯曼揭露说，皮尔斯曾经否认了她和同事们的建议，坚持通过了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市的一个项目，因为想要得到这个项目的人是查尔斯·马卡姆——达勒姆市市长、以前皮尔斯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同事。

#### 嫌贫爱富漠视民生

里根政府曾主张大力削减福利开支，因此，从1980年到1989年，美国住房部的预算也从340亿美元削减到了150亿美元。相应地，住房部的雇员人数也从最多时的16200人降到了最少时的11178人。如果是真正的精兵简政，那当然是好事。问题是，由于裙带关系等因素，剩下来的不少人员不仅没有多少才干，而且对于为穷人造房的计划持敌视态度，同时他们往往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1977—1985年间担任住房部审计长的查尔斯·登普西曾不客气地批评说：“住房都是一个蠢材充斥的地方”。

负责多户住房事务的前助理部长帮办亨特·库欣就是这么一个人。库欣主管着好几个为穷人造房的计划，可是他却极度蔑视穷人。据住房部的工作人员说，库欣有一次在工作会议上竟也大放厥词，说什么天主教徒和波多黎各人象蟑螂一样滥生孩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库欣对共和党的显贵们格外热情。在1988年时，住房部的亚特兰大行署发现有一个企业漫天要价，从政府那儿多领走了593782美元。可是，由于这个企业的合伙人之一是1980年里根竞选班子的副主任顾问爱德华·韦登菲尔德，库欣决定只要该企业退

还 88772 美元。1989 年重新进行的审计表明，该企业实际上应退还 757677 美元。在事实面前，库欣的律师提出了新的解释：那家企业不是索费太多，而是帐目出现错误造成了误会。

其实，库欣等人的态度与皮尔斯本人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后来在为自己的失职辩解时，皮尔斯又特意提醒国会的有关委员会说，他从一开始就反对“适度修缮计划”。结果，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这么回敬了他一句：“因为你没有能够扼杀这个计划，所以你就决定榨干它的血汗。”

由于没有真正为穷人服务的思想，住房部常常只做一些表面文章。住房部下设的社区住房资源委员会的任务是保障实施公平住房政策，可该委员会经费的有效使用率仅为 38%，其余 44% 的经费用来完成文书工作，还有 18% 的经费则宁可压着，也不用来为穷人办事。有钱不花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更令人气愤的是住房部常常用公家的钱肥地产开发商、承包人的腰包，而损害了真正穷人的利益。住房部后来的一项审计表明，在 21 个月内完工的 25 项低收入者住房工程（这些工程都有政府补贴）中，有 11 项工程不符合住房部的部颁标准，其中一项工程竟然连一项质量指标都没有达到。这些工程一共花掉了 3600 万美元的政府补贴，达官显贵和不法承包商既然已把钱挣到了手中，房子能不能住人又与他们何干呢？

#### 说客盈门权势换钱

美国政坛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说客可以公开地在议会四下活动，对议员们施加影响，争取通过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其实，美国政府部门也常常有说客登门求情，比前者危害更大的是这种人一般都在幕后活动。

曾经担任过里根政府内政部长的詹姆斯·瓦特就是一位活跃于住房部的说客。不过，瓦特当说客挣钱不是凭“说服别人的本事，而是靠他在任上结下的关系网，利用自己卸任后的“余热”。有一次为了争取到一个项目，瓦特先后打了 8 次电话，跟皮尔斯面谈了一次（30 分钟），他的价码是每次交谈收费 33333 美元。有人请他描述一下他在这种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位前部长竟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一位技术娴熟、富于天赋、利用自己的可信性完成了工作的人”。

看到当说客收入丰厚，住房部的官员们也不禁砰然心动。于是，他们在任上就多了个心眼，注意为今后的收获撒下种子。1983 年住房部的审计长就发出过警告说，由于地产开发商虚报成本，漫天要价，“适度修缮计划”会损失好几百万美元。当时担任住房部副部长的菲利普·艾布拉姆斯斥责这种警告“夸大其词”，对此不予理睬。离任之后，艾布拉姆斯和也曾负责过同一计划的前住房部官员菲利普·温一起于 1984 年加入了一家咨询公司。艾布拉姆斯和温两人一起为他们的公司从“适度修缮计划”的修缮基金中捞到 1.336 亿美元，还因这一计划而免去税款 2900 万美元。审计员们发现他们从 3 项工程中就多收费 970 万美元——这种捞钱方法正是艾布拉姆斯担任副部长时所不愿意加以揭露和制止的。

事实上，至少有 14 名前住房部官员加入了为私人企业争取承建合同的行列，这些人都充分利用了他们与在职的住房部官员的关系。温·艾布拉姆斯、兰斯·威尔森（皮尔斯部长的前助手）和住房部地方分部的一位前官员组成了所谓“温集团”，在短短 11 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就得到了“适度修缮计划”所有工程中八分之一的承建合同。调查人员根据电话留言本发现，联邦住房局局长托马斯·德默里收到过已经成为说客的前住房部官员的上百个电话。

1987年12月，德默里去科罗拉多的维尔度假时租用了“温集团”拥有的房子。德默里从那儿用电传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发回了属于机密的管理条例，上面有艾布拉姆斯改动的手迹，而这些文件根本就不应该让艾布拉姆斯看到，更别说让他修改了。德默里承认，他让艾布拉姆斯看过条例，但他说这是为了征求“前局长”的意见。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说客都收报酬，也不是说不收报酬的说客就没有危害。例如，福特政府时期的住房部长、现任布什政府贸易代表的卡拉·希尔斯女士就对别人把她和前内政部长瓦特相提并论“极为愤慨”，因为她当说客未取分文。但是，卡拉·希尔斯造成的危害比瓦特还大，她说服皮尔斯按照“合作担保贷款计划”继续给予华盛顿的一家金融公司发放贷款的权利，结果该公司给住房部造成了3亿美元的损失。

#### 监督不力 国会失职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住房部管理不善，营私舞弊成风，而且持续时间长达8年，美国国会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呢？在1986—1988年间担任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说：“无论是对想得到权势的人来说，还是对国会议员来说，住房部都是一只蜜罐。我们委员会的议员几乎没提过批评意见，因为他们都指望住房部能给他们的地区和州一些好处。”普罗克斯迈尔的这番话可谓坦诚至极，切中要害。

1987年，皮尔斯提名德德拉·迪安为部长助理。本来，这是国会提出反对意见的大好时机。可是，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会都站出来明确支持迪安。当该委员会的主席普罗克斯迈尔想阻止对迪安的提名时，委员会的12名委员，（6名共和党人、6名民主党人）一举要求付诸表决。究其原因，住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得好：“他们忙着代表承建商与德比交涉还不及呢。”

按照现任住房部审计长肯普西的说法，“任何一个年级的初中生只要读一页（过去住房部给国会的）审计报告，就会知道住房部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既然国会议员都在为一己私利而争相邀宠于住房部的实权派，他们又怎么会真正行使监督权呢？虽然美国国会里现在已经开始抨击住房部的“适度修缮计划”，可是，当初许多议员却只顾忙着给住房部打电话、写信，积极要求把该计划中的建设工程交给自己的关系户承建。

在所有的国会议员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纽约州选出的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住房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达马托到住房部来就象是密特朗对英国女王进行国事访问”，住房部对达马托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达马托是参议院拨款和住房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住房部有许多朋友和门徒，前住房部纽约分部主任约瑟夫·蒙蒂乔洛就是其中之一。达马托通过蒙蒂乔洛给了纽约州的“白色平原”承建公司特殊优惠。因为这个公司是达马托参加竞选的主要捐款者。当然，达马托也决不会亏待自己的故乡。他从住房部为家乡纽约州公园岛搞到了25万美元的补贴，建造游泳池，为了表彰达马托的“功绩”，公园岛还把一条街命名为“达马托大道”。

自从1989年5月住房部新任审计长提出原住房部的问题以来，美国报刊正在不断地予以揭露，但由于案情复杂，至今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美国舆论认为，虽然住房部丑闻的政治意义不会超过伊朗门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及储蓄和信贷银行危机惨重，但是，达官显贵们利用“低收入住房修缮计划”巧取豪夺的卑鄙程度却是任何其它案件都无法相比的。

## 天使湾的罪恶——尼斯市长涉嫌经济犯罪丑闻

尼斯位于法国东南部，紧靠摩纳哥，濒临地中海，是法国第五大城市，以环境优雅而闻名海内外。法国南部著名的“天蓝海岸”就是从尼斯到马赛，每到夏季，国内外游人蜂涌而至，来此度假。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小说家、记者马斯卡罗以尼斯为背景创作了系列小说《天使之湾》则更使其声名倍增。然而，1990年9月16日，担任尼斯市长职务长达25年之久的雅克·梅德森突然提出辞职，雅克·梅德森涉嫌经济犯罪的丑闻也随之披露出来，令法国政坛震惊，同时，也在这座雅致、漂亮的“天使湾”城市里“泛起一股臭气。”

连任市长，“尼斯之王”

雅克·梅德森是前尼斯市长让·梅德森的儿子。1928年，雅克·梅德森出生，这一年，让·梅德森也当选为尼斯市长，以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让·梅德森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只是在45年—47年中曾由社会党的律师雅克·考特担任过两年尼斯市长。

1950年，22岁的雅克·梅德森刚刚进入大学学习法律，而让·梅德森已为儿子进入政界，继承他的事业作了精心安排。一天晚上，雅克·梅德森在父亲的安排下见到了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第四区的议会主席，并和他做了长谈。此后不久，就有大量的海报号召人们“投丁·梅德森”的票。然而，一直到公布名单时，尼斯人才发现所谓“丁·梅德森”不是让·梅德森，而是他的年轻的儿子雅克·梅德森。让·梅德森利用姓名上的机巧耍了一个大大的花招，为儿子入选地区议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雅克·梅德森刚刚步入政坛，一切都在摸索之中，他的言语行为毫无称道之处。为了扩大儿子的影响，巩固他的地位，让·梅德森在一次支持他的群众集会上故作动情地说：“我把雅克交给你们了，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护他。”1962年，雅克·梅德森在选举中被击败，地方报纸普遍认为作为他父亲继承人的雅克·梅德森“太诚实，太理想主义了”。

1966年，让·梅德森死后，雅克·梅德森还是当选为尼斯市长，而且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较量。他的竞选对手不无解嘲地说：“人们不会去反对一个还在戴孝的人。”

让·梅德森把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3种人身上：一是反法西斯的老战士；二是退休者；再就是天主教徒。雅克·梅德森上台后，想进一步扩大他的权力基础，着眼点从手工业者发展到实业家。雅克·梅德森已不满足于象足球俱乐部、剧院等一类的东西，而想大规模地发展经济，搞市政建设。

很快，雅克·梅德森就树立起了他的市长形象，满头浓密的黑发，点着一支雪茄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的行为举止中透着几分二流子的神色，但却颇有诱惑力。他有一整套体系完备的思想，他提出的想法常常显得有些俗气，然而却从中透出几分精明。他对美国的加利福尼亚颇有好感，并希望能把尼斯一下子建设成“欧洲的洛杉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雅克·梅德森终于在事实上成了这一地区的头号人物。这里的封建色彩比较浓厚，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深入到尼斯市的每一个角落。雅克·梅德森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大规模地发展他的计划。早在1967年，他就曾帮助他的一位号称“赌王”的同学让·多米尼克·弗拉多尼在尼斯建立了一家俱乐部。以致于一位强烈反对他的戴高乐主义者写信给当时的内政部长罗杰·弗来伊说：“雅克·梅德森是我们的敌人，他制造了许多麻

烦。”

但雅克·梅德森却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并以其在尼斯的政绩获得了尼斯人的信任。在1983年的选举中，雅克·梅德森以55%的绝对多数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连任。1989年，虽然他因涉嫌经济犯罪的传闻受到影响，第一轮投票中得了43%的选票，但在第二轮选举中，他还是以48%的多数再次连任尼斯市长。到1990年9月16日他宣布辞职时，任尼斯市长近25年之久，父子两代，则长达40余年。难怪法国舆论界评论说他们在尼斯建立了“梅德森王朝”，而雅克·梅德森则无疑是继他父亲之后独一无二的“尼斯之王”了。

经济犯罪，有恃无恐

据法国报刊称，雅克·梅德森是个私欲较重的人，随着任职时间的增加，地位的巩固，他变得更加贪婪，酷爱享乐。

法国报刊报道说，自1979年以来，雅克·梅德森多次涉嫌经济违法犯罪活动。1980年到1990年11年里，地方审计机构先后对他进行了3次税务审查，税务部门屡次发现他本人在征税申报单中漏报、虚报收入，有一次竟高达1600万法郎。

1986年夏，尼斯市政府曾委托巴黎一家金融公司为重新安排该市的一笔6亿法郎的债务同有关部门谈判。按双方的协议，这家公司可以得到3%，即1800万法郎的佣金。然而，等到谈判结束，事成之后，这笔佣金中的450万法郎却支付给了一个现年25岁的女学生爱丽莎伯丝·阿努芙。阿努芙把钱迅速转移到美国一友人处，这笔钱至今下落不明。阿尔卑斯滨海省审计机关事后调查认为，在这一非法支取公款的案件中，雅克·梅德森和他的另外4名助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8年，雅克·梅德森甚至私自截留了议会议员马丁·唐柯利的津贴补助。

据来自美国的调查报告，雅克·梅德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有多个帐户，并在一些公司中持有股份。法国报纸称他是一个“利用市长职务做生意的大商人”。

雅克·梅德森为什么能够在长达20多年的市长任期内涉嫌众多的经济违法犯罪案，款额巨大，却不受触动的呢？这里有历史上的原因。

1980年前后是雅克·梅德森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当时，有连续多起涉及他的丑闻被揭露出来，如“斯班吉里事件”、地中海乐园的倒闭、汝拉俱乐部丑闻等都使他狼狈不堪，1976年—1978年期间雅克·梅德森曾任右翼政府旅游部长，这些事件都和他有关。尼斯的旅游业略有衰败，有人指责是雅克·梅德森造成了这种局面，并盛传他要辞职。不久巴尔总理突然宣布解除了他的旅游部长的职务。1978年夏天，他的一位朋友邀请他去阿根廷，但他却突然失踪了，那时他正热恋着伊安娜·格里玛，也就是他今天的妻子。9月份，他又突然公开露面了，威胁要公开一些秘密文件，说：“我参加政治活动只有17年时间，但我是我父亲的继承人，他从1925年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先是我父亲，然后是我，我们了解许多发生在尼斯的秘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发生的事件，要知道我掌握有这些材料。”雅克·梅德森所指的文件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其中涉及众多的法国政界要人，因此很有威胁力。他的谈话很有成效，法国情报总局关于他的卡片上写道：“无重大问题，只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于是，梅德森事件便无声无息了，

以致法国报刊连呼“梅德森事件被埋葬了”。

1981年，梅德森又被卷入了对他的税收检查的飓风之中。他一度难以摆脱，因为《巴黎竞赛画报》上刊登了一幅让他倒霉透顶的照片，上面有希拉克的标记，让人觉得由政府预算部长阿兰·朱佩下令的税务检查被这位巴黎市长希拉克先生冻结了。于是，雅克·梅德森又拿出了惯用伎俩，威胁要公布秘密文件。在10多年时间里，有人先后对他提出了18次指控，都波他以这种手段压了回去。正是因为雅克·梅德森手中握有这些令一些政府要员心惊肉跳的秘密文件，才使得他能够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虽涉嫌多次经济违法犯罪案件，贪污、挪用巨额款项，大量偷漏税，被指控、审查多次，而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

风声日紧，逃亡国外

1988年，在米歇尔·萨哈斯的支持下，原来的税务总监伊夫·奥里乌被任命为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省长，这一任命事实上吹响了对雅克·梅德森进攻的号角。随后，对雅克·梅德森涉嫌经济违法犯罪的秘密调查就进入准备之中。

1989年，有人又指控雅克·梅德森犯有干涉司法审查罪，他虚张声势大加威胁，做出破釜沉舟的样子。并逐步在政治上靠向国民阵线，在那里他一直拥有很多朋友

按法国报刊文章的说法，真正可以称作“梅德森逃亡记”的三幕戏还是1990年7月开始上演的。有3点原因促使雅克·梅德森逃亡国外。

第一件事7月底发生在埃克斯的法院里。总检察官在此秘密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对雅克·梅德森的司法调查问题。他们一起仔细研究了所有的司法程序，并决定了执行办法。财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经济事务机构的一名经济警察，两名地区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大法官一起研究了这些问题。最敏感的问题则在于核查尼斯市的帐目。这一行政调查的最终结果可能会导致罢免雅克·梅德森。同时，在财政部的督促下，司法警察从3月份就开始了预备性的调查。总检察官最后决定，调查之后就可以进行司法预审。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还讨论了监禁爱利莎白丝·阿努芙的可能。一位与此案有关的证人供认450万法郎可能由阿努芙转给了她的一位美国朋友，因为担心生命安全，这位证人不愿透露姓名。8月中旬，对雅克·梅德森严厉指控的消息传到了雅克·梅德森的耳中，这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尼斯，准备到其它地方去安身。

8月底，另外一件事情增加了雅克·梅德森在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他的一位亲信背叛了他。8月29日前后，梅德森夫妇开始把物品从他们居住的私人别墅搬走。开始时，搬迁行动非常秘密，但不久，目标就开始逐渐暴露了。他们把一部分东西搬到住在内地的女婿那里，另一部分则由经营海外搬迁业务的马特斯·卡洛斯公司负责运往阿根廷。他的妻子伊安娜则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物品搬往他们在摩纳哥的住所。

秘密的搬家行动没有逃过精明的地方情报局，他们通知了内政部长。总之，就雅克·梅德森而言，他对政治生活“厌倦了”，在他动身前往日本大阪之前接受蒙特卡罗广播电台采访时就明显地透露了这种疲惫心情。

9月9日，他动身前往日本大阪，庆祝尼斯和大阪结为友好城市，当时他还决定回来，尼斯人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会逃亡国外。这是雅克·梅德森第22次访问日本，出发前，他收拾了3个箱子外加一箱私人物品，准备随后就

运往国外。临走前他还交了一封辞职信给他在尼斯的律师查理·朗贝尔，一旦地方议会宣布解除他的职务，则让他公布这封辞职信。

但是，雅克·梅德森离开尼斯后，他的行李却未能顺利地出境。他的箱子连同其护送人勃莱特·姆拉在罗西机场被截住。当时，这位年轻的姑娘因为箱子超重，在尼斯机场打电话要旅游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来帮助她出境。而海关人员在情报局的要求下早已在机场静静地等候她了。在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箱子里藏有大量法朗和美元（共值 60 万法朗）。海关人员没收了这批巨款和箱里的其它文件，释放了这位姑娘。雅克·梅德森得知这一消息后发表声明说他的行李里装的是一些私人文件、衣服和体育器材，此外还有一份阿尔卑斯滨海省议会与乌拉圭得拉斯特市的协议。并称箱子里的钱是“警察的挑衅和栽赃。”后来，雅克·梅德森在乌拉圭得拉斯特接受法国《观点》杂志记者采访时解释这件事说：“我才知道是我的助手通过一位朋友把两只箱子交给了这位姑娘。箱里装的是一些私人物品。后来，为了便于她出海关，这位助手通知了巴黎情报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是 9 月 6 日的事，我还没有出国。5 天后，一位陌生人以我助手的名义又交给她一只箱子。这是一个陷阱，是社会党政府的挑衅，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钱的来历。如果真是我要把这些钱转出去，又怎么会把钱装在印有尼斯市政府的信封里，下面写着我的名字呢？在我看来，这笔钱已被它的合法主人，财政部长收回去了。但不能容忍的是，海关把属于我个人的东西也没收了。”对于这种做法，雅克·梅德森表示“可以看出他们什么都会干得出来，所以我只好走为上策了”。

雅克·梅德森听到行李被截的消息后，立即命令他的律师朗贝尔公布他的辞职信。在对《观点》杂志记者解释此事时他说：“我 9 月 9 日离开尼斯，去日本进行工作访问，随后我还要去阿根廷和乌拉圭，拜见两国总统，并准备 9 月 24 日返回尼斯。但我担心 1988 年由社会党一手建立的地区审计院趁我不在尼斯时谎称我犯有经济罪，让阿尔卑斯滨海省省长宣布解除我的职务。所以我在出发前交给我的律师查理·朗贝尔一封辞职信，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离开而不会被人捉弄。15 号，我听到了在罗西机场发生的事，这太过份了，我立刻通知律师在《尼斯晨报》上公布我的辞职信。”按雅克·梅德森的话来说，这一行动是为了“先发制人”。事实上，他所担心的是行政法院指控他犯有罪行而传讯他。

这出三幕“梅德森逃亡记”的戏到此也就结束了，雅克·梅德森开始了他在阿根廷的“流亡”生活。虽然他与阿根廷总统梅内姆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但他表示“不愿因为自己这个小人物而给梅内姆总统增添麻烦”。他还说他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拥有许多财富”，他将过着朴素的生活，并有可能参加一些商业活动。而在尼斯人眼中，这真是一出奇特的戏剧，尼斯市有一条街是以让·梅德森命名的。而 20 多年后，他的儿子雅克·梅德森却成了尼斯市历史上最大的一起丑闻的主角，使他的选民、朋友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PGN0220.TXT/PGN>

### 第三篇 生活丑闻



## 一场断不清的“官司”——北约欧洲盟军副司令基斯林同性恋事件

1983年，正当科尔政府被拉姆斯多夫受贿案搞得焦头烂额，难以自拔时，西德政坛又爆出一大新闻；国防部长韦尔纳认为西德四星上将、北约欧洲盟军副司令基斯林有同性恋行为。因而他有受讹诈的危险，鉴于国家安全，决定让他提前退休。这一决定在西德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派指责韦尔纳拿不出确切的证据，于是趁机发难，要求韦尔纳辞职，并改组科尔政府。这一事件严重地影响了本来就很不稳定的西德政府，险些导致韦尔纳的辞职和科尔政府的改组。

### 东窗事发 基斯林出尔反尔

冈特·基斯林，1926年出生，事发前尚未结婚。他是西德的四星上将，北约驻欧洲盟军副总司令。

1983年7月27日，联邦国防军安全局从联邦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那里得到了一条关于基斯林将军的消息，这一消息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于是，该安全局决定对这一消息进行调查，以确定这一事情在多大程度上触及联邦国防军的安全利益，同时也好澄清事实，避免使无辜的人受牵连。9月14日，联邦国防军安全局局长在国务秘书、国防军总监、人事司司长库比斯中将在场的情况下，向韦尔纳报告说，已经明确认定基斯林将军经常出入科隆的两个同性恋的酒吧，他在那里被称为“联邦国防军冈特”。韦尔纳当即问道：“是不是搞错人了？”并要他们进一步搜集材料，以便证实他所说的情况。但韦尔纳要求调查人员注意严加保密，以防对基斯林将军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同时，韦尔纳委托国防军总监把安全局局长所报告的情况通报基斯林。

1983年9月15日，国防军总监库比斯中将与基斯林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中，基斯林竭力否认有任何同性恋行为，要求总监相信他。基斯林说，对证也不会弄清真相，因为证人一定是在撒谎。基斯林甚至说，他可以以名誉向国防军总监担保。当日下午，韦尔纳亲自同基斯林谈话，重复了国防军总监上午所谈的情况，并说出了他出入过的科隆的那两个酒吧的名字。此时，基斯林笼统地否认去过这两个地方，但他既不要求采取正式的调查程序，也不要求对证。

在9月15日以后，国防军总监和基斯林又进行过一次谈话。基斯林在证人有可能出场对证的情况下，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并保证以后将不再重犯这一错误。韦尔纳随后向基斯林建议，鉴于他身体不好，应去治疗一下，并且不要再履行他的公务了。韦尔纳允许基斯林考虑一下，几天以后表态。接着，韦尔纳又指示国防军安全局，不要再进一步调查这件事，以避免这件事成为公众讨论的问题，那样的话对国防军和基斯林本人都不好。

1983年9月19日，基斯林又来到国防部，与韦尔纳、国防军总监库比斯中将讨论他退休的时间、方式和方法。韦尔纳提出要基斯林于1984年3月31日退休，前提是他不再履行公务，并去医院就医。同时，他还应做到不让公众怀疑他的病情。基斯林对此表示同意，他说他本来就需要就医。在这之后，国防军总监通知北约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罗杰斯将军：基斯林将军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再履行公职了。

10月3日，汉堡的联邦国防军医院负责治疗基斯林的医生通知说，预料基斯林将军将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履行公务。但是从十月中旬开始，北约总部的德国高级军官送来了许多报告，说基斯林将军的健康状况引起了有害的

猜测，并且说公众最为费解的是尽管他宣称有病却还在公共场所露面，甚至还要接见了一个访问团。10月25日，国防军总监在电话里要求基斯林将军不要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基斯林并没有遵守这一点。由于基斯林没有遵守他不参与公务的承诺，11月4日，国务秘书席勒、国防军总监库比斯等再一次讨论了基斯林的退休问题。他们决定结束对基斯林的安全审查并做出结论。11月25日，国防军副总监、安全局局长再一次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由于有几个原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能再等下去了。第一，现有材料已说明存在着安全规定中的安全风险，即基斯林有可能被讹诈。第二，在北约和国内调查会使这件事公开化，并影响到同盟国的关系。第三，会损害基斯林个人的声誉。因此，安全局长认为对此事必须做一个结论。当时供韦尔纳选择的方案有两个、一是撤销基斯林的安全证明，这必将引起舆论界的轰动。二是按军人法第50条令他退休。韦尔纳选择了后一方案。把本来定于1984年3月31日的退休日期改为1983年12月31日。这一决定宣布后，1984年1月23日，基斯林本人出尔反尔地断然否认了对他的指责。基斯林这一举动，一方面使韦尔纳处于很难堪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

#### 推波助澜 反对派兴风作浪

本来韦尔纳下令不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一是怕引起盟国的不安，二是怕对基斯林本人不利。但是，基斯林的举动使韦尔纳处于很被动的境地。韦尔纳既未下令作深入调查，而提出的证据既不充实，证人也不可靠。因而韦尔纳立即成为各方面攻击的焦点。所谓“基斯林事件”便转化成了“韦尔纳事件”。

首先发难的是作为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借题发挥，指责韦尔纳缺乏根据，轻率行事。1984年1月19日，社会民主党议会领袖福格尔在与科尔会谈时提出，要为基斯林将军恢复名誉，并要求韦尔纳辞职。科尔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会谈后，福格尔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认为，基斯林是谎言的牺牲品，国防部长没能对这些谎言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科尔拒绝解除韦尔纳的职务，那就只好成立一个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讨论韦尔纳是否有资格呆在科尔内阁的问题。议会下院经过表决，决定按照社会民主党的要求，由国防委员会组成议会调查委员会。1月20日，调查委员会听取了韦尔纳就提前让基斯林退休一事所做的说明，他向委员们详细说明了其作决定的依据。他说他是在明确地肯定基斯林将军是科隆同性恋酒吧的常客后，才解除他的职务的，他没有别的选择，任何一个认真对待安全问题的国防部长都会这么做的。他提出了四条理由，第一，我不相信他能够按照职务所要求的那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我按军人法第五十条让基斯林退休。第二，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由于基斯林接触高级机密，因此，在他身上存在安全风险的时候，部长没有别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失，不能等着看有根据的怀疑是否确实。在处理了解机密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第三，我从未有过基斯林有同性恋的断言，我从未参加舆论中就此进行的讨论，我不必为损害基斯林将军的名誉做辩护，相反，我作的决定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其次是来自军方的责难。35位武装部队的头头们要韦尔纳就基斯林一事提出确切的证据，如拿不出确切的证据，便要为基斯林将军恢复名誉。他们还要求保护武装部队和基斯林将军不受进一步的伤害。北约前副司令德国人施米克勒猛烈抨击韦尔纳。他说，为了武装部队的利益，韦尔纳应该辞职。

再次是来自盟党的批评。1983年3月6日大选，基社盟得53席，与基民盟、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希望在科尔内阁中任副总理兼外长，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这使本来就对科尔和根舍不满的他更加愤怒。在这次“基斯林事件”中，施特劳斯不仅要求韦尔纳辞职，甚至要求改组科尔内阁，并表示，如需要，他可以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在军界及其他党派强大压力下，韦尔纳向科尔提出了辞职的要求。但科尔拒了韦尔纳的这一要求。

化险为夷 科尔是技高一筹

科尔上任才一年多，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就被指控有受贿行为，对他的侦查正在进行，还有两名部长也受到严重怀疑。而现在“基斯林事件”又转化成“韦尔纳事件”，使科尔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政府更加艰难，同时也使科尔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拉姆斯多夫案尚未了结的情况下，如果免去韦尔纳的职务，会引起连续反应，势必要触发施特劳斯所希望的政府改组。如果不免去韦尔纳的职务，在韦尔纳提不出“基斯林事件”有关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是无法向军界和反对党交待的。经过十几天的慎重考虑，科尔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他分别与韦尔纳和基斯林谈话，以促使他们两人和解。1984年2月1日，韦尔纳给基斯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解除基斯林的职务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有义务这样做。同时承认要求基斯林提前退休的材料不充分，而且没有得到证实，决定恢复他的职务。同日，基斯林将军也给韦尔纳回了一封信。在信中，基斯林除了表示感谢外，他还表示经过这场风波后，加上健康原因，他已不能尽职，因此请求在1984年3月31日光荣退役，在此之前也不再实际视事。

依据这两封信，科尔于2月1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韦尔纳继续留任国防部长，同时为基斯林将军恢复名誉。科尔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平息了一场影响西德政坛达一月之久的风波。首先是既保了卒，又保了帅。韦尔纳是科尔政府中的一位重要成员，在拉姆斯多夫案尚未了解的时候，如果韦尔纳辞职，必然会给科尔政府带来困难。因此，保住韦尔纳就是保住了科尔自己。其次，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韦尔纳和基斯林“两全其美”，实际上却是对韦尔纳的明打暗保，对基斯林的明保暗弃。韦尔纳在给基斯林的信中仍然坚持自己有义务那样做，如果说有错的话，那就是证据不足和未能制止事态公开化。科尔虽然推翻了韦尔纳的决定，为基斯林恢复了名誉，让他官复原职，但又让他以健康原因为借口，仍然按当时事发时所商定的日期退休，这实际上是在坚持当时的想法，认为基斯林不再适于担任此职。再次，可以迅速平息这场风波，使科尔早日结束政府危机。基斯林是否确有同性恋行为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查得出来，如果听任事态发展，必然会给反对党造成大量攻击的机会，使科尔政府长朗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对科尔来说，不深究同性恋事件的做法，既保全了一名高级军官的声誉，稳定了军界的情绪；又可保住韦尔纳的位置，对外还可避免盟国的猜测与不满，实为上策。最后，还可以防止施特劳斯入阁。施特劳斯与科尔和根舍素来不合。施特劳斯从不把科尔和根舍放在眼里。如果施特劳斯一旦进入内阁，势必同科尔平分秋色，并驾齐驱，甚至可能凌驾于科尔之上。因此，保住韦尔纳，也就防止了施特劳斯入阁。

为平众怒 局长成为替罪羊

科尔的决定公布后，立即遭到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攻击，他们指责说，

科尔已经使他自己和西德在国际上受到嘲笑。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指责科尔要通过保留韦尔纳把“令人不快的事情掩盖起来”，他认为韦尔纳的信誉仍然可疑。科尔甚至还遭到他的联合政府的小伙伴自由民主党一个议员的含蓄指责。认为科尔做出这项决定是“令人不快的”。

由于韦尔纳承认他对基斯林的指责证据不足，因此，“基斯林事件”中负责向韦尔纳提供了情况的安全局局长只得提出了辞职，1984年2月6日，韦尔纳接受了他的辞职。安全局局长尽心尽责，结果落了个辞职的下场。

这样震动西德政坛一个多月，险些导致韦尔纳辞职、科尔改组政府的风波就此平息。

## 保守党魁不保守 露水夫妻反成仇——英国保守党主席帕金森的桃色丑闻

桃色新闻 举国哗然

1983年的6月上旬，英国保守党从一党至尊的领袖到默默无闻的党徒，每人都象喝醉了酒一般，无不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因为他们经过激烈的角逐，刚刚击败老对手——工党，又一次大选获胜。想到本党又可再一次执政英伦，尤其素有“铁女人”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又要蝉联首相，怎不使他们欣喜若狂呢？在全党的一片欢声笑语中，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开始精心挑选内阁大臣，考虑安置竞选中的有功之臣，尤其要对“本党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党主席”帕金森委以重任。

首相撒切尔夫人思前想后，决定让帕金森担任内阁中非常重要的角色——英国贸易工业大臣。首相将决定宣布后，无论社会舆论还是党内反应，几乎无人反对。大家都觉得象帕金森这样的谦和君子担当重任不仅问心无愧，也是众望所归。帕氏本人也喜不自胜，踌躇满志，准备弹冠登场，在政坛上一展宏图。

然而，4个月后，就在保守党内对帕金森的一片赞颂声中，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凯伊丝接受记者单独采访时，在英国有相当影响的报纸——《每日镜报》上揭露了自己与保守党主席帕金森长达8年之久的风流韵事。凯伊丝声泪俱下地哭诉了帕金森与自己有染8年之久，并在得知她已珠胎暗结后，绝情断义，竟然抛弃了她。

这消息如同一颗炸弹，在乎和的英伦三岛立刻引起了冲天的弥烟。刹那间，英国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从不知名的地方小报到大家电视台，无不连篇累牍登载帕金森与凯伊丝小姐有染的桃色新闻，整个英伦三岛闹得沸反盈天。那些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们如蝇逐腥，对凯伊丝和帕金森穷追不舍，都希望从他们的口中探得更多的隐秘。从来没人注意的平民小姐凯伊丝，这时竟然门庭若市，采访者蜂拥而至，各种报刊登载着诸如此类的题目：“有谁料到，保守党领袖竟是拈花惹草之徒？”“贸易大臣帕金森与凯伊丝小姐有染8年之久”“看似谦谦君子，实则绝情忘义之辈”“帕金森弹冠相庆，凯伊丝痛不欲生”“有染8年，珠胎暗结”……这件桃色新闻也成了市民们街谈巷议的谈资，许多人对凯伊丝充满了同情，寄语赠物。更多的人对帕金森的行径愤愤不平，指责他太无道义。保守党内也是一片怨艾之声，认为帕金森有辱“家”门。

在西方，人们一般把性问题看得比较开放，一般有妇之夫拈花惹草，或者有夫之妇与人有染，也是个人之间的事，舆论也不会为难他（她）们。然而，一旦在政府官员身上发生哪怕是捕风捉影的“桃色事件”，舆论也不肯放过，要穷追猛打，直到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其下台谢罪才肯罢休。正因为如此，西方政界对记者畏之如虎，惟恐避之不及。

首相帮手 内阁重臣

英国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议会每5年进行一次大选，大选结果，由获胜的党派中出人担任首相，并由首相组阁，挑选任命内阁大臣。多少年来，英国政坛尽管有许多政党并存，然而能够互相争雄，角逐执政党地位的，只有工党和保守党两家。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原因除了以竞选政策争取人心外，党内是否有出类拔萃之辈也是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工党和保守党都费尽心机，培植党内领袖人物。帕金森就是前任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一手

扶植起来的“奇才”。

帕金森初登政坛时，仅仅是一位根本不引人注目的议员。然而，此人不仅有一定的才干，而且深谙官场钻营之道。不久便以其忠顺而博得撒切尔夫人的赏识。短短数年间，帕氏又平步青云，由内阁一名副大臣擢升为一党之尊的保守党主席。同时兼任主计大臣和兰开斯特公爵大臣，成为人人侧目的内阁大臣。不但如此，帕金森还千方百计地迎合撒切尔夫人的价值观念，力主自力更生，发挥个人的积极作用。撒切尔夫人能够在人才济济的大英帝国，战胜成千上万的须眉男子，成为一国之相，这期间除了借助本党的力量和个人孤心苦诣的奋斗外，还与她的思想个性——强硬、自主精神不可分开。撒切尔夫人强硬的思想个性和工作作风，不仅被人们送给了“铁女人”和“铁相”称号，而且也使她在公众中平添魅力，争取更多的选民。帕金森自立更生的主张与撒切尔夫人一拍即和。另外，帕金森也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不仅能言善辩，常常技压群雄，而且风度翩翩，在电视上有十足的绅士形象，这在讲究风度礼仪的英国，无异使帕氏赢得了众多公众的好感。

最为重要的是，帕金森以其忠诚和才干为本党竞选和撒切尔夫人的连任屡建奇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为如此，撒切尔夫人十分器重和赏识他，把他视为“党内宠儿”，称赞他是“保守党历史上一位最出类拔萃的党主席”。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别的意外，帕金森应该是官运亨通，前程万里。然而，百密一疏，帕金森竟因为女人问题而在政坛失足落子。由于抛弃与他做了8年露水夫妻的女秘书凯伊丝，被轰下台去。并且“一失足成千古恨”，难以东山再起。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有染八年 反目成仇

1983年6月初的一天，英国大选在即，保守党上下正紧张地迎接选举，党内大小头目个个忙得不亦乐乎，疲惫不堪。然而，保守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的办公室却充满了柔情蜜意。正坐在办公桌前若有所思的帕金森突然感觉有人悄悄来到自己身边，回头一看，不禁喜出望外。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女秘书凯伊丝小姐。这位36岁的女秘书颇有姿色，风韵犹存，很有一番魅力。凯伊丝见室无旁人，便俯在他耳边亲昵地说：“亲爱的，今晚七点半，老地方。”帕金森听到这爱意绵绵的声音，心旌神摇，微笑着点了点头。

当晚7点30分，华灯初照，整个伦敦城一片灯火辉煌。这时，只见一辆黑色豪华小轿车在一家大咖啡厅前嘎然而止，车还没有停稳，就从车上急急忙忙下来一位绅士派头的人物。他脚步匆匆而又轻车熟路直奔二楼后排雅座。还没等他走到那里，一位早已等候多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年女人快步迎上前来，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之后，他们便靠在一起，喝起了咖啡。

这位绅士派头的人就是英国大名鼎鼎的保守党现任主席帕金森，女的则是她的女秘书凯伊丝。她们为遮人耳目，精心选择了这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咖啡厅的二楼，作为经常约会的场所。

两人含情脉脉地边喝边谈，过了一会儿，凯伊丝突然焦急地恳求帕金森“亲爱的，我觉得应该把我们之间八年之久的恋情告诉首相，因为咱俩的名字在政界中充分连在一起，难免引起人们的猜测。让首相在组织新政府之前知道我们的事，很有必要。”听了凯伊丝的话，帕金森原来充满喜色的脸上，立刻露出为难之色，急忙搪塞说：“亲爱的，此事不宜操之过急，不过你尽管放心，我会见机行事，在适当的时机向首相面陈内情。”尽管凯伊丝对帕金森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一想到帕金森与自己如胶似漆的恋情，尤其考虑帕

金森是党内奇才，一向深谋远虑，他现在不向首相说明，定有其更高明的想法。想到此，凯伊丝也就不再坚持，免得双方下不来台。

不过，凯伊丝已隐隐感到帕氏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变化。不久，凯伊丝再次主动约请帕金森去老地方相聚，帕金森一见面就发现凯伊丝这次显得既激动又羞涩。还没等招待送来咖啡，满面绯红的凯伊丝就迫不及待地扑向帕金森的怀里，悄然一声：“亲爱的，我有了……”帕金森如坠云里雾里，不解地问：“有了什么？快告诉我。”凯伊丝见自己的情郎如此不晓男女之事，心里更有说不出的甜丝丝的感觉，便笑着说：“有了就是有了，还不明白？天下的男人都是一群只知寻欢作乐的傻瓜。”说完不好意思地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帕金森这时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最不希望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可怎么办呢？聪明绝顶的帕金森为了防止凯伊丝得寸进尺，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急忙冷淡而又断然地说：“不过，我已是有三个成年子女的父亲，无论如何不想再结婚了。”

帕金森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叫凯伊丝如何承受得了。她没想到帕金森竟然如此冷若冰霜，如此绝情忘义，突如其来的羞辱感、愤怒感使她一下子晕了过去。

帕金森见此情况，也一时慌了手脚，急忙把凯伊丝抱住，百般安慰。他灵机一动说：“亲爱的，我只不过同你开开玩笑，其实，我心里比你更激动。”凯伊丝此时表现得十分简单，一听此言，立即破涕为笑。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大，不可收拾，帕金森决定先把凯伊丝稳住。于是信誓旦旦地向她表示：“我准备马上会见首相，把我们之间的事告诉首相，并争取首相的谅解。”沉吟了一下，他又说：“为了娶你，我必须先同我妻子离婚，此事我也着手去办。”此时的凯伊丝显得非常激动，她开始憧憬自己与帕金森的未来，想象着人们如何向她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6月9日保守党获胜的当晚，帕金森便驱车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面见首相。寒暄之后，撒切尔夫人觉得今晚帕金森显得有些异常，几次欲言又止，似有什么事情难于启齿，便十分平和地问道：“塞西尔，有什么事吗？”帕金森吞吞吐吐地向撒切尔夫人说：“萨拉·凯伊丝怀孕了，这孩子是……我的……我同她8年以前就相爱了。”

撒切尔夫人一听此言，如同被人在头顶猛击一棍，觉得此事一旦传扬开去，那真是非同小可。不仅帕金森凶多吉少，无法在政坛立足，从而自己失去一条膀臂，而且在保守党党魁身上出了这种桃色丑闻，也会使本党蒙受奇耻大辱。另外，更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为以后的执政带来不利的影响。虑及于此，禁不住面露愠色，她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保守党主席，竟然如此因小失大。不过，沉思片刻，撒切尔夫人又平静地说：“塞西尔，此事已成事实，泼水难收，现在关键是防止此事扩散，不要声张！要稳住凯伊丝，更不能抛弃自己的妻子，要继续同你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侥幸，此事没有在大选前传扬出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听了铁相这番话，帕金森如释重负，对首相的感恩之情更是油然而生。撒切尔夫人不是没有考虑到此事的风险，不过虑及帕金森的才干和多年来对自己的忠心耿耿，仍然坚持让帕金森留在内阁，出任大臣。同时，撒切尔夫人又向他面授机宜。

当天晚上，帕金森按照自己的计划，兴冲冲地赶往与凯伊丝约会的老地方——伦敦闹市区的那家咖啡厅。这次，成竹在胸的帕金森显得特别主动，分外殷勤，把凯伊丝哄得欢天喜地。他告诉她：“我已把我们的事告诉了首

相。”乘无人之际，他又猛然把凯伊丝搂在怀里，长吻不已。凯伊丝顿觉暖流阵阵，涌上全身，激动得热泪横流。此时此刻，陶醉在甜蜜爱情之中的凯伊丝，又怎会想到帕金森已怀异心，在向她施展缓兵之计呢？

自那以后，帕金森一方面继续保持同凯伊丝的关系，一方面在保守党内树立自己的威信，坐上了贸易工业大臣的政治交椅。此时的帕金森自以为自己的地位已稳如泰山，不时地向同僚和新闻界流露出春风得意的神色。八月初，在没同凯伊丝说声“再见”的情况下，毫不顾忌地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到国外度假去了。

此时的凯伊丝，度日如年，整日坐卧不安，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因为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根本无法掩人耳目了。久久不见帕金森的音讯，凯伊丝对帕金森的真情有所怀疑了。不过，当地平静下来之后，又立刻产生了侥幸心理：他不会这么绝情，再说，他身为一国执政党主席，又兼内阁要职，总不会置个人的名誉与前途于不顾吧。

帕金森轻松地在国外度假一个月后，携着家眷返回伦敦。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凯伊丝到老地方相会。凯伊丝喜出望外，这些天来的忧虑和痛苦一扫而光，同时暗暗责备自己把帕金森想得太坏了，感到很内疚。然而，见面后帕金森的表现又使她如同被人浇了一盆冷水：帕金森对她象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彬彬有礼”，脸上冷若冰霜。以往那种令她激动不已的柔情已荡然无存了。这种打击对凯伊丝实在太大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失神地望着与自己有着8年男欢女爱之情的情人。

这次帕金森毫不犹豫地告诉凯伊丝：“我不想和你结婚了。”凯伊丝声嘶力竭地问道：“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说罢嚎啕大哭。帕金森漠然地回答到：“因为……我有许多为难之处……”凯伊丝不等他把话说完，就发疯似地冲出了酒吧，一头跌倒在人行道上。帕金森把她送到了家里。

呆呆躺在床上的凯伊丝，此时欲哭无泪，欲怒无声。帕金森也是一言不发，他也不想安慰，只坐了一会儿，便象没事似的溜之大吉了。离开了“是非之地”，帕金森长长地嘘了口气，感到肩上轻松了许多。凯伊丝绝望了。

#### 官官相护 舆论穷追

在英国，法律有明文规定，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哪怕说出的隐私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如果损害了个人的名誉，也会以诽谤罪论处。相反，如果涉及的是政府官员，则无论涉及什么地位的人，都照揭不误。4个月后，伦敦《每日镜报》的记者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了帕金森同凯伊丝之间的“秘密”，于是便穷追不舍，活动起来。

已经彻底绝望的凯伊丝，这时忍痛含悲，决心同帕金森拼个鱼死网破。于是她鼓足勇气，求助于公共舆论，向天下讨回公道。凯伊丝在家中接受了记者单独采访，把帕金森与自己有染8年，在得知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后绝情断义抛弃她的行径公诸于世。

帕金森的桃色丑闻披露报端后，举国哗然，有些人公开质问：“执政的保守党主席这号人物，究竟要把英国引向何处？”要求帕金森下台的呼声也时有耳闻。迫于新闻界的强大压力，帕金森在10月上旬，即保守党第100届年会上发表简短声明，遮遮掩掩地承认了此事。

对于保守党领袖的丑闻，首相撒切尔夫人，保守党内要人以及政府官员，甚至英国亲保守党的报刊杂志，共同联合起来，予以庇护。尤其首相撒切尔夫人更是首当其冲。她曾先后就帕金森的桃色丑闻发表两次声明，宣称这仅



仅是个人私生活的小节，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会影响帕金森的留任。

在保守党的年会上，大会主持者特意安排得力人物为帕金森评功摆好，制造党内继续拥护他的气氛。亲保守党的许多报刊也纷纷刊登有利帕金森的报道。有关电视台也在关键时刻播映帕金森节目，为其提供辩护机会。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帕金森在10月13日保守党年会上，竟然大摇大摆地作起了报告，其得意忘形之势，溢于言表。

面对帕金森的忘乎所以，凯伊丝悲愤填膺，决定同帕金森最后“摊牌”。于是，她在具有权威性的报纸《泰晤士报》发表了《讲明真相》的文章，这篇洋洋万言的长文，用确凿的事实，向公众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帕金森的两面派真面目。凯伊丝揭露说：帕金森通过其律师发表的关于她们之间私恋的描述，不仅轻描淡写，而且歪曲了事实真相，旨在推卸责任。凯伊丝还一针见血地将矛头指向首相撒切尔夫人，揭露说有关帕金森想同她结婚的事情，首相完全知道。而且，撒切尔夫人身为一国首相，居然说帕金森的行为纯属生活小节，无害大局，这完全是为帕金森开脱。同时，凯伊丝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无辜。他写到：“帕金森在我怀孕之前很久就已向我提出结婚的事，他第一次向我求婚是在1979年。我是在持久的恋爱关系的基础上怀孕的。我之所以让这种关系继续维持下去，是因为我相信他要同我结婚的保证。”

凯伊丝的《讲明真相》一文，使趋于平静的帕金森桃色丑闻又再起波澜。而且这次给予帕金森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她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帕金森的伪君子面目。以往一些把这件桃色事件看作私生活小节的人，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不是政治家一般的拈花惹草，而是说明帕金森在道义和人品上有问题。那些一开始就对帕金森丑闻愤愤不平的公众，看过这篇万言长文后，更加火冒三丈，群起声讨帕金森。

面对舆论的声讨和外部压力，保守党内再也沉不住气了。党内和政府内反响强烈，许多人不顾首相的面子，纷纷谴责帕金森的卑劣行径给保守党脸上抹黑，这样的人再担任党的领袖和政府要职，无疑辱没了本党和政府的名声，直至给保守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在内外声讨下，帕金森纵然才华横溢，纵然有“铁女人”为他撑腰，也难挽狂澜。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帕金森感到只有引咎辞职，以谢国人一途了。于是，这位昔日在英国政坛上纵横驰骋，在保守党内被人青眼有加的“风流”大臣，只好认命了。他怀着悔恨交加的心情，向一向器重他的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了辞呈。撒切尔夫人此时也是百感交集，眼看着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党内英才”顷刻间因为女人问题搞得声名狼籍，并且使本党清誉蒙受巨大损害，怎能不令她痛惜不已呢？回想起帕金森为本党竞选和自己连任的耿耿忠心、横溢的才华，又怎能不使她万分难过呢？然而，事已至此，无路可走了，只有“挥泪斩马谕”，以平息愈来愈烈的倒帕风潮了。于是，这位“女强人”忍痛接受了帕金森的辞职。

帕金森辞职一周后，在他的乡间别墅里对记者发表告别谈话时说：“我现在的愿望是，同妻子和家人一起重建美好的生活。我不打算辞去议员的职务。”这位显赫一时的内阁重臣，保守党的宠儿，尽管遭此波折后，没有以前那样的心胸万丈了，然而，从其对记者谈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虽然今日他抱恨而归，以后还会寻找机会，以图东山再起的。

英国舆论认为，首相撒切尔夫人作出支持帕金森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这不仅使帕氏本人不能知难而退，而且撒切尔夫人本人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

了损害。也使整个保守党受到了损害，因为“帕金森事件”使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年会上的报告黯然失色，并使4个月前在选中赢得的胜利失去了许多光彩。无疑，这是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所遭到的众多挫折中，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个。

#### 东山再起 知难而退

帕金森挂冠离去后，并没有从此归隐田园，抱负全失。相反，重返政治舞台，以雪昔日耻辱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他时刻窥测着英国政坛的走向，伺机复出。这4年期间，他又暗中出力，为撒切尔夫人的第三次连任再立新功。撒切尔夫人呢？她对帕金森也始终关注，尤其念念不忘帕氏的忠心与才干，也在待机起用他。自己这次第三次连任首相，帕金森不仅没有袖手旁观，相反，在暗中鼎力相助，屡建奇功，为保守党赢得了大量选民。保守党内一些人也呼吁帕金森复出。撒切尔夫人考虑再三，决定让他出任内阁中的能源大臣。

1987年4月12日，即保守党在11日大选中赢得“三连任”的第二天，56岁的帕金森突然同撒切尔等保守党要员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在电视上公开露面，但见帕金森春风满面，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似乎早已把4年前不光彩的桃色丑闻忘得一干二净了。

然而，英国的公众对帕氏4年前的丑闻却记忆犹新。他在电视上一露面，立刻引起了许多观众的注意和议论，许多人推测着，这位“风流大臣”可能又要东山再起了。尤为敏感的新闻界更是无孔不入，又连篇累牍地把帕金森4年前的丑闻端了出来，同时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帕金森面对如此难以“忘记”自己的新闻界和社会公众，只好自认时运不济，命运多乖，又一次痛苦地知难而退。撒切尔夫人呢？眼看帕金森就要东山再起，却又一次功败垂成，其懊恼心情，可想而知。

英国舆论界认为：帕金森几乎复出，原因有三：一是此人才智超群，不是等闲之辈，深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垂青；二是帕金森为几届保守党大选尤其是第三次大选效尽犬马之劳，其功不可灭，其诚可感。保守党应该“知恩图报”，否则“会冷了弟兄们的心”。三是撒切尔夫人着眼于“大节”用人，不是清教徒式的人物，遇到诸如此类的桃色事件，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起桃色事件，帕金森本人可能已登上了通往首相宝座阶梯的外交大臣一级，向撒切尔夫人接班人的地位前进了。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英国报界那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无冕之王”，即使凯伊丝有通天的本领，也难以向帕金森这样的政治权贵挑战，更不用说诉诸舆论把帕金森赶下台

## 聪明反被聪明误才子竟中骗子计——英国保守党副主席阿切尔的桃色丑闻

### 一、妓女电话主席惊魂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英国保守党副主席杰弗里·阿切尔仰靠在办公室舒适的高靠背转椅上，嘴里叼着一支硕大的雪茄，正同自己年轻貌美的女秘书侃侃而谈。整个办公室烟雾缭绕，充满了浓烈呛人的烟味。可女秘书仍然两手托着自己的双腮，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阿切尔，听他滔滔不绝地抒发着满腹经纶。她对这位被人誉为“德才兼备，精明能干”的才子有着一一种强烈的崇拜心理，常常觉得自己同他哪怕是闲谈片刻，也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阿切尔也愿意在年轻女子面前展示才华，尤其同这位貌美、又善解人意的女秘书谈话，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感。

女秘书被阿切尔的高谈阔论深深地吸引住了。阿切尔更加豪情大发，刚刚抒发完对英国政坛的见解，又语锋一转，谈起了文学问题。他说：“其实文学与政治有时也有惊人的联系。我就喜欢写政治小说，我在文坛捉刀多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还是《平等者中间的第一名》。这里边我写了四位政客，其中三个人身上均不干净，四人中只有一人洁身自好，其实这个人就是我的自画像”。女秘书也曾看过这部颇为畅销的小说，今天听了阿切尔本人的话，她对她的上司越发尊敬了。阿切尔还想和女秘书谈他的另一部作品《名誉问题》，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铃铃……”地响了起来。女秘书拿起了电话：“您好，这是阿切尔先生的办公室。”只听见话筒里传出了一个娇生娇气的声音：“我是阿切尔的朋友，请他本人接电话。”女秘书把话筒递给了阿切尔。

阿切尔接过电话，话筒里传出一声“我最亲爱的”，把阿切尔叫得甜滋滋的，美不可言。只见他脸上忽然泛起了红光，领上的两条皱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他显然很激动，很兴奋。他以爽朗的声音和对方攀谈着，可是讲着讲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那张表情丰富的脸变得呆板起来，只见他两眼发直，双眉紧锁，面部红一阵白一阵不停的抽动着，领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这位素以能言善辩、口齿伶俐闻名的才子，此时居然说不出一个字来。猛然间，他象被人在头上浇了一盆凉水，打了个冷颤，冷漠地一字一句说：“你遇到的那个人不是我，长像可能像我，但不是我，你一定要咬定那个人不是我，否则，传扬开来，那还了得……”。他还想再说下去，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像一滩烂泥，瘫坐在沙发上，呆若木鸡。

是什么事情使这位羽翼渐丰、驰骋政坛的保守党副主席魂惊魄动？原来，阿切尔同伦敦一个妓女有染，这个妓女名叫莫尼卡·科夫兰，天生一副美人胚子，妖艳迷人。阿切尔与此人已有染多年，这个电话就是她打来的。她惊慌失措地告诉阿切尔，她的一个嫖客、名叫库尔塔的律师威胁要把她同阿切尔的“特殊关系”泄露给报界。

阿切尔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着实魂惊天外。在英国，人们对待性问题比较开放，一般人在合法婚姻外另有男女私情，也很少受到谴责，因为英国人坚信，这是个人之间的私事，但高官政客一旦与女人有染，则非同小可。按英国的传统政治观念，政治家必须德才兼备，有才而无德，连自己都管不了，何以治天下人。所以，政客们出现桃色丑闻，公众和舆论绝不会宽容他们，非把他们轰下台不可。阿切尔作为一党副帅，深得首相撒切尔夫人赏识，前途无量，若桃色丑闻曝光，自己的一生岂不栽在一个女人手里！这怎能不

令阿切尔心惊胆颤呢？

## 二、文学才子政治明星

阿切尔时年 46 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毕业于享有世界声誉的古老学府——牛津大学。在大学期间，阿切尔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尤其擅长文学，具有文学天赋。1974 年，阿切尔参股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倒闭，他发迹的美梦没有作成，反而破了产，负债达数十万英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然而，阿切尔毕竟不是懦弱无能之辈，他生性争强好胜，胆略过人。他决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写出几部畅销小说，这样既可以偿还债务，解除囊中羞涩之苦，又可成名于文坛，名利双收。于是，他在贫困交加中，开始了艰苦的文学创作。功夫不负有心人，1974 年，阿切尔终于出版了一部名为《一个便士不多，一个便士不少》的小说。这部小说很快成了畅销书，一印再印，一版再版，他也因此而一举成名。此后，他继续写作，陆续出版了五部小说，均成为抢手货，挤身英国出版的最畅销小说的行列，轰动了文坛，他随之也成力英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阿切尔拥有了众多的崇拜者，英国的许多著名作家也称他是文坛奇才。此后，阿切尔家中门庭若市，请他写书的出版商进进出出，令他应接不暇。就这样，阿切尔依靠数百万英镑的收入，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还当上了百万富翁。

阿切尔不但是位文学奇才，而且还精于政道。他 29 岁时，已任英国国会保守党议员，成为当时英国政坛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年轻“政治明星”。在官场上，他目睹了英国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对政治权术更加精通，拉笼党徒，讨好高官是他的拿手好戏。尤其是，阿切尔在政治哲学上有意与撒切尔夫人靠拢，表现出撒切尔主义的忠实捍卫者的形象。他凭借自己的文学特长，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宣传保守党的政策，拥护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政策，得到了本党同僚们的好评，也深得撒切尔夫人的赏识。从此，撒切尔夫人对阿切尔格外关切，准备时机成熟，即委以重任。

1985 年 9 月，阿切尔在政治上交了好运，撒切尔夫人一手提拔他担任保守党副主席。这是连阿切尔本人都没想到的。原来，1983 年，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因为与女秘书凯伊丝的桃色丑闻曝光，在舆论的压力下，饮恨挂冠。帕金森的下台，无疑使撒切尔夫人失去了一只得力的臂膀。撒切尔夫人忍痛含悲，表面上若无其事，不露声色，而在暗中却开始物色帕金森的接班人了。这次撒切尔夫人十分谨慎，她准备挑选一个新的得力助手，开创保守党工作的新局面，恢复被帕金森玷污了的保守党的清誉。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阿切尔。撒切尔夫人曾不止一次地称赞阿切尔是位“德才兼备，聪明能干，年富力强的”人物，提拔他任党的副主席，党内几乎无人反对，公众舆论也是一片赞许。此时的阿切尔踌躇满志，心想：这次可真要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了。然而，有谁能料到：这位文学才子，政治明星，却和“风流大臣”帕金森一样，是一个不争气的“风流才子”呢？

## 三、陷入圈套饮恨政坛

阿切尔自接到莫尼卡·科夫兰那令人惊悚的电话后，整日坐立不安，彻夜难眠。他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因桃色丑闻狼狈下台的情景，每想至此，他便不寒而栗。办公室里再也听不到他侃侃而谈的声音了。女秘书见他一副无精打采、魂不守舍的样子，也不敢多问。该怎么办？怎么办？阿切尔在想着对策。千万不能栽在女人手里，不然，我的前程就全完了。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10月23日傍晚，心急如焚的阿切尔悄悄打电话给莫尼卡，让她去国外旅游，避避风头，一切费用由他负担，并约好第二天上午11点钟，他派一个好友去维多利亚火车站第三进站口给她送钱。莫尼卡娇滴滴地答应了。阿切尔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先让莫尼卡出去躲躲风头，然后再慢慢施展对策，堵住她和那个嫖客库尔塔律师的嘴。“有钱能使鬼推磨”。想到此，阿切尔就好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得意地笑了。然而，素来聪明过人，善于交际的阿切尔，此时此刻就象一个糊涂虫，他哪里知道，他煞费苦心安排的这场戏竟是由别人导演的呢？

原来，那个叫库尔塔律师是妓女莫尼卡的常客，他从莫尼卡嘴里得知，大名鼎鼎的保守党副主席阿切尔与莫尼卡有染，这可真是天赐良机。狡猾的库尔塔想到，把这样的大人物的桃色丑闻捅给报界，不仅可以使保守党难堪出丑，而且自己还可以捞到一大笔钱。于是，他打算同莫尼卡合作，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妓女莫尼卡只知道赚钱，不问手段，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库尔塔串通莫尼卡布下了“迷魂阵”。先是由莫尼卡给阿切尔打电话，让阿切尔陷入圈套，然后再引“蛇”出洞，令其出丑。

库尔塔律师得知“蛇”要出洞的消息，兴奋异常，马上拨通了英国《世界新闻》社的电话。记者们接到“情报”，都争着要去“现场采访”，这样的独家新闻，哪一个不想立功。

10月24日上午11点整。维多利亚火车站，人流不息。在第三进站口，一位中等个头的青年男子在独自徘徊，他手里拎着一个精制的小皮箱，两眼不时的四下张望。此人就是阿切尔派来的心腹，（我们就称他A君吧）他是按预订计划，给莫尼卡送钱来的。就在这时，一个浓装艳抹，行为轻挑，举止放荡的女人也出现在进站口。A君认定此人就是莫尼卡，于是快步走上前去，互相打过招呼之后，A君就把一笔巨款递给莫尼卡，同时，还对莫尼卡说着什么……此项行动，阿切尔自以为万无一失，A君自然也没有防备。然而。《世界新闻》的记者早已等候在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瞄准了这场精彩的表演，咔嚓咔嚓地拍下了给莫尼卡送钱的每一个镜头，还录了音……

10月26日清晨，一家发行量占全国第一的英国黄色报纸，以头三版整版篇幅刊登长文和巨幅照片，把这位正青云直上的政治明星的桃色事件原原本本、绘声绘色地和盘端了出来。这一爆炸性新闻顷刻间轰动了首都伦敦，人们在街头、地铁和公共汽车站纷纷抢购报纸，不多时便闹得满城风雨，家喻户晓。人们议论纷纷：“阿切尔平时道貌岸然，像个正人君子，原来竟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真荒唐，真丢人！”“保守党内桃色丑闻多，真是物以类聚！”

直到此时，这位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才自知落入了圈套，追悔莫及。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刚打就不得不收场了。此时的伦敦城，舆论哗然，阿切尔则急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他瘫坐在沙发上，两眼盯着红色地毯发呆。自己最怕发生的事发生了。在妓女面前栽跟头，真是丢人现眼。他又想起了前党主席帕金森被轰下台的狼狈场景，不由的打了个冷颤。然而，阿切尔生性争强好胜，岂肯轻易认输？他坚决否认与莫尼卡“有染”，并一口咬定，他从来不知道莫尼卡这个人，更没有见过那个莫尼卡。但是人证物证俱在，阿切尔纵有伶牙俐齿，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了，一再辩解，反而欲盖弥彰。最后，这位被撒切尔夫人称为“德才兼备，聪明能干，年富力强”的保守党副主席只好无可奈何的承认自己“愚蠢”，“上了圈套”，在当天灰溜溜地

辞职了。

阿切尔挂冠政坛，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心情如何呢？她这次虽没有“护短”，但心里既惊讶，又可惜，又感到难过。惊讶的是自己又一次看走了眼，这个白面书生竟也在女人身上出事；可惜的是，阿切尔聪明能干，年富力强，失去他，自己又少了一只得力的臂膀；难过的是，撒切尔夫人一年前重用阿切尔，本来想要他要出力洗清被帕金森桃色丑闻玷污的保守党的形象，开创保守党工作的新局面，谁知这位文学才子、政治明星与帕金森一样，只会在党的信誉簿上胡涂乱抹！

#### 四、自我画像徒增笑柄

前面说过，阿切尔不仅是一位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而且还是当今名噪一时的小说家。他因破产负债而立志写作，终于成名于文坛，赢得了“文学才子”的美称。1984年，阿切尔出版了一本政治小说《平等者中间的第一名》，颇受读者欢迎。该书生动地描绘了保守党和工党各有两名议员，处心积虑地投机钻营，争当首相的故事。在这4个政客中，除了以阿切尔本人为模特的一个人外，那三个人都不干净。后来，这部小说被拍成了电视系列片。其中的第三集重点刻画一名花花公子般的工党议员嫖女人后不认帐，最后硬是以大把大把的金钱堵住了妓女和一个知情者的嘴。阿切尔这位“文学才子”好象有先见之明，他描写的这种情况，同他本人的桃色丑闻是何等相似！阿切尔的桃色丑闻曝光后，人们议论纷纷：“这类事情发生在保守党内不足为奇，何况阿切尔早有自画像了。”一时间，阿切尔自画像作为笑料，传扬开来。真是：自我画像，惟妙惟肖，引火烧身，徒增笑柄。

阿切尔还有一本得意之作，叫做《名誉问题》，深受读者欢迎。从作品里，人们会认为，作者阿切尔一定是一个视名誉如生命的高尚之辈。然而，谁又曾料到，这位政治明星正是因为名誉问题才饮恨政坛，断送了前程呢？

阿切尔下台后，仍于心不甘，他聘请了律师控告库尔塔等侵犯了自己的名誉，经过反复较量，终于胜诉，恢复了“名誉”，只是英国政坛此类桃色丑闻司空见惯，又有谁会认真对待那一套呢？阿切尔又对自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英国舆论认为，自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因桃色丑闻下台后，副主席阿切尔再步后尘，这无疑对保守党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保守党的信誉簿上让这些党魁们越描越黑。同时，撒切尔夫人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了损害。撒切尔夫人不是请教徒式的人物，她用人不拘“小节”，总是着眼于“大节”，然而，英国是一个重传统、重经验的民族，政治家必须德才兼备，这是英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撒切尔夫人的用人之道，与英国人的政治传统是不合拍的，经过这两起桃色丑闻，撒切尔夫人是否应该猛醒呢？

## 三次出山意欲入主白宫一夜风流痛失问鼎良机——加里·哈特绯闻大曝光

加里·哈特，这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有点陌生。但对美国人来说恐怕是家喻户晓。这不仅是因为哈特由于善于开展“政治游击战”一度名震美国政坛，更多的是因为他与女模特儿唐娜·赖斯之间的“不检点行为”曾在美国引起轰动。时至今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旅游业者还把哈特和赖斯的“幽会之处”列为他们所举办的“华府丑闻之旅”中的关键性一站。

### 投身仕途异军突起

加里·哈特（原名加里·哈特彭斯，1961年始用现名）于1936年11月28日出生于美国西部堪萨斯州的小城渥太华。其家境贫寒，父亲是个普通的运油卡车司机，母亲是位平凡的学校教师。他年轻时曾在铁路上谋生干活，后来才到俄克拉何马州一所基督教学院就读。60年代初，转入耶鲁神学院，潜心攻读法律。此时，一改过去打算成为一名哲学教授的人生目标，决心投身仕途，以显壮志才华。

1960年，他作为一位自愿服务人员参加了约翰·肯尼迪的竞选班子，开始步入政治生涯。1964年，他从那鲁大学学成毕业，旋即在约翰逊政府内谋一公职——担任司法部民权事务律师。1968年投靠到他“倾心崇拜”的民主党人罗伯特·肯尼迪的门下，积极协助肯尼迪竞选总统。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死后，为了寻找新的“政治机会”，哈特于1970年改换师门，转而帮助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因工作卖力，他被提升为麦戈文总统竞选班子的“总管”。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麦戈文得以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首战告捷，然后脱颖而出，最后赢得了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1974年，哈特利用在协助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麦戈文总统竞选中所获得的经验，正式加入科罗拉多州美国参议员的竞选行列。不出所料，旗开得胜。这一成功使他在通往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政治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这时，他才38岁。其后，哈特在参议院内的影响不断扩大，被认为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和“革新”的政治家，一跃成为国会中公认的“新自由派”的代表人物。1980年，他又历经艰难角逐，蝉联美国参议员。从此以后，他便积极探索问鼎白宫的新途径。

1984年，哈特首次打出竞选美国总统的旗帜。在一无强有力的竞选班子，二无充足的竞选经费的情况下，他决定采取“攻破一点，影响全局”的竞选策略，以图开创美国总统竞选史上的新范例。于是，他把主要财力和人力集中在被称之为美国总统竞选“晴雨表”的衣阿华和新罕布什尔两个率先预选的州内。果然，他的竞选策略成效显著。在预选前，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他的选民从未超过5%，俱到衣阿华州投票时，他已获得了15%的支持。由过去在民主党的主要竞争者中“根本排不上号”，一跃而居第二。到新罕布什尔州投票揭晓时，他竟然打败了民主党内的主要候选人蒙代尔，获40%的支持，得了“金牌”，成为轰动一时的“黑马”。等到“超级星期二”的预选后，他已正式成了“全国性的候选人”。只是因为其它州竞选失利，他最终未能获得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这次竞选中，他虽然未能如愿以偿，并因竞选而负债100多万美元，但他在全国的知名度却由此大大提高，获得了“牛仔游击手”的美誉。

### 政治明星滑落谷底

为了实现入主白宫夙愿，他打算卷土重来，力图在1988年总统竞选中

再展雄风。1987年1月，他任满两届参议员后，毅然离开了参议院，于同年4月13日，在科罗拉多的丹佛正式宣布角逐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时，民主党内包括哈特已有6人宣布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为了赢得竞选的胜利，他再一次标新立意地声称，他将“以新的方向和思想来重建美国”。其实，早在1984年总统竞选中，他就打出了“新观念”“新领导”“代表未来”等旗号。于今，他开始进一步对他的这套理论作新的补充。他在他的《顺利的起点》、《新民主》等专著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观点，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新思想”。由于哈特早已为人所知，加上又有颇具感召力的“新思想”作护身，因此，他这次一登场，便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在几次民意测验中，他通常能获得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中大约45%的支持，而居第二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只不过获百分之十几的支持。这说明，哈特在民主党内角逐1988年总统候选人的“群星并起”的局面中已成了一颗“遥遥领先的政治明星”。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哈特春风得意之时，1988年5月3日，《迈阿密先驱报》刊登了一条关于加里·哈特和一位29岁的女演员兼模特儿唐娜·赖斯“共度春宵”的绯闻。不久，美国各家报纸竞相转载这一报道。顷刻间，哈特的私生活问题成了美国新闻媒介的头号新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据《迈阿密先驱报》的负责人说，他们根据一个匿名电话所提供的线索，开始对哈特和赖斯的关系进行跟踪。5月1日晚间，该报派出几名记者轮流埋伏在哈特在华盛顿的住宅门前监视（当晚，哈特夫人不在华盛顿）。他们看到赖斯进入住宅，一直到第二天白天尚未见她出来。于是，他们就以此为题，写了上述报道。事后，哈特和赖斯矢口否认关于他们“一同过了一夜”的传闻，并对5月1日晚发生的事作了详细说明。他们说，那天晚上赖斯是同另外一男一女一起到哈特家的。当他们发现门口有人监视后，赖斯和另二位拜访者就迅速从后门离开了哈特家。对此，那位拜访的男客人（一位律师）也作了旁证。

尽管如此，在美国公众中，关于哈特与赖斯有不正常的性关系的流言蜚语却日益增多。据说，在1988年3月，哈特和赖斯与另外一男（已婚）一女（独身）“一起航行”到巴哈马，去验收一条正在比米尼岛上修理的游艇时，他们俩人就在比米尼岛上过了夜。虽然哈特声称他和赖斯不在“同一条船上”，虽然这四位当事人“都坚持说没有发生任何不体面的事情”，然而，由于哈特同他妻子李·哈特自结婚以来的“恩恩怨怨”，以及关于哈特的“不忠行为”和“喜好女色”的传言，再加上正在流行的绯闻，所有这一切使得许多美国人“相信哈特确实有过私通之事”。这就是为什么1987年5月6日，哈特在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遇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充满敌意的质询”。有人问哈特：“你是否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是的”“你是否与别人有过私通？”哈特十分尴尬他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就在哈特因赖斯事件被弄得焦虑不安之时，《华盛顿邮报》又刊登了哈特的另一桩婚外传闻。1988年5月6日晚，该报记者告诉哈特的一个竞选工作助手，说他们根据一个“匿名的来源”所提供的线索，经“有效地证实”，已掌握了哈特同华盛顿的另一个女人有暧昧关系的“确凿证据”，并要求立刻向哈特当面采访。这真是祸不单行。

在舆论的交相攻击之下，哈特已清楚地意识到争取总统竞选提名的形势



对他已越来越不利。5月7日，他决定放弃正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的竞选活动，无可奈何地飞回到了丹佛。当天，他的竞选总部宣布了哈特暂停竞选活动的消息。5月8日，哈特在他妻子李·哈特的陪同下，在丹佛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他已决定退出竞选。其理由是他不愿意让他的家庭、朋友和他本人进一步受到“谣言和流言蜚语的伤害”。接着，他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报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我们必须对这个国家选择政府首脑的体制提出严肃的批评，它使这个国家的新闻界降到了猎人的地位，而总统候选人则成为其猎物；它使记者们藏身灌木丛中，编造不确切的虚假故事；它使照像师们窥测于我们的窗户之间，成群的直升飞机则在房顶上盘旋。我的非常坚毅的妻子也为之落泪，因为她没有一次不在受到侵扰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住房”。不过，他也承认，他与赖斯之间有“不检点行为”。

#### 东山再起在却难逃

1988年5月8日，加里·哈特作出痛苦的抉择后，便开始和他的妻子过起了“政治流放生活”。难道一颗曾大有摘取白宫总统宝座之势的“政治明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殒落”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哈特作为一个职业政客，是决不会轻易结束他那曾一度光辉灿烂的政治生涯的。

事实上，他退出竞选后，仍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全国的竞选形势。据报道，他和他的妻子在长达7个月的“政治流放生活”中，他们俩的谈话“没有一天不涉及到这个话题”。开始，哈特只希望对总统竞选施加影响。他自己说春天他“退出竞选时”，原以为民主党内会有“其它有名望的领导人将加入竞选”，并“期望”他的“有关战略投资、军事改革和明智地卷入的思想会被他们采纳和宣扬，但7个月过去了。两者都没有发生”。于是，他想到了东山再起。

在哈特看来，当时全国的竞选形势仍对他较为有利。首先，在民主党阵营内，自哈特退出竞选后，由于没有哪一个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者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呈现出了“门户空前开放”的局面。其次，据美国盖普洛研究所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有68%的美国人认为报界对哈特是“不公正的”。这说明美国“选民们并没有忘记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特在他朋友的鼓励下决定“重新走上国家的舞台”。

“在美国，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在他身边的妻子谨慎的、忠诚的、有时是勉强的微笑，那就一事无成。”哈特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因此，他这次出山的第一步就是要争得他的妻子李·哈特的完全同意和支持。据哈特说，在一个“星期天晚上，全家人都聚在一起。我对李解释说，我不能再等了，我应该重新参加总统竞选，不然的话，我可能会遗憾一辈子的。而且，只要我们大家都对所有那些将会突然出现的流言蜚语不予理会，我就可以重新参加竞选。她考虑再三，然后回答说：‘同意，我们去参加竞选吧’。”显然，哈特这次希望“以他的家庭为中心，特别是以李为中心”，再次在美国展开“一场政治游击战”，“再演一次美国政治闹剧”。

1987年12月15日，哈特在7个月之后，在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宣布：他将重新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角逐。他在演说中毫不隐讳他说，他曾与唐娜·赖斯“干了一件蠢事。但这纯粹是私事，与旁人无关。”接着，他含沙射影地攻击里根政府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他说：“重要的是我没有犯法，我从来没有向国会撒谎，更没有销毁过任何文件”。并一再声称，“我有他人没有的，而又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新方向、新思想”，最后，他慷

慨激昂他说，现在他和其他几位候选人不同，“一无竞选班子（早已解散）、二无竞选经费（他还欠债 100 万美元，所募集的经费不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的 1%）”，所以，他只能走上街头，面对选民，“让人民来决定”他是否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哈特宣布重新参加竞选后，美国舆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一些美国人认为，哈特的通奸行为固然不足取，但是他在事后毫无隐瞒地向选民作出说明，其诚恳、坦率可嘉。因此，他们不仅赞赏哈特的才华和智慧，更钦佩他的意志和勇气，表示支持哈特竞选总统。据美国广播公司 1987 年 12 月的民意测验，这部分人在全国民主党选民中占有 30%，虽然比过去低了 15%，但仍比支持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高。这证明哈特仍不失在民主党候选人中“居领先地位”。然而，也有许多美国人指责说，哈特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幽灵”。新闻界也视哈特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开心解烦的笑柄。他们再次掀起了一股嘲弄、讥讽哈特的热潮。有所谓“哈特复出，笑话一箩”之说。例如，华盛顿谐星施特劳斯在他特地为哈特所编的一个政治笑话中说：“如果哈特当选总统，我们就在白宫建造一系列新的厢房，供第一、第二、第三夫人使用”。这就是说，5 月绯闻仍在许多美国人的记忆之中。无怪乎，在上述同一次民意测验中有 36% 的选民投了否定哈特的票。

更令哈特难堪的是，民主党内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也对哈特的复出大加责难。民主党主席考克指责哈特“把个人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前科罗拉多州长将哈特比作是“在合家团聚时出现在门口的私生子”。至于该党的其他总统候选人对哈特的举动更是震惊和愤慨。殊不知，这几位候选人原本在全国的声望不著，正当他们力图引人注目，招徕选票之时，哈特却又“爬”了出来，把新闻界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在许多民主党人的眼里，哈特由于绯闻的影响，根本没有当选总统的可能。因此，他们称哈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腥汤之鱼。

然而，哈特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仍在继续使用各种招术，以图争取公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1988 年 1 月 10 日，他在一次记者采访他时说，假如他当选，“决不会成为白宫中的第一个偷情者”。当有民意测验把他列入“选不上”的竞选人名单时，他乖巧他说：“我不想谈民意测验。民意测验令人厌烦。”好似他还有什么绝招没有使出来。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亲临前线擂鼓助阵。他们“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来为哈特的错误辩解，并责怪新闻记者不该为了猎取耸人听闻的消息而一再“侵犯政治人物的隐私权”。

不管哈特的竞选策略如何高明，也不管他的思想如何新鲜，然而，大多数的美国选民并没有忘记他的“不检点行为”，他们希望选的是一个“清清白白”的总统。1988 年 2 月 8 日，在衣阿华州首开 1988 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初选中，哈特出师不利，仅得该州民主党出席预选会议者中的 1% 的支持。接着，2 月 16 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他又一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坐上了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中的末把交椅。此后，他在其它州的预选中获得的票数“越来越少”。最后，被迫“结束这次被挫败的竞争”。1988 年 3 月 11 日，他在丹佛声泪俱下地对新闻记者说“我所到了公正的声音。这是公众的决定。现在，我显然不必继续往前走了。”

## 令人侧目的婚礼——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的桃色丑闻

1989年7月13日晚8点30分，雅典近郊的小城波利特伊雅，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开到了教堂的大门口。一个保镖先跳下车，扶出了战战兢兢、两腿发软的新郎。这位新郎就是希腊前总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时年71岁，已是4个孩子的父亲、两个孙子的爷爷。跟着新娘也出现了。她就是比他小一多半、芳龄34岁，被他昵称为“咪咪”的航空小姐迪·米特拉·莉娅妮。为了她，一个美满的家庭拆散了，为了她，帕潘德里欧声名狼藉。

### 继承父业政途坎坷

1919年2月5日，帕潘德里欧出生在希腊的希俄斯岛。其父乔治·帕潘德里欧是颇有声望的政治家，曾任中间派联盟的主席，并于1944年、1963年和1964年3次出任首相，在希腊现代史上有一席之地。

帕潘德里欧从小随家人迁居首都雅典，毕业于雅典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他常参加激进青年组织的政治活动，发表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1938年，在梅塔克萨斯右翼专政处于高潮时期，他遭到通缉，便逃亡美国。1944年他取得美国国籍。侨居美国期间，他曾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51年，他同一位美国姑娘结婚。1947年至1961年先后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西北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教授等职。

帕潘德里欧决心走他父亲的道路。1961年，他放弃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职务，返回希腊，加入了他父亲领导的中间派联盟。1964年，他当选为中间派联盟议员，先后任首相国务秘书和经济协调部副大臣等职。1967年4月希腊发生军事政变。军政权指责他在“盾牌”事件中图谋叛国，将他逮捕。因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为他说情，才得获释。之后他流亡国外，先后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加拿大约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在此期间，他的激进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开始批评他父亲的一些观点。1968年到1974年，他召集一部分反对军政权的骨干分子，成立了“全希腊解放运动”组织，自任主席，积极开展活动。他以亲身经历揭露和控诉军政权，呼吁人民起来推翻其统治。

1974年希腊军政权垮台，帕潘德里欧再度回到祖国。同年他在“全希腊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吸收了“自由中间派联盟”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左派”，创建了“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简称“全希社运”）。全希社运在创建之初势寡力弱，在军政权垮台后的第一次大选中在议会300个议席中仅占12席。但帕潘德里欧及时察觉到70年代希腊青年从右向左转的情绪，提出了轰动一时的口号：退出北约，不要欧洲共同体，撤销美国在希腊的军事基地，对土耳其实行强硬政策等。这些口号果然收效甚大。在1977年第二次大选中，全希社运势力大增，一跃而为仅次于新民主党的希腊第二大党，在议会中获93席。随着1981年大选的日益迫近，他把握选民“思变”的情绪，在有关希腊内政、外交的敏感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与执政的新民主党截然不同的方针和口号，向新民主党发起了全面攻势。

他的主张赢得了群众，结果全希社运上台执政。1981年11月21日，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的希腊新政府正式宣誓就职。他独揽军政大权，既当总理，又兼国防部长。内阁的其他一些主要成员，几乎都是他的故友和多年的老同事。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仅50岁，是希腊历史上最年轻的一届政府。

1985年，帕潘德里欧领导的全希社运在大选中再次获胜，继续作为执政党领导希腊。帕潘德里欧确立了自己在希腊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然而，作为执政党领袖的帕潘德里欧，在胜利面前，不是励精图治，努力实现对选民的承诺，改变国家巨额财政和经常项目收支双赤字问题，而是沉溺于金钱和女色之中。他对政府高级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采取纵容态度，自己也接受巨额贿赂，特别使人震惊的是，年届古稀的帕潘德里欧不甘年迈，偏爱风流，同一个比他小一半多的航空小姐莉娅妮相识后，一见钟情，坠入婚外恋的泥潭。此事公开后，帕氏声名狼藉，威信一落千丈。

#### 邂逅艳女坠入情网

1986年，66岁的帕潘德里欧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专机上与一位身高1.81米的丰满而性感的空中小姐相识。这位女中尤物名叫迪米特拉·莉娅妮，帕潘德里欧呢称她为“咪咪”。

咪咪是一位将军的女儿，1976年（21岁时）考入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莉娅妮身材窈窕，面似桃花，这位金发女郎以她的美丽、大胆、性感、爱挑逗男人等非凡的举止风姿，令无数男人为之折腰。她还常让她的男友拍无上装照，风姿婀娜，极富魅力，被称为“甜蜜的野兽”。后来她被公司挑中，专门在客机上为达官贵人服务。

帕潘德里欧对这位美人可谓是一见钟情，如痴如醉。自从迷上这位美人之后，就和那位跟他同甘共苦35年的美国夫人疏远了。1986年，帕潘德里欧到墨西哥参加世界裁军会议，在旅馆和咪咪幽会，被他的夫人撞见。这位总理夫人深明大义，不让丑事外扬，而总理先生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与咪咪的关系公开化，不断在公众场合露面，并一起搬到一家雅典旅馆同居。1987年和1988年夏天，帕潘德里欧两次公开带她到风光绮丽的爱琴海旅游。他甚至毫无顾忌地冒舆论之大不韪，正式通知雅典外交界人士从1988年6月起，他不再一定要他的配偶被邀请一起去参加同一个招待会。

1988年8月，帕潘德里欧前往英国伦敦接受心脏手术，他没有要夫人同行，却带咪咪作伴。在等待手术时，他宣布在返国之后，将跟与他结婚近40年的妻子离婚。而那位咪咪小姐呢，则一如既往，毫不再乎。为了显示她的存在，她不再回避记者的追踪，公开在帕潘德里欧下榻的旅馆接受记者的访问，甚至以总理夫人自居，向伦敦一家电台宣布她的一个心愿：返回希腊时，在雅典机场，她将和总理并肩走下飞机，接受欢迎人群的鲜花和祝福。

帕潘德里欧还不顾外交礼节，公开带着他的情妇咪咪小姐出席国际会议，会见外国客人。在国际上也闹得满城风雨，使希腊人民蒙上了羞耻。

1988年12月，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雅典罗多斯宫举行。各国首脑知道帕潘德里欧与咪咪的不正常关系，都有意识地不带夫人，以免出现尴尬局面。而帕氏却骄傲地带着他那身穿迷你裙、脚戴金链的咪咪出席记者招待会。更为甚者，帕潘德里欧还带着他的情人咪咪一起接见来希腊访问的塞浦路斯外长艾克托夫和美国国务卿贝克。这种置外交礼节而不顾的行为，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感到震惊和尴尬。

#### 舆论谴责大选失败

帕潘德里欧金屋藏娇，疏忽职守和他的新欢招摇过市的行为，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当希腊刚刚出现总理和一位年轻貌美的空中小姐相恋，双双坠入情网的传闻时，一些拥护总理的人，特别是全希社运的成员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造谣诽谤，是要保守派重新上台。然而当帕氏与咪咪的关系逐步公开化，报纸上差不多每天都有有关总理和他的情妇的报道后，他的支持者也开始指

责他了。他们对帕潘德里欧能否继续“担大旗”，把党内各派团结在他的麾下，表示怀疑和忧虑。希腊左派报纸《AVGI》在报上公开提问说：“如果英国撒切尔夫人带了一个年轻的拳击手，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总理带来了一个王宫的宫女，戈尔巴乔夫带一位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手牵手地到希腊来，我们将如何接待？”

帕潘德里欧的桃色丑闻及其政府大批高级官员涉嫌侵吞国家巨款和贩卖武器等经济丑闻败露后，全希社运政府遭到反对党的同声谴责，国内最大的反对党新民党抓住时机，指责他沉溺于美色、不理政事，使国家面临巨大危险，因此他们要求提前进行大选。并表示如果新民党上台，将对全希社运政府官员的种种丑闻进行彻底调查，一旦发现证据，不管其职位曾经有多高，都将绳之以法。

美国的《时代》杂志和西德的《明镜》周刊，也披露了帕潘德里欧的秘密，在国际上也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国家时领导人对帕氏的婚外恋极为鄙视，影响了全希社运在国际上的威望。法国总统密特朗本应去希腊接受某大学授予的名誉政治博士学位，当他听说该大学不能保证咪咪不出席时，便拒绝了这一荣誉头衔。希腊邀请戈尔巴乔夫失去访问，但请了3年，苏方一直未给予正式答复。因为这事牵涉到戈尔巴乔夫夫人赖沙到希腊时，究竟由谁来陪同，是夫人，还是情妇？

帕潘德里欧与咪咪的婚外情更激起了家人的反对和愤怒。帕氏的发妻已经67岁。她出生在美国，出生时取名玛格丽特·钱特。她和帕潘德里欧邂逅于一个牙医诊所。当时她是明尼苏达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还在经营自己的公共关系公司。而帕氏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经济学。他们1951年结婚，住在加利福尼亚。当帕氏决定回希腊从政时，她跟他于1961年到雅典定居。这以后，玛格丽特·钱特成了希腊著名的热衷女权运动的活动家。在希腊，这位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女性经常在乡村广场上、工人聚居的郊外、酒馆、迪斯科酒吧和筹措资金的宴会上向人们发表演讲。她是希腊妇女联合会主席，深受国民的尊敬和爱戴。近40年来，无论喜与忧、甘与苦，她都跟随着帕潘德里欧。他们有4个孩子，两个孙子。长子乔治·帕潘德里欧任希腊教育部长。在父母的婚变中，4个孩子都站在母亲一边，同父亲断绝了来往。他们的女儿索菲娅对希腊《自由新闻报》记者说，自从她父亲与其情妇莉娅妮生活在一起后，她母亲非常气愤，不思茶饭，其内心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他们不能容忍父亲的行为。

年届古稀的帕潘德里欧同一个年龄比他小一半多的航空小姐发生婚外恋，使他在一个极其重视家庭的国度里，特别是在妇女和正统基督教徒中的威望一落千丈。更由于帕氏坠入爱河，政事荒疏，无心过问，导致党内出现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丑闻，内部矛盾激化，使执政党威望陡降，在1989年举行的大选中，帕潘德里欧领导的全希社运仅获39.1%的选票，被一举赶下了台。

#### 尴尬婚礼众叛亲离

年届古稀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不甘年迈，偏爱风流，终因婚外恋桃色丑闻而声名狼藉，被希腊全民大选撵下台。为了挽救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帕潘德里欧决定与原配夫人正式分手，而与比他小一半多、芳龄34岁的情妇迪米特拉·莉娅妮正式结婚。

1989年7月13日晚，帕潘德里欧和莉娅妮的婚礼在雅典近郊的小城波

利特伊雅的一座教堂举行。婚礼是按照希腊的传统方式进行的。新郎先到教堂，向等候在那里的男亲友们致意答谢，然后新娘出现。新郎吻了新娘以后双双进入教堂。按照希腊传统的仪式，婚礼由教堂主事主持，新郎穿着大礼服，手挽新娘，进入铺着红地毯的大厅。

这位不久前还躺在医院急救病房的新郎，尽管脸上涂着厚厚的化妆品，仍掩盖不住他的病态。他不时挤出一丝笑容，向周围宾客点头致意。

新娘咪咪比帕潘德里欧高出一头，在众目睽睽、不断闪烁的镁光灯面前，她勉强地露出应酬的微笑。由于处境尴尬，她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花枝招展、性感挑逗式的形象，打扮得朴素端庄。

这是一次很苦涩、很简单的婚礼，没有唱诗班，没有乐队，没有欢乐气氛，一共才进行了 33 分钟。唯一的陪衬是少量的鲜花。一切都是按帕潘德里欧的要求安排的。男女双方宾客都是经过仔细选择的，因而拒绝邀请的人不多。帕潘德里欧的 4 个子女是属于拒绝邀请的人，他们不能原谅他们的父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在力图打消父亲与咪咪结婚的念头，但是他们失望了。他们断绝了与父亲的关系。

尴尬的婚礼结束了。为了一个女人，他失去了家人，也失去了千千万万无数拥护过他的选民。他的声望一落千丈，并从总理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等待他的将是两个特别高级法庭对他的审理：一个是专门审理帕潘德里欧执政时卷入的希腊最大银行丑闻案；一个是专门审理帕潘德里欧执政期间支持授意属下搞“非法窃听电话的活动”，触犯国家禁止窃听的有关法律案件。新婚后的帕潘德里欧不但没有可能重登政坛，而且很有可能被判有罪，锒铛入狱。

## 神秘女郎入国会英伦三岛齐震惊——发生在英国政坛的桃色丑闻

1989年初，英国以“丑闻”为名把1963年涉及国防大臣的“普罗富莫丑闻案”搬上了银幕。当年的普罗富莫作为英国国防大臣是有可能入主唐宁街首相府的政坛新秀，正在走红之时，却被新闻界爆出与高级妓女娅娜有染，而她同时又与苏联驻英大使馆武官伊凡诺夫相好，国防大臣与有间谍嫌疑的苏联武官有共同的女友的丑闻震动了英国，不但普罗富莫丢了官，内阁也因此而倒台。

就在旧事重提之际，3月上旬英国《世界新闻》杂志又爆出了一起类似当年丑闻的“帕梅拉案”，震动英国政坛。

### 印度玫瑰艳名四播

这次丑闻的女主角名叫帕梅拉·巴迪丝，27岁，印度出生，有西班牙血统。帕梅拉体态丰满，绰约多姿，颇有性感。曾当选为1982年的“印度小姐”，因嫁给一法国男子而入了法国籍，但这场婚姻仅维持了数月。其夫波迪说，她嫁给我，目的只是为了取得法国护照。

帕梅拉不是一个普通女郎，而是有鸨母在幕后替她安排“工作”，有经理人，形象设计师，以及语言专家帮助她发展“事业”。据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周刊报道，帕梅拉当上印度小姐后，即到美国竞选世界小姐，竞选失败后，她来到纽约，这时已身无分文。在纽约，她结识了一位名叫斯瓦米的可疑商人。斯瓦米经常利用应召女郎为他的国际性买卖服务，他看中了帕梅拉，把她培养成了一名高等妓女。帕梅拉在她的笔记中写到：“我们周游全世界，到美国、挪威和瑞典旅行。我从没有看到这个斯瓦米结过账，但我们却经常住高级旅馆，特别是经常住希尔顿旅馆。他同那些为我们支付费用的商人会晤，当然，奖品就是我。”

几年以后，帕梅拉来到了伦敦，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她的通讯地址簿上就增加了许多名人的地址，很快就跻身于英国政坛的名人行列。丑闻爆出前，她被认为是伦敦社交圈10大活跃女人之一。她认识很多外交官，到过10多个国家大使馆包括美国大使馆参加酒会。她的客人包括文人雅士、商业大亨、娱乐界名人、政界要人，甚至皇室成员。她有时陪客人出国公干，也常到欧洲大陆活动。她的服务费由500至20000镑不等，每周收入平均超过5000英镑。

### 结识附马共度良宵

1988年夏天，一向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的帕梅拉突然喜欢上了骑马，认识她的人无不感到奇怪。有消息说，教她骑马的是英国女王的附马爷马克·菲利普斯上尉。对此，帕梅拉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当然，我是认识马克·菲利普斯的。我曾在他领导的一个中心学习骑术。但我没想到他是那么平易近人。我还记得，当我看到他同安妮公主的结婚照时，我心中说：‘她真有运气。’我认为他长得十分英俊，与他相比，参加那次周末活动的其他的人都令人厌烦。大家都称他为‘上尉’，但我心中却在以‘马克’称呼他。我感到我已引起了他的惊奇。他一再问我：‘象您这样一位漂亮的姑娘怎么会同这些人处得好？’第一天晚上，我同他见过面，但我没有同他说话。第二天晚餐时我坐在他旁边，喝汤以后，我同他共饮了一杯白兰地酒，彼此交谈起来。我们谈得是那么投机，以至不知不觉晚会已经结束，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彼此分手以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正要躺在床上看电视时，电话铃响了。对方在电话里说：‘喂，是我！您知道……我！您能到我这里来

喝一杯吗？’我穿上工装裤和短袖圆领衫，溜进了马克的房间。我们彼此一言不发，脱光了衣服。末了，他要我在他房间里度过通宵，但我对他说，我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帕梅拉笔记的公布使皇室感到非常尴尬。帕梅拉还曾对人说，她曾在1989年初受过堕胎手术。她说：“我当然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但不能公开其身份，因我不想毁他的前途。我很痛苦，精神快将崩溃。”

#### 国会兼职性爱交易

在帕梅拉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之后，帕梅拉想尝试搞政治。尽管她知道自己是印度人，可能会有障碍，但她有许多有地位的朋友，他们可以帮助她。果然，保守党议员贝宁汉为她作了担保，使她成为下议院的工作人员，并取得了自由进出下议院的通行证。

英国下议院聘用约1800名助理人员、秘书及资料搜集员，三分之一是女性，身为应召女郎的帕梅拉竟成了其中之一。她是保守党议员大卫肖的助理，担任研究及资料搜集工作。她只做兼职，周薪60英镑。因为她是议员助理，而且有“通行证”，可以自由进出国会。她住在国会附近一所价值70多万英镑的豪华寓所，层内装设了“国会电铃”（通知会场表决的电铃）。她说，这铃声很重要，客人会感到方便。

伦敦政界、财界甚至传播界，有多位名人是她的朋友。《星期日泰晤士报》报社社长安德鲁·尼尔，是国际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39岁，一直没有结婚。他在一家夜总会结识帕梅拉之后，遂成好友。

英国体育运动部长莫尼汉认识帕梅拉以后，频频与他幽会，在一起过夜。莫尼汉曾带她出席保守党冬季晚会。帕梅拉透露，莫尼汉曾向她求婚，她则以“经济理由”拒绝，因为莫尼汉一年收入只有4.4万多英镑，不够养活她。

据报界披露，帕梅拉对人说，她曾与一位内阁大臣发生过关系，这位大臣是撒切尔夫人的高级顾问。她所指的内阁大臣并非保守党明日之星莫尼汉，因莫尼汉只是体育运动部长，非内阁大臣。撒切尔夫人有21名男性内阁，其中多人接受访问时均否认牵涉其中。帕梅拉口中的阁员是谁，已成为调查的焦点。有说人，调查人员已知此神秘阁员是谁，只是不便公开其身份。

#### 结交狂人幽会花都

丑闻爆出后，英国对帕梅拉案的调查，逐渐扩展到国外。利比亚领袖卡扎菲的堂弟艾哈迈德·卡扎菲已成为被调查的“焦点人物”。据报道，帕梅拉承认与艾哈迈德·卡扎菲有来往，并与中东和欧洲若干军火商有约会。

艾哈迈德以前是利比亚驻英国外交官，自1984年利使馆人员向示威者开枪击毙一女警后，他与另三人被驱逐出境，后来被派驻巴黎，负责军火采购和收集情报，也替卡扎菲策划恐怖活动，被称为“新狂人”。他是利比亚秘密机构的二号人物。

帕梅拉与艾哈迈德的交情，大约始于1984年。当时，帕梅拉还只是一名神秘军火商人的女“赌本”。帕梅拉在她的笔记里叙述说：“这次我又是被当成了‘礼物’，目的是博得艾哈迈德·卡扎菲—迪亚姆的信任。我们是在米兰见面的，他很快就主动提出为我支付1万美元，存入我在巴黎的账号上。”此后，帕梅拉成了艾哈迈德的情妇之一。艾哈迈德之所以对帕梅拉十分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帕梅拉经常前往离巴黎很近的布鲁塞尔去同北约的高级军官见面。1985年，艾哈迈德请帕梅拉到利比亚同他会晤。帕梅拉说：“我是乘艾哈迈德的私人飞机前往的黎波里的。给我安排的宿舍里摆满了鲜花和



水果。但我被要求不得离开宿舍，艾哈迈德不愿别人看见我。”帕梅拉在伦敦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之后，艾哈迈德与她的幽会也日益频繁。在丑闻爆出之前半年，帕梅拉至少6次前往巴黎会晤艾哈迈德，她还曾坐其私人飞机一起到黎波里海边别墅度周末。

1989年1月，法国情报人员向英外交部报告说，英国“国会研究员”帕梅拉在巴黎有不寻常的社交活动，与利比亚人有接触。这个利比亚人就是以商贸代表名义掩饰的艾哈迈德。可是英国一直没有重视这份情报。帕梅拉还通过艾哈迈德认识多位军火商，其中包括牵涉伊一尼军火丑闻的沙特军火商加殊。帕梅拉曾被邀请到他的豪华游艇度周末。她也是卡塔尔酋长的朋友。帕梅拉还协助埃及穆哈迈德兄弟在商战中战胜对手，至少获得10万英镑的报酬。

#### 各国要求深入调查

帕梅拉的行踪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英国最有影响的周刊之一《世界新闻》对她进行了追踪调查。在丑闻披露前几天，《世界新闻》的一名叫朱迪·麦圭尔的记者给帕梅拉打来电话，要求她证实她过去是应召女郎这一事实。帕梅拉在笔记中写道：“一听到这话，我立即吓得颤抖起来，突然感到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我只能对电话勉强回答道：‘你去问我的律师吧。’”帕梅拉立即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吓得失魂落魄的她前去求安德鲁·尼尔帮助。尼尔劝她离开英国。帕梅拉听从了尼尔的劝告，于1989年3月12日《世界新闻》出版前匆匆离开了英国。

在帕梅拉丑闻发生后，撒切尔夫人立即下令追查是谁给她签发国会通行证的，并要求国会立即撤销。

下议院人士说，此项调查令皇室感到尴尬，因为担保签发通行证给帕梅拉的保守党议员是皇储妃戴安娜童年时代的朋友贝宁汉。他是英国政坛唯一在公开场合获皇储妃香吻的保守党议员。他承认担保帕梅拉获得国会通行证，但强调事前曾详细看过有关她的安全审查报告，认为并无问题，才帮助她领到通行证。他解释说：“每个议员只能担保3个人领取国会通行证。大卫肖的担保期已满，他要请一位女助理，所以找我帮忙。”

工党议员猛烈抨击贝宁汉，指责他盲目作担保人，有损国会安全。有的说，现在要特别关注安全问题，性交易尚属其次。有的则提议，牵及丑闻的议员应接受检查，看是否患有爱滋病。有的说，帕梅拉本身可能只是为了赚钱，但极有可能被人利用以获取国会秘密，调查人员必须注意此点。由于帕梅拉有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英国反间谍组织需重新估计此案对国家安全的影晌。

美国特工人士说，一个与利比亚间谍有密切关系的女人进入美国大使馆，是非常危险的事。白宫要求调查是谁带帕梅拉进入美国使馆的。

帕梅拉事件也使印度尴尬。帕梅拉1982年当选印度小姐后，结交了不少印度名人。印度教圣者真拉华米曾用私人飞机送她赴利比亚会晤卡扎菲的高级助理，进行军火交易。印度当局正调查她在其他军火交易中担任的角色。

神秘女郎帕梅拉震撼了英国政坛，也使国际政坛为之一动。英国、美国、印度等国侦察人员正追踪调查……

## 战后日本最短命的首相——宇野宗佑因桃色丑闻下野记

1989年是蛇年。日本人视蛇年为财年。近年来，在黄金外汇储备、外贸黑字、对外债权、人均收入等各项指标上，日本连连摘取世界第一的桂冠，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展现在面前的是超级经济大国令人眩目的景象。但是，谁曾料到，1989年竟是日本政局风云激荡，丑闻叠起的一年。

1月7日，在位60余年的裕仁天皇驾崩，标志着一个时代——昭和时代的结束。新天皇明仁继位，文人儒者处心积虑，引经据典，改昭和年号为“平成”，意谓“天平地成”、“和平昌盛”。不料国丧大典刚毕，竹下内阁突然倒台。以往一向被人觊觎的首相宝座，却一反常态无人问津。自民党几经动员、物色，终得“洁身自好”、“形象较佳”的宇野出任首相。正当宇野新首相信誓旦旦表示要断然进行政治改革、重建伦理道德之时，一家杂志社却抖出了这位新首相与艺妓有染的隐私，有照片、有证词，真凭实据，全国哗然。从6月2日到8月9日，宇野内阁仅存68天，宇野以“短命”首相载入日本战后史册。

### 几经周折宇野上台

1989年4月25日，竹下被迫引退，成立还不到一年半的竹下内阁宣告解体。竹下内阁解体了，谁来收拾残局？一时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总裁”与“首相”，这两把交椅金碧辉煌，极具魅力。自民党内7大派系，尤其是几个大派的头头，哪个不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然而，这次他们谁也不敢出马。何也？因为他们的屁股上都不干净，他们都与“利”案有这样那样的瓜葛。如若出马角逐，必是一败涂地，所以一个个都很识相，不敢奋勇当先。

竹下在辞职前夕相中了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4月25日，在宣布辞职的当天，竹下派的首领、前副总裁金丸信表示：“现在恐怕除了伊东没有别人能行。”第二天，安倍派、中曾根派、河本派和宫泽派分别召开会议，一致确定伊东正义“继位首相”。共同社当天报道说：“伊东接班在自民党内大势已定。”

然而，伊东对别人垂涎三尺的首相宝座似乎全无兴趣。4月26日，官房长官小渊惠三正式请求伊东接替竹下任首相，伊东以身体不好而拒之。他说：“一旦因病中途辞职，还会给国际关系带来麻烦。”伊东为何坚辞不干？年老体弱故是一个原因（伊东时年75岁，健康不佳，长期患有糖尿病——编者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自民党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此都认识不足，即使他上台，也难以贯彻其廉政措施。一切劝说、“请求”全部无效。5月13日，自民党无可奈何地宣布放弃伊东继任首相。转而选定宇野为继任首相。

宇野宗佑，1922年生。1951年当选县议员。1960年以来，他9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在竹下内阁中任外相。

宇野的荣升，既是自民党各派系妥协的产物，也因为迄今还未发现他与“利”案有任何牵连。“利”案以后，日本财界一直认为“后任总裁的首要条件是，他必须与利库路特案件没有关系，是一位清白的人。”当宇野被确定为自民党总裁时，经济界一要人便指出：宇野很少参与派系活动，也不是以金钱为基础从政的，他给人的印象是诚实的。经济界对宇野的能力也予以高度评价，称赞他“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对外交和经济有高深的见解”，并能“结束因政局混乱而造成的政治空白”。

1989年6月2日，宇野新政权诞生。宇野被选为自民党第13任总裁和日本国第75任首相。面对国民因利库路特案对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宇野在他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表明：“我们应该反省过去，面向未来，建立清新的党，以重新取得国民的信任，认真地实施政治改革大纲”，“解决确立政治伦理等问题”。他在新内阁中起用了一批年轻人，并且改变过去选任与首相同派人为官房长官的作法，任命安倍派的盐川（宇野为中曾根派——编者注）为官房长官，努力给人以务实和清新的印象。

宇野面临的是自民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涉嫌接受利库路特公司贿赂的国会议员有40余人，中曾根、竹下都未能幸免，宫泽喜一、长谷川峻、竹下登均因此而辞职，民意测验对竹下内阁支持率最低，只有9%。宇野内阁上台以后，人们拭目以待，期望宇野能使动荡不已的日本之舟驶向平稳的海滩。

然而，愿望只是愿望，日本政坛并未因此而趋向稳定，宇野上台刚一个月，就陷入东京新闻界的包围之中，日本政坛又掀起轩然大波。

#### 丑闻曝光穷追猛打

日本新闻界素以穷追猛打、刨根问底的泼辣作风而著称于世。在洛克希德贿赂案、利库路特股票案中，新闻界跟踪采访，起到了检查部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宇野的桃色丑闻也源出于新闻界。

6月5日，宇野新政权上台的第3天，东京《每日周刊》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有关宇野首相丑闻的文章。据一个名叫那阿西，现年40岁的神乐坂原艺妓揭露，从1985年至1986年间，宇野同她“相好”过5个月，为此他一共支付了300万日元（合2.1万美元）。

时隔不久，6月22日《新潮周刊》又爆出另一新闻：就在宇野与神乐坂艺妓相好之前一年多，宇野与原赤坂艺妓波津子保持了10年之久的关系，直到1984年将她抛弃为止。在这期间，宇野每月给他10万日元（700美元）。此后，《新潮周刊》又“乘胜追击”，披露了宇野首相前秘书的揭发材料，说从1962年到1972年，宇野曾付一笔数目不明的钱给银座一间酒吧的女老板，那名现年50来岁的“半老徐娘”在同宇野“相好”期间曾怀过孕。

接着，东京小报又传出消息，说66岁的宇野竟与一个16岁的雏妓有染。日本新闻界沸沸扬扬，海外舆论连篇累牍地转载、评论，日本朝野震动，宇野坐立不安。舆论猛烈地冲击了永田町（日本自民党所在地）和霞关（日本政府机关所在地）。

宇野与艺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6月18日，《每日周刊》以《宇野首相的丑闻》为题，发表了专题采访，现转载如下：

宇野首相不是靠“政治实力”而是靠“廉洁正派”登上首相宝座的。但是，有人在问这位新首相“你做人的道德哪里去了？”“用金钱可以玩弄女人吗？”诸位请听听被他玩弄过的妇女的“控诉”吧。

我们假定把这位妇女称为“A子”。A子是一位美人，现在东京一家设计公司工作，40岁，过着单身生活。1985年，她不顾旁人的反对，与丈夫离了婚。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便在东京新宿区的花柳街神乐坂当了艺妓。

采访长达6个小时。

问：你具体介绍一下同宇野首相的关系，好吗？

答：我是艺妓，他一见钟情，就成了我的“丈夫”。宇野先生通过料亭（高级酒馆）女老板告诉了我所在的艺妓馆里的女老板。

问：有金钱上的授受关系吗？

答：当时得到了 200 万日元。是现款，不是转账支票。装在一个信封里给我的，信封上印着议员会馆的字样。钱是包在一张粉红色的信纸里。

问：你和宇野首相最初是怎么认识的？

答：是我去料亭陪客途中被他看到并向别人打听我是谁的。从那以后过了一周或 10 天的样子，在一家料亭的二楼正式认识了宇野首相。他问我“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便叫人拿来一本他写的介绍他的故乡的书给我，并强调让我看作者介绍。上面写着科学技术厅长官、通产大臣等头衔。我想他是借以炫耀自己。然后他捏住我的 3 个手指问：“这个数如何？”

问：作你“丈夫”时举行过什么仪式吗？

答：在料亭，先生和我，另外还有两家酒楼的女老板，4 个人一起用啤酒干杯，吃饭。

问：除前面谈到的 200 万日元以外，还有什么钱吗？

答：年底先生回故乡滋贺时，给了我 100 万日元。除此以外，再没给什么钱了。

问：他说作你“丈夫”，提出什么条件了吗？

答：说不能生孩子，随叫随到。其他随我的便。

问：你们双方没有长时间保持关系，是有什么原因呢？

答：那年新年发生了妈妈（艺妓对其女老板的称呼）被气哭的事情。每年新年，宇野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款待一次支持他的人。记得是 1 月 3 日或 4 日的事。我负责为来客分发“丈夫”的礼品袋，艺妓馆的女老板为欢迎她店里艺妓的“丈夫”到来，高兴地跳起了舞。当我必须告辞去招待客人时，妈妈觉得是新年第一次相见，便说“先生，你去送送她吧！”可是宇野先生却说“为什么要我去送？岂有此理！”接着他又朝着妈妈骂道：“没请你来，就擅自跳舞摔倒献丑，没有教养！”妈妈已是老太婆，而且她在跳舞时也根本没有摔倒。宇野先生的所作所为，不仅不象个男子汉，而且是欺侮人。

另外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到我家，说“我回到了东京，快告诉我你的公寓。”我回答说：“不要来，我家很乱。先生，我是女人，请你不要来。”可是他还是找来了。他可能认为，是他付了钱，随便怎样都行。我感到，宇野先生在心理上对我构成了一种压力，我不仅不能以与他的关系为骄傲，而且害怕暴露出来。如果让人知道，我就不能接客了。

问：你“告发”当代首相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答：也许有人会说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谈论一度相处的人是泄私愤。可是他现在是一国之首相，如果他以对待我的那种轻率态度来处理国家政治，就实在不能容忍了。欺侮软弱老太太的人怎么能当一国首相呢！认为女人可以用钱买来供自己寻欢作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宇野先生的人格不能说是高尚的。

《每日周刊》社为证实这些讲话的真实性，进行了广泛的采访。除那家料亭的女老板否认外，其他有关人士都承认 A 子与宇野的“关系。”

6 月 26 日，星期一：宇野首相会见记者团，连连表示“无话可说。”

妇人觉醒国人同抗

宇野的风流韵事在报刊上披露后，不仅在政界、财界引起强烈反应，在妇女界也掀起了阵阵波澜。

日本是一个男权主义社会，日本妇女的地位在世界上名列第 34 位，这与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来说是很不相称的。目前，日本在教育 and 就业方面对女性的歧视仍是严重的。1988年有关部门曾对日本1000家公司作了调查，结果发现担任部门级负责工作的妇女只有150名。虽然日本在1985年通过了不准在就业机会中歧视妇女的法令，但是迄今为止，日本妇女还只有“乞求”——而不是“要求”工作的权利，而违反法令的雇主则依然“逍遥法外。”

对丈夫在外寻花问柳，日本妇女一般也不闻不问。一名有3个孩子的42岁的母亲说：“日本女人对她们丈夫的艳事一般都持不闻不问的态度。她们认为只要男人不将那一身脏病带回家就算了。”

日本妇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确非易事。在宇野桃色风波中，妇女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男人，而是一国首相。人们不能想象一个艺妓会出面揭露首相，并当着电视观众的面怒斥，“象他那样恶劣对待女人的人根本不应该成为首相。”人们也不会想到，宇野丑闻竟唤起了日本妇女的觉醒。

6月13日，日本7个妇女团体联名提出抗议，并开始走上街头抗议，舆论沸沸扬扬。东京一名女政治评论员慷慨激昂地说：“时代已经彻底改变。即使日本还是个男性社会，这种事也不应该再发生。我们妇女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我们决不允许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对待女人就象对待一双破袜子一样。”

当然日本舆论对艺妓的评说不一，但所有的目标都集中在宇野身上，宇野成了众矢之的。长期以来以描写男女恋情闻名的作家濑户内寂德撰文认为，选择这种妇女的男人没有资格当首相，怎么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没有眼力的人。评论家盐田丸男也认为，这个艺妓的作法虽然并不光明正大，令人厌恶，但事情已经在电视上曝光，宇野应该在公共场合明确承认。

日本国内妇女团体紧紧抓住宇野丑闻，将此作为宇野对待妇女“人权”的态度，追究首相的“性道德。”妇女们认为，首相的行为是用金钱买女人的买春行为，是国民难以接受的。“财团法人日本基督教妇女矫风会”、“亚洲妇女会”、“新日本妇女会”等组织纷纷呼吁，“不准宇野欺侮妇女”和“宇野早日下台。”

日本女评论家口惠子和法政大学教授驹尺喜美两人主办了一次“宇野问题座谈会，”与会者150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参加座谈会的日本女性一致认为，许多上层社会的男士们凭借权力和金钱把女性占为己有，这样是无法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的。第二天，主办人将抗议信亲自送到首相官邸。这份抗议信说，首相的女性问题并非私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尊严的政治性的根本问题。首相至今不对此事作出明确答复，这是不能容忍的，要求首相马上辞职。这场由新闻界掀起的轩然大波，辅之日益觉醒的妇女斗争，使宇野政权四面楚歌，摇摇欲坠。

#### 六十八天的“短命”首相

一度被认为“天使般纯洁”的宇野，6月2日坐上首相宝座，正待踌躇满志，推行他的政治革新，根本没有想到马上陷进了桃色丑闻的泥潭中。

当种种传闻一出，日本朝野轰动。据自民党内的工作人员说，宇野波这些新闻报道震撼得“差点昏倒，”以至于不得不被人抬上床“以恢复镇静”。但在表面上，他最初表现得十分镇静，保持沉默，并坚决予以否认。自民党桥本干事长一面应付记者团说，“我不知道，什么周刊，我没读过”，一面加紧研究对策。当《华盛顿邮报》记者东乡茂彦打电话采访首相府秘书官森

真一郎，要求他说明情况时，秘书回答：“这不是事实”、“首相自己不想说明”。首相秘书小林恒盛在回答《每日周刊》询问时也说，首相“没做此事，问心无愧”。

随着舆论高涨，妇女斗争，在野党抨击，议员质询，宇野开始慌乱起来，因为无论如何表白，也掩盖不了事实。在国会社会党质询时，宇野不得不表白：“我生来爱护妇女，自认为是男女平等主义者，由于过子敬爱妇女，而度过了无数个热情的夜晚。但是感到政治家是神圣的职业，便克服了自行的烦恼，结束了与妻子之外的女性的关系，接受了无人担任的首相职务，为国家献身。”宇野的这段表白实际上承认了过与去艺妓的关系。

6月26日，宇野会见内阁记者团，面对记者们咄咄逼人的攻势，宇野已无退路，只是连声说：“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宇野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他将不得不辞职以谢天下了。6月27日傍晚，宇野流露出辞职的念头，但是桥本干事长极力挽留。可以想象，如果宇野立即辞职，必然给即将到来的参众两院选举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自民党内部一致要求宇野坚持到众院选举。

7月24日，参议院选举揭晓。126席改选议席，自民党只获得36席，加上未改选议席共109席，在252个席位的参议院中失去了34年来一直为多数的优势。而社会党在其女首领土井多贺子的率领下，争取到多张选票，议席大增，加上该党推荐的无党派议席达86席，这样，在野党与执政党议席之比为141：111，第一次超过了执政党的自民党。

自民党参议院选举惨败引起日本社会的巨大震动。7月24日上午，宇野不得不在永田町紧急会见记者，宣布他对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失败“负全部责任”。他声泪俱下地表示：“失败的责任全在我，我已决心辞去首相和总裁职务。”当记者们追问“桃色事件是不是影响到参院选举”的问题时，宇野没有正面回答，但间接予以承认“责任全在我”。

1989年8月9日，58岁的海部俊树继任自民党总裁、日本国首相，宇野内阁正式倒台。宇野引咎辞职是继竹下登下台，日本在一年中因丑闻而下台的第二位首相，这表明自民党已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

从6月2日到8月9日，宇野政权只存在了68天，这是日本战后“寿命”最短的首相。

## 昔日人权领袖今日吸毒市长——美国华盛顿市长巴里吸毒被捕案

1990年1月18日晚，已连任11年华盛顿市市长的巴里在华盛顿因吸毒被抓。这是他自1988年12月涉嫌吸毒以来，第一次被当场抓获。一时成为令美国民众震惊、新闻媒介关注的事件。

### 涉嫌已久苦无证据

多年来，有关巴里市长吸毒的传闻，一直没有间断过。1981年，华盛顿市第一次盛传市长巴里是个“瘾君子”，有人声称曾在市中心的一个酒吧里见到他吸毒。司法部门认为这可能只是谣言，未予理睬。巴里本人也公开出面否认。那时，华盛顿市民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市长——曾经一再表示要坚决肃毒的市长，会成为“瘾君子”

事过3年之后，巴里又一次卷入与毒品有关的风波。一位名叫凯伦·约翰逊的女工受到联邦法院的审讯。凯伦被指控非法销售过可卡因。有证人作证说，凯伦还曾经为巴里市长提供过毒品。但是当审判人员询问此事时，凯伦拒绝回答，结果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而已里则表示与她只是有“个人”关系，否认曾经购买过任何毒品。

在当时，巴里的地位不是轻易可动摇的，因为巴里尽管陷于困境，但他在这个黑人占大多数的城市中不仅仅是名黑人市长而已，在华盛顿许多选民的心目中，他是地方自治的象征。美国国会在历经当地黑人与白人连续数年的抗议后，于1973年同意该市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在华盛顿，地方自治意味着黑人自治，黑人政治家不仅视这一城市为黑人政权的堡垒，而且认为还是全国黑人的政权堡垒。而现在铺天盖地涌来的对巴里市长的批评，在黑人团体看来，则是白人企图重新控制这一地区政府的阴谋。所以，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在他1991年任期满之前是决不会下台的——除非他受到起诉。

但从那时开始，巴里已引起缉毒人员的注意。尽管没有人知道巴里的秘密，但是可以肯定，以前的传闻不再是无中生有，巴里确实与毒品有着某种牵连。联邦调查局开始注意上了他，对他的调查跟踪不断加强。1988年，联邦调查局制定了代号为“毒刺行动”的秘密调查计划，这一计划是经司法部长索恩伯勒审阅并批准行动的。

### “毒刺行动” 张网以待

1988年12月，联邦政府开展了一场反腐败的调查运动。22日深夜，两名华盛顿市的警官来到拉马达饭店，任务是向往在这里的一个名叫查理斯·路易斯的房客进行调查。此人当时49岁，住在拉马达饭店，经常与该饭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勾搭。他为她提供可卡因，她则向他出卖肉体。据报告此人还曾向其他人兜售过可卡因。

当两名警官来到饭店第9层路易斯的房间猛地推开房门，正准备冲进去时，突然象中了定身法似地僵住了。原来在里面的不但有路易斯，竟然还有本市第一把手巴里市长。这两名警官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但是公事归公事，他们向市长说明了目的后就开始盘问起路易斯。但还没有问上几句，对讲机里就传来了“撤回自己管区”的命令。

事后，“巴里市长同贩毒分子在一起，并妨碍公务”的消息传开了，华盛顿舆论哗然，又一次将巴里市长与吸毒牵扯到一起。为此，联邦法院成立了大审判团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巴里先后两次出庭，否认他曾经从路易斯那里购买毒品，否认自己曾经吸毒。他说，这种事情与他的性格、身份和人格根本连不到一起。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据，公开调查只好中断。此后，联邦

调查局人员开始对“拉马达饭店事件”进行周密和严格保密的调查。

从1989年起，联邦调查局人员对路易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调查。这年3月，正当路易斯在维尔京群岛向一名联邦调查局便衣出售可卡因时，一付冰凉的手铐铐住了他的双腕。同年4月，路易斯在华盛顿受到审讯，他被指控犯有“向联邦大陪审团撒谎及非法拥有毒品罪”。此时联邦调查局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小小的路易斯已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真正的目标乃是路易斯背后的那条“大鱼”——巴里市长。在经过幕后一番交易后，路易斯同意同联邦调查局合作，参与对巴里的秘密调查，作为交换条件是联邦法院将撤销对他的某几项罪行的起诉。路易斯陆陆续续向联邦调查局招供了他曾同巴里一起吸过几次毒。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在路易斯的帮助下，联邦调查局陆续收集到了对巴里市长相当不利的“确凿证据”。到年底，联邦调查局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张网捕鱼”了。

物色诱饵布下陷阱

“毒刺行动计划”成熟的一个主要标志是联邦调查局物色到了关键的“诱饵”——巴里市长长期以来的“朋友兼情妇”、前时装模特儿拉希达·莫尔。

路易斯在拉马达饭店事件后与巴里断绝了一切来往，他做内线已不大可能。但他供出了巴里的情人莫尔小姐。他向联邦调查局透露说，他们3人曾在一起抽过“快克”（毒品名称——编者注），巴里对莫尔的感情根深，完全可以选她做内线人物。在哥伦比亚特区警方的协助下，联邦调查局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了莫尔。在晓以利害关系后，莫尔终于同意合作。于是，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维斯塔国际旅馆设下了圈套。

1990年1月18日，星期五。华盛顿市长巴里处理完一天的公务，该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了。中午他接到女友拉希达·莫尔的电话，说她住在维斯塔国际旅馆的727房间，要他晚上前去会她。莫尔是当年顶顶有名的黑人模特儿，尽管时年已38岁，膝下有3个孩子，但仍然风韵未减，十分迷人。自1979年巴里与莫尔相识以后，两人常在一起吸毒、寻欢作乐。如今，莫尔小姐来到了自己家门口，巴里当然要去看看这位“宝贝”的。

维斯塔国际旅馆7楼，联邦调查局包租了相连的3间客房。在莫尔居住的727房间里安装好了秘密录像录音装置。

晚7点半左右，巴里的黑色豪华卧车在维斯塔门前停下。身材高大的他步履潇洒地跨进饭店大门，乘电梯来到第7层，敲开了727房间的门，莫尔正在房里温情地等待他。

尚未落坐，莫尔向巴里介绍了她的一位“女友”。巴里漫不经心地向这位女友打过招呼，就脱去了身上的大衣，与莫尔谈笑起来。几个月不见，两人谈得格外亲热。20分钟过后，巴里就直截了当地向莫尔提出能否搞点毒品吸，这时，莫尔的“女友”言听计从，一转身出了房间，不一会儿她就带回了一包价值60美元的可卡因。这位市长并不知道，莫尔“女友”的可卡因是到隔壁房里取来的，而在隔壁的2个套间里，早已有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和华盛顿警察厨的工作人员在那里秘密录下了他们的一举一动。

当莫尔的“女友”回到房里后，巴里在付了钱以后就自己迫不及待地吸食可卡因。他还一边同莫尔亲热，一边请她也来“试一试”。就在巴里心满意足地吞云吐雾时，突然，门被撞开，数名身材魁梧的警察闯了进来。他们迅速将明晃晃的手铐牢牢地铐在了市长大人的手上。这位身材高大的黑人市长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得目瞪口呆，片刻后他才好象醒悟过来，对着莫尔



破口大骂：“你这臭婊子把我给卖了！”

巴里马上被带到联邦调查局总部进行指纹、血、尿等方面的化验。律师杰伊·斯蒂芬斯向新闻界宣布，各项化验结果都证明巴里的确吸了毒。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道工作程序而已，调查人员已经看到巴里吸毒的全过程。

这位总是一次又一次在政治和个人危机的边缘“跳着狐步舞”，而且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的市长，他在新闻界面前，在他的选民面前，甚至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再三矢口否认自己有吸毒恶习。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真可谓机关算尽，声败名裂。

灵魂悲剧悲哉哀哉

华盛顿市长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美国各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和世界四大通讯社纷纷予以详细报道。消息迅速传遍了美国和全世界。

时年 53 岁的巴里已经连续担任了 11 年的华盛顿市市长。早在 60 年代，巴里就已成为闻名全国的黑人政治活动家。那时，他雷厉风行，再加上他那雄辩的口才，每到一处作演讲时都要受到热烈的欢迎。

巴里出生在美国南方一个不太富裕的黑人家庭，但由于他的才华以及顽强的奋斗，1979 年他当选为华盛顿市长。从处理政务来说，他是一位合格的市长，甚至有人说华盛顿市少了他就无法运转。因此，他连续 3 届当选。就在事发前 4 天，1 月 14 日，他表示将于 21 日宣布竞选第 4 任市长。但是，他没能经受住毒品的诱惑，终于成了可卡因的俘虏，从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对巴里市长被捕一事，在美国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在他被捕的当天夜里，一群群记者拥进他家，一个个电话令他妻子应接不暇。市长官邸外整个夜晚喧闹不停，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时一闪一闪。后来，巴里的一位朋友闻讯赶来接走了他们 10 岁的儿子，以免孩子受到过份刺激。

第二天，巴里被法庭传讯时，法院门口人山人海，新闻记者、围观群众数千人。市长及夫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过人群，在记者们兴奋、嘲弄、鄙视和好奇的目光和照相机不停的“咔嚓”声中进入了法院。许多群众对巴里的被捕表示庆幸。因为近年来华盛顿发生的与毒品有牵连的暴力事件是骇人听闻的。自 1985 年以来，这一地区的杀人数字从每年 148 人激增到 1988 年的 372 人，增长了 151%。如果就人口比率而言，华盛顿市在全国首屈一指。在这个人口为 62·5 万的城市中，1988 年每 10 万人中，就有 60 人被杀。华盛顿市享有“谋杀首都”的恶名。现在，这位曾在学校和工厂等公共场所多次大声疾呼禁毒的市长，成了贼喊捉贼的吸毒市长。美国《新闻周刊》认为，巴里的被捕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首都的悲剧，标志着首都肃毒战役的失败。

但是，也有一些一贯支持巴里的人持另一种看法，认为巴里事件是一次政治阴谋，其目的是搞垮黑人领袖，从而恢复白人对首都的控制。华府吸毒的官员多的是，但联邦调查局却视而不见，为什么单单拿一位黑人市长开刀？而且又设计出如此严密的逮捕计划。即使如此，这些人在为之“扼腕痛惜”的同时，也认为这是巴里“咎由自取”，他们普遍认为“巴里早应该意识到这一危险”。

巴里市长吸毒被捕，对布什政府来说也是一种难堪。美国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说服拉美各国参加扫毒运动，但是现在却出来个吸毒市长，而且还是首都的市长。拉美各国报刊闻讯竞相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并配以大幅照片

作了报道，这对美国政府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 重罪判处惨别政坛

1990年1月19日，联邦法院正式传讯巴里到法院“作证”。经法院裁定，巴里犯下了“非法拥有毒品和吸毒罪”。有关方面认为，对他的指控可能还不止这些。法院允许他暂时在家候审，但条件是他必须每周定期接受吸毒化验。巴里这次没有提出无罪申辩，也没有向法院发表任何声明，更没有像以前那样否认自己吸毒和喋喋不休地指责《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新闻媒介是在故意“整他”。1月21日，巴里在本来计划要发表第四次参加市长选举声明的日子，在离他公寓不远的圣提莫西教堂做完祈祷后，痛苦地宣布，将华盛顿市府的日常工作交给市长助理卡洛尔·汤普森处理。巴里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

自5月起，巴里在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接受审讯。围绕法庭调查，辩控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检察官在向法院提出的诉讼中，列举了巴里14项罪名，其中有3项是向司法部大陪审团作伪证，有10项是拥有毒品，有一项是企图拥有毒品。如果这些罪名成立的话，巴里最终可能被判26年徒刑，并得以185万美元的罚款。

在从6月4日到7月底的法庭调查中，检查官共传唤26人到庭作证。据检察官方面透露出的消息说，共有10人作证说巴里曾在哥伦比亚特区、亚特兰大、维尔京岛和巴哈马群岛等地吸毒200余次。这些作证的人大多数是巴里以前的仆人、保镖、秘书和密友等。巴里的旧日情妇莫尔作证说，从1986至1989年，他俩在旅馆、游艇和家里一起吸毒至少100次。

巴里的辩护律师肯尼思·芒迪在法庭上同检察官针锋相对，从几个方面为巴里辩护。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芒迪指出，检查官提供的证人所说的巴里使用可卡因的时间、地点、细节都对不上口，因此他断言那些证词无法证明被告有罪，他只承认巴里偶尔有吸毒行为。

——对联邦调查局用诱骗方式逮捕巴里提出异议，并对“主要证人”莫尔小姐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追问，以致莫尔小姐不得不承认在巴里最后拿起莫尔给他卷的“快克”之前曾7次拒绝吸毒。

——把巴里吸毒案与种族斗争联系在一起，以影响陪审团的裁决。在法庭上芒迪还抖出了联邦调查局内设有一支“突击部队”的内幕。芒迪指出，该组织专门在全美各地骚扰黑人官员。而这个“突击部队”的负责人就是指挥这次诱捕巴里行动的特工人员罗纳德·斯特恩。

芒迪咄咄逼人、铿锵有力的辩护，使陪审团对巴里市长的指控意见不一。8月10日，陪审团判定巴里仅犯持有毒品罪一项罪名，并宣布对他的另一项指控的审定无罪，而对其余12项罪名的指控因陪审团意见不一，杰克逊法官宣布审理无效。

当法庭宣布裁定后，巴里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他走到芒迪跟前，与他紧紧拥抱，眼泪夺眶而出。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拥有毒品”是一种行为不端的轻罪，判处极为宽松。所以，巴里异常兴奋，他以为将轻松过关，并宣布他将改变主意，参加下届市长竞选。他雄心勃勃地表示，至少要在由13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里谋求一席之地。

就在巴里欲重振旗鼓，再展宏图之时，联邦地方法院于10月26日对华盛顿市长巴里吸毒案进行了宣判。主审官杰克逊宣布，巴里因持有毒品罪而

被判处半年徒刑， 5000 美元罚款和缓刑一年。

杰克逊法官在宣判时对旁听观众说：“巴里市长的声望鼓励其他人去效仿他。由于他没有为华盛顿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他现在必须成为另一种榜样。”他还说，巴里市长的职位及他辜负大众信任的行为就足以加重刑。杰克逊法官还命令巴里在服刑期间参加戒毒计划，并说，巴里在一年缓刑期间要接受吸毒抽查。此次宣判意味着巴里政治生命的终结。

## 后 记

当代西方社会，政坛丑闻屡见不鲜，资料浩如烟海。本书在编写中，主要引用了以下书刊：《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世界知识》、《国际展望》、《海外星云》、《编译参考》、《瞭望》周刊；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法国《观点》周刊、《费加罗报》；西德《明镜》周刊，《美国丑闻大全》、《西方政坛丑闻纪实》等。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全书由杨江华选题、指导写作并审阅定稿。其中杨江华撰写 10 篇、李伟北、曾伏华、王亚军各 4 篇、张文庆 3 篇、刘平 2 篇、孙德强 1 篇。

限于编写者的水平，书中不当的地方，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 年十二月

